

开到荼蘼花事了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与《新民报》





“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1949年前后的曹聚仁



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
——成舍我与《世界日报》

所有的选择都合逻辑

所有的结局都有宿因

向左走 向右走

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

陈建云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旧上海望平街的报馆，给乱世中国留下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铁肩道义和妙手文章，相信中国报人的智慧和风骨仍将薪继火传。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　周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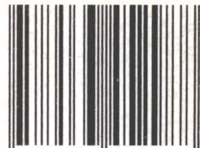
史料翔实，引人入胜。中国新闻界曾经的历史，中国报人曾经的时代风云，让我们无限感慨！

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



上架建议：新闻·历史

ISBN 978-7-5334-5298-8



定价：36.00元



向左走　向右走

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



陈建云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 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左走 向右走：1949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陈建云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334-5298-8

Ⅰ.①向… Ⅱ.①陈… Ⅲ.①报刊一新闻事业史一中国 Ⅳ.①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3914号

向左走 向右走
1949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
陈建云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出 版 人	黄 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0591－83752790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福州西洋路4号 邮编：350005）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1千
插　　图	56幅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298-8
定　　价	36.00元

遥想望平街当年（代序）

陈建云

从人头攒动的南京东路折进山东中路，穿过九江路和汉口路，向南一直走到福州路，上海这条长不过200米、宽约10米的马路，在当年的十里洋场，有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望平街。近人叶仲钧在《上海鳞爪竹枝词》中吟咏："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这条马路的赫赫声名，来自它一街两行鳞次栉比、形形色色的报馆。

1872年，英人美查创办的《申报》首先在望平街设馆。20余年后，美商福开森的《新闻报》也在这里开业，与申报馆衡宇相望，互争短长。1904年，国人狄楚青设时报馆于福州路、望平街口，与《申报》、《新闻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尔后，《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天铎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权报》、《民国日报》、《晶报》、《立报》等数十家报馆相继在此安营扎寨或设立批销处，就连"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天津《大公报》，也歆羡望平街这块"风水宝地"，于1936年派人马南下上海，设立分馆。望平街，这条狭短的陋巷，成为举世闻名的报馆街，中国报人心中的"罗马"。

曾经是望平街一员的曹聚仁，新中国成立后寓居香港。上海的这条马路，常使他魂牵梦绕："望平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跃着，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

曹聚仁生于浙东乡村，他说自从自己有了知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便"如雷贯耳"了。后来到杭州读书，对上海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当然，最向往的便是望平街，因为"那是光照世界的文化灯塔"：

“短短望平街，代表着西风吹动以来的中国文化，从这一街巷的浪潮上，体会着时代的脉搏。从启蒙运动以来，每一个和政治动向有关的人物，没有不在望平街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的确，一部望平街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新闻史，也正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史。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报纸的独立，不被利诱，不为势屈。

1915年8月，“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轰动南北，使意欲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备受挫折，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携带30万元巨款到上海“运动”报界，为复辟帝制寻求舆论支持。当薛大可把15万元支票送到申报馆主史量才的面前时，遭到史的断然拒绝。9月3日、4日，《申报》连续两天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将这一丑闻公诸天下，并明确表示:“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正真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诪张，环境险恶，史量才为使《申报》免遭摧残，言论上采取审慎态度，着力于企业化经营，更新设备，兴建大楼，招揽广告，扩大发行，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攀升，稳固了《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大报地位。但是，信奉“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国将非国，报将非报，人将非人”的史量才，绝非追名逐利之徒。1932年，他借《申报》创刊60周年之机，对报纸实施全面改革，“以极挚诚的态度，对政府、对国民尽舆论贡献之责任”。同时，报馆开办流通图书馆、妇女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出版月刊、年鉴、丛书、地图，服务社会，启迪民智，以文化事业“救国难”、“策危亡”。“一·二八”淞沪抗战，史量才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维持会解散后，又被推选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他又与朋友合办中南银行，获得成功。史量才成为上海滩舆论界、金融界和社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国民党处理当地事务，几乎不能忽视他的意见。

史量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民主，主张抗日。据说，蒋介石曾约他到南京谈话，警告他：“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壮语犯颜，蒋氏遂下杀史之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乘车自杭返沪，在海宁翁家埠遭国民党军统特务狙击，当场殒命。一代报人，以身殉报。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新闻的自由，奋起抗争，无所顾忌。

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未经临时参议院授权，颁布《暂行报律》，电传至上海中国报界俱进会，令其转饬全国报馆遵行。3月6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和曾经鼓吹或支持革命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等望平街各报，联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通电各埠，坚决予以抵制：“今统一政府未立，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次日，望平街各报又同时刊出《大共和日报》社长章太炎起草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逐条批驳报律条文，批评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之覆辙”，将报律“却还”给内务部。孙中山得知此事，当即于3月9日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宣布《暂行报律》违背法律程序，予以撤消，并声明：“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因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催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1912年5月20日，《民权报》主编戴天仇（季陶），不满袁世凯政府举借外债，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24字的超短时评《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权，杀！”上海公共租界以“鼓动暗杀”的罪名，将其拘捕。唐绍仪闻知戴天仇被捕，不但没有拍手称快，反而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当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正式公布实施，其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最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以罚洋30元结案。戴天仇

出狱后，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这一事件，却也显示了民国政要尊重言论自由的政治风度。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社会的进步，以笔为旗，前赴后继。

1903年5月，倾向革命的《苏报》馆主陈范，聘请爱国学社学生、年仅22岁的章士钊担任主笔，"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痛感言论奄无生气，人心无从振发，于是在《苏报》上大事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刊登章太炎嘲弄"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文章，不惜以身家性命，"为爆炸性之一击"。清廷大为震怒，指使地方官吏向租界当局交涉，对相关人员实施拘捕。章太炎坐等被捕，"邹小弟"自动投案。被清廷赏予二品顶戴的《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派记者到监狱劝说章太炎，向其宣传封建伦理思想。章太炎嗤之以鼻："去矣，新闻记者！……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章太炎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台，每次审毕，他乘坐马车，高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诗句，意气洋洋地返回监房，万人围观，街衢为之拥堵。"苏报案"历时10月，前后开庭7次，方于次年5月22日结案，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两年。邹容年少气盛，积愤成病，在监禁期满前两个月瘐死狱中，章太炎则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被孙中山派人接往东京，委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重任。

被誉为"元老记者"的于右任，在1909年5月至1910年10月的一年半内，兜转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屡封屡办，坚忍卓绝，连续创办了一脉相承的"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为国民效驰驱，为神州树义声。尤其是《民立报》，在宣传革命、联络志士方面，厥功至伟。孙中山在海外闻讯武昌首义成功，火速归国，抵沪后首次出门拜访的同志就是于右任，并题写"戮力同心"四字勖勉《民立报》同人。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论功行赏，又向《民立报》颁发了"旌义状"。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民族的尊严，众志成城，宁死不屈。

1937年10月5日，《上海报》、《大晶报》、《小日报》、《正气报》、《世界晨报》、《金刚钻》、《东方日报》、《明星日报》、《福尔摩斯》、《铁

报》等10家小报，在淞沪抗战激烈进行之时，联合发行《战时日报》，放弃往日的吟风弄月和追星捧花，担负起建立民族“精神堡垒”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要干这样一张小型刊物，我们是不愿在这大时代行进中，来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未曾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中华民国的百姓，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所以我们要干，干到敌人的铁骑，不再来践踏我们的国土为止，同志们请大家来努力吧！”上海陷落后，日寇强令各报新闻送检。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毅然停刊，迁往内地。与《大公报》一样义不受辱，不接受日寇新闻检查而停办或内迁的报纸有30家，它们是：《救亡日报》、《立报》、《申报》、《民报》、《神州日报》、《战时日报》、《辛报》、《抗报》三日刊、《战时联合旬报》、《救亡周刊》等。

“孤岛”时期，《大美晚报》附刊《夜光》主编朱惺公，因发表痛骂汪伪投敌的文章而收到一封恐吓信，上写“如再恶意谩骂，将被国法宣判死刑”。朱惺公毫不畏惧，又在《夜光》上发表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洋洋洒洒，对汪精卫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章说，汪精卫的行为如欲国人不反对，除非将中国人赶尽杀绝；自己若因反汪而死，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与日月争光。“余生作庸人，死作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1939年秋的一个下午，朱惺公从寓所步行去报馆，路上突遭暴徒狙击，弹中太阳穴而死。一代报人，生为人杰，死作鬼雄！

短短的望平街，与世界潮流同步，呼吸相通。

1917年11月，《申报》的张蕴和、张竹平、伍特公，《新闻报》的汪汉溪、冯以恭，《时报》的包天笑，《神州日报》的余谷民，《中华新报》的张群，《民国日报》的吴苍，《新申报》的席蓉轩，《时事新报》的冯心支，《亚洲日报》的薛德树等上海新闻界代表，组团考察日本新闻业。考察团先后访问了东京、九州、大阪、长崎等地报馆，详细了解和学习东邻新闻业的发展情况与管理经验。

1921年10月，第二次世界报业大会在檀香山召开，我国有董显光等六位代表与会。代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董显光，曾受业于世界

报业大会会长、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因此中国代表团颇受大会欢迎和器重，有四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申报》派出的代表是王伯衡和王天木，史量才虽未到会，亦被推选为大会副会长。

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老板北岩爵士，来沪考察新闻事业。他先后同上海日报公会、新闻记者联合会代表进行座谈，并参观了《申报》、《新闻报》、《大陆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报馆。史量才在巍峨壮观的申报馆三楼餐厅，宴请这位有“舰队街拿破仑”之称的异国同行。高朋满座，意兴湍飞。席上，北岩爵士盛赞《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纸，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百闻不如一见’，此次广观贵国情形，对贵馆方面深抱乐观。”一个月后，世界报业大会新闻调查委员会会长、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也来访望平街。在申报馆举行的茶话会上，格拉士期望中国报界，也能够像美国和列邦报界一样，有独立精神，不受政治潮流之浸润与打击，心力专一，唯人民之幸福是谋。东道主史量才答曰：“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本馆宗旨，迄未偶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本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短短的望平街，有多少报人故事，英雄传说。

创刊于1916年1月的《民国日报》，虽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却是上海有名的穷报馆。某一冬夜，各版新闻都已经排好，天也快亮了，可是白报纸还没有着落。社长叶楚伧和经理邵力子两人，只好脱下身上的皮袍，送到当铺抵押一点钱，买了几十令白报纸，才开机印报。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工作非常努力，报纸内容十分精彩。叶楚伧乃诗酒文豪，在编辑室常常是一边喝高粱，一边嚼花生，一边写评论，酒后文思涌发，气势如虹。后来北伐成功，叶、邵二人都离开望平街进了官场，《民国日报》的声光也就黯淡下去了。

陈布雷也曾经是望平街上的一支健笔。1921年上海《商报》创刊，他担任总编辑，以“畏垒”之名发表的抨击军阀、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政论享誉一时，多为革命报刊所转载。后来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的程沧波，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即开始向各报投稿，文章受到陈布雷的推重，便经常替《商报》写文章。程沧波每于星期六下午去商

报馆看望陈布雷，陈也常常请他到附近的宁波菜馆小酌。1924年寒假，京沪路因“齐卢之战”中断，程沧波无法返乡，就留在上海，天天晚上到《商报》写杂评。《商报》当时经济窘迫，两大间编辑室勉强生了一个火炉，大家围坐其中，几包花生米其乐无穷。程沧波说，他为《商报》写了三四年文章，从没有支取过一文稿费。他当时从梵王渡乘船到租界，几视望平街和自己的老家一样。

《民立报》社长于右任，“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政府捉拿，一度躲到一个名叫“荷花”的青楼女子家里。他当时身上只有12块饭钱，双方说好只住半月。谁知后来无法走脱，于右任在这里又住了五个月，隐姓埋名，看书写字，没有再付一个钱。荷花姑娘性情爽直，饮食供应不废，从不追索房钱。后来，他看到有人常在对面凭窗窥望，怕有杀身之祸，就在某晚一走了之。20多年后的1935年4月，已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在沪上名中医陈存仁等陪同下，微服重游旧地，一心想寻到荷花姑娘，报答当年的收留之恩。然而物是人非，荷花已不知去向。此事被《晶报》记者俞逸芬获知，以“于右老花丛访恩人”为题予以报道。于右任初闻不悦，后来一想，自己确实是来访旧的，也就释然，并且还对陈存仁说：“这消息传开来，也许更容易找到荷花的下落。”

……

抗战胜利，停办的报纸复刊，内迁的报纸复员，外地的报纸也进军“罗马”。望平街无地容纳，各报只好就近觅址，本来南北走向的报馆街变成了东北伸展：《大公报》、《中华时报》、《和平日报》设馆于南京路，《中央日报》、《益世报》、《前线日报》比肩于河南路；《正言报》在福州路西头抢先复刊，《东南日报》在北四川路底的长春路上从容创业；上海《新民报》晚刊租下圆明园路50号怡和洋行房屋作为社址，不少晚报则被挤到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这是广义上的望平街——无论馆址是否设在这条街上，在世人眼里，它们都属于望平街。

国民党要把望平街变成清一色的天下，首先以“附逆”为由，勒令《申报》、《新闻报》停刊整顿，将其改组为官商合营报纸，大权操在陈布雷手中，以潘公展主《申报》，程沧波主《新闻报》，堂而皇之地复业。望平街上历史最悠久、销路最大、经济基础最稳固的这两家私营报纸，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就连上海《中央日报》也变成“童养媳”

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新闻统制，以《申报》、《新闻报》为中心，《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乃是外卫；《正言报》、《东南日报》、《前线日报》、《益世报》更是外卫的外卫。然而，民间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周刊，国民党还是无法强行支配，就连CC派的《东南日报》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前线日报》，由于主持编务的工作人员中不乏思想进步人士，也多少带着自由主义的色彩。国民党玩弄伎俩，阻止《新华日报》战后在上海出版，但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力量，依然在这座城市暗暗滋长。

当望平街上的报馆为白报纸外汇配额争得头破血流之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战场上正节节败退。1948年底国民党经济防线崩溃、徐蚌会战惨败，京沪人心立刻浮动起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语："应变"。名为"应变"，实则逃亡。官办或半官办报纸，国民党政府拨有"疏散"、"迁移"款项，应变的行动最为迅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首先迁移到了台北。CC派的《东南日报》有着杭州和上海两副家当，杭州的轮转机先拆掉运往台湾，不料搭乘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倾覆，机器和报社当局的大批财富，连同几位随行的家属一起沉入海底。这样一来，上海《东南日报》的机件，就在员工们的反对之下不能移动了。上海《中央日报》的机件、白报纸和其他财富，与南京《中央日报》不相上下，社长冯有真和国民党新闻官彭学沛去香港打前站，想在那里找个新的据点，谁知搭乘的那架飞机在香港上空失事，两人一同遇难，迁移报馆的计划便受到了阻碍，除了一大批白报纸和印刷原料给几位高级人员瓜分了去，其他粗重器材都被职工保留了下来，等待共产党方面的接收。《申报》、《新闻报》也曾有过南迁香港出版联合版的打算，但是遭到中下级职工的反对，两报的几位大头目，也就各捞到一大笔现款，远走高飞了。《前线日报》在台南高雄找到了房子，把印刷机件运去，想在那里打开新的天地，可是全社职工中只有四五人愿意随社迁台，报纸也就一直不曾在台湾复刊。

在政治夹缝中艰难求生、试图探寻"第三条道路"的民间报人，在这一历史的大变局中，如果不愿意离开"父母之邦"而远走他国，就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留在大陆支持共产党新政权，要么追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观察》周刊

的储安平、《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这些曾受国民党打压甚至封杀的民间报人，带着对新时代的憧憬选择了前者；《世界日报》老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成舍我，在上海得知共产党接收了自己北平的报馆，非常倔强地选择了后者。曹聚仁则在上海“旁观”革命一年之后，南下香港，担当起海峡两岸的秘密信使。

所有的选择都合逻辑，所有的结局都有宿因。

1949年5月25日，上海国民党守军土崩瓦解，解放军于夜半攻入市区，一举占领了市政府。那天晚上，望平街上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准备出版第二天的报纸，却估摸不准天亮后的上海市，究竟是属于国民党的，还是已经换了主人。《新闻报》主持人头脑活络，先编好了国民党口吻的报纸，浇好了版等待着；等到解放军到了市中心区，便又改编成共产党口吻的报纸，以新鲜醒目的字眼做了上海解放的头条新闻。至于《申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江苏丹阳集结、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时已经决定：进城后迅速将其接收，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因此，随军入城的新华社工作人员，5月25日晚便进入了汉口路309号申报大楼。5月27日，历时77年、共出25599号的《申报》终刊。次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上海市委联合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在望平街与读者见面。

从此，中国的新闻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曾经喧嚣激荡的望平街，成为那一张张发黄新闻纸上的斑驳记忆。

笔花墨香报人魂，百年望平幻风云。

辛勤检得虫鱼字，旧梦前尘待重温。

目　录

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

——成舍我与《世界日报》

开到荼蘼花事了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与《新民报》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八版文章千滴泪

邓季惺『大闹立法院』

『报纸本身就是目的』

老板做不成了

告别《新民报》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抗战军兴后西迁重庆的《新民报》，八年间在财力、人力、新闻业务与管理经验方面的积累，使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有了在抗战胜利后扩张这份事业的“底气”和“本钱”。

1937年11月《新民报》从南京撤离，设备和人员上船后，报社仅剩下200多元现金，总经理陈铭德只好解开私囊，作为同人沿途伙食和零星开支。人马到达重庆时，社址虽然已由先行一步的总主笔罗承烈在七星岗租好，但开办事宜千头万绪，两手空空的陈铭德感到寸步难行，无从着手。幸好有朋友帮助，以轮转机和卷筒纸作抵押，向重庆银行借贷3000元，复刊工作才得以启动。经过短期筹备，《新民报》重庆版终于在1938年1月15日正式出版。发刊词宣称：“本报以南京旧姿态，出重庆之地方版，相信抗战既无前方后方之分，救亡安有中央地方之别。战局虽促，但我们必须坚定最后胜利之信念。社会间虽不免间有摩擦，但吾人则认定民族统一战线实高于一切。其原则，在能以抗日反帝反封建反汉奸为出发点，而以民主化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方能消除内部之矛盾，坚强抗战之实力。本报今后立言主旨，即本乎是。”

《新民报》在重庆可谓一炮打响。当时复刊启事一登出，预订报纸的读者即络绎不绝，报社不得不动员经理部全部人员来办理。广告方面，一开始就拥有了全市影剧院、主要公司行号和商店的广告。

报纸迁渝成功，正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句古话。《新民报》是抗战时期从京沪西迁重庆出版的第一家报纸，陈铭德、邓季惺都是土



新民报社“三张”：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自左至右）。

生土长的四川人，“四川人认为是四川人主办的报纸，下江人又认为是从下江迁来的报纸，对《新民报》都具有感情”。[①] 从深层上看，《新民报》的成功主要得力于编辑方针的正确。鉴于迁渝后读者的广泛性，陈铭德与张友鸾、罗承烈、赵纯继等骨干商议：报纸以城市市民——偏重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对象，着重社会新闻；根据随抗战而迁徙到四川的文化人和学校日益增多的情况，增加副刊分量；汲取上海《立报》和《南京人报》版面特点，新闻和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编辑组版以生动活泼取胜。“这个设想体现了《新民报》同人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办报方针。这个设想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民间性。读者对象的确定是为自己划定了服务范围，它既不是办给达官贵人看的，也不是办给少数知识分子看的，而是为处在社会最底层而又是有条件看报（相对地处偏远、又普遍没有文化的农民而言）的那一批人服务的；以社会新闻为主的方针就是在内容上保证了这张报纸是以反映最底层的疾苦和呼声为要的；编排和文章风格的确定显示了他们对于服务对象趣味的了解。”[②] 这一编辑方针，以后继续用于重庆版晚刊和成都版日、晚刊，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上海、北平各版，成为所谓的“《新民报》的传统”。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19页。

②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版，第78页。

办报方针既明，人称“刘备”的陈铭德，广纳贤才，知人善任：来归的南京《新民报》旧人、“办报全才”张友鸾主编新闻版，名噪海内的小说家张恨水、“副刊圣手”张慧剑主编副刊，自称“民主主义者”的赵超构担任主笔，主持言论。如此众多的行家里手“鼓捣”一份四开一张的小型报，岂有不旗开得胜之理？

开端良好的《新民报》一年后便遭遇挫折。1939 年 5 月初，日机对重庆市区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重庆各报均无法正常出版。国民党当局遂决定，《新民报》与《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 10 家报纸，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三个月后各报才得以恢复独立出版，但《新民报》的销路已大不如前。为打开报社出路，同时也为了缓解物价飞涨下同人的困苦生活，陈铭德、邓季惺召集报社骨干商议，决定集中优势阵容，增出一张晚报。1941 年 11 月 1 日，重庆《新民报》晚刊问世，崔心一任总编辑，张友鸾主编社会新闻版，张慧剑主编副刊《西方夜谭》。晚刊《发刊词》说：

> 报纸之消极作用，在报道新闻，积极作用，在指导社会。但无论报道和指导，要贵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俱能与读者发生密切联系。晚报之发行，正所以在空间和时间方面补充上项之缺憾者也。
>
> 本报创刊已十有一年，自惭对于社会服务之工作，犹有未逮。尤其在此国际国内情势瞬息万变之时，各方需要情报，更为迫切，早报消息虽多，但转眼便成往史，且目前陪都并无任何晚报之发行，本报今以晚刊补此缺陷，自为事实上所必要。惟晚报消息来源，比较缺乏，本刊自当尽力，以求充实；同时并着重于副刊之趣味化，藉使首都人士每日工作疲劳之余，得以焕发其精神。至如衡论事物，一本日报之旨，公正平实，要期有益于社会。所可憾者，筹备时间太短，同人等能力亦复有限，益以目前各种物价高涨，人力物力胥感困难，草草问世，缺憾甚多，尚望贤者不时赐教，是所厚幸。

当时，偌大的重庆报业市场只《新民报》晚刊一家晚报，因此一创刊便不胫而走，发行量不久攀至四万份，是日刊的四倍。晚刊经营所得，不仅维持和壮大了重庆社，也为日后《新民报》的扩张积累了资金。晚

刊发行的成功，使陈铭德、邓季惺明确了《新民报》的经营思路，即着重发展晚刊。以后创办成都版和抗战胜利后恢复南京版，就是先从晚刊起步，打下基础后再经营日刊，上海版则只出晚刊。

胸怀大志者永远不会"小富即安"。1943 年，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把事业的领地拓展到"花重锦官城"的成都，于 6 月 18 日在成都创办《新民报》晚刊，两年后的 2 月 1 日又增出日刊。至此，《新民报》已拥有重庆、成都两社四版，初具报系规模；日总发行数最高达到 10 万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事业的发展需要经营管理水平的跟进，否则终难形成气候。早在 1937 年春天，南京《新民报》经过八年的努力，经济上终于实现了自给自足，不用仰人鼻息，靠接受各方津贴艰难度日。邓季惺也不再做执业律师，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副经理，帮助夫君陈铭德打理报社。邓季惺学法律出身，又善于理财，加盟《新民报》之后，首先着手建立健全的财会、广告、发行、印刷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报社走上企业化管理轨道。1937 年 7 月 1 日，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任董事长，董事几乎囊括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各派各系，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当然，他们把自己个人的事业变成公司组织，不仅仅是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更是出于报纸生存的政治考虑："在当时的形势下，既要找些人来挡风挡雨，掩护这个事业；又要合作的人不过分干涉《新民报》的内政，好让我们还有点'自由'。"①

1943 年 9 月，根据董事会决议，《新民报》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下设稽核、业务、秘书三室和供应部，陈铭德任总经理，罗承烈、张恨水、邓季惺任协理。总管理处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会计制度重加修订，贯彻由总管理处集中领导和成、渝两社独立核算的精神。总管理处的成立，使报社经营管理进一步资本主义企业化。

抗战胜利在望，《新民报》公司已经粮草充沛，蓄势待发。1944 年 5 月，第三次股东大会决定增值增资为 1200 万元；1945 年 3 月，为复刊南京版做准备，陈铭德、邓季惺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决定增资为 2000 万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3 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 年版，第 113 页。

元；6月，他们另组重庆新闻公司，集资3000万元，作为上海版的创办费。他们还把集资款和报社原有积累，买进黄金美钞存储，以规避法币贬值风险。

真正让陈铭德、邓季惺感到自豪的是报社人才济济，战将如云。报社在重庆开办时，职工只有八九十人，到抗战胜利，重庆、成都两社职工已达300余人。陈铭德帐下有可以倚重信赖的同乡挚友、总主笔罗承烈，新闻界名宿“三张一赵”——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重庆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编辑高手程大千、姚苏凤，主笔崔心一、方奈何，还有一大批年轻的编辑记者。另外，抗战时期先后入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巴金、叶圣陶、朱自清、洪深、阳翰笙、陈翰伯、黄炎培、陈寅恪、章士钊、徐悲鸿、顾颉刚、吴宓等新朋故交，几乎被陈铭德罗致无遗，成为《新民报》的作者。其中夏衍还亲自主编过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陈翰伯曾担任重庆版晚刊的副总编辑。如此强大的编采、管理阵容和作者群，放眼当时的民营报馆，恐怕只有《大公报》一家可以媲美。

抗战胜利前夕，《新民报》管理层就规划好了战事结束后报社的发展蓝图：重庆、成都两社继续经营，由协理兼总主笔罗承烈负责；协理邓季惺、副总主笔赵超构负责南京版复刊和上海社的创办；协理兼主笔张恨水负责创办北平社，邓季惺协助筹备；陈铭德在重庆完成调度工作后，将总管理处迁往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苦撑八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按照事先的规划，陈铭德坐镇重庆，调兵遣将，指挥同人兵分三路从9月起先后出川：一路是邓季惺、张友鸾、张慧剑、程大千、郑拾风和配备的经理、印刷部门人员分乘飞

机、轮船赴南京；二路是赵敏恒[1]、周重光等赴上海；三路是张恨水、方奈何等去北平。

《新民报》女管家邓季惺，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开疆拓土”的气势和效率，让同行惊叹不已：

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只身一人从重庆飞抵南京。到南京后，立即将新街口原来的报社社址收回，作为总管理处办公地址，又租下中山东路一幢楼房，作为报社社址。本来，原计划张友鸾、郑拾风是和邓季惺一起复刊南京版的，可两人乘船到南京后却离开了《新民报》，张友鸾带着郑拾风去复刊自己的《南京人报》了。邓季惺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46年元旦在南京出版《新民报》晚刊，这是继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刊的第二家报纸。同年10月10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也成功复刊。邓季惺亲任南京社经理，总编辑、采访部主任分别由曹仲英、浦熙修担任。

南京版复刊、上海版创办筹备工作告一段落后，邓季惺即飞到北平，冒着严寒满城寻找合适的社址，最后以1400两黄金购得东交民巷瑞金大楼作为北平社社址，还为张恨水买下了一处宅子，供他到京后安顿家小。北平版本来由张恨水负责筹备创办，可是他携家带口，一路辗转到北平时，已是1946年2月，社址和印刷、办公设备邓季惺已经置办停当，不劳他费心了。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版日刊创刊。报纸创刊之日，发行即达四万多份，一跃而居北平报纸发行之首。

上海版的创办原由赵敏恒主持。赵敏恒到上海，向怡和洋行租下圆明园路50号房屋作为社址后，就参加《新闻报》去了，创刊工作实际上

---

① 赵敏恒（1904～1961），江苏南京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官费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学习，后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被留美学生会推举担任《中国留学生月报》总编辑。1927年夏回国，担任北京《英文导报》副总主笔，兼任中国大学教授。1928年8月受聘于英国路透社，先后担任南京特派员、汉口特派员、中国分社兼重庆分社社长，还曾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派员。“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际新闻社、伦敦每日电讯社、日联社、朝日新闻社、塔斯社都曾聘他发布新闻。在路透社工作期间，因抢先报道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西安事变、开罗会议等事件，享誉国际新闻界。1944年，经英、法去非洲采访，因在重庆《新民报》连载《伦敦去来》，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残酷统治，受到路透社指责，愤而辞职。后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1945年10月起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新闻系采访与写作教研组主任。1955年7月因“国际特嫌”受到审查，1961年在江西逝世。



社論

復刊致詞

南京《新民报》日刊 1946 年 10 月 10 日社论《复刊致词》。

处于停顿状态。南京诸事稍有头绪，邓季惺马不停蹄赶赴上海，和赵超构一起接手上海版的创刊工作。她干脆在圆明园路 50 号楼内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床铺，吃住都在这里，不分昼夜地筹备起来。南京是《新民报》的发祥之地，北平是张恨水的成名之地，《新民报》在这两个城市复刊、创刊，虽有不少困难，但总体上还比较顺利。但是上海人地生疏，报馆又多，在这里开办一份新报纸，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陈铭德、邓季惺知难而上，冒险出击，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第一，因为上海是东方大港、国际市场，中外观瞻所系，要在国内以至世界报坛上争取地位，必得在上海取得一席立足地；其次，上海人文荟萃，组稿组画容易，可以同时供应其它四社七版的需要；再次，便于为其它四社采办纸张和其它印刷物料。"[1] 陈、邓二人的胆识和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1946 年 5 月 1 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正式发刊，经理邓季惺，总主笔赵超构，总编辑程大千。随着国民政府还都，陈铭德已将总管理处迁到南京。他也来到上海，和同人们一起住在报社，苦撑苦斗，直到上海《新民报》晚刊的销路赶上或超过其他晚报后，才返回南京。邓季惺因身兼南京、上海两社经理，只好两地奔走，在沪宁铁路的火车上睡觉，对她来说则是常事。

陈铭德、邓季惺夫妻恩爱，但是为了《新民报》的事业，邓季惺常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3 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 年版，第 147 页。


1953年1月24日，陈铭德、邓季惺结婚20周年留影。

常不得不去其他分社处理事务。当她不在南京时，陈铭德在布置完日常工作后总会打长途电话给她："季惺，我好想你噢——！"偏偏邓季惺耳朵有点背，听不清楚，陈铭德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再重复一遍。南京社同事就模仿老板给夫人打电话的腔调取乐。[①]

在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民报》由两社四版扩张到五社八版，成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走向一生事业的巅峰。《新民报》战后的大发展，当然与战前陈铭德有计划地积累资金、招贤纳士分不开，但更得力于邓季惺步步抢得先机和严格的管理。多年以后邓季惺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用这样的口吻说道："要快点跑啊！要赶紧哪！要让那些钱尽快变成东西！"[②] 五社八版运作后，信奉法治的邓季惺，为总管理处和各分社制订了详尽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办事，使《新民报》股份公司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企业。很难想象，这位娇小体弱、将届不惑之年的女性，能够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用在邓季惺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1949年9月《新民报》创刊20周年，陈铭德在纪念特刊中发表了一篇总结性长文《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对报社的核心人物进行评价，向曾经荣辱与共的"战友们"表示感谢。他扬善不避亲，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自己的妻子邓季惺："邓季惺先生事实上是成都、南京（复员以后）、上海、北平四个社的创立人，找社址，买机器，买纸张，安排人事，甚

---

① 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版，第35页。

②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至一颗螺丝钉的装设，一张凳子的安置，都经过她的眼，透过她的心，艰难擘画，贡献最大。她是铭德的妻子，然而就事论事，绝对不应该因她与铭德的关系，就抹杀了她在本报的业绩。”①

陈铭德对妻子的感激之语，发自肺腑，情真意切。

邓季惺1907年生于重庆，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商人，叔父邓孝可曾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舅父吴梅修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母亲吴婉知书达理，性格刚强，主张女子教育，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后，创办了重庆第一所女子学堂。受先天遗传和家庭环境的熏陶，邓季惺具有经营理财的天分和改造社会、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14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离开家塾，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习。后来成为风云人物的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肖楚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肖楚女还夸奖过邓季惺文章写得好，有思想。

1923年，邓季惺与同学吴淑英相约出川，先后在南京暨南大学附中、上海中国公学预科读书。其间，她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竹似，两人相爱，于1925年结为夫妇。第二年秋天，因为生育，她中断了学业，全家回到重庆。吴竹似受聘于《大中华日报》任编辑，结识了同社的陈铭德，三年后一起在南京创办了《新民报》；“新民报”三字，就是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中摹写下来的。

不料吴竹似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在杭州调养数月，不见起色，只好到气候干燥的北平碰碰运气。邓季惺也带着三个孩子，陪丈夫北上养病。但是，北方的气候也没能救回丈夫的生命，1931年7月，吴竹似撇下年纪轻轻的邓季惺和三个孩子撒手西去，最小的儿子吴敬琏（后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只有一岁半。

陈铭德到北平去看望朋友的遗孀，发现邓季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悲愁哀怨，而是一边抚育孩子，一边在朝阳大学攻读法律，坚忍地面对丧丈之痛。对邓季惺，陈铭德由同情而生敬佩、怜爱之心，决心用自己的肩膀，为这位娇小而顽强的女性分担人生的不幸。当时陈铭德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双儿女。他就和妻子协议离婚，使自己能够光明正大地去

---

① 陈铭德：《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1949年9月9日《新民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新民报总管理处编）。

关爱邓季惺一家。1933 年 1 月，两人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婚礼，一百多位亲友见证了他们别开生面的结合——所有来宾都得到了一张粉红色卡片，上面印着陈、邓二人的结婚协议，并盖有“海枯石烂 永不相忘”一对印章。协议内容为：婚后各人用各人的姓，即邓季惺不冠以夫姓；邓季惺带来的三个孩子依旧姓吴；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1] 协议的内容，应该都是邓季惺提出的。这样的约定，在时人眼里可能有悖情理，却也反映了邓季惺对法治的信服和对平等的追求。事实上，这份协议也并没有影响夫妻二人半个世纪的真挚感情。

1933 年夏，邓季惺从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南京，任职于国民政府司法部。不过，她很快就厌倦了衙门里的生活，开始热衷于妇女运动，和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等一起，成立“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开办南京第一托儿所，承办《新民报》的《新妇女》周刊，有声有色地开展起“女权运动”实验来。

1935 年秋，因为《新民报》刊登了一则不利于司法部的消息，邓季惺受到部长训斥。一气之下，她干脆辞掉了司法部科员之职，专门在南京、镇江两地做挂牌律师。陈铭德多次邀请她进入《新民报》工作，她不愿被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决心经济独立，事业有成，所以一直没有应允，只同意业余主持《新民报》的《法律问答》专栏。

1937 年 6 月，邓季惺终于被陈铭德说动，正式加盟《新民报》任副经理，掌管经营和财务。从此，“刘备”得到了“女诸葛”，邓季惺用自己的才智和胆识，通过建立健全财会、人事、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的制度，使《新民报》从个人的小作坊式经营走上了现代化的管理之路。可以说，没有善于理财、崇尚法治的邓季惺的加盟，《新民报》在陈铭德手里可能只是个小小的文人论政的舞台，不会成长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报业集团。难怪陈铭德在 20 周年社庆时充满感激地说，邓季惺对《新民报》的贡献是最大的。

---

① 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 年版，第 20 页。

八版文章千滴泪

《新民报》一向以“超党派”、“独立”的民间报纸自居。1931年9月，《新民报》创刊两周年之际，陈铭德就以“传达正确消息、造成健全舆论、促进社会文化、救济智识贫乏”与同人共勉，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复刊词又特别申明《新民报》“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的民间报纸性质：

> 本报是个民营报纸，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党派的津贴，所以说话不受拘束。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要求与意见，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本报在现政治极端尖锐化的环境之下，精神上时常感受一种左右不讨好的威胁，但我们的态度很鲜明：除了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之外；更具体的讲：我们是服膺三民主义的，决不信奉共产主义。我们是拥护现政府的，但确不满现状。我们很珍爱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但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赶快结束了。我们相信大家只要以国家民族的生命为重，不要向同归于尽的道路走，则忠实执行政协各项决议未始不是解决政治纠纷比较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不能反美，也不能反苏，中国应做苏美间的桥梁。我们对官僚资本、买办资本

式的财政经济政策，深恶痛绝，希望增加生产，促进外销，紧缩通货，平抑物价，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救济贫苦失业大众。有人说：你们这样主张，必为当局所不喜，又不啻做了中共和民盟的尾巴。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的良心裁判，配合着客观的社会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①]

1947年9月9日，《新民报》迎来18周年社庆。当天，重庆《新民报》日刊发表纪念社评，重申“本报的整个意识形态以纯超然性的反映民主主义思想为原则”：“本报创刊十有八年，中经八载抗战，惨淡经营，得有今日，深知造成正当舆论之不易，与吾辈报人责任之重大。本报自创刊以来言论编辑之一贯方针，为根据国家民族之当前需要，促进国家之统一与民主，维护人们之自由与权力，藉此以实现三民主义之最高理想。惟有遵循此一之方针，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不立异以鸣高，不逆情以沽誉’，不凭主观好恶任意攻击政府，亦不谬执成见替任何党派宣传，始能坚持本报之独立立场，发挥本报爱自由爱民主之真精神。吾人深知言论自由之可贵，吾人尤凛于报人所负道德责任之重大，故切盼同人勿滥用新闻自由主义，发为偏激不负责任之言论，或作歪曲事实之报道，牺牲本报独立自主之精神，徒作他人利用之工具。”[②]

但是，民间报纸的生存和发展，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民间报纸其实是和政党一样，只是施行民主政治的工具。所谓民主政治，其实就是民意政治。民间报纸，说白了，就是汇集、组织、表达民意的一个工具。”[③] 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和平建国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将其撕毁，继而发动全面内战。在战火四起、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钳制舆论的政治生态下，陈铭德、邓季惺雄心勃勃营建起来的五社八版《新民

① 《复刊致词》，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社论。

② 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③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新民報

HSIN MIN PAO

南京 NAN KING

社址：南京中山東路五十二號

國大決如期召開

召集令今佈頒

代表限會期十日前報到

中共代表團將發表聲明

南京《新民报》日刊。

报》，在1946年至1949年的四年间，“走过了比过去十六年所走的还要曲折险峻的道路”[①]。

由于《新民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常住于此，南京社拥有收发报电台，各社的政治新闻主要依靠南京社供应，因此，南京版是他们刻意经营的版面，其政治态度在五社八版中具有代表性。

南京版虽然声称“服膺三民主义”、“拥护现政府”，但其主张和平、民主、统一，反对内战、独裁、分裂的态度却是鲜明而坚决的，尤其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陈铭德和同人们当时的认识就是：只有走政协达成的和平、民主、统一之路，国家才有前途，事业才能发展，个人也才有出路；打，谁也消灭不了谁，兵凶战危，只有使民生更加痛苦，包括民间报纸在内的民族工商业必然会受到绞杀。[②] 南京版的新闻，主要采用本社特讯、专电和英、美、法等国通讯社电稿，同时收听新华社广播，稍加改写后以本社专电名义发表，并发给其他各版。当时邓季惺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吴敬琏，已开始在家里偷偷收听延安广播，记录稿由其姐夫关在汉（美联社记者，与梅园新村联系密切）改写后，以“美联社”、“法新社”名义见诸《新民报》。南京版各地新闻版编辑蒋文杰是中共地下党员，凡是于国民党不利的消息，他都运用编辑技巧使其在版面上显得醒目、突出，致使办报出身的蒋介石智囊陈布雷惊呼：《新民报》南京版上凡加框的消息，清一色不利于国民党政府！

南京版的“左倾”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恼怒，决定施以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43页。

②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45页。

"颜色",以儆效尤。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中,国民党特务看准《新民报》南京社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揪住她的头发一阵暴打。龚德柏的《救国日报》也公然声讨《新民报》,连续发表《检举新民报为共匪宣传》、《证明新民报是共党机关》等社论,要求"对共匪第五纵队采取断然处置"。《救国日报》还发表诗文,指称《新民报》接受延安3亿津贴。陈铭德、邓季惺一怒之下要与《救国日报》对簿公堂,对方只好发表了一篇闪烁其辞的文章,搪塞、耍赖过去。

上海社进步或倾向进步的员工较多,因此上海版一开始就比其他各版更左一些。其发刊词宣称要忠于民,忠于国,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已经有别于南京版日刊复刊时声称"拥护现政府"了。发刊词明确上海版的立言态度为:"我们相信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这很容易回答:为了国民的幸福,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为了国家的富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平统一,这是普遍于我们民间的要求,也都是极平常的道理,我们愿追随各界稍稍尽一点鼓吹的责任。"① 在民主自由、和平统一的主旨下,赵超构的《今日论语》、夏衍的《桅灯录》言论专栏,对"中美商约"签订②、国民党"制宪"等内政外交,进行及时评论。两人的文章,短小精悍,辛辣犀利,针砭时弊,不遗余力,经常被南京、重庆、成都各版转载。新闻方面,对美国驻沪水兵打死三轮车夫事件、上海各界集会追悼李公仆闻一多活动、上海警察局取缔马路摊贩而引起的摊贩风潮、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上海劝工大楼血案③,上海版都给予了详实报道。有关摊贩事件的报道使上海市长吴国桢大为光火,以停刊报纸相威胁,勒令《新民报》交出所谓被警察打死的摊贩尸首,交出撰稿人和编辑。关于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报道,国民

---

① 《我们的志趣》,1946年5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

②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

③ 1947年春,上海市百货业职工在中共领导下,掀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以挽救濒临崩溃的民族工业。2月9日,"爱抵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成立大会,郭沫若、邓初民受邀到会演讲。国民党特务进入会场捣乱,打死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重伤13人,史称劝工大楼事件,又称"二·九"血案。

党军统局认为“有碍中美邦交”，要求《新民报》切实整顿编辑部，改变编辑方针，改组编辑部人事。由于同人团结一致和大多数董事主持公道，方才作罢。劝工大楼血案真相见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员扬言要砸烂新民报社，社会局并唆使派报工会的一些特务和流氓，冒充报贩，天天在机器房和发行部借端闹事，妨碍报纸印刷、发行。

1947 年 2 月 20 日，上海《新民报》副刊《夜光杯》（主编吴祖光）刊登了一首署名“愚者”的社外投诗，标题为《冥国国歌》：

战神土地，污党所宗，
以建冥国，以进“打同”。
兹尔多事，唯民前锋，
昔也非现，主义是祟。（原注：别读为崇，以谐其音。）
世人似蛹，毕罄毕终，
异心亿得，动辄死终。

这首讽刺诗根据国民党党歌亦即“代中华民国国歌”改编而成[1]，一经刊出就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应，读者纷纷致电致函编辑部，拍手称快。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见报后当众破口大骂《新民报》“侮辱国歌”，训斥陈铭德“大逆不道”，要以党纪制裁陈氏的“妄行”。过了几天，方治又把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请”去，咆哮责骂一通后，正式提出要上海《新民报》自动停刊，交出《冥国国歌》作者，在跑马厅开群众大会公审。经陈铭德、邓季惺在南京、上海多方奔走，最后才以上海版自动停刊一天、登报道歉而暂时了结。

上海版《冥国国歌》事件刚刚化解，重庆社又起风波。1947 年 3 月 16 日，重庆版日刊副刊《呼吸》（主编聂绀弩）登出一篇寄自云南自贡、署名“子于”的文章《无题》，讲述一国民党军人在市场上买菜时，不但不按市价付钱，反而毒打、痛骂菜贩。文章结尾说：“枪就是强权，也就

① 中华民国国歌原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国民党当局认为该文侮辱了全国军人、警察、宪兵，当晚即出动几卡车“军警宪代表”，开到大田湾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和印刷部，强迫报社承认“侮辱了中华民国军人”。这些代表拿出拟好的“《新民报》道歉启事”，要《新民报》送交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并要求《新民报》停登广告三个月，交出副刊主编和文章作者。重庆社负责人罗承烈向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等反复求情，当局才作出让步：道歉启事只登本报和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平日报》，停止刊登广告三个月缓议。罗承烈委曲求全，“最后在一二百特务包围胁迫的形势下和全社职工悲愤饮泣声中，被迫签了城下之盟”①。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特务们不许报童拿报，警备部以一连兵力，每天派一个班驻七星岗营业部，阻挠读者和广告客户订阅报纸和刊登广告。他们威胁读者和广告客户说：《新民报》侮辱了中华民国军人，读《新民报》或在《新民报》上登广告也就等于侮辱中华民国军人。他们还分遣爪牙挨个找到《新民报》广告客户，强迫他们在停登广告通知信上盖章。国民党特务、军警对重庆社的骚扰持续了一个多月。

《新民报》五社八版虽然在经营管理上属于一个公司，由总经理陈铭德总揽全局，但五社八版不设总编辑，对各社各版的政治态度没有严格划一的标准，基本上随各个版的主持人和言论编辑人的政治态度而异趣。《新民报》各版不断“滋事”使国民党当局伤透了脑筋，决计通过设总编辑的方式，达到从内部控制《新民报》的目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请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邓季惺弟弟）出面，对陈铭德假以辞色说：国民党中央已决定查封《新民报》，但他们为了这个已经办了近20年的事业，同萧同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彭学沛（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吴铁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商量结果，想由《新民报》总管理处设一个总编辑，负责指导五社八版的言论工作，来挽救报社危局；总编辑人选也已找好，就是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56页。

陈铭德考虑到按当局意图设一个总编辑，以后报纸再遭受迫害，也有人出面为自己排忧解难，况且彭革陈是《新民报》股东，又是自己的朋友，比较容易相处，就接受了这一建议。1947年4月14日，《新民报》股份公司在南京举行董事、监察联席会议，通过了总管理处设置总编辑并由彭革陈担任的决定，并通过了由罗承烈、赵超构、彭革陈合拟的五社八版总的言论方针：

> 本报的整个意识形态，应以客观的态度，发挥民主自由思想原则；本报立场应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及促进人民自由幸福之前提下，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本报各个地方版以及同一版面之新闻态度与言论方针，应力求统一；并需严格遵守总管理处之指示，力求避免有自相冲突矛盾之情事发生，尤忌各自为政，自由发挥其个人思想自由之作风。必须牢牢记取“报社有自由，个人无自由”之原则。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对政府施政的批评，应取建设态度，不作消极的讽刺或破坏性的攻击，应审度当前的社会环境，采取稳重而进步的言论标准。在编辑方面，要求对国际国内要闻处理，态度力求严肃公正，并多用本报特访消息；社会新闻应避免作政治性之宣传和主张，应幽默多于刺激。在采访方面，要求对实际政治问题之访问与描写力求客观，最忌受人宣传，被人利用；对政治社会人物之描述，尤不应有个人爱憎之表现。

在这次董监会上，陈铭德还作了《本报言论编辑方针总检讨》：“过去各版连续出毛病，在于各自为政，个人有自由，报社无自由，而作风上偏于幽默讽刺，缺乏一种积极性的严肃稳重之泱泱风度。”“本报虽拥有广大群众，但只具有社会影响，而政治上影响并不大，国际新闻界虽很重视本报之超然立场，但也只限于消息报道。今后应该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使政治影

响能高于社会影响。”[1]

彭革陈担任总管理处总编辑后，除了和陈铭德一起奔走各社“救火”外，根本不能左右各版言论编辑。这种不尴不尬的职位使他颇感无趣，上任两个月即离京返渝，仍去做川康兴业公司总稽核去了。当初吴铁城曾面授机宜，要他切实掌握《新民报》五社八版言论编辑工作，使其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彭革陈 1948 年 5 月再来南京，吴铁城责备他没有负责把《新民报》的工作做好，方治也面斥他被陈铭德利用，和《新民报》一鼻孔出气。

问题不在于彭革陈不负责任，也不在于陈铭德及《新民报》同人故意和当局作对，关键是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人齿冷，民心丧失殆尽。1947 年 5 月 20 日，正是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的当天，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市学生聚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蒋介石出动全市警察、宪兵，打伤学生百余人，逮捕 20 余人，酿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根据数名记者的现场采访，以《昨日凄风苦雨天愁地悲》为通栏标题，详尽地报道了事件经过。然而，首都卫戍司令部却认为《新民报》报道失实，天天派员到编辑部纠缠。

陈铭德正在南京与当局周旋之际，5 月 25 日，上海方面又传来噩耗：《新民报》上海版和《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上海“党政军会报”勒令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停刊通知送达当天下午，武装特务即进驻报社予以执行。几天后，在议长潘公展操纵下，上海市参议会全体通过“永远不许三报复刊”的决议。陈铭德、彭革陈跑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政府、参议会、警备部，最后上海市参议会和国民党中宣部联合提出两点，作为《新民报》上海版复刊的条件：（一）由中宣部“介绍”上海版总编辑；（二）由潘公展、方治各“介绍”记者一至两名。陈铭德无奈只好接受了这屈辱的条件。7 月 30 日，上海版停刊两个月后终于复刊。10 月，“钦派”的总编辑王健民，带着腰挎手枪的“记者”邓武荪、蒋志清、郭良蕙等，大摇大摆地到报社上任。

---

① 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5～246 页。

这样的阵势，在中外新闻史上堪称“奇观”!

与此同时，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成都社总编辑关白晖等两社员工多人被捕。经陈铭德及各社负责人多方营救，这些被捕员工才陆续获释。可是半年之后，重庆社又有三名员工先后被捕。

这时的陈铭德感到心力交瘁，面对一二知己，常常潸然泪下。

1948年6月24日，立法委员邓季惺领衔30余位立委，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临时动议，质询国民党军队为何出动飞机对开封实施轮番轰炸，造成大量市民死伤，国防部长何应钦不得不于当天下午到会答复。第二天，《新民报》南京版日刊登出了何应钦关于中原战局的检讨报告、立委们的质询及何应钦的答复要点，同时登出邓季惺等立委主张停止轰炸城市的提案。蒋介石怒不可遏，于6月30日亲自主持官邸会报，悍然作出决定：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

当时陈铭德正在北平处理社务，闻讯邓季惺“大闹立法院”，知道《新民报》到了最后关头，迅即赶回南京。他拉着彭革陈一道奔走权门，却不得要领。陈铭德一看连续几天查封命令并没有下达，还抱着挽回的侥幸心理。7月8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以《豫东国军空前大捷，一举歼匪达十万名》作为头条新闻，希望借此讨得当局的饶恕。然而到了晚上9点多，宣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公文终于送达他们府上：

>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及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

送公文的使者还特别强调，命令为立即执行，第二天即不得再行出报。陈铭德和邓季惺立即赶回报社，约集全社员工开会，告诉大家，命令终于下来了。“正在写稿的记者放下了笔，编辑放下了手中的版样，排字工人放下了正在检排的铅字，几个女记者和女职员已经忍不住哭了起

来，更多的人则是怀着一腔悲愤，含着热泪沉默着——报社周围此时已经布满了特务，高声怒骂亦不可能了”。①

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通讯，详细地记录下南京《新民报》被封当晚的情景：

> 九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询。
>
>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决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乏，一位报社同事偷偷的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
>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唯一的表情。
>
> 经理邓季惺先生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命令中有两句话：“……依照出版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所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
>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
> 十点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
>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都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

---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280页。

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许多人在流泪，痛哭。[①]

7月8日晚，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南京《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的消息，同时发表了内政部发言人关于停刊处分的谈话。内政部发言人在谈话中罗列了南京《新民报》的三大"罪状"：第一，"为共匪宣传，夸大匪军战力"；第二，"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人心"；第三，"谎报事实，污蔑国军"。每条"罪状"之下，发言人均开列了南京《新民报》曾经刊登的文章，以示"证据"充分，言之凿凿。

消息一出，中外舆论大哗。7月9日，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报》，以《京新民报日晚两刊昨不幸奉令停刊!》为标题，报道了南京《新民报》被封的消息，对同业的遭遇表示同情。7月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分析当局封闭《新民报》所援引的《出版法》，"实在不合时代精神"，应予废止；上海《正言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封闭《新民报》，"不是行宪国家的民主态势"，"以行宪之名，干违宪之事"。驻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等外国通讯社，于7月8日当晚即将南京《新民报》被停刊的消息发出，仅美国国内就有60余家报纸以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不少报纸还刊文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不满，对《新民报》的遭遇寄予同情。如美国《旧金山纪事报》7月13日发表评论说："中国倘欲发扬民主，扩大新闻自由即为一种象征。目前法律规定禁止刊布被认为违反'国家利益'的新闻，则此种自由即不存在。新民报所被援引的五种犯规，均关于战事报道，显然极其广泛，甚至欲杜绝任何程度的批评。吾人于承认一个困苦的政府有权防备自身垮台之余，唯有以中国政府不能辨别超然批评与破坏活动为憾。"[②]

中共系统的报纸则更加不客气。7月17日，中共在香港暗中经办的《华商报》，发表了夏衍撰写的《人心如此》一文，嘲讽国民党封闭南京

---

① 《沉痛的一天》，1948年7月9日《南京人报》。

② 《美报评新民报被封》，1948年7月15日上海《大公报》。

《新民报》，正印证了“上帝要他死亡，必先使他疯狂”这句西方谚语：

南京《新民报》被封这件事，的确震动了宁沪蒋管区的人心。尽管这张报是四川财阀和政学系的背景，但在全蒋管区，这仍然是唯一敢于报导一点真情实况的民间新闻纸，所以一般老百姓，对于蒋家“保王党”的这一措置，表示了强烈反感。有一件事最足的证明，就是七月八日《新民报》被封之后，第二天南京所有党报一律幸灾乐祸，用“为匪张目”之类做了标题，其中只有《南京人报》用比较同情的口吻，婉曲地速写了一下被封当时的情景，这一天的《南京人报》就增销了一万多份。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现在蒋管区的人心，已经完全表示得清清楚楚，政府顶喜欢的，老百姓就顶讨厌，政府不喜欢的，老百姓偏喜欢他。这是一种人心的潮流，枪杆子威胁不了，金钱收买不了，“沛然莫之能御”，这句话用在这儿再恰当也没有了。

这次坚决主张封闭《新民报》的，据说是蒋侍从室的一个被叫做“保王党”的最反动的集团，即陶希圣、陈布雷、李惟果、俞济时等。这些人，平时是以蒋的“智囊”自居的，那么你说陶希圣、陈布雷他们，连封闭《新民报》这一件事不仅要激起更大的人民的愤怒，甚至要招致美国主子的反感的结果都不能预想到么？当然他们是预想到的。但“时势危矣”，所谓图穷而匕首现，不如此倒施而逆行之又还有什么办法？此即西谚所谓“上帝要他死亡，必先使他疯狂”之谓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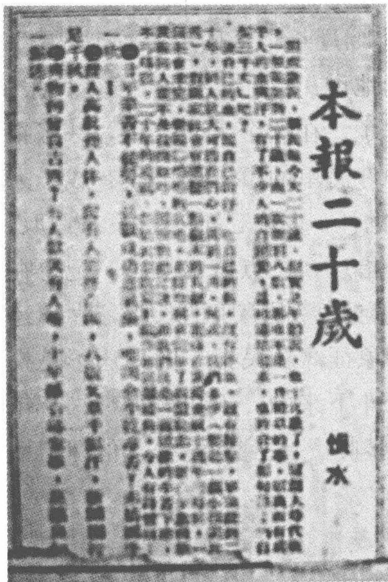

南京新民報被停刊
內政部發言人談處分理由

1948年7月9日上海《大公报》刊登的《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消息。

① 夏衍著：《白头记者话当年》，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04页。

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律界的毛健吾、方秋苇、姜豪、胡道静、曹聚仁、万枚之等 24 人，联名写了《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的抗议书，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吁请全国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张，立即复刊南京《新民报》，永远废止窒息言论的所谓《出版法》之类的枷锁。[①]

陈铭德、邓季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多方找人转圜外，还请章士钊等六位律师代撰了万言“诉愿书”，要求内政部复议，希冀通过“合法斗争”使南京《新民报》起死回生，就像一年前上海版的遭遇一样。



本報二十歲

恨水

1948 年 9 月 9 日北平《新民报》日刊登载的张恨水诗文《本报二十岁》。

分为法律、事实和情理的万言“诉愿书”呈送后的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国民党政府南京当局随后还逮捕了《新民报》南京社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等人。北平、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新民报》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1949 年 7 月 23 日，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出动军警宪兵六七百人，包围了《新民报》成都社，逮捕经理赵纯继等六人，宣布“新民报成都社迭次违反戒严法令，着即查封整理”。王陵基武装劫掠成都社后，窃《新民报》之名继续出版报纸，在成都解放前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把成都

① 据当事人姜豪回忆：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总经理陈铭德会同贵阳《大刚报》负责人毛健吾来到上海，请求各方支援。来沪后他们先与《亚洲世纪》主编方秋苇取得联系，正好当时方秋苇、万枚之、姜豪等七人有个座谈会，开展民主自由活动。方秋苇在座谈会上就把这件事提了出来，请各位讨论。大家激于义愤，一致主张发表公开抗议书，并扩大征求联署人，以壮声势。最后征得 24 人在抗议书上署名。姜豪：《反对封闭南京〈新民报〉的联名抗议书》，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中华书局（北京）2005 年版，第 35～36 页。

社储备的纸张和其他物资耗费殆尽。

在成都社遭劫夺的前两天，30多名特务闯进重庆社大田湾编辑部，以报纸刊登上海解放后的消息为借口，剪断电话线，冲入排字房，将全部字架推翻，致使当天晚刊不能出版，第二天日刊也只能减张出版。此时重庆社负责人罗承烈已避居外地，为了报社职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受严重侵害，避免类似成都社的遭遇，经理刘正华和部分董事遂决定改组报社，将“新民报重庆社”改为“重庆新民报社”，请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新民报》董事曾扩情任发行人和社长，于8月6日登报声明独立经营，与原《新民报》总管理处和陈铭德、邓季惺脱离关系，希望能够“借房子躲雨”。就在重庆获得解放的前夜，重庆社四位被逮捕的编辑记者——胡作霖、陈丹墀、张朗生、胡其芬，死难于渣滓洞集中营。

1948年9月9日，是《新民报》创刊19周年纪念日，北平社还是举行了庆祝会。会上，经理张恨水感慨万端地说：“照虚岁说，《新民报》今天二十岁，照实足年龄说，也有十九岁了。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张报纸办到二十岁，由一版办到八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的人白了头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有诈取，没有掠夺，何况我们对国家社会还有小手指这么一点微末贡献。记得在重庆庆祝十周年的时候，一个茶会未完，空袭警报呜呜的长鸣，大家还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这个纪念会。这多少象征《新民报》同人还不是投机取巧、囤积倒把之流，而是一直这样苦斗下来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庆祝，创始的《南京版》不能参加这个盛典！”说到动情处，他即席赋诗一首：

> 几人高就几人休，尚有人能撑白头。
> 八版文章千滴泪，新闻圈著足千秋。①

“八版文章千滴泪”，这正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及同人，抗战胜利后四年间在夹缝中惨淡经营《新民报》的真切写照。

---

① 1948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

邓季惺"大闹立法院"

南京《新民报》被封的诱因不止一端，其中导火索是邓季惺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上的言行，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忌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为所谓的"行宪"，在遍地烽烟中开始搞"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陈铭德、邓季惺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分别参加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竞选。他们决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保全自己事业的目的：《新民报》五社八版均在国统区，跻身于国大、立法院这些国家权力机关，对《新民报》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排除两人当时对国民党施行"宪政"还抱有一线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是他们最大的政治期待，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也愿意去尝试努力。特别是邓季惺，用她儿子吴敬琏的话说，"她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①。

10年前刘湘统治四川时，陈铭德就被推选为国大代表；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议定，战前选出的代表依然有效，所以陈铭德参加了同年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大。根据国民大会组织法，这次"行宪"国大代表总额为3045人，其中职业团体（包括农、工、商、渔、教育、自由业）487人。陈铭德参加的是"职业选举"，即自由业中的新闻业选举。职业选举由各行业自行操作，《新民报》在西南区（四川、云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南、贵州）新闻界声名远扬，陈铭德在竞选中也就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参加四川区域立法委员竞选的邓季惺却遇到了麻烦。立法委员总额为773人，其中四川省分得53人。选举法规定，女性议员名额约为十分之一，因此四川省至少要选出五名女性立法委员。那时国民党政府早已公布了《戡乱建国纲领》，邓季惺还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的排挤，不予提名候选。国民党为了主导选举，特设了一个筹办选举的机构“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总所”，地方再设分所，以指挥和监督选举事务。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代、立委选举，原规定参选者先进行签署——一定数量的选民联署支持成为候选人，旋即发现联署费时费事，改由政党提名。虽然签署方式并未放弃，但国民党员参选，必须经由党中央提名。国民党又设立提名指导委员会和提名审查委员会，前者有委员数十人，派往各省市执行提名工作；后者设于中央，审查核定合格的候选人。各省市的提名指导委员会，与选举事务所合并，由中央派去的大员和地方政要组成。除邓季惺外，《新民报》的罗承烈也准备参加四川区域的立委竞选，但两人都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提名。罗承烈无奈退出，邓季惺绝不轻言放弃，她改而从事“自由竞选”，由成都社同人代为凑足两百个选民提名，取得了候选人资格。

投票的日期一再更改，最后定于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选举国大代表，次年1月21日至23日选举立法委员。陈铭德、邓季惺抗战期间接纳的地方势力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四川省议会140多县的参议员，大都在本县为邓季惺争取了些选票。邓季惺的家乡奉节县，因无他人参选，选票大多也投给了她。成、渝两社的同人，都尽力为老板夫妇奔走宣传，“活动”选票。[①] 经过多方努力，最后陈铭德、邓季惺都如愿以偿，分别当选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

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看，这次当选的国代、立委、监委，“仍属一代精英分子”。但是，选举的过程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且不说选民登记胡编乱造，不少投票人懵懂无知，只好请学童代填选票，闹出“点秋香”的笑话，仅候选人请托行贿一项，就足以使这次大选蒙羞。蒋介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66页。

石在国大代表投票前一日即1947年11月20日，专门下了一道《饬行政院制止全国各地竞选流弊令》，于此可见奔营贿选风气之盛。

在国共交兵、物价飞涨的形势下，老百姓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兴趣去投票选举？国民党内外有识之士曾建议推迟大选。1947年11月间，国民党中常会推定孙科、居正[①]、于右任、白崇禧、陈立夫等10人密集研商，看大选应否立即叫停。研商的结果是倾向停办，但蒋介石坚持“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蒋之所以一意孤行，目的有二：“开国会是要以民主的外观实现他的全国最高领袖之梦，同时可以获得美国的援助，‘早日消灭共匪’；前者是他的生平大愿，后者是他的心头大患。”为了能够开会，国民党当局不择手段，尤其是强迫实行“退让”政策[②]，简直是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笑话，丧失民心，莫此为甚；这次国代、立委、监委选举，国民党内部CC和黄埔两系拼斗得也十分激烈，“其严重性关系到国民党在大陆上的解体失败。”总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执意举行的这次大选，“不得其时，绝不相宜”，图了虚名而得实祸。[③]

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在绝食请愿、陈棺请愿的沉重气氛中开

---

① 居正（1876～1951），字觉生，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学校，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族革命事业。1910年潜回湖北主持同盟会工作，筹备武汉地区起义。1912年民国成立，任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上海联络处主任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后回国参加护法、反袁运动，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总务部主任。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常务委员。因反对国共合作，次年与邹鲁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组成“西山会议派”。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反对蒋介石一度被监禁。1932年至1948年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评议委员。1951年11月在台北病逝。

② 这次大选，候选人改行政党提名后，国民党中央掌握着最后的核定大权。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候选人，有正选与候补之别，正选无条件当选，候补只能在正选出缺时递补。另外，为了装点“宪政”门面，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青年党、民社党人士当选。国民党虽欲严加控制大选，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许多得不到提名的国民党人，便以签署的方式参加竞选；那些被定为候补者，心中不服，也奋起与正选竞争。国大代表选举结果，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预期当选而未当选者近500人，其席位被竞选中表现突出的签署参选者和提名候补者夺得。这一结果大出国民党中央所料，遂要求非本党提名而当选者退下，让给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提名而落选者。

③ 参阅张朋园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67～207页。

幕。[1] 大会的重头戏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1946 年 12 月“制宪”国大制定并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总统只是虚君。蒋介石不愿做有名无实的总统，声明自己不参加竞选，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是何等聪明之人，坚辞不就。而一帮“从龙”之士闻讯大惊，哭哭啼啼地恳求他们的蒋总裁无论如何要出任总统。国民党于是召开中常会，讨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会上，贺衷寒、袁守谦等与“三青团”有关系的常委，都主张尊重蒋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等与 CC 有关系的常委则一致坚持请蒋出马。双方争辩异常激烈，张群忽然站起来说：“总裁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他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始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2] 中常会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去征询总裁的意见，蒋介石一看部属已揣摩到自己的心思，也就不再忸怩作态，同意参加总统竞选。于是，现代“叔孙通”王宠惠博士等再定



上海《新民报》晚刊。

① 国大开幕前一天即 3 月 28 日上午，颜泽滋等 10 位被要求“退让”的国大代表，悄悄进入国民大会堂，开始静坐绝食。另一位被要求“退让”的国大代表赵遂初，抬着自己买来的白木棺材，在会场外进行抗议，引来无数记者围观、拍照。在安抚、劝导均不奏效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派 40 位彪形大汉，将 10 名绝食抗议者挟持转移到国大招待所软禁起来，赵遂初的白木棺材也被装上一辆大卡车强行拉走。

② 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0 页。

“朝仪”[1]，制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特权，并设法在国民大会通过。

国民党元老居正本来要参加总统竞选，在得知蒋介石同意参选后，不愿“陪太子读书”，于4月8日在各大报刊发表声明，放弃竞选：“余不揣腐朽，偶听朋友劝告，出面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段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面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做竞选言说以淆视听，特此声明。”[2] 蒋介石为了制造“竞选”效果，一定要居正参选，他只好陪着蒋介石跑回龙套。4月19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了269票。正式开票时出现了一张废票，颇有意思。选票上候选人“蒋中正”与“居正”并列，但这张选票没有圈选任何人，却在“居”与“正”中间的空格内填了一个“不”字，成为“蒋中正居不正”，令人啼笑皆非。[3]

副总统的竞选却异常热闹、激烈，候选人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溥霖等六人之多。在六位候选人中，蒋介石和国民党CC派力挺孙科，最不愿意能够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李宗仁当选，而希望南京政府出现新气象的美国却中意于李宗仁。蒋介石企图用政党提名正副总统的办法阻止李宗仁参选，遭到李宗仁的坚决反对。蒋又单独召见李，劝其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李说：“委员长，我以前曾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蒋问何以见得？李回答：“正像个唱戏的，在

---

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早年留学日本，研究宪政，后赴耶鲁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外交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改任司法总长，同年7月辞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长、中央监察委员。1930年至1935年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37年至1941年任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创立会议，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司法院”院长，1958年在台北逝世。

② 转引自刘统著：《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版，第68页。

③ 张寿龄：《“蒋中正胡适”与“蒋中正居不正”》，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中华书局（北京）2005年版，第156页。

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消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蒋一怒之下，说自己不支持李，李一定选不到。李也来了气，说自己一定选得到。谈话已无转圜余地，两人不欢而散。[①]

4月23日，副总统竞选进行首轮投票，李宗仁、孙科、程潜名列三甲，另外三人得票靠后，退出竞选。但是，李、孙、程三人得票数均不过半，按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

首轮投票结束后，南京城发生了广东籍国大代表捣毁龚德柏的救国日报社事件。原来，当天国大代表们步入会场时，发现座位上都有一份《救国日报》，头版赫然刊登着孙科与“如夫人”蓝妮的丑闻。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蓝妮觊觎这批颜料，孙科就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无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请其看在孙的面上，将颜料发还给蓝妮。这些材料落到绰号“龚大炮”的龚德柏手中，他就在《救国日报》上给抖了出来。此时此地登出这样的新闻，显然对孙科竞选不利。于是，张发奎、薛岳两位上将，指挥百余名粤籍国大代表，乘坐两辆国民大会交通车，呼啸而至位于闹市区的救国日报社，“逢人便打，遇物便毁”，并啸聚至报社印刷所，将字架推翻，机器毁坏。

4月24日进行第二轮投票，仍然没有人获得法定当选票数，必须在这三人中再次圈选。副总统选举已成为李宗仁、孙科两人的竞争，实际上是蒋、桂之间的角逐。第二轮投票当天，有人在国民大会上散发传单，说李宗仁“加官”以后就要接演“逼宫”，“反对威胁政府贪污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本轮投票结束后，蒋介石指示贺衷寒、袁守谦，让他们把争得的票全部都投给孙科，并示意程潜放弃竞选。24日晚，程潜招待其竞选团，声明“本人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副总统”。李宗仁也接受

---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5～666页。

其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的建议，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孙科突然没有了竞选对手，也被迫宣布退选，国大成了“空城计”，只好暂时休会。选不出副总统，国大就无法收场。大会推举胡适、于斌主教等五人，分别去规劝三位候选人，希望他们继续参选；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召见桂系的白崇禧，表示：“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之说，完全无稽。”

4 月 28 日，选举的锣鼓重新敲响，但投票结果仍无人超过法定半数，必须进行第四轮也是最后的决选。根据规定，最后的决选在前两名之间进行，得票比较多数，即可当选。4 月 29 日，李宗仁与孙科展开最后对决。李宗仁得到了原来支持程潜的基本票，结果以 1438 票对 1295 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①]

5 月 1 日，因副总统“难产”而延长了一周的国民大会终于闭幕。有人弹冠相庆，有人落寞失意。最高兴的是那些得了“投票疲劳症”的国大代表们，他们终于可以打道回府了。但是有一位松江籍代表叫孔宪荣，因其组织的“抗日义勇军”被解散，家乡又成了解放区，感到无家可归，于 4 月 15 日开会期间，在代表驻地旅馆自缢身亡，只能“魂兮归来”了。这次“行宪”国大最大的问题，正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宪法已经戳了一个洞，它今后的形状将演变成什么样子颇为难知”，“最后的副总统竞选给国民党本体划了一道刻痕”[②]。

以往和《新民报》为难的大都是 CC 派，因此，在这次副总统竞选中，陈铭德指使《新民报》暗中支持李宗仁，借以寻求一股政治力量，希望以后多少能对《新民报》有所宽假，渡过残局。例如，南京版日刊 1948 年 3 月 10 日登出的分析文章《竞选副总统面面观——李宗仁可能性最高》，倾向就非常明显。4 月 23 日，即副总统选举投票日，南京版日刊登出南京交通服务社总经理朱光正的大幅启事，列举拥护李宗仁的 12 条理由，说李若膺选，“对于安定时局胜任有余，对外亦足备条件”，并“至诚拥护李宗仁先生竞选副总统，特备专车免费迎送国大代表至国民大

---

① 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北京）2000 年版，第 51～54 页；刘统著：《中国的 1948 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北京）2006 年版，第 68～77 页。

② 《国大观感》，1948 年 5 月 2 日上海《大公报》社评。

会堂投票”。4 月 25 日，程潜、李宗仁和孙科先后放弃竞选，使大选无法进行下去。南京《中央日报》为此发行号外，将候选人全部退选归咎于若干报纸刊登互相攻击的言论和新闻，致使谣言蜂起。《中央日报》号外特别指出，23 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刊载的朱光正启事，“最足以引起误会”。中央社也发布类似内容的电讯，把《新民报》刊登的那幅启事，视为该报对副总统选举的态度。南京《新民报》只得拒绝刊登朱光正以后多次送来的广告，并在 4 月 27 日新闻版发表编者附白，进行自我辩解，说广告不代表报纸的态度，《中央日报》号外所引的那个广告，与《新民报》的态度风马牛不相及。①

辩解归辩解，《新民报》实际上确实在暗捧蒋介石最不属意的候选人李宗仁，而李宗仁最后又逆势胜出。因此，《新民报》在这次副总统竞选中的态度，为两个月后蒋介石“钦令”南京版永久停刊埋下了祸根。

国民大会闭幕一周后，“行宪”第一届立法院成立。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头还去做他的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副院长竞选中，由于蒋介石和 CC 派都支持陈立夫，邓季惺和一些立委虽然反对陈立夫而属意于傅斯年，也无济于事。这样，《新民报》与 CC 派进一步结下冤仇。

1948 年 6 月 17 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突然围攻河南省会开封，猝不及防的国民党守军一边坚守，一边请求空军救援。6 月 20 日，国民党空军从徐州、郑州方向出动大批飞机，对开封实施轮番轰炸，造成无数平民死伤，大半市区化为废墟。6 月 22 日，解放军攻占开封，国民党守军 66 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省主席刘茂恩化装逃脱。开封是中原地区被解放军攻占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国民党方面极为震动，6 月 24 日上午，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了检讨中原战局的报告，一些立委蜂起质询，要求追究开封之战的责任。邓季惺领衔于振瀛、谭惕吾等 30 余位立委，当即提出“开封城内，盲目轰炸，责任谁负？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致使何应钦当天下午不得不到会答复质询。

说起开封之战，有一出“兄弟阋墙”的家庭悲剧，令人唏嘘。诗坛

---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1～262 页。

名宿乔大壮教授，四川华阳人。他的长子，抗战时期投身空军，担任队长，作战非常勇敢，曾在昆明空战中一手击落七架敌机，自己也受到重创，下巴被打得粉碎。美空军司令敬佩其英勇，特地派专机运他到印度加尔各答就医，下巴居然修补完整，康复后又回到空军效力。抗战胜利，


中國新社會革命黨和縣支部為清算豪門資本遭受縣長蔣撫摧殘緊要呼籲啟事

喬大壯先生赴告

先公大壯府君於三十七年七月二日在蘇州

遵遺命於七月十一日

嚴山火葬哀此敬告 親友

孤哀子 無競 無數 無遇 無期

女 無疆 無忝

乔大壮子女在 1948 年 7 月 15 日上海《大公报》上刊登的“乔大壮先生赴告”。

他随军回到南京，升任大队长。不料内战爆发，“旧使贼胆悸”的飞将军，而今却奉命杀戮国人。长子的遭遇，本已使乔大壮十分痛苦，恰好开封战役，外间传言，中共军队带队攻入开封城的，乃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而率领“国军”飞机去轰炸这座城市的，又是自己的长子。“用自己的右手去斫自己左手，这在蒋介石心头，并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应；但在一个诗人心头，却是一件大刺激”。乔大壮不久听说自己的三子已在开封被炸死，悲不自胜，乘家人不备，从上海搭车到苏州太安旅馆，写下遗书，又写了一首诗——“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寄其弟子蒋维崧，于 7 月 2 日午夜跳进了苏州护城河。①

6 月 25 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登出了何应钦关于中原战事的检讨报告、立委们的质询及何应钦的答复要点，同时登出邓季惺等立委主张停止轰炸城市的提案。《新民报》这次把娄子捅大了！当天的立法院会议就以“《新民报》泄露秘密会议消息”开锣。CC 分子相菊潭首先出马，要求严追严办泄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420～421 页；台静农著：《龙坡杂文》，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第 71～79 页；黄墨谷：《乔大状遗事》，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史迹文踪》，中华书局（北京）2005 年版，第 37～40 页；牟润孙著：《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北京）2009 年版，第 192～193 页。

密之人，众多CC立委群起附和：有的质问《新民报》的消息是谁供给的（秘密会议不许记者旁听）；有的说亲眼看见邓季惺在会场上做详细记录，不是她透露的又是何人？有的主张调阅《新民报》这条新闻的原稿，辨明笔迹；有的指责《新民报》把邓季惺等严禁轰炸城市案登在显著位置，故意影响士气民心；还有人登台狂叫："《新民报》已经两次泄露立法院秘密了！第一次泄露了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财政情况，这一次又泄露了军事秘密。""共产党的尾巴已伸进了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把潜伏本院的奸类清逐出去！"邓季惺在四面楚歌中上台答复，却被"滚下去！滚下去！"的声声嚎叫打断。支持邓季惺的立委与CC分子互相诘骂，整个会场闹成一团。院长孙科只得用锤子在主席台上大敲大喊休会10分钟。复会后，邓季惺还是镇静地对所谓《新民报》两次泄密进行了答辩："两次秘密会议消息，各报均有登载，有的比《新民报》还详。即如何部长报告，《新民报》还略去了一些数字，所不同者《新民报》只是多了几位质询者的姓名和发言纪要而已。何以单独责备《新民报》?"邓季惺的答辩又引起会场一片骚动，胡子昂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意在平息会场的争吵。CC首脑张道藩闻言，当即表示赞成，趁机溜下主席台。其他CC立委一看阵势，也不敢再放肆喧闹了。① 最后，多数立委通过成立一个"立法院秘密会议消息责任调查委员会"，对《新民报》展开调查，一场闹剧才草草收场。

虽然调查委员会20天后提出的调查报告证实邓季惺所言不虚，但蒋介石已无耐心、也无必要等待这一纸调查报告了。如果说在蒋介石60大寿和"膺任"总统时，南京《新民报》刊出《慈禧太后做寿》、《袁世凯当皇帝》等类比嘲讽文章，他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这次刊登邓季惺等人反对国民党空军轰炸城市的提案，已经完全超出了蒋的容忍限度。要知道，在内战战场上节节失利的国民党军队，空军是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不等"立法院秘密会议消息责任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亲自主持官邸会报，判了南京《新民报》的"死刑"。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71～172页。

正如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所言，在“戡乱”的年头，不是《新民报》更“向左转”，而是国民党政府的尺度更狭窄了。如果蒋介石集团的日子好过，未始不可以显示“宽大”，留着《新民报》作为“民主”的装饰。问题是他们连连溃败，而《新民报》的基本态度又不肯改变，最后的决裂就必不可免。“阶级斗争到了决死关头，中间派自无容身之地。”[①]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76页。

“报纸本身就是目的”

在中国新闻史上，陈铭德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以办报为终生职志的职业报人。

陈铭德，1897 年生于四川长寿县。父亲在重庆一家川货庄任职员，去汉口做生意亏了本，被东家诬陷为贪污营私，百口难辩，一怒之下吞服砒霜，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陈铭德时年才六岁。父亲的朋友出于义愤，设法让川货庄主给了陈家一笔不多的抚恤金，孤儿寡母就靠这笔钱和亲友的资助艰难度日，陈铭德也得以接受了完备的教育。在家乡小学毕业后，他只身一人到重庆上中学，接着又考入北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大学期间，陈铭德兼任了北京《国民日报》编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当时他认为，办报是民主政治下光辉的事业，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就决定走新闻工作之路，把办报作为一生生命的归宿。1924 年他大学毕业回到四川，先后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 年又应邀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一度还兼任《华北日报》驻京特派员。陈铭德大学时代已加入国民党，但毕业回川后和国民党一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在国民党集团中混个一官半职，终身以一个报人自居。

在中央社这个官方通讯社工作，陈铭德感到事事掣肘，与自己大学时代就开始信奉的新闻自由理念相去甚远。“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一直是陈铭德的梦想。1929 年 9 月 9 日，32 岁的陈铭德和同乡刘正华、吴竹似在南京创办《新民报》，

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从此，陈铭德个人的命运就和《新民报》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需要说明一下《新民报》的开办经费问题。陈铭德等三位年轻人是拿不出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的。为了报纸能够创办，陈铭德只好奔走权门，最后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给了2000元开办费，并按月给《新民报》津贴500元，给陈铭德个人活动经费200元。除刘湘的资助外，国民党中宣部以所出《七项运动》周刊随《新民报》附送为条件，每月给《新民报》津贴800元。孙科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经费中一次拨给津贴2000元，名义是在《新民报》上刊登该馆所出的季刊广告。《新民报》从创刊到1938年刘湘去世，的确为刘湘集团的“文治武功”做了不少吹捧。拿人钱财，替人宣传，对于筚路蓝缕时期的陈铭德来说，这似乎也不足为病。陈铭德虽然变相接受了国民党中宣部的津贴，但《新民报》挖国民党当局“墙根”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新民报》连续发表多篇社评，呼吁政府对日绝交宣战、收复东北，与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唱反调，致使首都警备司令部勒令报纸停刊一日，中宣部的津贴也到此为止。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等川帮企业对西迁的《新民报》多有支持，不过大部分属于投资入股性质，与当年刘湘的津贴不同。况且，这时的《新民报》经济上已能自给，与初创时资金捉襟见肘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投资《新民报》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投资实际上是从他们所主持的企业的盈余中提出点滴之数，作为扶助社会文化事业开支销账；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不在企求从《新民报》牟取利润。”[①] 另外，在抗战时期，陈铭德为了使《新民报》在政治上有人照拂，主动与继刘湘担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结交。张群被视为所谓的“新政学系”巨头，懂得运用宣传工具，对已成器的《新民报》，自然也不会漠视。不过，张群对《新民报》的影响，一般是通过中间人或陈铭德夫妇、罗承烈等友谊关系来实施的，很少直接以具体意图要求《新民报》如何行事。这些内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夏衍说《新民报》有“四川财阀和政学系的背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第122～123页。

《新民报》虽然在创办之初接受过权贵津贴，后来也吸纳了民族资本家的投资，为了生存也不断地寻求过政治靠山，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民间报纸的性质。

陈铭德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新民报》虽得权贵资助而创办，但他的内心是清醒的，就是报纸决不"官报化"、"传单化"。他在《新民报》创刊两周年时就向社会郑重声明：

> 新闻记者之清苦，早为社会所共知，本报同人，感情意志，两皆融洽，虽外侮频来，经济屡厄，而同人精神上尚能互相慰安，不为外诱，日常互励，辄有数语，"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自己心安。"
>
> 今之报纸，大都仅谋增加收入，以至商业尖锐化，仰鼻息于资本家，奔走于银行及百货洋行之门，分润彼等榨取劳工血汗之唾余，沾沾自喜，故不惜丧心病狂，为特殊阶级做喉舌，造成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忘却重榨下之劳苦工人；或办报者优然高官贵爵，席丰履厚，但求个人享乐，忽视事业之革新，其结果非为诱惑，即系煽动，是何能安定目前社会之人心，而促进世界永久之大同。本报不敏，决不官报化，传单化，此则又可为社会告者之一。①

1947年社庆之日，他又在重庆《新民报》日刊上发表社评，继续阐明自己的办报信条："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报纸，说起来并不简单，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不可忘却，那就是为办报而办报，报纸本身就是目的。倘以报纸为其它企图的桥梁，那就难免有过河拆桥之一日；倘以报人身份为敲门砖，那就免不了有闭门弃砖的时机。总之，办报的目的，倘在报纸以外的什么企图，总有一天，报纸要受其它企图的牺牲，这自始即乏办报之心，又怎能爱护报纸的历史？"②

明白"为办报而办报，报纸本身就是目的"这一基本前提，才能理

---

① 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 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解当国民党政府挤压、迫害《新民报》时，陈铭德屡屡向当局低眉的良苦用心。1946 年 2 月 10 日上午，重庆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协会议闭幕，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特务打手，乔装成民众代表，在会场捣乱滋事，打伤民主人士施复亮、李公仆、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酿成“较场口血案”。当天的重庆《新民报》晚刊第一版，刊登了多名记者现场采写的报道，抢先把事件真相揭露出来，引起国民党当局强烈不满。事后，陈铭德对晚刊副总编辑、中共党员陈翰伯说，“你要可怜可怜我这点事业”，遂将陈翰伯“礼送出境”。[①] 1947 年 5 月，上海《新民报》与《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当局勒令停刊。《文汇报》和《联合晚报》都没有刻意去争取复刊，照邓季惺之意，《新民报》也要保持“名节”，不向当局低头。可是陈铭德依然百般求情告饶，争得了报纸复刊。后来，还有人对《新民报》上海版接受当局苛刻条件而独自恢复出版提出责难，批评陈铭德的做法无疑于向当局屈膝投降。其实，这些批评者并不理解陈铭德“报纸本身就是目的”的办报思想。

1944 年，陈铭德夫妇和罗承烈、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等报社核心人员，为《新民报》确立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言论编辑方针，即“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八字诀。他们执行这一方针的尺度是：“左”不能左到招致报社关门，“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一鼻孔出气，甚至骂共产党。[②] 也许有人会说陈铭德他们投机取巧，立场不够坚定。1948 年 10 月，著名学者张申府就曾在《观察》上撰文，批评有些知识分子“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③] 不过在今天看来，在当时国共双方激烈党争的夹缝中，陈铭德能够做到“中间偏左”已属不易，“遇礁即避”也不失为保全报纸的明智之举。

不管是陈铭德的“软弱”性格，还是《新民报》的“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八字方针，说到底，一切都是为了《新民报》能够生存，陈铭德费尽心力开创的这份事业能够延续和光大。《新民报》是陈铭德安身立

---

① 参阅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2～205 页。

②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3 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 年版，第 134～135 页。

③ 张申府：《呼吁和平》，《观察》第五卷第 9 期，1948 年 10 月 23 日出版。

命的事业，他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着《新民报》，生怕出现一点闪失，更不愿坐视其中途夭折。“《新民报》是陈铭德、邓季惺个人创办的事业，他们珍惜的是那筚路蓝缕的历程，是那昙花一现的机会，是那聚沙成塔的用功。”[①] 如果报社关了门，那些崇高的新闻理想就无从谈起。因此，“生存至上，事业第一”是陈铭德最基本的办报信条，对《新民报》，他“不为玉碎，宁为瓦全”。曾任南京版总编辑的曹仲英，对老板的做法深为理解。他说，陈铭德的忍辱是为了负重，为了这一民间报纸的“苟全”。《新民报》能够在国民党暴政下生存20年，而且有了辉煌的发展，陈铭德的韧性和锲而不舍精神，是直接起了作用的。周恩来对陈铭德的处境和做法也表示过理解和支持。1946年11月，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曹仲英和浦熙修去梅园新村送行。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走了，《新民报》承受的压力必然会增加，陈铭德先生的日子将更加不好过了。作为民间报纸，必须反映社会真实，做人民的喉舌，不然，又成什么民间报！民间报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的，这就不能同他硬顶牛，顶牛过了头，它会封你的门。民间报一般是同人的结合，报存人在，报没了人就散了，再集合就困难了。所以民间报纸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战术，既要生存下去，又要持续地同它斗。”[②]

不过，陈铭德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关键时刻他也能够挺身而出，维护《新民报》独立自主的立场。这是陈铭德“报纸本身就是目的”办报思想的另一重含义。

1947年2月、3月，上海版因刊登所谓的“侮辱中华民国国歌”、重庆版日刊刊登“侮辱中华民国军人”的文章，激起当局震怒。刊登道歉启事可以接受，自动停刊一天也未尝不可，但对当局提出的报社交出文章作者和编辑的要求，陈铭德一口回绝。5月，上海版被勒令停刊，陈铭德勉强接受了当局提出的撤换总编辑等屈辱的复刊条件。当时，陈布雷还授意彭革陈，要《新民报》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和南京社的浦熙修，陈铭德均没有答应。陈铭德这样做，当然有保护同人、爱惜人才之意，

---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② 曹仲英：《锲而不舍 思贤如渴——记铭德同志办报生涯中的几个段面》，1990年2月11日、12日《新民晚报》。

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报纸独立自主立场的维护。即使有时报纸的独立自主立场无奈受到当局的干涉，陈铭德也要设法予以补救。1947 年 10 月，国民党中宣部为上海《新民报》“介绍”的总编辑王健民“履任”，陈铭德即调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来沪任副总编辑，牵制王健民。他还告诉王健民说，《新民报》的编辑、言论工作，有个“双轨制”传统，即总编辑掌管新闻版面，总主笔掌管言论。这样，代表上海《新民报》立场的言论，仍掌握在赵超构手中。

陈铭德是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报人。作为一家广有影响的民间报纸“掌门人”，报纸生存对他来说固然是第一要务，但在苟且偷生与主持正义之间，他也敢于选择后者，代民众立言，尽报人天职，发挥“本报爱自由爱民主之真精神”。这是陈铭德“报纸本身就是目的”办报思想的第三重含义。

抗战胜利后，大家满以为国家会走上和平、统一、民主的大道，而残酷的现实令人失望，政治夹缝中的民间报纸，发言立论感到异常苦闷、困难。在如此艰难的办报环境下，陈铭德依然宣称《新民报》要“明是非，辨真伪”，代民立言：“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两端的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但四万万老百姓谁愿意打下去？再乱下去呢？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要为老百姓说话，要使国家社会和平安定，要使政治清明，不贪污，有效率，要经济走上轨道，人人无匮乏之虞，又岂是讴歌现实，文过饰非所能济事？所以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去。”①

内战进入 1947 年，中国大地已是烽火连天，哀鸿遍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2 月 11 日，各地《新民报》都刊登了《请问有效的办法在哪里?》的社评，代表民众向当局提出严厉责问，甚至以“革命”来威胁国民党政府：

由于各种事态的无法可想，由于各种矛盾因素的无法消除，于

① 《本报十七周年纪念》，1946 年 9 月 9 日重庆《新民报》。

是只好用打的方法来解决。好，那就打吧！今天这个局面，便是这个结论的注解。但老百姓有一个要求，就是“速战速决”，不管马打死牛牛打死马，若果长年累月的内战下去，那不是甲打乙，乙打甲，而是在和老百姓作对了，为什么老百姓该白受牺牲呢？这当然由于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没有知识，没有组织，没有力量，所以才不敢有所主张，纵有主张也不能发生效力。但我们要问：中外历史的教训，加上目前世界局势的推移，谁能保证主人翁始终不会抬头，谁能保证革命运动不会再演？我们真想不出我们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不希望别的，只希望主政者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什么是他们利国利民的有效办法，以免我们彷徨，以免我们疑惧。

1947年4月，张群继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张内阁发布“戡乱建国纲领”，托人要《新民报》来篇社评捧场。《新民报》捧场文章没有写，反而在南京版上发表了《生存第一！和平第一！》的社评，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执行“军事第一”政策“不敢苟同”，指出实现和平才是挽救中国人民厄运的唯一办法。随后又发生南京军警镇压学生游行的“五·二〇”血案，陈铭德接到官方通知，必须按照“军警和学生互殴”的统一口径进行报道。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也专门来到报社，当面告诫他：此事干系重大，不可造次，《新民报》的报道应以当局的口径为准。在南京社编辑部，陈铭德看着正在奋笔疾书事实真相的记者，欲言又止。只是临去之前，对总编辑曹仲英悄悄地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的报道，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要当心啊！当心啊！”[①] 在事实和谎言之间，报人的良心促使陈铭德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没有按照当局的意图而阻止同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揭露。

即使南京版被强行封闭之后，陈铭德等《新民报》同人仍然表示“不畏难苟安”、“不唯强力是视”，还要代表民众意见，争取言论自由，实现民间报纸的理想：

① 曹仲英：《锲而不舍 思贤如渴——记铭德同志办报生涯中的几个段面》，1990年2月11日、12日《新民晚报》。

本报已有十九年之历史，现在五社八版，职工近千人，纯赖刻苦经营，谋自给自足，并未受任何方面之津贴，亦不愿以此作敲门砖。我们既系以民间性之报纸问世，所以结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义派人士，也正因为是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并没有好多成见，并没有任何党见，不愿意过左也不愿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总想求得一个不偏不倚之道。但在这个政治路线极端尖锐化的环境下，中间空隙，遂愈来愈狭，便成了左右不讨好，左右做人难之势。但我们总觉得这是必有的现象，报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教育，就是一种文化动态，他代表着民间的意见，我们就得要争取这点自由，要实现这点理想。因此他并不畏难苟安，他并不唯强力是视。假使一个纯民间性报纸而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我们也就根本怀疑到政治是否有革新之望，民主是否有实现之可能了。[①]

陈铭德待人谦恭厚道，遇事委曲求全，有人因此觉得他没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是和他相濡以沫 50 多年的邓季惺并不这样认为。陈铭德去世以后，邓季惺在追思会上终于向大家坦陈了自己对丈夫的看法：

他这个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感觉如坐春风，因此觉得他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我知道他是有坚定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坚持民主自由，想用办报通过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作育新民，继承和贯彻中山先生的那一套主张）。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不能不在一定的限度内作适当的让步，在报馆里，他去当外交部长，为了《新民报》的生存，有时要对有权有势者磕头作揖。要是让我来的话，我不会说话，磕头作揖更办不到，《新民报》早就玉碎不能瓦全了。铭德为了《新民报》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有些人便误认为看不出铭德这个人内心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生活经历证明，在政治上，他没有拿报纸去做敲门砖，

---

① 重庆《新民报》社评。转引自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 年版，第 111 页。

解放前他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在经济上，他没有藉办报敛财，蓄积财产，两袖清风……①

知夫莫如妻，诚哉斯言！

在一个新闻自由不受尊重与保护的国度里，在激烈的党争中，既要报纸生存，又要维护报纸独立自主的立场，代民众立言，尽报人天职，主持正义，倡导民主，陈铭德的办报思想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然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忍辱负重，竭尽心力，作育新民，造福社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陈铭德看似不合逻辑的办报思想，却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新民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新民報二十年
（新民報總管理處編）
二十年之回顧與前瞻
無忝於時代的新民報

新民报总管理处编辑的《新民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49 年 9 月 9 日出版）。

① 转引自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 年版，第 233 页。

老板做不成了

在浦熙修等南京社同人被捕前后，陈铭德、邓季惺从朋友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决定在立法院休会后即着手逮捕反对派立委，邓季惺的名字已列在黑名单内。“蒋王朝”中还有人主张把他们二人逮捕，交“特种刑事法庭”治罪。

事已至此，陈铭德、邓季惺才对蒋政权彻底绝望。1948 年 10 月，在黄苗子的帮助下，邓季惺化名乘机从南京逃到香港。陈铭德则继续留下来，部署各社做好应变准备。12 月，蒋王朝崩溃已成定局，国民党中宣部钦派的上海社总编辑王健民，建议陈铭德将《新民报》南京社全部设备迁往台湾，或者借给他，由他负责运到台湾，出版《新民报》台湾版，遭到陈铭德的断然拒绝。实际上，南京社被封后，陈铭德、邓季惺不但将原来租赁的社址买了下来，还搞到了一张《江南晚报》的登记证，暂时出版《江南晚报》，等待光明的来临。各社部署妥当之后，陈铭德于 12 月底也化名出走香港。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李宗仁“履任”后，或是为了酬答自己竞选副总统时《新民报》的捧场，或是为了显示“民主”，特许《新民报》南京版复刊，甚至表示可以贷款。远在香港的陈铭德夫妇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李宗仁政权软弱无力，不足为恃，遂电告留守南京的同人：“复刊事须从缓议。一切等大局安定，

我们回来后重作打算。”[①] 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已经和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夏衍的肯定答复：解放后新政权仍然允许私人报纸出版。

夏衍的话无疑使陈铭德夫妇吃了定心丸。他们也自认为《新民报》不同于另一家民间报纸《大公报》。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呼吁共产党要“政争”不要“兵争”，指责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驱使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打头阵，遭到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的严词批驳，称《大公报》对蒋政权一贯“小骂大帮忙”，其社评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帮凶”。《新民报》虽然也发表过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社评，但总体上是“中间偏左”的。况且，陈铭德、邓季惺及《新民报》的一些骨干，有的与中共要人私交颇好，有的本来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浦熙修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及董必武的私交自不待言，陈铭德在重庆时期也与周恩来多有往还，邓季惺有三个弟弟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赵超构则深受毛泽东的赏识。1944 年初夏，国民党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赵超构代表《新民报》参与其中。他将延安见闻整理成十多万字的通讯，命名为《延安一月》，同时在《新民报》重庆、成都两版连载，引起读者强烈反响，使国统区人民对神秘的革命圣地的人与事，有了系统、客观的了解。在《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文中，赵超构对延安共产党领袖的描写，细腻传神，别具一格：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3 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 年版，第 179 页。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①]

毛泽东后来曾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毛泽东对赵超构的印象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两人建立了很特殊的个人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经过上海，在稍事逗留的几个小时里，很想到《新民晚报》见见赵超构，碰巧他外出不在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地广播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是"请赵超构同志听到广播后，立即到《新民晚报》报社去，有紧急事宜"云云，[②] 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毛泽东的诗词，也是通过《新民报》首次发表的。1945 年 11 月 14 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刊登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并加了编者按：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尽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共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山河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欠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渺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

① 赵超构著：《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 1946 年版，第 60～61 页。

②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7 页。

这是毛泽东的诗词第一次公开刊布。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翩然到渝”，与蒋介石握手言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特撰社评，激动不已，“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①]在“双十协定”签订、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新民报》又发表其诗词，使国人知道共产党领袖还有文采风流的一面，这等于替共产党做了最好的宣传。《沁园春·雪》发表后，国民党组织一帮文人墨客进行所谓的“唱和”，“欲与毛公共比高”，结果风调、文情和气魄均不及毛作，只好作罢。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毛詞 沁園春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共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祇識彎弓射大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潤之氏能詩詞似鮮爲人知。客有鈔得其沁園春詠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氏自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爲青年法，尤不足爲外人道也。

1945 年 11 月 14 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如此看来，《新民报》在新政权下继续出版是不成问题的，身在香港的陈铭德夫妇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此时，香港聚集了大批进步的文化人，上海社的赵超构、北平社的钱家瑞等同人也先后逃难来港。陈铭德、邓季惺与这些同人、新朋旧交，自然少不了接谈酬酢，共话劫后余生。作为《新民报》的老板，他们念念不忘的还是报纸在解放后的发展问题。在香港，陈铭德、邓季惺开始阅读邹韬奋的著作，研究生活书店职工持股办法，招揽办报人才，为《新民报》的东山再起潜心准备着。

1949 年 4 月中旬，在夏衍安排下，邓季惺带着吴敬琏，从香港乘船，取道天津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邓季惺离港后，陈铭德也秘密回到上海，保护《新民报》的财产，迎接上海的解放。

---

① 《毛泽东先生来了！》，1945 年 8 月 29 日重庆《大公报》社评。

回到上海的陈铭德情绪颇为高昂。他虽然还为尚在蒋政权控制下的成、渝两社的安危担心，但南京版日刊已于5月下旬复刊，上海社的工作也进展顺利：国民党指派的总编辑王健民离开了报社，流亡在外的赵超构、浦熙修等人，先后回到了上海。同人中有的参军南下，有的离职他就，报社不断开欢迎会和欢送会。不管去留，大家情绪都十分高涨。置身于如此热烈的气氛中，陈铭德觉得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番事业了。

邓季惺遇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当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北平，碰到的却是令她懊丧的局面。原来，北平社已在解放军入城后成立了职工会，并发布了《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

> 一、本报职工会在2月2日职工会全体大会中正式宣告成立，当场并推选工人代表三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今后所有本报对内外一切事宜均由本执行委员会负责。
>
> 二、本报前总经理陈铭德在解放前离平他往，本报业与该报总经理完全脱离关系。
>
> 三、前本报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前后解除职务。
>
> 特此郑重声明。

这就是说，北平社已经不再属陈铭德、邓季惺所有了！邓季惺看到这则启事后勃然大怒，骂代经理曹仲英“软骨头”（张恨水于1948年12月离开《新民报》，北平社经理由曹仲英代理），即刻找新政权领导讨说法。以往《新民报》遇到过不去的坎儿，陈铭德总要请托说项，力求化解。唯独这一次，他对夫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然，反而在上海大读《七剑十三侠》。他说：“到了新社会，风气一新，只要对于变革现实的有志之士，都有充分发抒聪明才智的可能，新社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的事业，要是对人民有利，人民会需要我们并帮助我们发展，用不着我们磕头；要是对人民不利，人民干脆也不要我们，磕头也无所用。”①

7月12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招待新闻界朋友，集中回

---

① 《陈铭德自传》，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答多次要求见他但一直没有工夫接见的新闻界朋友们提出的问题。邓季惺受邀参加了这次宴会。她向周恩来诉说了《新民报》北平社的遭遇，提出民间报要不要办、怎么办等种种疑问。周恩来回答说，民间报纸肯定要办，至于《新民报》等民间报纸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交给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具体负责。胡乔木后来在燕园临湖轩开过一次新闻界座谈会，对大家进行安抚。

实际上，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就召集过夏衍等南下接管干部谈话，针对报纸工作予以指示。周恩来说，共产党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像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按解放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民办报纸，像《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党领导的外围报纸，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中央的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① 《新民报》就是按照这一指示被保留下来的。

《新民报》虽然得到中共高层的允许可以继续办下去，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曾经的报业老板，现在却被视为剥削者、寄生虫，失去了对报社的领导权。邓季惺想把浦熙修安排到北平社，却遭到报社工会一些人的反对，加上其他原因，浦熙修离开《新民报》去了《文汇报》。1949年3月赵超构从香港到北平后，陈铭德、邓季惺想让他负责北平社的工作，但北平社的一些人不能容他。陈、邓二人隐约意识到，对于自己创办起来的事业，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完全当家作主了。

---

① 夏衍著：《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版，第395页。

告别《新民报》

1949年9月9日，是《新民报》创刊20周年的日子。每年此日，《新民报》都要郑重地发表一篇社评，抚今追昔，向全社会申明报纸的立场和发行人的办报理念。时移世易，20周年社庆，发表这样的社评比往年看起来更为必要：

新民报创刊二十周年了。二十年的时间在个人生命史上虽不算短，在一个集体事业上说起来却是很平常的。流连过去，夸耀历史，这是没落阶级的心理，不是我们新民报同人所该有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检讨过去，是趁这个二十周年的机会，勇敢地检讨过去二十年这张报纸所表现的一切，把它作个结束，作为新的开始。

二十年前，新民报创刊于南京，创办新民报的同人，对于出张报纸，是抱着自以为相当进步的理想的。那时新民报的同人，沉溺于资本主义的新闻观念，相信新闻在其本质上是必当"大公无私"，而且幻想报纸是可以超然于阶级斗争党派性之外，站在中立地位的。二十年来，新民报同人多多少少都有着此种信念，作为职业报人，为新闻而新闻，为办报而办报，自居于"民间立场"，向反动统治者争取"新闻自由"。

从今天看，这种办报的态度，这种新闻工作的理想，完全是幼稚的，幻想的，迷信的，一切资产阶级的新闻教育都犯着共通的错误，他们有意隐蔽阶级斗争的事实，制造一个虚幻的"人类"、"民

间”的立场，在这个虚幻的基础之上追求虚幻的“公正”虚幻的“中立”虚幻的“自由”，却忘记本身在客观上已成了某个阶级所利用的播音机。因为我们所承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而我们所处的又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反动专制的政治环境，所以在我们本身便经常发生矛盾与斗争。一方面，我们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是很明确的，我们不能过于自贬，说新民报过去二十年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毫无表现；但是成为问题的，是我们仍然受了资本主义民主观念的束缚，仍然醉心于英美式的“民主”，仍然梦想英美式的“言论自由”。二十年来若干历史事件反映到新民报纸面上的，九一八以后的坚决主张抗日，可是同时又是“合法主义”的抗日论者；旧政协时期，新民报是积极的拥护者，可是又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追随者；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新民报是一贯的反对论者，可又是自居于“中立”者，和平主义者，幻想超乎党派之外。南京反动派统治末期，新民报是进一步了，反对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动统治，支持各种反对反动统治的民间运动；可是，仍然寄其幻想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民主派。在最近几年，我们反美，却仍不能忘情于第三条路，我们争取言论自由，甚至为此被反动派停刊，但是没有勇气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一切说明了新民报在过去反动派统治的历史阶段中，在某一方面是进步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的。其表现于纸面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迷信，自由主义之鼓吹，对国内问题，徘徊于中间路线，对国际关系彷徨于第三条路。

从今天看二十年来的新民报，虽然并无一贯的反动立场，但在客观上是起了帮凶帮闲的作用，解放以前的新民报，在其追求进步的作风中，同时就包含着小资产阶级的落后、动摇、软弱、自私性。解放以前的新民报是受过迫害的，新民报同人是受过苦难的，这说明新民报也斗争过来的。但从今天看来，我们对于过去的自我估价是有限的，没有多少值得自负值得夸耀的。

解放使我们获得自由，同时使我们接近真理。解放后的新民报历史虽还很短，但已足够有机会反省我们过去的错误与幻想了。

我们充分认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在目前阶段，我们的报纸必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联系起来，作

为人民民主专政之下，为人民服务的报纸。

我们充分认识：现在的公营报纸与私营报纸的合作关系，基本上已不同于过去反动统治时期的官场与民间报纸的对立关系。我们应当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有机而灵活地配合公营报纸，为着同一个大目标而分工合作。

我们充分认识：现在已不是书生办报或以办报为单纯的职业的时代，所有我们新民报的工作人员应当从思想到行动，努力改造自己，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缺点和根性，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以期报纸不断的进步，能对人民作更好的服务。

新民报创刊二十年了，摸索了二十年道路的新民报今天见到光明了。解放区的天地是明朗的天地，解放区的报纸也应当是干净的、坦白的、健康的、富于新鲜活力的，让我们在检讨过去的错误中稳步踏上这一条应走的路上去吧！今日新民报的同人是有这个决心的，在做得不够或做得不好的时候，那是必须读者、朋


社論

二十年來的新民報

1949 年 9 月 9 日北平《新民报》社论《二十年来的新民报》。

友以及先进人士的不断批评援助的。[1]

这篇社评据说是赵超构撰写的。如此重要的文章，当然经过陈铭德、邓季惺的审阅并同意发表。社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新民报》一向引以自豪的"公正、中立、自由"的"民间立场"进行否定，把20年来的《新民报》定性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帮闲"。就在1948年社庆日，陈铭德夫妇还"毫不愧怍"地说，19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他们是"贫贱不移"、"为办报而办报"的职业报人，为保持报纸的洁净，力求以报养报，采取纯粹的商业方针。[2] 事隔一年，他们的立场和对自己事业的评价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扭转，是出于自觉还是别有隐衷？

隐衷肯定是有的。他们的报社老板身份已经受到质疑，对报社的领导权实际丧失，《新民报》的前途也不明朗。同时，他们也有些许政治上的失落感。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观察》周刊的储安平，都作为新闻界代表应邀与会。作为国内最大报系——《新民报》的负责人，陈铭德夫妇没有受到邀请，自己的下属赵超构反而名列其中。徐铸成还为自己只是个候补代表而"殊感委屈"[3]，他们夫妇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陈铭德夫妇同意发表这样的社评，恐怕主要是为了向新政权表白：他们和《新民报》愿意放弃民间立场，接受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

为解决报社解放以来面临的问题，1949年9月，《新民报》在北平召开了平、宁、沪三社经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胡乔木在会上说："我们有工人阶级做领导，工农联盟做基础，统一的领导，统一的基础。我们各个报纸要合作，所谓合作，就是共同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但另一方面要分工，以适应各种群众的需要，使他们各得其所……目前我们感到缺少一份通俗读物的机关报，假如《新民报》能有计划的这样做，这是《新民报》的光荣，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很大的贡献，否则无非等于

---

① 《二十年来的新民报》，1949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日刊社论。

② 《十九年的考验》，1948年9月9日《新民报》社评。

③ 宋云彬著：《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人民日报》多出几份而已。”关于劳资纠纷，胡乔木提出要“劳资两利”，“做经理的要使职工兴高采烈地工作，职工也应使做经理的有积极性”。夏衍说，与其解放后喊我们万岁，还不如那个时候不踢我们一脚；《新民报》不是这样的，《新民报》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不能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夏衍建议《新民报》不妨以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为对象，耐心地向较为落后的分子宣传，也就是说，《新民报》的读者对象应该定为“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

这次会议决定，《新民报》在总管理处下设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职工代表参与报社管理，经理还有决定权。职工代表不满意决定权还在经理手里，他们认为这样无法保障职工利益。胡乔木安慰大家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我们在国家中占领导地位，怎么会失去保障呢？在企业方面，当然也要知道决定权是应该审慎用的，否则对他也是不利的。”[①]

无论如何努力，陈铭德夫妇感到他们已无法撑持《新民报》这份事业了。除了管理权被离析、社内劳资矛盾凸显外，事业发展还面临着三个无法突破的瓶颈：首先，作为私营新闻业主，他们不能参加官方频繁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与官方的方针政策在交流上存在隔膜。其次，解放初期国困民穷，工商业凋零，直接影响了报纸的销路和广告来源。《新民报》本来是旧中国为数不多的仅靠发行和广告就能赢利的民营报纸，但到了 1949 年，因销路不畅和缺少广告，经营开始出现亏损。第三，新闻来源出现问题。《新民报》虽以社会新闻见长，但并不忽视政治新闻，浦熙修就是以采写政治新闻而声名鹊起的。解放后，社会新闻之“趣味性”、“轰动效应”，被视为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而党政机关只欢迎党报记者采访，常把私营报纸记者拒之门外，中央政府的重大新闻，更轮不到《新民报》这样的私营报纸发表。本来驾轻就熟的社会新闻不知道如何做了，政治新闻又得不到，这是《新民报》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

无奈之下，陈铭德夫妇决定将《新民报》交出去，由政府收归公营或公私合营。从 1949 年 8 月起，他们就开始怀揣着报社财产的有关证

---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305 页。

明，一次次地找政府相关部门，仅阳翰笙（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秘书为此事接待他们就不下十次！他们的理由是："办报是一个尖锐的政治事业"，"我们是从旧社会里来的，对理论、对政策，过去都没有好好学习，对新鲜事物还不能充分接受和认识"，因此难以承担领导《新民报》的使命。[①] 这恐怕是堂而皇之的理由。1949 年 10 月 8 日，刚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徐铸成，与赵超构一起到陈铭德夫妇家便宴，"铭德、季惺深感能力无从发挥，他们对北京'新民'尤感不满"。[②] 由此看来，"深感能力无从发挥"，才是他们夫妇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决定交出报纸的原因所在。

不过，因为他们的想法太"超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年之后的事情，无论他们多么诚恳地反复申请，政府都无法出面将《新民报》收归国有或公私合营。到了 1950 年 9 月，曾属意过这份报纸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新民报》达成了公私合营协议，由李济深、邵力子任正副董事长，陈铭德任总经理，黄苗子为公方代表兼副总经理。

《新民报》与民革的公私合营只维持了一年。1952 年，新中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 月，北京市委收购北京《新民报》，用原名出版，半年后改出《北京日报》，邓季惺被聘为顾问。1953 年初，上海《新民报》实行公私合营，重组编委会，陈铭德被聘为副社长，邓季惺任顾问。他们两人接受了聘书，但再也没有过问报社的事情。成都、南京两社于 1950 年 4 月，重庆社于 1952 年 1 月已先后结束。至此，曾经拥有五社八版的《新民报》，只有上海版硕果仅存。上海版 1958 年 4 月 1 日易名为《新民晚报》继续出版，虽然延续了《新民报》的一些传统，但毕竟和原来的民营报纸不大一样了。

公私合营后，陈铭德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季惺担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都离开了自己钟爱的新闻事业。陈铭德做《新民报》老板时，为了疏通关系、联络感情，整天都在请客吃饭，日久

---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5 页。

②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 年版，第 208 页。



20世纪70年代初，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与孙女在一起。

竟成了“美食家”。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忙着把自己在上海、南京吃过的好餐馆介绍到北京来，以解决首都存在的饮食单调问题。邓季惺的“政绩工程”，则是负责建设了北京市第一个火葬场。

陈铭德、邓季惺虽然离开了《新民报》，但是他们内心仍不能忘怀新闻事业。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邓季惺对党报和非党报的待遇不同很有意见，她主张多办同人报纸，应该把同人报纸办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陈铭德则说，新中国成立后非党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报纸作为百花齐放的园地和百家争鸣的讲坛来说，“多一片园地就能开出更多的花朵，多一个讲坛就能多明辨一些是非”。他对首都北京连一张晚报都没有深表遗憾，建议及早在北京办一份晚报，“假如有人办一张晚报，如经营得法，我担保不会赔钱的”。言外之意，他还是想办报纸、也有能力办好报纸的。[①] 由于这样的言论，夫妇两人随后双双被打成“右派”，直到1961年才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陈铭德做书画组顾问，邓季惺做小餐厅顾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闻梦彻底破灭，只有当各地《新民报》老人赴京，到他们的家

---

① 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版，第56～58页。

里拜访时，“他们才在热情款待和絮絮交谈中温习五社八版的辉煌”。[①]

1989年2月11日，陈铭德以92岁高龄在北京病逝。六年后，邓季惺也追随而去，享年88岁。在他们的墓碑上，刻有这样的文字：

> 陈邓两人毕生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和民族富强，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保持坚定执着的信念，相濡以沫，共度艰难岁月……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1949年前后的曹聚仁

青春作伴好还乡

土地与时代的儿子

『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

《抗战画史》足千秋

桃花扇底送南朝

「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乌鹊南飞，何枝可依

『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秘密信使，爱国书生

青春作伴好还乡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消息传来，举国若狂。国人八年来的痛楚悲辛，压抑忍耐，坚毅不屈，憧憬期盼，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所激荡，一下子迸发出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战地记者）曹聚仁，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上，千千万万给八年抗战折磨得太够了的国人，每一角落上都在以狂热的情绪，迎接这最后胜利的消息。每一新闻记者的笔尖，都给太兴奋的热情堵住了，好似非到街上去叫喊一番不可。《前线日报》是在偏僻的铅山城外，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电台的报务员，拿着种种不同的乐器：脸盆、大鼓、铜锣，到城中乱敲乱喊一阵。从铅山喊到河口，直喊到天亮。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他断断续续地把消息报告了，就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是时收音机中送出重庆街上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盟友的"顶好"声，复闻万众合呼的"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之声。①

这一天，曹聚仁正在赣东北乐平县的临时家中。抗战期间，皖南和赣东北是敌军炮火所不及的"死角"，一直比较安全。1945年那一年，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66页。

他把家安在乐平，自己则往来于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部所在地）与乐平之间，像钟摆似的，不停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游走。美军向广岛投原子弹那天，《乐平日报》收到了一条五六十字的中央社电讯，报道广岛全城被炸，死伤 17 万人。编辑部众人都看不懂这条新闻，乐平县长也疑惑不解，就向曹聚仁咨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在总理纪念周上讲了一次铀原子分裂的经过，并断定三天之内日本必然投降，提醒报社中人时刻注意收听电讯。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曹聚仁走上街头，汇入游行的人流，和乐平民众一起庆祝这期盼已久的胜利。游行归来，他仍然亢奋不已，难于入眠，就和妻子邓珂云秉烛夜谈。他喋喋不休地向妻子描述不知讲过多少次的战后蓝图：要做现代的徐霞客，重作战地旅行，搜集资料，写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抗战史；周游全国，在各地做通俗的科学演讲，帮助百姓认清现代战争的特性。

乐平地僻，为了采写到重要新闻，曹聚仁急忙往浙赣线上的上饶赶。到了鹰潭，得知中日商洽投降事宜的地点，指定在江西玉山。曹聚仁等一帮记者赶到玉山，才知道那里的机场跑道还没有修好，不便于大型军机降落，当局已决定改用江西南城机场。可是等到他们赶到南城，又扑了一个空，最后决定在湖南芷江洽降了。在胜利之初，身为记者的曹聚仁就这样往来奔走，到处追寻着洽降的地点。

经过协商，东南地区由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第三战区决定 9 月 21 日在杭州举行受降典礼。曹聚仁得设法尽快赶到杭州，一是能够参加受降典礼，二是为了出版《前线日报》上海版。

《前线日报》1938 年 10 月 1 日创刊于皖南的屯溪。抗战爆发后，各战区都配备出版《阵中日报》，其性质属于政治部系统的宣传刊物。各地本来出版有属于军方系统的《扫荡报》，《阵中日报》只能算是临时性报刊。各战区的《阵中日报》都先后消亡，唯独第三战区改出《前线日报》，独树一帜，可以和《扫荡报》并驾齐驱。

《前线日报》在屯溪创刊不久即崭露头角，半年后迁到江西上饶，在浙赣线上和 CC 系的《东南日报》平分秋色，让《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惊羡不已。后来日寇窜扰浙赣线，《前线日报》从上饶迁到福建建阳，最后又从建阳迁回铅山。抗战期间，《前线日报》是赣东北唯一销行的报纸，曹聚仁称其为“东南战区孕育长成的奇迹”。

《前线日报》能够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中生长起来，当然离不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支持。就办报事务而言，则归功于社长马树礼、总编辑宦乡和副社长邢颂文这“三剑客”的苦心经营。马树礼对新闻业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与顾祝同乃江苏安东（今涟水）小同乡，顾对他信任有加：“顾将军有一个特点，即是不把报刊当作自己的宣传工具，可以让马兄放手去做。”[①] 宦乡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读的是工程专业，却有编写长才，是新闻界的后起之秀。邢颂文则是一个最适当的事务人才，能够应付复杂的环境。在马树礼等人的经营下，《前线日报》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份报纸，除了日报以外，还拥有周刊、通讯社、出版社、书店、造纸厂及苏皖学院、中国建设社等一整套文化机构。

1944年是中国抗战军事上最黑暗的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在湘桂线上连陷长沙、衡阳、柳州、桂林等名城，陪都重庆为之震动。但大家都相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一定会到来，大后方的文化人，都在筹谋着胜利后的远大计划。向中国新闻事业的“罗马”——上海望平街进军，是每一个报人的梦想，马树礼更是心向往之。1945初，曹聚仁与马树礼在重庆不期相遇。马树礼当时正在进行去美国的计划。两人一见面，马树礼几乎必向曹聚仁描绘战后《前线日报》的愿景：希望《前线日报》能够像《大公报》那样获得20万美金的官价外汇，他就可以拿着这笔钱到加拿大订购到足够三四年敷用的白报纸；到美国后，和那些新闻托拉斯取得联系，只要拆运一家第二流报馆的印刷机件回来，就够在中国“大闹天宫”了。抗战胜利后《前线日报》移上海出版，肯定会异军突起，一下子就可以压倒《新闻报》、《申报》那几家老爷报馆。马树礼理想中的《前线日报》，还是小型四开报纸，平时出16张，和伦敦《每日镜报》一样每日有两张画报，星期日增加16份周刊，出32张。他还邀请曹聚仁到时候来主持这16份周刊。其实，曹聚仁当时也有一个私人的计划：“首先联络全国各大城市的民间报纸，成立中国联合通讯社，以报社为基本会员，彼此在发行、采访、电讯上通力合作。这样，一个民间通讯社，就可以和中央社去争一日之长了。”同时，他还计划建一个全国性的报刊发行网，带着这份网向望平街进军，“要望平街看我们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18页。

的颜色”。[1]

到了胜利在望的1945年春，《前线日报》的“三剑客”已经开始做“抢滩”上海的准备：社长马树礼到重庆去推动他的战后扩张计划，总编辑宦乡、副社长邢颂文就在铅山整合手下那一支文化部队，作种种开拔的安排。他们邀请曹聚仁来主持《前线周报》，也是为了日后在上海打开局面做预演。

曹聚仁本以为抗战胜利后，自己可以在新闻界施展拳脚，打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谁知日本一投降，为共同抵御外侮而结盟的国共两党，隐藏的矛盾顿时显露出来。芷江洽降议定：日本投降后，日军有守城之责，等待中国军队前来接管。但是，日军在华最高军事长官冈村宁次偏向国军，而抗战期间周佛海就曾经到过上饶，与第三战区暗通款曲。“这样一来，伪军、日军倒成为国军的友军；国军的友军新四军，事实上却成为国军与日军的共同敌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虽然已被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番号，但是却在苏南发展壮大。苏北的淮阴，俨然成为中共新政权的中心，和国民党南京政权隔江相对。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派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到苏联，签订了出卖中国权益的《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苏联答应把关外还给中国，而且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蒋氏政令可以行到关外，“暗中踢了毛泽东一脚”。所以，抗战军事一终了，曹聚仁这个中央社战地记者的处境，便立刻复杂起来：“作为战地记者，中央社可以容许我这个并无政治关系的人工作着的，最主要的，还在社长萧同兹先生的大度包容。一旦投入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新圈子中去，我立刻就碰上了难以自处的复杂环境了。”[2]

《前线日报》内部的问题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共有意要争取社内的那几位负责人。马树礼与顾祝同有同乡之谊，还不致被渗透。对现状不满、又目睹旧军人腐败的宦乡，想摆脱与第三战区的依附关系，带着《前线日报》走向进步。这些不为外人道的隐情，有意无意间造成了《前线日报》内部的裂痕。这裂痕，曹聚仁也是到报社主编《前线周报》之后，才看明白的。他想调和社内的左右两种倾向，但于事无补。《前线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13～215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69～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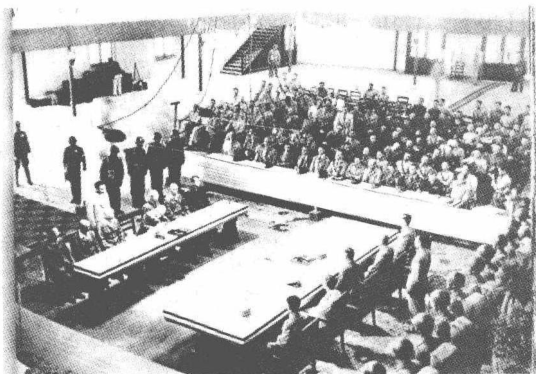
日报》社内的裂痕，终于在一件小事上扩大了。有一天，“编余漫笔”栏目刊载了一节批评三青团的文字，引起三青团团员的恼火，《前线日报》在各地被扣留，不许发行。这节文字是一位编辑写的，只是说三青团的准官僚作风，简直要不得，除了语气比较强硬外，并没有什么大错误。但是，三青团方面却要归罪于总编辑宦乡，到处贴标语要打倒他。过了几天，《前线日报》的社论对政治部工作有所批评，竟有人到重庆告“御状”，矛头又集中到宦乡身上去。这时正巧胜利到来，宦乡就借着到上海出版《前线日报》，离开了上饶。

“羊枣事件”更增加了对《前线日报》的政治性麻烦。羊枣，本名杨潮，湖北沔阳人。1923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主持过“左联”工作。1936 年 6 月至 1939 年，任塔斯社上海分社电讯翻译，同时为《世界知识》等刊物撰写军事和国际时事评论，名重一时。后去香港，用“羊枣”笔名为《星岛日报》写军事评论，与俞颂华合编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为共产党的《华商报》写稿。1944 年到福建永安，供职于美国新闻处。次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关押在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部。羊枣“失踪”时，连洗换衣服都没让带。押解到铅山后，他托人带了一张字条给宦乡说：“我和你虽只是见了一次面，但是相信你会帮我一次忙；我这次匆匆离开永安，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可否请你替我设法弄一床被头，秋夜凉了，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呢！”[①] 当时宦乡已经去了上海，曹聚仁叫报社派人送了棉被去，那边却回说没有这个人。后来羊枣又被移押到杭州，因饮食不调，患上了恶性疟疾，不幸于 1946 年 1 月 11 日病逝。第三战区发动“皖南事变”，已为中共所仇视，现在又秘密逮捕、关押文化人，又成为中共谴责的对象。《前线日报》是第三战区办的报纸，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曹聚仁慨叹：“我们在抗战长时期，从事新闻工作，并不感到十分困难；而今战争一结束，政治所造成的困惑，却无从解消了！”[②]

杭州受降在即，曹聚仁暂时抛开忧心烦虑之事，于 9 月 15 日从上饶动身，先乘火车到浙江江山县。浙赣线在抗战后期只剩下这一段能够通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335 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21 页。

车，江山县以下只有走富春江水路了。17日，他才勉强找到一条又破又狭的小船，却满满挤上了18位客人。大家归心似箭，当天又突降大雨，江水暴涨，船行如飞。曹聚仁站立船头，朗声吟诵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曹聚仁平生最爱杜诗，八年战地旅行，有两部书不离行囊，一部是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部就是《杜工部集》。此情此景，也只有杜甫的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才能表达他的这份"奔迸式的情绪"！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会场全景。

9月18日清晨，小船从兰溪西门出发，中午即过严子陵七里泷，傍晚过桐庐，到窄溪才泊船上岸，这一天就走了100多公里。19日，小船一过闻家堰，就远远地望到了六和塔，接着钱江大桥的影子也渐渐地清晰起来了。"自我不见，于今八年；旧地重来，悲喜交集；我们都流出眼泪来了！"①

西子湖畔这座天堂般的城市，是在1937年12月24日陷入日寇之手的。城市陷落前一天凌晨，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才沉痛地离开："冷峭的寒风，吹着霏霏的微雨，汽车沿着湖滨驶过，零落不见一个行人。但那街头的路灯好像含着满眶热泪的眼睛，放出惨红的光圈，一明一暗地，在那里闪烁着，湖上的碧水，也像一个困苦颠连的流浪人，在那儿长吁短叹如怨如诉的悲鸣。我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号称天堂的杭州！天堂天堂，刹时就要变成地狱了！想起了天堂的快乐，便想到地狱的痛苦，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72页。

不知何日可以再回到天堂哩？我是两任的西湖守主，这种景况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呵！”无限感伤之余，黄主席填了一阕《菩萨蛮》，以志不忘：

越王欲雪稽山耻，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头，酒旗楼外楼。吴宫人已去，教训谋生聚。期以十年春，还伊湖上人。[①]

曹聚仁是和黄绍竑同一天离开杭州的。这座城市，是曹聚仁的求学之地，也是他和青梅竹马的妻子王春翠欢度蜜月之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曹聚仁离去杭州之时，也是“一步一回头”，依依难舍。

不过，当时大家都相信，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的。可是，当真的踏着胜利的脚步归来，连曹聚仁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了。当时钱江大桥还不允许过船，小船就在闸口码头泊了下来。曹聚仁他们在满岸观众惊奇、欣羡的目光中上了岸，看到守卫候潮门的国军，也都显得气宇轩昂。

不料，曹聚仁到杭州的第二天，染上了恶性疟疾，寒热交作，浑身疼痛，半步不能移动。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战争结束了却突然怕起死、留恋起人世来：“我觉得中国既已有了希望了，应该让我看看盛世了！”9月21日，杭州受降这一天，他让工友安好藤椅，挣扎着坐看全副武装的国军，唱着战歌，喊着口号，踏着齐整的步伐，雄赳赳地向内西湖开去。士兵们所唱的那首战歌，歌词就是曹聚仁在1932年应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教授所请而写的：

枪在我们的肩膀，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齐赴沙场！
渡过鸭绿江，
冲过大同江！
哈，富士山算得什么！
嘻，富士山算得什么！

---

① 黄绍竑著：《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

我们濯足乎扶桑!
我们濯足乎扶桑!

听着这再熟悉不过的歌词和旋律，曹聚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9 月 23 日，国民政府论功颁奖，身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名列其中，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认为自己受之无愧，应获得这份光荣!

土地与时代的儿子

曹聚仁字挺岫，1900 年 7 月 7 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村（现属兰溪市）。曹家本是金华东乡人，明中叶迁居金华、兰溪、浦江三府县交界的蒋畈。四百年间曹家世代务农，门庭衰薄，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到了曹聚仁的父亲梦岐先生，发愤图强，力行耕读，终于考中秀才，算是挤到绅士阶层中去了。梦岐先生参加童子试，还有一段辛酸经历。他到浦江县应考，浦江童生说他是金华人，给他扣了一顶“冒籍”的帽子，被赶出考场。生性刚毅倔强的梦岐先生，不甘心就此放弃，瞒着心灰意冷的父亲，背着曹氏宗谱，到金华参加考试，这才达了志愿，以第一名秀才压倒了全场士子。南乡本是穷乡僻壤，秀才已属凤毛麟角，举人四百年间也只出了一个。梦岐先生不肯认命，到杭州参加最后一科乡试。虽然没有考中举人，但这次杭州之行使他眼界大开，返乡时把康梁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带回了闭塞的山村。1902 年，他自筹经费，在家里办起了全乡第一所学校——育才小学，免费培育乡邻子弟。1929 年梦岐先生辞世，育才小学由长子曹聚德接掌，一直办到 1950 年。50 年间育才小学培养的学生达 3000 人以上，亲受梦岐先生教益的就有千余人。梦岐先生除了致力乡村教育，还注重移风易俗，清除乡间积弊，其品行颇似陶行知先生，在当地极孚人望。

曹聚仁幼时被目为“神童”，6 岁即能动笔写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13 岁留读育才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可以代父亲教初级小学的国文课，批改学生的作文课卷。1916 年夏，他到杭州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于同

年秋天入学。浙江一师的校园就是原来的省府贡院，当年梦岐先生在这里参加乡试，落第而归。而今，在乡人眼里犹如中举的少年曹聚仁又来到这所黉宫，一生的志业由此开始。

曹聚仁进入浙江一师的时候，陈独秀已在上海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正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实际上，浙江一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渊薮，先后任职的教师，如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许寿裳、姜伯韩，都和新文化运动有密切联系，在这所学校播撒着新时代的文化种子。时人谈五四运动的演进，除北京大学之外，必以湖南一师与浙江一师相提并论。不过，在校的前三年，新文化运动似乎没有给曹聚仁带来什么洗礼，自小受宋明理学熏陶的他“埋头读书，一意做理学家门徒”，跟着单不庵师潜心学习桐城派古文和治史门径。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曹聚仁才“束书不观，要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当起来”了。①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自然也燎原到杭州的学校，顽固的浙江省长齐耀珊用提前放假的手段来释散年轻学子的满腔激情。但是，秋季开学后，学生们的热情又高涨起来。在校长经子渊（名亨颐）的支持下，浙江一师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废除考试制度试行学科制，要求新知识，提倡白话文，研究进化论，维护学生利益，和学校当局的不合理规定进行抗争。自治会还组织了学生法庭，处理和仲裁学生间的纠纷。曹聚仁参加了自治会《宣言书》的起草工作，并代表浙江一师参加了杭州学生会。与此同时，浙江一师的施存统（即施复亮）与省一中的阮毅成、甲种工业学校的沈乃熙（即夏衍）等20多名学生，创办了《浙江新潮》周刊。正是这份只出了三期的短命杂志，将杭州的学生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也将曹聚仁推进了现实政治的激流旋涡。

1919年11月，《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施存统写的文章《非孝》。这篇不过从《新青年》里偷得一些浅薄见解、加上一个吓人题目的短文，在浙江引起轩然大波。12月7日，省议会65名议员联名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和教育部，矛头直指一师校长经子渊，控告他“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主义；于校内发行《浙江新潮》、《校友会十日刊》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等报，贻害青年，灭伦伤化"[①]，吁请迅速将其严令法办，以杜邪说而正人心。经子渊校长是恂恂长者，为人博雅大度，主张"人格教育"，在教育界享有极高声誉。他思想开明，支持一师的革新运动，每次在校内演说，讲到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撤换的交通总长曹汝霖，总说成是"曹聚仁"，引起学生一次次哄堂大笑。如此一来，省内的顽固派便对他忌恨在心，抓住"非孝"事件向他发难。

经子渊校长表面上看去脾气很好，却是那种性格耿直倔强之人。省教育厅要求学校将"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刘次九这四位进步教师解职，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于是，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便在学生放寒假期间，撤了经子渊的校长职务，另派一位两级师范的毕业生金布来担任校长。

消息一出，群情激愤。在校学生领袖徐白民、宣中华立即组织寒假留校的同学向全校同学发信，呼吁大家"留经护校"。春季开学后，学生自治会迅速将同学们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经"运动。学生们的要求是：校长必须由经子渊留任，拒绝其他任何人当校长；解除陈望道等四位教师职务的成命必须收回。

因为省议员弹劾经校长"非孝、废孔、公妻、共产"，学生自治会认为必须发表宣言予以辩驳。曹聚仁读一师的第二年，在全校国文会考中获得过第一名，次年又获得国文朗读第二名，平时又经常给报刊写文章，笔头之快，文采之优，在一师颇有名气。大家就公推他来起草这篇宣言。这篇文理并茂的宣言，沪杭各报都予以刊载，为一师学生的"留经"运动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也提升了曹聚仁在学生自治会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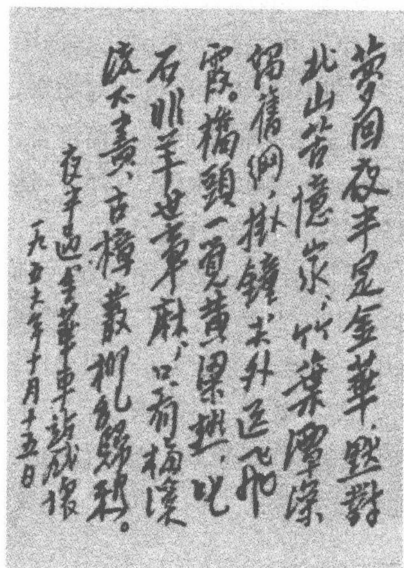
省府当局对学生们的停课请愿采取了强硬措施，教育厅宣布一师"暂行休业"，勒令学生一律离校。1920 年 3 月 29 日清晨，500 余名警察突然包围了一师，将学生领袖徐白民、宣中华监控，强迫学生全部离校。同学们不为所惧，呼喊着都到大操场集合，决不离校。唯有曹聚仁一个人拎着衣箱走出了校门，大家还以为他做了"逃兵"。原来，曹聚仁出来是为了和杭州学生会取得联系，寻求其他学校同学的声援。同时，他又

---

① 转引自卢敦基、周静著：《自由报人——曹聚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2 页。

将警察包围一师的详细情况写成新闻电讯，发给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第二天，三大报都以显著位置将其刊出。

3 月 29 日下午一时许，在操场和学生僵持了大半天的警察突然撤走，曹聚仁也于当晚返回学校。原来，这是蔡元培暗中斡旋的结果。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赴欧美考察教育。远在国外的蔡元培，从报上得知一师闹风潮的消息，害怕家乡学子受到伤害，打电报给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弟弟蔡元康，让其务必设法妥善解决。齐耀珊绰号“琉璃蛋”，做官圆滑世故，一看事情因报刊的报道引起全国瞩目，竟然连海外的蔡元培都惊动了，请出弟弟来说项，也担心事态再扩大而不可收拾，就给了蔡元康一个顺水人情，同意将警察从一师撤回，但条件是经子渊绝对不能留任。经蔡元康力争，齐耀珊同意继任校长可由学生自治会推选，然后由省府委任。即使如此，学生们依然坚持经校长留任。经子渊却已经看清楚，为了自己的去留使学生与官府对抗，最后的结果必然两败俱伤，因此决意离开。同时，蔡元康也向同学们晓以利害，劝大家接受现实。最后，经过全校学生票选，一致同意请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浙江余姚人蒋梦麟先生担任一师校长。蒋梦麟是极会办事的人，他专程赶回杭州，在一师做公开演讲，向同学们表示谢意，然后金蝉脱壳，推举姜伯韩。同学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也就鼓掌通过了。事后得知，由姜伯韩任校长，本来就是教育厅长夏敬观的腹案。



曹聚仁怀乡诗。

不管如何，一师风潮总算平息下来。经过抗争，学生们得到的结果也算不差，继任校长姜伯韩先生尚属开明。就曹聚仁个人而言，经过这次学潮，他名声大振，尤其是在 3 月 29 日危急之际的机智反应，赢得了同学们的称

赞。1920 年秋季开学后，领导学潮的风云人物徐白民、宣中华已经毕业离校，曹聚仁自然成为新的学生领袖。他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代表学生出席校务会议，不仅过问学校决策，还能决定教师去留，因此连教师都对他另眼相看，每门课都给他优等成绩。曹聚仁奔走校务，参加校外各种社会活动，俨然踏上了政治的路途。

浙江一师五年，也是曹聚仁尝试做新闻记者的开始。曹家经济并不宽裕，当初父亲让他报考浙江一师，就是因为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学生每年只需交 18 元半的膳费。即使这区区之数，曹家得卖掉 15 担新谷，再加上路费和日常零用，每年就得卖掉 30 担谷，等于 10 亩田的收成。曹聚仁在杭州，家里每月只给他一块零用钱，常常感到捉襟见肘。他有位好友叫查猛济（其姑母是蒋百里先生的夫人），在杭州《之江日报》做编辑，就让曹聚仁为报纸写新闻，挣点儿稿费零用。但是一师的校规十分严厉，学生一律住校，即使假日外出也得请假，晚上八时前必须回校。这样的规定使学生和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犹如关在大笼子中的曹聚仁如何去找新闻呢？"我便异想天开，和兰溪的《兰江日报》取得连络，我答应替他们写杭州通讯，不取稿酬，社中送我一份报。我便从那份报上，找寻金华地区的地方新闻资料，添油加醋，重新写过，投向《之江日报》，居然刊载出来，有了稿费了。有几回，居然得了一元一条的高酬。每月就有四五块钱收入作零用。这是我做新闻记者的开始，那时，我只有 16 岁。不过，当时学生是奉令不许做报馆访员的，好在我所写的都是钱塘江上流的地方新闻，和学校当局河水不犯井水，没给夏丏尊师训斥过。"[①] 后来，他主持校刊《钱江评论》，在"留经"运动中为沪杭报刊写新闻，并将这些文字结集为《思痛集》（后改为《浙潮第一声》）出版，让新闻圈里的朋友相信他是进得了这个圈子的，想不到终身的命运也就由此而决定了。

1921 年夏天，曹聚仁与一帮同窗好友游览了南宋都城旧址凤凰山、爬上初阳台眺望东海日出后，就从浙江一师毕业了。他不愿像其他同学那样回乡做小学教师，决定考入花费较低的高等师范继续深造。他先返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 页。夏丏尊时任浙江一师舍监。

回老家蒋畈住了一个月，然后携新婚妻子王春翠东下杭州。两人是春节期间完的婚，王春翠考取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要到杭州读书。曹聚仁和妻子在西子湖畔补度了蜜月，随即束装北上，孤身一人去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浙江一师的后两年，他忙于学生运动，荒疏了功课，英语、数学考得很差，结果名落孙山。打道回府肯定是没有颜面之事，曹聚仁毅然溯江而上，再考武昌高等师范。由于食宿不当，他得了疟疾，勉强坚持考了第一场国文便放弃了。武汉三镇，九省通衢，喜欢发思古之幽情的曹聚仁也无心揽胜，只到了黄鹤楼，对着浩浩长江放声大哭了一场。

极度失望的曹聚仁乘船东返，在江轮上过了中秋节，回到上海时兜里只剩下一块多钱。站在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茫茫人海，举目无亲，他禁不住又黯然垂泪。幸好知道陈望道师家在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他就坐车来到老师家，暂时总算有了寄身之处。

“一师风潮”后，陈望道离开杭州来到上海，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辑《新青年》，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巧的是，陈望道正和邵力子结邻而居，曹聚仁自然也就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青年导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实际上，邵力子对曹聚仁并不陌生，一师闹风潮时期，曹聚仁所写的报道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曾引起他的注意。在上海各报中，《民国日报》对一师支持最力，社长叶楚伧写社论讽刺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邵力子则在《觉悟》副刊中大量刊登过教育界、文化界声援一师的文章。接谈应对之下，邵力子对这位学识不错的小同乡颇有好感。

正在曹聚仁为工作无着而发愁之际，邵力子将他介绍到浦东川沙县，做县立高小一年级的主任。川沙毕竟太小了，虽能容身但施展不了才学，曹聚仁在这里呆了半年就回到上海，邵力子又给他介绍到陕西盐商吴怀琛先生（吴宓的堂叔）家去做西席。他在吴家一共呆了三年。这三年，宾主相得，师生融洽，曹聚仁食宿无忧，终于在上海立了足，不用再去叨扰陈望道和邵力子了。更重要的是课业轻松，他有从容读书写稿的时间。温习国故，吸纳西学，广泛涉猎时人新著，他的学识在不知不觉中突飞猛进。后来回忆起这三年家庭教师生涯的自修成绩，他相当自豪：“那是我自修研究进步最快的时期，几乎读遍了当时从欧西译介过来的文

学名著，旁及社会科学、哲学、史学专著，仿佛一个通人了。我开始用现代的烛光来照明中国的古籍，我读了无数种前人的笔记，也就是前人的杂学；正因为他们的议论，互有出入，大开了我的眼界。”[1]

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22 年 4 月，江苏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在上海开设国学讲座，逢周六下午开讲，一共讲了十次。教育会还请了两位老先生来记录讲辞。上海的各大报纸，对章大师的讲座极为重视，事先广而告之，开讲后又派记者前往记录，准备在报纸上揭载。教育会请的两位老先生，不知是听不懂章大师的一口余杭方言，还是笔头太慢，无法再记下去。各报委派的记者，理解不了大师的博学奥义，所记错误百出，根本无法刊载。《民国日报》也特派曹聚仁去听讲、记录。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检论》等艰深著作，曹聚仁在吴家都已经认真地研读过，因此记录起来得心应手，并且还能够纠补演讲中的疏漏。邵力子非常满意曹聚仁的记录稿，加上批语后在《觉悟》连载。学术界为之惊动，章太炎也惊异于记录稿的详尽准确。章从弟子钱玄同那里得知曹聚仁曾受业于单不庵，[2] 就传话让曹聚仁上门来拜师。曹聚仁就这样因缘聚合，成了章门最年轻的弟子。同年底，上海泰东书局依照曹聚仁的记录和整理出版了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这本小书，三年内就重印了十次。成为众人仰望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曹聚仁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为以后进入大学执教准备了“名片”。

与此同时，曹聚仁在上海新闻界也开始小有名气。当时的上海，文坛和报界本来就是一帮人的两个阵地。由于邵力子的关系，曹聚仁从 1921 年秋天到川沙县教书开始，就成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长期撰稿人。《民国日报》是穷报馆，叶楚伧和邵力子常常脱下皮袍抵押，换取纸张开印。曹聚仁初期写的文字，大多在《觉悟》上发表，四年中差不多写了 150 万字，却不曾拿过一文稿费，心甘情愿地来撑开《民国日报》这一场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民国日报》，他结识了一大批才俊英豪：就在《民国日报》这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诸师，还认识了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陈独秀、戴季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5 页。

② 单不庵的姐姐单士厘，是钱玄同的兄长、外交家钱恂的夫人。

陶、孙中山，都是扭转乾坤或即将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风云人物。1923 年 5 月，曹聚仁还和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庵、叶楚伧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新南社”。

俗云：高人指点不如贵人相助。在曹聚仁的一生中，邵力子是在关键时刻给予他无私帮助的“贵人”。没有邵力子多次援之以手，并把他荐引到《民国日报》这个圈子中，曹聚仁也许会落拓一生，湮没无闻。曹聚仁自己就曾说：“我的思想，一部分可以说是《觉悟》的儿子，邵先生乃是我所终身师事的一人。”①

这段时期，除了《民国日报》那一帮师友外，曹聚仁还结识了对他一生思想上影响最大的忘年交吴稚晖。吴稚晖生于 1865 年，江苏常州人。青年中举，后薄文人而不为，决计科学救国，发动赴法勤工俭学，刻苦耐劳，为人表率。1923 年下半年，他从伦敦归国，寓居上海，曹聚仁通过书信结识了这位行事、文风诡异的民国元老。吴稚晖约曹聚仁到上海西门黄家阙一家茶楼见面叙谈。这天，从上午 10 点一直谈到下午 3 点，吴稚晖滔滔不绝，兴致很高，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其中一则故事给曹聚仁留下了深刻印象：

> 张三李四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张三住在楼下，李四住在楼上。一天晚上，附近起了大火了。张三惊醒过来，披衣下床，连忙高声叫李四：“李四，大火了，快点下来！”这时张三听得楼板响，却不见人下来。他又叫了：“李四，怎么啦！”李四回道：“我在穿袜子，还有一只没穿！”张三叹息道：“蠢材！逃命要紧，还穿什么袜子？”可是，老半天，仍不见李四下楼。张三又叫了，“怎么啦？”李四回答道：“你不是说不要穿袜子吗！我正在脱那只袜子呀！”

曹聚仁从这则令人发笑的故事中，听出了极深的寓意：“要穿袜子是笨，可是要脱袜子，那就更笨。我一生就紧紧记住这一故事！”②

在《民国日报》那帮师友特别是吴稚晖的影响下，曹聚仁加入了国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5 页。

②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3～214 页。

民党，只是他后来很少提及自己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我的加入国民党，和《民国日报》有相当关系；那时编《觉悟》的邵力子先生和主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沈定一先生都是指导学生运动的导师。可是我的决意入党，还是受吴稚晖先生的影响最大；他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沸腾了我心头未冷的血。"① 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曹聚仁接连写了三封信给吴稚晖，质问他为什么"首议清共"，吴都避而不答。从此，两人的交往就稀少下来。不过，吴稚晖对曹聚仁思想上的影响却是终生的，曹一直把吴视为"思想上的拐杖"。在曹聚仁的一生中，除父亲曹梦歧外，有三个人对他影响至大，而各有偏重：单不庵重在学问，吴稚晖重在思想，邵力子重在实际的援助。

1925 年 6 月，邵力子应蒋介石之邀，南下广州，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长，曹聚仁也随之结束了在吴家的西席生活。此时，已从浙江一师改任暨南大学校长的姜伯韩，请曹聚仁去暨南，任中学部国文教师。原来，暨南中学部的国文教师多次被学生轰走，让新掌校的姜伯韩很伤脑筋，他就想到了曹聚仁这位昔日的学生领袖，请他去试试看。曹聚仁 13 岁就在育才小学做过父亲的"助教"，在吴家做西席时又先后在上海艺专、上海大学附中等校兼过课，已经有了一些课堂教学经验。他国学根底扎实，又通晓时论西学，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一下子享誉暨南。曹聚仁在暨南开始教的是初中二三年级的国文课，一个月后升到高中师范科，到 1925 年 10 月底，他就正式被调入大学部任商科一年级的国文教师了。

1927 年 4 月 12 日，正当曹聚仁满心在大学讲堂授业解惑、受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学生追捧之时，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向共产党下手，他的多名同窗好友在政变中遇害，其中就有在浙江一师时一块儿闹学潮的宣中华。惊涛骇浪，斑斑血迹，让曹聚仁痛心、迷惘，不知所措：

> 一九二七年，从初夏到深秋，这百八十天中，真是使释迦大彻大悟的大千世界！多少人从最高层跌入血污池，多少人从贫民窟爬

---

① 曹聚仁：《十分诚意与三分希望答罗园先生》，《涛声》第二卷第 34 期，1933 年 9 月 2 日出版。

上三十六天，多少人把自己的亲友当作牺牲品，多少人把仇敌当作亲滴滴的同志，所谓友谊，所谓政见，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那时，熟人的死讯，一起一起传来，几乎流眼泪的余裕都没有了。可是“死”予我以启示，并不予人以威慑；我并不想活下去，但也并不想死。我问我自己：“害怕不害怕?”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没有恐怖，我只有淡漠”！于是，我揩干我的眼泪，在这淡漠上活了下来。①

当时的曹聚仁，并不能看清国共“婚变”背后那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血雨腥风中的人生浮沉，使他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斗争对人性的戕害。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口的长人，手的侏儒”，决心远离政治漩涡，不再过问社会问题。1927 年秋，恩师单不庵任浙江省立图书馆西湖分馆主任，请曹聚仁去做馆员，帮助整理文澜阁藏书。他毕竟年轻，不愿终老在湖山胜地的文澜阁钻故纸堆，便于第二年春天重回暨南大学任教。从 1928 年到 1931 年，曹聚仁安家于暨南大学所在的真如镇，过着优裕淡定的大学教授生活，很少再写东西，加上 1927 年，他差不多沉默了五个年头。这几年，“一个社会革命的力量，慢慢从地下成长起来，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和我相知的朋友，很多都已在狂潮中死去了。”②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4～355 页。

②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下），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9 页。

“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曹聚仁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在真如乡下的家和藏书，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被毁散，只好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重新置家。他和几个朋友创办《涛声》周刊、《芒种》半月刊，协助陈望道师编辑《太白》月刊，为朋友陈灵犀主编的《社会日报》写社论，为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参与发起“大众语运动”，与创办《人间世》、主张“闲适”的林语堂论战，成为望平街上的活跃人物。柳亚子写信称道他：“我觉得在今日的言论界中，头脑清楚而使我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怕只有你曹先生了。”[1] 在曹聚仁的文字生涯中，这一时期的文风最为激愤，鲁迅形容其为“赤膊上阵，拼死拼活”[2]。从热河陷于日军后《涛声》所发表的宣言，即可感受到曹聚仁这一时期的文风和立场：

> 蒋介石北上，张学良下野以后，中日之间转出一个新局势；对于这个新局势，我们的态度是如此：
>
> 政府若有积极抵抗的决心，我们愿望站在最右翼，把最后一滴血奉献给政府，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政府若是因循苟且，依旧那么妥协下去，我们决心站在最左翼，和政府处敌对的地位，死而有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6 页。

② 鲁迅：《祝〈涛声〉》，《涛声》第二卷第 31、32 期合刊，1933 年 8 月 19 日出版。

> 灵，为厉击人！
>
> 这一次是蒋介石的最后机会，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后机会，非积极抵抗以图存，即国际共管以亡国，生死存亡，间不容发；谋国者好自为之！[①]

不过，办报刊写文章只是副业，曹聚仁的主业还是大学教授。1932年6月暨南大学大学部南迁广州，曹聚仁随中学部一度迁到苏州。次年，他就离开了执教9年的暨南大学，教学中心转到复旦大学，兼及大夏、持志、中国公学等大学。他十年不变地穿着一身蓝布长衫，穿梭于十里洋场的大中学校、报馆书店。这身蓝布长衫，被朋友们视为他的永久"商标"。关于这身一成不变的行头，按照他的解释，也是出于爱国的热忱："我之所以穿蓝布衫，倒有点小小的曲折。五卅运动以后，凭着一点爱国热忱，决意抵制英国货。我曾咬定牙龈，三个月不坐电车，也不再穿呢绒英国货，这都是年轻时的一股劲。不穿英国呢绒，照说可以代之国产绸缎，那知那时的绸货，染料不成，容易褪色；一件长衫，穿了两三天，下水一洗，便走样了，变成了奇形怪样的地图，简直不成；无可奈何，只好走布的路子，乃看中了阴丹士林；这是我穿蓝布衫的开头。其后，大约穿了十多年的蓝布长衫，夏天则代之以白夏布，直到后来，才知道阴丹士林也是洋货，只好叹息自己国家工业的落后了。"[②]

历史行进到1935年，内战不止，外患日亟，中华民族已到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1936年1月，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曹聚仁参与其事，被推为执行委员。他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使曹聚仁下决心走出书斋，奔向抗击日寇的战场。

第一步向何处去，曹聚仁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正在他踌躇不定之际，暨南大学毕业生陈希文从广州来到上海，为即将出版的《星粤日报》订购轮转印刷机，同时为报社延揽采编人员。曹聚仁就接受《星粤日报》

---

① 《我们的态度》，《涛声》第二卷第10期，1933年3月18日出版。

②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③ 转引自卢敦基、周静著：《自由报人——曹聚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的聘请，担任京沪一带的采访工作。从此，他和"星系"报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当时，国民政府召集各方人士商讨抗日大计的庐山会议即将开幕，曹聚仁整理行装，准备去牯岭采访。不料，日寇突然将战火引到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终于"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①]，开始了惊险而传奇的战地记者生活。

一介书生的曹聚仁能够成为战地记者，得益于他与孙元良将军的交谊。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1904 年生于成都华阳，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32 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次年升任 88 师师长。红军从瑞金长征后，孙元良奉命率部尾追，驻防于四川奉节，曾住在湘军悍将鲍超（字春霆）家里。鲍超乃曾国藩的爱将、湘军"霆字营"统领，家中积存有不少珍贵文献。当时鲍氏家道已经中落，这些珍贵文献被后人视同废纸。孙元良知道它们的价值，就用几包烟土换了过来，随军辗转运到南京。但是孙元良无暇整理这些材料，他的秘书周震寰在上海暨南大学听过曹聚仁的课，知道曹有志于研究近代史，便从中通款，把全部八大篓文件送给了曹。这是文人曹聚仁与武将孙元良订交的开始。

1937 年 8 月 7 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孙元良从无锡来上海休假，在福州路一家咖喱饭店请曹聚仁吃饭。此时，孙元良已率 88 师驻防无锡，成为拱卫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谈到战局，孙认为战事只是在北方胶着，一时还不会燃到南方来。曹聚仁向孙表达了上前线做一名战地记者的心愿。孙许诺说，如果 88 师参战，就邀请他到自己的部队来。不料两天后孙元良返回无锡，就接到动员令；8 月 11 日，他已经率 88 师向上海近郊挺进，13 日下午，中日双方前哨即发生遭遇战。曹聚仁做一名战地记者的愿望，就这样很快地成为现实。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帅部规定，淞沪各军不得随便发布军事新闻，所有新闻拟定后必须报告给苏州第三战区长官部，再由长官部转告上海市政府，然后由市府新闻处转告中外记者。新闻如此这般辗转下来，都已成了明日黄花，报纸不愿采用。日军方面每天则发布五六次新闻，在宣传上反而抢了先。因此，各报都希望有战地记者，直接进入前

① 曹聚仁之子曹景行语，见曹聚仁著《万里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0 年版，第 440 页。

线采访。但是，前线各师司令部都不欢迎记者到来，因为记者的采访车常常跟来敌人的炮弹，非常不安全。这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期报社与前线部队之间难于解决的矛盾。



曹聚仁初任战地记者。

曹聚仁受聘的《星粤日报》还在筹备中，用不着采访新闻。① 《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听说曹聚仁有进入前线的门路，就请他担任《大晚报》的战地记者。1937 年 9 月 3 日晚，曹聚仁搭乘《大公报》的一辆采访专车，冒险到达苏州河北岸茂新面粉厂 88 师师部。不过，他进入前线，并非以记者的身份，而是顶孙元良的秘书周震寰的缺。这是孙元良想出的妙法，这样曹聚仁就可以随军进退，自己担当新闻发布的责任，师部无需为此负责。

孙元良特意安排曹聚仁与师参谋长张柏亭同住一个房间。他不耻下问，很快学会了看军事地图，分析兵力配置，悟到了军事新闻的写作要领。他每天将战地见闻，写成通讯、特写，发给《大晚报》，后来还给上海《立报》和中央社发新闻。可以说，淞沪战线上的新闻，也就是自曹聚仁到了军中之后，才转入正常化。由于得天独厚的采访优势和过人的采写能力，除了平型关战讯到来那天，曹聚仁的电讯，占了上海报纸两个月的头条。他不无自豪地说：“说起来，战地记者也正是富有刺激性的生活，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一个人独占了东战场右翼的军事新闻，便是留居四行仓库的那两个月。”② 更让曹聚仁自豪的是，他采写的战讯，不仅满足了后方民众对战事的了解，而且对抗战发挥了实际效用。10 月 3 日，日军出动 20 余架飞机轰炸我军闸北阵地，尔

---

① 《星粤日报》1937 年冬才在广州试版，只出了几天，日本就在大鹏湾登陆，报纸转香港出版，改名为《星岛日报》。

② 转引自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7 页。

后敌方发言人向各国记者宣称：“闸北中国军队阵地经轰炸后，完全动摇，即将向后总溃退。”曹聚仁闻讯，一言不发，马上到阵地巡游了一圈，随即写成电讯发给报社和通讯社。第二天，上海的中外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出了这则电讯：

> 【本报战地特讯】今晨一时前方报告：昨日左右两翼，均有激战，左翼虽吃紧，但并无危险；右翼工事巩固，敌人虽狡谋很多，前途仍可乐观：此系记者最忠实的报道。
>
> 左翼敌军，屡以一二联队之兵力，在各线探击，前日之攻顾家宅，昨日之攻刘行，均系同一用意。自刘行镇全成焦土后，我即移守××附近阵地，又成拉锯战之形势。昨日下午三时起，敌以大炮飞机，密集射击轰炸，我方亦以重炮还击，至下午五时左右，敌约两联队，过沪太公路，向西犯我阵地，我以战车队及机枪队猛烈还击，至晚九时起，枪声稍息，惟炮战又起，敌炮有一分钟发五响者，隆隆之声，闸北方面，亦可听到，至晚十一时许，我军即开始冲锋前进，与敌肉搏，至今晨尚在血战中。
>
> 右翼敌军集结于北四川路一带，昨下午二时起，敌向我宝山路宝兴路口中兴路口冲进，被我截断包围，杀敌四十余名，敌即仓皇退出。下午七时左右，敌又由虬江路口宝兴路口冲进，我分头迎击，激战达两小时之久，敌卒被我逐回北四川路。昨双方激战终日，声震全市，预料今晨当有更激烈的战事发生。①

消息一出，敌方所谓的我军“总溃退”之说不攻自破，消解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孙元良看了，也大为赞赏曹聚仁用事实来澄清敌人谣言的做法。

然而，现代战争是要用实力说话的。尽管我军将士前仆后继，英勇异常，无奈血肉之躯终难抵御日寇的飞机大炮。最高统帅部遂决定淞沪前线国军撤退到先前构筑的福吴国防线（福山——吴县，时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依托工事再与日军展开决战。原计划国军 11 月 1 日开始次

---

① 《我昨晚开始冲锋前进》，1937 年 10 月 4 日《立报》。

第撤退，至 6 日行动完毕。不料日军 11 月 5 日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攻陷松江、青浦，直趋平望、吴江，绕过了福吴国防线向江南各地挺进。如此一来，我军有秩序撤退、回防福吴国防线的计划被打乱，陷入极度混乱、狼狈之境地。

孙元良将军把师部撤出四行仓库、留下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据守之时，曾与曹聚仁约定，等 88 师撤防到青浦后，让曹再去部队找他。不料青浦很快失陷，曹聚仁就与 88 师失去了联系。他困坐在法租界家中，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都是国军溃退的消息，心急如焚，无计可施。

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为使敌方逼我签订“城下之盟”的阴谋破产，发表宣言，移驻重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1]

听着这慷慨悲壮的言辞，曹聚仁下决心离开租界去寻找部队。就在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的当天下午，他告别正在热恋中的邓珂云[2]，随着乱糟糟的人群在上海东门码头挤上了一艘开往宁波的轮船。翌日清晨船到宁波，看了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后，于晚间乘火车直达杭州。此时杭州人心惶惶，谣传日军已到离杭州只有50里的临平，警察大队都全部撤离了，南逃的市民犹如一股潮水，将浙赣线全线冲溃。一位绸缎庄的老板在街上碰到曹聚仁，看他似乎并不惊慌，感到奇怪，便设宴款待，还请来救火会会长王五权等作陪，要曹聚仁谈一谈对军事形势的看法。他分析说：日军到嘉兴后，会西攻湖州、宜兴，从那儿转攻芜湖，切断我军退路，在南京保卫战未分明前，日军不会来攻杭州。这些人听了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的一席话，心里踏实了许多。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杭州，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杂志，上面登有一份某银行秘书的留杭日记，说王五权那天本来已决定成立维持会投敌，正是听了曹某这番话，动作才推迟了一月多，此所谓“曹聚仁一语救杭州”。[3]

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曹聚仁所料，杭州混乱的局面也就很快平息下来。蒋介石为了稳定家乡局势，派桂系军人黄绍竑到浙江，接替朱家骅任省主席。曹聚仁本来打算从杭州转往无锡，寻找88师归队，不料无锡已经陷落，京杭国道被阻断。无奈之下，他决定乘车先回老家看看。在兰溪县城，他还招待逃难至此的丰子恺一家吃了顿饭。此时，白崇禧将军到了金华，通过兰溪县长约曹聚仁去金华一谈。曹聚仁坐小船到了金华，意外地遇到了在上海分手的好友、暨南大学同事曹礼吾。当时曹礼吾正随同一批大学生西进，准备到庐山筹备东南联大。曹聚仁就挤上他们所乘的列车，一道去了南昌。曹礼吾改变计划南下赣州，曹聚仁和好友黯然道别，独自凭吊了滕王阁，又乘浙赣线列车返回杭州。

---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2页。

② 邓珂云是曹聚仁任教的务本女中学生。曹的妻子王春翠因曹移情别恋，已于1936年上半年与曹分手，离沪回杭。

③ 卢敦基、周静著：《自由报人——曹聚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日寇已于12月14日攻陷南京，转攻杭州。曹聚仁雇船独自一人到里西湖兜了几圈，又去看了一眼即将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便于了12月23日再次离开杭州，暂回家乡蒋畈。第二天，杭州就陷落了。

在家乡，曹聚仁得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到皖南屯溪，便迅即搭船前往。到了屯溪，终于知道88师在首都保卫战中全军覆没，孙元良生死不明。伤痛之余，他对88师也就断了念，决定另找出路。就在这时，中央社社长萧同兹慕其声名，聘请他担任战地记者。1937年农历年底，他从屯溪回蒋畈过春节。大年初五到金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请他吃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在金华，他与中央社东南分社的张明烈、盛维棨接上了头。两人分别是曹聚仁在暨南、复旦任教时的学生，殷勤招待老师之后，把中央社总社颁发的“中央社战地特派员”聘书转发给了他。从此，独立记者曹聚仁正式成为中央社的一员。关于“中央社战地特派员”这一称号的来历，还有一段插曲：七七事变后，中央社总社先后派胡定芬、韩侍桁北行采写新闻。胡定芬久历官场，懂得官场习气，在名片上印了“中央社特派员”的字样；韩侍桁书生不懂世故，名片上只印着“中央社记者”。两人都到了济南，却互不相谋。有一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官邸请客，将“胡特派员”尊于首席，同宗的“韩记者”却叨陪末座。经此一事，中央社总社专门发一通告，让参加战地外勤的工作人员，一律称“中央社战地特派员”。[1] 后来曹聚仁到福州，当地报纸报道了他的行踪，老百姓误认为他是“中央特派员”，纷纷找他告状。无可奈何，他只好发新闻说自己是“中央社”的特派员，不是“中央”特派员，笑话才没有再闹下去。

CC系的《东南日报》已经从杭州迁金华出版。[2] 《东南日报》的“三巨头”胡健中、许绍棣、刘湘女，曹聚仁和刘湘女最相熟，许绍棣则是上海《民国日报》时的旧友。这样，他就替《东南日报》写专栏了。《东南日报》在抗战时期一直独霸着浙江新闻界，声威及于闽、赣，连黄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51页。

② 《东南日报》原名《杭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2日创刊于杭州，1934年6月16日改名《东南日报》。1937年12月迁金华出版，1942年5月金华失守，又先后在浙江丽水、云和复刊，并在福建南平出南平版。1945年8月杭州光复，云和版迁杭，续出杭州版。1945年12月南平版停刊迁沪，于次年6月16日出版上海版。杭版、沪版出至解放前夕停刊。

绍竑主办的《浙江日报》和中央社本地分社，都难与之抗衡并驾。后来马树礼、宦乡、邢颂文创办《前线日报》，才在他们的“卧榻之旁割取了一席”。

曹聚仁在金华稍事逗留即去南昌，会晤了中央社南昌分社主任陈熙乾和记者刘尊棋，然后启程来到武汉三镇。武汉这时已成为军、政、文化中心，各方人士云集，充满着团结抗战的新气象。在武汉，曹聚仁见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和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并终于有机会谒见了中央社萧同兹社长。第一次见面，两人谈得很好，他评价萧同兹是自己生平碰到风度汪洋愿为之效命的人。[①] 曹聚仁还被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为候补执行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星岛日报》的战地特派员，成了“星系”的成员。更让他高兴的是，邓珂云从上海取道香港、广州，来到了武汉。乱世鸳鸯，两人便在旅馆结为夫妇。

曹聚仁下榻的汉口平江会馆，88 师在此设立有办事处，收容流散袍泽。办事处处长是 36 师师长宋希濂的长兄，视曹聚仁为 88 师中人，对他殷勤款待。41 军军长孙震是孙元良的叔叔，因此 41 军武汉留守处负责人刘大元也奉命接待曹聚仁。他与刘大元一见如故，刘告诉他 41 军正在徐州前线，“徐州将要有一场大战”。曹聚仁于是和邓珂云奔赴徐州，首报台儿庄大捷，书写了作为战地记者最辉煌的一页。

台儿庄之战开始于 1938 年 3 月 23 日。曹聚仁夫妇是 3 月底到的徐州，蒋介石和白崇禧刚来过前线视察，他们到徐州时蒋介石已回汉口，白崇禧则留下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战事。中央社在徐州的随军记者是胡定芬，配有电台。曹聚仁到徐州后，即和胡定芬取得了联系。当时，《大公报》、《新华日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大刚报》等报社，派驻徐州的记者有 20 多人，其中《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诒，都是一时之选。各报记者奉社命不许协作，都是孤军奋战，互不沟通信息，新闻竞争异常激烈。

台儿庄距徐州约 120 公里，敌我在此血战正酣，而呆在徐州的记者团实际上并不清楚前线的情况。一直到了 4 月 5 日，台儿庄正面守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邀请记者前往前线视察，曹聚仁等 17 名记者才从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下），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13 页。

徐州赶往台儿庄。范长江与孙连仲素来相识，第二天清晨便进入孙的卧室，谈起军情来了。曹聚仁也通过关系，得到了与孙单独晤谈的机会。这样，军情就落在他和范长江手中了。不过，孙连仲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军当晚在台儿庄有总攻击的行动。

4 月 6 日中午，守卫台儿庄的第 31 师池峰城师长，约记者到最前线的运河车站见面。记者们走到半路，遇到敌方猛烈炮火，继续前行非常危险，池师长就派一名副官长迎到中途，请大家在旁边的一个小村落中谈了一阵子。这位副官长说："我军现在虽战得很苦，但敌人也同样精疲力尽，我方右翼的汤（恩伯）军团已开始动作，我们正准备反攻。"恰巧《大公报》的范长江还在孙连仲司令部那里盘桓，无意参加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而参加的其他记者，大多缺乏军事常识，都没有留意这位副官长的话。独具"新闻眼"的曹聚仁却从中得出判断：我军当晚在台儿庄将进行反攻！他赶回孙连仲司令部，求证于金典戎参谋长。金参谋长笑着不置可否，这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当时范长江也在旁边，他还不相信反攻这一说法。

当晚 8 时 25 分，曹聚仁借用司令部军用电话，向徐州的胡定芬报告我军总攻台儿庄获胜的战讯。他刚报告完这段战讯，正在旁边下棋的田镇南将军（指挥台儿庄正面作战的 30 军军长）停下棋子，笑着对他说："进攻刚开始呢，没有那么快的胜利吧！"为了留有余地，他又接通电话，让胡定芬在电讯中增加"控制"、"退却模样"等字眼。胡定芬参考徐州第五战区长官部报告，写了一则战讯发向总社。晚上 10 点左右，孙连仲司令部备车送记者们回徐州，范长江、陆诒托故留了下来，准备抢发台儿庄大捷的头条新闻。曹聚仁则认为此时回徐州更能看清全局，看清楚了再来前线，亦不为迟，遂和邓珂云决定搭车赶回徐州。一到徐州，前线胜利的消息已被证实，曹聚仁和胡定芬接着又发了一份更详细而确定的战讯，这便是 4 月 7 日轰动全国的台儿庄大捷电讯。[①]《申报》汉口版 1938 年 4 月 7 日头条新闻，使用的就是曹聚仁他们所发的三条中央社电讯，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当时紧张而激动的心情：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68～70 页。

昨晚第三次总攻　台儿庄我军大捷
数路合围奋勇袭击　敌兵四千悉遭歼灭

【徐州七日上午二时中央社电】我军为彻底歼灭台儿庄东北各村落残敌，于六日晚八时起开始第三次总攻，预料七日晨当有更好捷音，困守一隅之残敌，即可全告肃清。

【徐州七日上午零时卅分中央社电】军息：峄县台儿庄间敌我激战，五日晚我军突出奇兵，将敌四面包围，同时谭庄堡子、张楼、刘庄等处我军，亦协力出击，发生大规模喋血混战。我第一次挑选敢死队五百冲入敌阵，黑夜混战，敌阵大乱，后头部队亦跟踪而上，敌联络切断，我军遂加紧猛攻，再四挑选敢死队，不断冲击，直到六日晚五时，敌卒不支，全线摇动，我军当将当面敌人全部歼灭，获空前未有之胜利。计此役毙敌三千余，俘获堆积如山。

【徐州七日上午一时中央社电】台儿庄正东东北及正北一带村落敌之主力，被我围攻，至六日晚计内线各军歼敌逾千，外线各军，歼敌达三千，两昼一夜，共歼敌四千余众，俘获无算，开抗战以来未有之胜利。

曹聚仁和邓珂云发完电报，倒头便睡，醒来已是4月7日午后。胡定芬打来电话，说武汉三镇十万人正在集会游行庆祝胜利，举国若狂！4月8日，他综合各方消息，又写了篇长文《台儿庄巡视记》发给总社，全国各报第二天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范长江的长篇报道，在《大公报》刊出已是一周之后。战后日本朝日新闻社编纂战史，关于台儿庄战役，援用的就是曹聚仁当时采写的报道。

首报台儿庄大捷新闻，使曹聚仁在全国新闻界声名大振。"八·一三"淞沪会战，因为其他记者无法随军，他几乎独占了两个月的军事新闻。台儿庄战役的报道则不同，数十位同行会集于此，其中不乏范长江、陆诒这样的名记者。在激烈的"新闻战"中，曹聚仁能够独占鳌头，当然与他的中央社记者身份有一定关系。但是，他的知识素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尤其是非凡的新闻观察力和判断力，使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他后来总结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仅要会使用"显微镜"，还必须学

会使用“望远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每觉得愈接近战线，所得的消息愈零碎、愈真实，但未必正确；而能设法接近高级指挥部，所得的消息愈是综合的，愈增加正确性!”①

4月下旬，中外记者团、慰问团纷至沓来，采访、劳军，甚是喧腾。作为首报台儿庄大捷的记者，曹聚仁多次被请去做战况介绍。一位德国海通社的记者，不相信我军打了胜仗，到台儿庄听了曹聚仁的介绍，目睹了日军焚烧的骨灰堆后，才真正信服。

台儿庄之战后，日军暗中增兵鲁南豫东，徐州、兰考、开封一线局势实际上已非常紧张。曹聚仁接受一位军中至亲的建议，与邓珂云迅速抽身西行，先搭火车从徐州到开封，然后雇黄包车赶到郑州，再乘火车到了洛阳。那些没有及时离开徐州的记者，后来都陷在了敌人的包围

台莊殲敵記

我軍英勇衝鋒
臥溝中炸坦克車
兩軍爭奪王莊戰激烈

本報戰地特派記者 曹聚仁

序幕：一局圍棋

正幕：一場惡戰

1938年4月13日香港《立报》刊出的“本报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采写的通讯《台庄歼敌记》。

① 曹聚仁著：《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1946年版，第2页。

圈中。

曹聚仁原计划西入潼关，或去延安看看，或去盛世才主政的新疆考察一番。不料一路颠簸，邓珂云患了伤寒症，只好在洛阳暂住下来，安心养病。其间，他意外得知四弟曹艺的运输部队正驻扎在渑池，大喜过望，遂乘车前往相聚。"世乱从知骨肉亲"①，兄弟两人促膝谈论到午夜，曹聚仁才恋恋不舍地返回洛阳。

三个月后，邓珂云病体初愈，两人决定不再西进，南返武汉。7月29日乘上火车，次日下午就到了武汉。曹聚仁给妻子买了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让她经香港回上海休养。第二年四月，曹聚仁巡游到福州，邓珂云知道后要从上海赶来与夫君相聚。不料福州局势突然紧张，两地间的海上轮运断绝，曹聚仁也疏散到福建南平。后来他转到温州，邓珂云搭上通往温州的轮船，南驶四小时，在瓯江口外，突然接到电讯说温州海口被封，轮船又掉头驶回上海。曹聚仁在温州痴等了半个月，望穿秋水，也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七月初，邓珂云听说宁波口岸已经开放，不断有船只往来，便下决心坐船先到宁波再说。想不到她到宁波时，曹聚仁已经于三天前到了这里，两人下榻的旅店还十分接近。有一天，竟然同在一家菜馆吃午饭，曹聚仁和几位朋友在楼上，邓珂云在楼下。饭时大雨，还在饭馆中一同挨等。两人近在咫尺，却彼此不知。第二天，邓珂云去电报局发电，告诉曹自己的行程，正巧邮递员送信到电报局，她一眼瞥见一封从南平寄来留交曹的信，才知道丈夫已经到了宁波，于是向电报局职员说明原由，把那封信拿走。下午，曹聚仁也到电报局发电，局方告诉他邓珂云在宁波的住址，分别了一年的夫妻在乱世中终于喜剧性地相遇。

1938年8月的武汉，已是风声鹤唳，军政文化机构和人员纷纷入川。在群情惶惶之际，曹聚仁还去汉口的一条陋巷看望了陈独秀。他与陈独秀原来就有交往。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曹聚仁的妹妹曹守三正好在这个监狱任狱医，他就通过妹妹时常在生活上帮助陈，并劝陈写回忆录，他供给资料。抗战爆发后，陈被释放，也

---

① 抗战期间，黎烈文离开《申报》，来到陈仪主政的福建主持文化工作，创办改进出版社，主编《改进》半月刊。黎有"国危愈觉江山美，世乱从知骨肉亲"诗句，传诵一时。

来到了汉口。这次两人一见面，陈独秀劈头就说："我以为你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员了!"曹聚仁答道："然而你又早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两人相对，默然良久。[①]

8月9日，曹聚仁乘船离开武汉，过洞庭，入湘江，于8月12日到达长沙。主政湖南的张治中，原是指挥淞沪会战的总司令，第二天正好是"八·一三"周年纪念日，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总结我军之所以在淞沪能够支撑三个月，"得力于士气者半，得力于民气者亦半；民气士气相激相荡，是即旺盛精神之主要条件，民气士气交相为用，是即军民合作之彻底成功。"[②] 他还严正宣告，如果敌人进犯武汉，洞庭湖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张治中的豪言壮语，也感染了采访他的曹聚仁。不料三个月后的11月12日深夜，长沙守备人员误信谣传，以为日军将至，情急之中纵火焚烧长沙市区，房屋被烧五万余栋，来不及撤退的市民死伤两万余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因此被处死刑，省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

在长沙停了一周，曹聚仁经株州东行，第三次来到南昌。新四军军长叶挺来电邀请，他与彭文应、龚梅彬、程希孟等四人前往屯溪采访。途经皖南祁门，还访谈了移驻于此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在屯溪，叶挺将军把几张日寇在南京奸淫杀戮的照片送给了曹聚仁，这是从被击毙的日军中队长身上搜到的。后来，他将这些照片编入了《中国抗战画史》，让日寇的罪行永污史册。

1938年10月26日，武汉弃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这时到抗战胜利，曹聚仁除了1942年夏至次年春曾在赣州为蒋经国办《正气日报》外，其他时间大都是"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③]，带着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一部杜甫诗集，在东战场的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巡游，写下了难以数计的新闻报道、战地杂感和人物通讯，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香港《立

---

① 曹聚仁著：《新事十论》，香港创恳出版社1952年版，第15～16页。

② 《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1946年版，第12～13页。

③ 罗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读书》1986年第12期。1942年，曹聚仁巡游到桂林东郊星子岩《大公报》编辑部，罗孚时任该报练习生，负责收发兼管资料，大记者曹聚仁的这身装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报》、《星岛日报》等报刊所刊载。他用一支健笔，不仅记录了八年抗战的壮阔画卷，而且对抗战也发挥了直接助益，因为在他的字里行间，始终充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下面是他 1938 年 11 月 23 日所写的金华通讯：

> 今天微明，又来到了金华。
>
> 金华的面貌，若配上一个西湖，就变成十足的杭州城；街头偶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全是苏小小的乡亲。楼外楼、天香楼、西泠饭店、颐香斋的招幌，格外使浙西人士引起乡思。南宋之际，汴都南迁，整个杭州，变成了开封风味，由今思之，眼前景物，与古无殊。其中有一家粤中人的菜馆，名广州酒家，亦仿效沪杭格式。开张于广州陷落前夕，中悬粤中军人贺联，句云："岭表正烽烟，愿诸君酒饮葡萄，快活沙场拼一醉；天涯同敌忾，看满座气吞胡虏，轩昂眉宇夺三军。"想南岛人士，读此联必为神驰。整个市面，因为浙西人全力支撑，在狂炸后依然热闹非常。他们说："反正是无家可归，拼着死了也就算了。"这便是牺牲的决心的具体表白。[1]

这样的文字，足以使人忠勇奋发，同仇敌忾！

抗战时期，我国出现过一位现代"花木兰"，名叫唐桂林。唐是湖南零陵人，婚后与丈夫不和，便弃家出走，化装成男人投了军，混迹于湖南地方部队。抗战军兴，改入唐云山的 52 师，参加东菇岭之战，任机关枪手，身受重伤，这才暴露了女儿本色。伤愈后奉师部命令，调往江山伤兵医院任看护长。曹聚仁在皖南从唐云山师长那里听到这一佳话，当即发了一个专电，唐桂林顿时成为新闻人物，声名震动了全国。港沪各报，古风排律，赞诵之诗不绝，军事委员会也颁发给她一枚铁十字奖章。曹聚仁从皖南回浙东时，特地到江山去访她，不料她不习惯于平淡无奇的看护生活，又回到部队去了。后来她随军向溧阳挺进，不幸途中翻车，重伤身亡。唐云山师长曾给过曹聚仁一张唐桂林的照片，并对他说，唐桂林生前到处要找曹聚仁一见，她想不到新闻记者的笔，有这么大的力

---

① 曹聚仁著：《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 1946 年版，第 26 页。

量。当时军中有这样的说法："像唐桂林一样，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了!"

1940年，上饶的战地图书出版社，将曹聚仁采写的战地通讯结集为《大江南线》出版。他从赣州把这本书寄给了远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朱自清师。朱自清收到《大江南线》后，回信当年浙江一师的学生："多年不见，也没通信。抗战以来，常在报上读到您的通讯。您似乎走了不少地方。这其间，一定冒了许多险，吃了许多苦，但一定也增长了许多阅历。最值得钦佩的，是这种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①] 朱自清评价曹聚仁所投身的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可以说代表了时人对战时新闻工作的看法。

曹聚仁所采写的战地通讯，不但刊诸报端，有的还被选入战时教科书，流布极广。1939年4月，他巡游到福建，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将军正好也来到福州，做了三次公开演讲。曹聚仁采写了《万人争说白将军》的长篇通讯，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的专栏上。后来，多种新闻学教材和战时国文读本都选作范文。这种水准的新闻通讯，如今已难得一见了。特摘录第三节，以见曹聚仁的文才笔力：

万人争说白将军

——四月二十二日福州通讯（节选）

三 把福建变作山西式的战场

白将军在演讲与谈话中，几次提到山西战场所使用的全面战术的成绩。他说："去年三月间，敌军由临汾沿同蒲路将我军向晋南压迫，想在黄河边上将我军一网打尽；敌军发言人已预言将有惊人的战果可以获得。阎司令长官向大本营请示今后作战方针，大本营即执行不离战区的命令，指示四个要点：一、化整为零，以一个旅为作战单位；二、敌向南压迫，我即向北（向太原五台山）撤退，即向敌人后方推进；三、党政军人员不准退过黄河，过河即军法从事；四、尽量与民众合作，真正成为民众的武力。阎司令执行这个命令，

---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成绩非常之好；二十二个月之中，中条山太行山五台山一带，军队配合着民众，和敌军不知周旋了多少回，牵制敌军十五万以上的兵力，消耗敌军实力非常之大。敌军打不下山西，即不敢过河；山西对于华北，关系非常重大；我方便用全面战术，即已保全了山西。"他又举某师的事实为证：某师曾被敌驱迫，退至黄河边上，由参谋长电请渡河；大本营严令北进，渡河必杀。该师遵令北进，推进得非常顺利，还打了好几个胜仗；直到现在，实力反而加强。白将军因强调这个意思，对在座的同志们说："大家须知前进即是安全，后退即是死路！"

白将军从军事地理来说福建最适于全面战术的使用，希望以山西为标准，把福建变作山西式的战场。他认定全面性的战争，必须军队与民众彻底合作，他希望党政当局赶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一千二百万民众真正动员起来，他说："军队如鱼，民众如水，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民众，不组织，不训练，并没有力量；一经组织训练，就发生伟大的力量。敌人若是来进攻福建，我们能运用一千二百万民众来对付他，他有什么办法？"白将军关于发动民众，说了许多具体的意见；他希望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相配合，县、专署、省府每个单位也都配合着军事，来一个精神总动员，彻底实行军民合作，实行国民公约：消极方面使民众不做顺民不做汉奸，积极方面使民众人人认识敌人的阴谋毒计，人人参加抗战工作。他希望沿海一带，要假定为敌人所攻占，不时作攻守假演习；从演习中得应付的经验，一旦有事，不至手忙脚乱。白将军最后郑重提示担当党政责任的人："认识要清楚，准备要快！"他引用一句成语："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在白将军谆谆提示这一刻间，福州人士的确有点醒悟了；全市市民疏散的工作也在开始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也有人在着手了。记者从南街经过，看见"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改除"的横额，不觉微笑。不知那天从文艺剧场出来的人，还有人再作"只要我方不做积极抗战工作，不刺激敌人，敌人是不会来的！"的想头不？[1]

① 曹聚仁著：《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1946年版，第77～78页。

实际上，曹聚仁的文字并不局限于报道战事、记述言行、描写风物，有的通讯已经达到了对问题学理研究的水平。日寇在对华进行军事战的同时，还发动经济战，企图使我国经济社会崩溃，彻底丧失抵抗的力量。日寇发动经济战的预定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封锁沿海口岸、大量使用军用票、滥发伪币、倾销日货等方法，摧毁我国法币的外汇价格。敌人的狠毒伎俩的确发挥了作用。1938 年 4 月，法币在上海的暗市，从一先令两便士半的外汇率，落到八九便士之间，一年后又下落到六七便士；国民政府放弃上海黑市场后，一度泻至两便士七。这样的经济大波澜，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立即要影响亿万人生活，然而在中国的农村大海中，依然不曾掀起什么浪涛，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曹聚仁感叹，这简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奇迹？1939 年 9 月，曹聚仁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浦城，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自耕农抗战前后的家庭收支情况。研究发现：外汇暴跌，既未使农村主要用品价格暴涨，而农村物品的平衡涨价，又未影响农民生活，使陷于困顿不能支持。自耕农是中国农村的基干，他们是“经济的母财”——土地的忠实儿子，相信土地的产物不会断绝，只要辛勤耕耘，土地一定会回报他们以财富。在社会经济变动过程中，自耕农就发挥他们的保守性武器，只承认物物交换的原始经济原则，用自己的劳力在土地上生产所需物品，再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一个不相信土地会破产，而认定自己的劳力，可以再造财富的农民面前，外汇率涨落在他们心头，能激起什么作用呢？”[①] 曹聚仁进而得出结论：关于抗战，只有农民，能作“能不能支持下去”的最后答复。他建议政府，不但要节用民力，更要扶植民力：如何扶助自耕农，如何稳定农村经济，这是决定持久抗战力量的重心。他把这一研究心得写成长篇通讯寄出，八开八版、版面紧张的《前线日报》当即刊出，而中央社只发了参考稿，重庆的路透社、美联社却都发了长篇专电。于是中央社又发了专电，全国各报也刊登出来，《前线日报》又刊载了一次。曹聚仁说，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高的荣誉，比后来获得胜利勋章还感到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52 页。

光荣。

当然，这些成就、荣誉的获得是曹聚仁在“读万卷书”后，于烽火连天中“行万里路”的结果；埋首书斋、懦弱虚浮之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多而有影响的通讯报道的。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涯，曹聚仁所经历的苦难，遭遇的危险，何止一二！1938 年春，他与妻子邓珂云采访台儿庄战役，为防不测，两人在徐州的一个月，几乎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睡觉。4 月底搭车离开徐州西行，第二天，他们所住的徐州花园饭店就遭到敌军轰炸，逃过一劫。同年 8 月，他在长沙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周年纪念、采访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后，乘车前往株州，不料第二天敌机轰炸长沙，他住过的那家旅馆被炸毁。杭州出版的伪报纸，还报道了他在长沙被炸之事，朋友们都以为他已经遇难，相互转告，表示悼念。



1937 年曹聚仁与邓珂云在上海。

“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这是曹聚仁 1943 年所做的感怀诗，足以作为他八年战地记者生活的写照！

《抗战画史》足千秋

1945年8月杭州收复，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把长官部从上饶移到杭州，《前线日报》也就跟着在杭州出了分版。抗战八年，第三战区一直在东南地区撑持着，终于熬到胜利，接收该地区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谁知半路生变，蒋介石让自己的嫡系、远在黔桂的汤恩伯第三方面军飞来接收京沪这一富庶之地，顾祝同的防区，顿时缩水许多。《前线日报》的这帮人，本来要在胜利后大干一场的，当然不甘心局促于杭州一隅。同时，CC系的胡健中把杭州看作《东南日报》的禁脔，连省主席黄绍竑的《浙江日报》都是他的眼中钉，《前线日报》在杭州出版，更招致了他的不快。因此，《前线日报》一定要到上海的望平街去显身手了。

1945年9月30日，杭州受降典礼后10天，曹聚仁扶病从杭州乘特快专车回到上海。他离开上海那一年，还没有孩子，等到胜利归来，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回首前尘，如梦如幻。车过麦根路车站，自己随88师师部住过50多天的四行仓库赫然在目，"旧景如新，又不禁迸出酸楚欢喜之泪来了!"曹聚仁一到上海，便碰到了已经担任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的孙元良将军。孙元良当年率88师撤出上海后，一路退守至南京。京沪线上的防御战和首都保卫战，88师都是首当其冲，英勇异常。南京血战，88师几乎全军覆没。首都沦陷后，孙元良在南京寓所的地窖里潜伏了三个多月，最后化装逃出。他因此被军法处审问了很久，丢了军职，黯然出国。因结怨于宋子文，归国后也没被起用。直到抗战末期，才到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任副总司令。故旧重逢，曹聚仁问这位当年淞

沪战场上风头最劲的将军，而今坐飞机回来接收上海，飞机在江湾机场降落的那一刻，心头有何感想？孙元良说那是情人会面的镜头，要说是说不出来的，这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①]

曹聚仁在上海过了平生最狂热的双十节。但是，胜利后国民党对东南沦陷区的大接收变味儿为“大劫收”，使他顿感失望。中国新闻事业的“罗马”——望平街是曹聚仁的心仪之地，然而，当局在望平街上对新闻事业的宰割，也是大打出手，六亲不认。

战争一结束，望平街上随即出现了三种新闻力量。首先是“地下钻出”吴绍澍的《正言报》。吴绍澍本是上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加入了国民党，毕业后任职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部门。1939 年夏，国民党中央派他从重庆潜回上海，筹建上海市党部和三青团支部并担任负责人，接应、护送出入敌占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新闻工作者，搜集日伪情报，派人渗透敌区，制裁日伪汉奸，为抗日救亡做地下工作。1940 年 9 月 20 日，他打着美商旗号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正言报》，这是上海“孤岛”时期代表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一份报纸。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该报宣告停刊。抗战一胜利，一直在上海指挥地下工作的吴绍澍得地利之便，抢先接收敌伪的《平报》资产，于 1945 年 8 月 23 日复刊《正言报》，自任社长。此时的吴绍澍，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等职务，一人身兼六职，炙手可热。同时，原来望平街上的龙头老大《申报》、《新闻报》因为“附逆”被勒令停刊整顿，《正言报》一下子便替代了这两家报纸的地位。严宝礼则下手更早，于 8 月 18 日就复刊了“孤岛”时期停刊的《文汇报》。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84～285 页。

接着是“天上飞来”的詹文浒[1]等“重庆人”。最后，冯有真[2]的《中央日报》、宦乡的《前线日报》也从“陆上走来”[3]。冯有真是从皖南屯溪带人马来到上海，接下河南路上伪《新中国报》的房子和印刷机，出版上海《中央日报》的。

冯有真乃国民党中宣部东南战区特派员，吴绍澍又一向在上海指挥地下工作，可以捷足先登，接收敌伪新闻业。但是，詹文浒从重庆带了“尚方宝剑”一飞来，要重新“洗牌”，冯、吴两人的美梦便被打碎了。这样，对上海敌伪新闻业的接收，在国民党自己的圈子里就已经搅不清了，各方神圣你抢我夺，望平街上乱作一团：

> 新闻界那几位巨头，掮着文化宣传的招牌在那儿争地盘；政学系的《大公报》，CC系的《东南日报》和《大刚报》（毛健吾），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分得二十万美金的官价外汇。（南京《中央日报》和上海《申报》，也分得同样的数目。）上海《中央日报》分得了房子、机器和大量的白报纸。《正言报》也分得了半部《时报》的印机和大量白报纸。《和平日报》的房子、印机，规模也是很大，军方之力也。第三方面军，就借了日方的《每日新闻》社，出过一些日子的日文报纸，所收得的白报纸数量之多，更在各报之上。《中华时报》，就因为是青年党的机关报，也很快分得了房子、印机和白

---

① 詹文浒（1905～1973），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游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译主任，1938年11月在上海租界创办《中美日报》，任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往重庆，任《中央日报》副社长、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特派员身份，从重庆飞回上海，接收敌伪新闻业。曾任《新闻报》总经理、上海市记者公会理事、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1949年5月逃亡他乡，1973年逝世。

② 冯有真（1905～1948），江苏常熟人。早年就读于之江大学，1928年到南京，任中央通讯社驻立法院记者，为院长陈果夫赏识，成为CC系干将。上海沦为“孤岛”后，被国民党中宣部委派为驻沪专员。1940年9月，与吴绍澍合作在沪创办《正言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被国民党中宣部委任为东南战区特派员，设办事处于安徽屯溪，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进行秘密活动，并于1942年7月18日创办《中央日报》屯溪版。1945年8月30日，屯溪《中央日报》迁至上海出版，任社长，兼任中央社上海分社主任。1948年12月21日，受命筹备上海《中央日报》南迁事宜，所乘飞机在香港附近的火石山失事，与同机的彭学沛一起遇难。

③ 《前线日报》1945年8月24日在上海出临时版，同年11月16日江西版正式停刊，单出上海版。

> 报纸。至于《前线日报》，虽说也带点军方的关系，一直到后来，才从徐州分到一架老旧的转轮机，开头挤在四川中路的一所房子的楼上，勉强开了业；后来也转了许多弯，才把分配给《和平日报》的，就是那所《每日新闻》社的房子买了过来。（这中间，又有许多微妙的关系。）大概你抢我夺，到了第二年夏天，才算各霸一方，转到白报纸的外汇分配额上去吵嘴的。①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从重庆迁沪，又作出了一个毫无道理的规定：战前没有在上海出版的报刊，现在不能到上海来出版。如此一来，不但《新华日报》不能在上海刊行，连军方的《和平日报》（原《扫荡报》）、CC系的《东南日报》、青年党的《中华时报》、第三战区的《前线日报》、天主教的《益世报》，都不能在上海出版了。最后，只有《新华日报》被拒之门外，其他报纸兜了许多圈子，经过行政院特许，先后又都在上海出版了。



上海望平街（今山东中路）。

曹聚仁到上海时，冯有真和詹文浒之间的暗斗已经白热化。在詹文浒看来，上海《中央日报》随时可以转到他的手里。冯有真惴惴自危，只能守住中央社上海分社的地盘，作最后退步之计。国民党中枢，自然要把历史最悠久、销路最大、经济基础最稳固的《申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79～280页。

报》、《新闻报》这两块肥肉一同抓了去的。通过内部整顿，这两家大报改组为官商合营报纸，大权操在陈布雷手中，而以潘公展主《申报》，以程沧波主《新闻报》，编辑全权操在CC手中，堂而皇之地复业，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詹文浒被委以《新闻报》总经理之职，和社长程沧波平分秋色，这才让冯有真稳住了江山。江山是稳住了，不过上海《中央日报》也变成"童养媳"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新闻统制，以《申报》、《新闻报》为中心，《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乃是外卫；《正言报》、《东南日报》、《前线日报》、《益世报》更是外卫的外卫。

《前线日报》总编辑宦乡是在上饶受了闷气，抱着理想跑到上海准备大干一场的。《前线日报》上海版开头那一时期，果然也办得有声有色，宦乡自己写"编余漫笔"，可以说是最接近理想的"新闻说明"，其识见和文笔，可以和第一流的评论家抗衡并驾。到上海后，宦乡又结识了周予同、郑振铎、唐弢等一帮开明书店的朋友，他在杏花楼宴请这帮朋友，拍着胸膛表示可以担当责任，让大家尽管赐稿支持《前线日报》。因此，《前线日报》的副刊和学术性周刊，显得比当年上海的《立报》更富有自由主义色彩。

但是，上饶的那一笔账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当时有17位政治部主任在重庆告《前线日报》的"御状"，使顾祝同十分为难。而且，《前线日报》的言论、新闻，时常被重庆《新华日报》引用，这让那些带有"眼镜"的人看来，《前线日报》已不仅仅是一张自由主义报纸了。社长马树礼满怀高兴从芷江参加完洽降会议飞回南京、上海，打定了天下，不料积劳吐血，只好住进医院调理。各种政治性的攻击，密集而至，《前线日报》风雨飘摇，宦乡一个人几乎支持不下去了。

顾祝同十分器重宦乡，他的意思是要宦乡改变态度，这样可以继续主持这份报纸。顾祝同满以为宦乡会听从自己的劝告，谁知宦乡在顾家吃了一顿午饭后，便和他分道扬镳了。宦乡断定顾这一帮军人已经没有了前途，在顾祝同与进步的前途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前线日报》上饶版还在继续出版，邢颂文抽身不得。上海方面，马病宦走，《前线日报》这只"石臼"就落在了曹聚仁这个半客卿的头上。宦乡走时还特意嘱托曹聚仁不要步自己后尘，希望他能够顶着做下去，否则就等于拆了《前线日报》的台。这样，曹聚仁也就在上海定居下来，变

成《前线日报》的一员了。

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使马树礼不能再用开明书店的那帮朋友。曹聚仁心里也明白，自己留下来撑持《前线日报》，肯定会被一些朋友误解。但是，《前线日报》关系到二三百人的生存问题，为了大家有一个吃饭容身之地，他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有一天晚上，马树礼从南京回来，急匆匆地找到曹聚仁，诉说京中的遭遇：顾祝同的责备，朋友们的攻击，使他觉得走投无路，前途茫茫；当局分给《前线日报》的 18 万美元官价外汇，本已在望，就因为报纸的态度问题被搁浅了，徐州方面可以分得的白报纸，也落空了。曹聚仁看着急火攻心、一碰就会倒下去的马树礼，顿生怜悯悲壮之情，当即拍着胸膛对老朋友说："我的主张是一件事，报社主张又是一件事，你要怎么做，你说好了！"[①] 这样，曹聚仁就掌着《前线日报》的舵，不让这只船沉下去，过了大半年为报社谋生存的日子，任何外间的误解，都不闻不问了。

1945 年 12 月底，曹聚仁从友人处得知，才两岁的二女儿曹霆，在江西乐平染上痢疾，因无药医治，已于三个月前夭折。想着千里之外悲伤无助的妻子和孩子们，他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赶去乐平接他们回来。其间，国共和其他党派正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曹聚仁从上海、南京溯江而上，经芜湖到九江，又在赣东北兜了一圈。等到他一圈子兜回去，再从九江、南京回到上海，也已经把政协带来的一点新希望都兜完了。不过，他也知道这种会议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政治协商会议，摆在会议席上那些堂堂正正的议论，都是要从侍从室挖出实权交给国民政府去，要使主席成为'虚君'，内阁制所容许的'总统'，要终结'手令政治'，这是拔根的工作，岂不要蒋氏的政治生命？无论如何，是不会成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蒋介石性格的深切了解。回上海后某一天，他和几位民盟的朋友闲谈，他们想听听他对政协会议成果的看法。曹聚仁反问他们："蒋介石和袁世凯不同之处在哪儿？"这几位民盟朋友都回答不出。他就自问自答说："袁世凯狗抓地毯，老忘不了皇帝梦，尽在总统制、内阁制上兜圈子。蒋介石呢？他并不要兜这些圈子。主席也好，行政院长也好，委员长也好，总统也好，结果还是他的天下。（到后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91 页。

来，舍不得总统这宝座，也还是‘狗抓地毯’。)”[1]

曹聚仁事后明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是离心与向心转变的总枢纽。当时他只是觉得社会情绪真是微妙。以新闻业来说，一般人都希望国共双方真的能够停战谈和，但报馆老板方面，似乎都受了上头的指示，以强调破裂为言论编辑中心，只要把责任加到对方去，颇有不择手段之意。[2] 就在这一年，顾祝同奉命指挥军队在陇海线上和中共军队对垒。发生在昆明的李公仆、闻一多惨案，又是由顾祝同主持军事法庭来处理的。《前线日报》的言论，自宦乡离去之后，曹聚仁为了报纸能够生存，日趋于灰色，只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但是他也是有底线的，顾祝同的这些作为，《前线日报》就格外无法配合了。一份失去灵魂的报纸，自然难以打开销路的。《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东南日报》出版上海版以后，望平街上的市场也让他们占了先，《前线日报》在上海变成了二流报纸，仅能和《益世报》、《和平日报》相比肩，只是比《中华时报》稍好一点而已。

因此，在《前线日报》的基础稳定之后，曹聚仁就开始逐渐地和报社疏淡关系，担任了上海法学院报学系和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教授，把上海方面的工作重心移到新闻教育上去。战前曹聚仁在上海大学已教过新闻学，那时难免纸上谈兵。八年战地记者下来，重上三尺讲堂，时事分析、采访学、编辑学、新闻学，不管是业务课还是理论阐释，他都能现身说法，得心应手。社会教育学院设在苏州拙政园，新闻系主任是俞颂华。俞颂华曾任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和曹聚仁早有工作上的关系。当时他已病入膏肓，可是对新闻事业仍抱有浓厚兴趣。他对曹聚仁说：“我们总是办报的人，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还是到海外办报去!”[3] 然而过了不久，他就在苏州病逝了。

至于新闻报道的工作，曹聚仁则移到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去。他担任着《星岛日报》的外勤记者，这份境外报纸，为他采写的通讯的发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36页。“狗抓地毯”是狗的一种下意识行为。狗已经在地毯上睡觉了，还要像以前在山野草堆里睡觉那样，先在地毯上乱抓一阵。曹聚仁用“狗抓地毯”喻指下意识中生根的传统思想。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91页。

③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94页。

表，提供了最大便利。这一时期，政府当局有闹不尽的笑话，他也就有写不尽的通讯了。他的南京通讯，居然发出了“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这样的愤激之语。诚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曹聚仁迎来了新闻生涯中“伟大长篇通讯的黄金时代”。到了 1946 年底，他认为内战的战场上已经用不着像他这样的记者了，就下决心离开中央社，把新闻工作的重心，完全放在为《星岛日报》写通讯上。

1946 年夏天，内战之火愈烧愈旺，经济危机一天天深化。在这个危机四伏、天气热得怕人的夏天，曹聚仁蜗居在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的家中，每天以五六千字的速度，埋头赶写着他的不朽胜业——《中国抗战画史》。

早在 1943 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到重庆时，偶遇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向王透露了自己准备编写一部战史的计划。王云五当即跟他谈妥，书成之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中央社也有意出版这部战史，社长萧同兹想调曹聚仁到社里的资料室去赶这份工作。上海联合画报社的舒宗侨生意眼敏感得多，他对曹聚仁说：中央社是官衙门，脚步迟慢，而且顾忌重重；商务印书馆头绪繁多，不会替你来争取时间。他劝曹聚仁不要把战史当作名山事业来做，跟他合作，抓住时机，早出版一天好一天。① 曹聚仁觉得舒宗侨言之


世界日報
聯合畫報又一巨著
曹聚仁舒宗僑合編著
中國抗戰畫史
增厚國防
發展工業

北平《世界日报》1947 年 6 月 24 日所登之《中国抗战画史》广告。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352 页。

有理，于是两人联手，曹撰写文字，舒选配图片，半年即完成了编撰工作。1947 年 5 月，《中国抗战画史》由联合画报社正式印行。

1947 年 6 月 24 日，联合画报社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做了一则“《中国抗战画史》隆重出版，运抵北平”的广告，从中可以看出该书梗概：

> 本报动员中外记者五十人，名记者曹聚仁舒宗侨编著，印刷半载，耗费数亿元之《中国抗战画史》，兹特郑重宣布，本书已隆重出版！
>
> 本书初版已全部预约一空，致市面无书可以发售，再版经日夜赶印，亦已出书。凡预约书籍，本社已如期于五月二十二日起依预约先后陆续交邮寄出。再版书原定价为十万元，近以各项工价再涨，特改为十二万元。
>
> 本书编印既毕，统计共刊用照片一千一百六十七幅，文字四十余万字，地图六十幅，彩图十四幅，文献内幕秘闻百余种，自日本明治维新起，中经八年血战，至最近中日情况止，共分为十大章(共七十二节)，后附抗战史料一览，各战区将领一览，抗战大事记，各次战役统计等。文字通俗美妙，资料丰富确实，图片新鲜生动。内容之结实完备，无论就文字，就图片，国内无以出其右。尤其本书刊用之图片，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因战时物质条件欠缺关系，从未向外间发表，而由本书加以搜罗刊用。大部分照片，均为战地作战实录，关于敌伪动态则搜自日方，故参阅文字与图片，既像小说，又似电影，从学术立场看，则又是一部最完善的史料，从普通军事学立场看，是一部战史。适宜于各种职业、年龄、趣味的人阅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设立了战史局，结果连最简略的战史也没有编写出来。青年党的左舜生曾向国民参政会建议设立战史委员会，着手编写完备的战史，当局就说国防部已经有了战史局，不必再设战史委员会。曹聚仁对当局不重视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做法非常失望，他愤慨地说：“这八年仗是白打的！”所以，他虽然觉得《中国抗战画史》写得并不尽人意，但是也相当自豪：“毕竟地也只有我这部战史，算是把八

年抗战的史迹留下来了。”①

浙东学术有重视史学的传统，有清一代，编撰《明史》的万斯同、万斯大兄弟，著《文史通义》的章学诚，都是浙东人。章太炎曾说：“浙东学派，多从史学入手；史学使我们胸襟开阔，这与孤陋寡闻的冬烘文翁颇不相同。胸襟开阔，所以有识力，有识力，乃不至随声附和。胸襟开阔，所以能组织自己的思想系统，才能左右逢其源。”②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曹聚仁似乎对史学有天生的兴趣。他 9 岁即在父亲的朋友朱芷春师的讲解下，开始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后来又耳濡目染于单不庵、章太炎两位大师，便想做章学诚的传人，终生以史家自期了。

曹聚仁自己说，他是以研究历史的态度进入新闻圈子的。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从走出书斋迈向战场的第一天起，便留意搜集敌我双方的各种材料。台儿庄战役后，他和妻子邓珂云重回战地巡行，在敌尸堆中找到了一本一位日本士兵写的日记，成为了解台儿庄战役过程的第一手材料。那位不相信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的德国海通社记者，就是看了这本日记后才哑口无言的。1945 年 9 月曹聚仁从上饶到杭州参加受降典礼，突染恶性疟疾，寒热交作，举步维艰。在发病间歇期，他还赶到荒货摊去收集大量有关抗战军事的文献。“我要研究日军的战略和战术，我要了解日军的士气和战后心理，日军一百三十万战斗兵，居然闷声不响，放下武器，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其间，偶尔出点小乱子，有的苦闷之至，愤而自杀，里西湖时常有投水自杀的日军官兵，大体说来，他们都服从了天皇的命令，毫无保留的向我军投降了。就我仔细研究和实地观察所得，日军在战术上，可说是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战略却是失败的；正如德军一般，他们打赢了许多战役，却不曾打胜过整个战争。”③ 当他开始着手编写战史后，八路军和川桂系军人，把这工作看得十分重要，又供给了他不少史料和照片，特别是川军的孙震将军，给他提供了最充分的史料。

同时，为了战地报道的需要，曹聚仁一穿上戎装就开始潜心研究古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73、353 页。

② 转引自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5 页。

③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74 页。

今中外的军事学典籍。八年战地巡游，经常与军政要人往还，使他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位具有丰富军事知识和深刻军事洞察力的专家。1938年10月26日，我军事当局宣告放弃武汉三镇。次日，身在金华的曹聚仁写了一篇综述通讯，其对宏大战事的概括、分析能力，绝非一般记者可比：

> 过去三个月，战局之扩大、紧张、激烈，变化之迅速、复杂，为先前所未有；记者片段的记述，决不足以尽壮阔的波澜。当此大幕将落之际，且回溯历程，作简单的综述。七月间，敌军越过马当、香山，进陷九江，战事焦点由鄱阳湖东岸移至西岸，南浔线每个据点都经过几度进出。那时候，敌军的意向已判明并无在鄱阳湖地找寻我们的野战军来一度决战的野心；而敌军主力是否由德安西进或南冒，尚未可测。七月底边，敌又把战事重心放在黄梅、广济的线上，这才摇动了武汉人心。可是八月间的重心又北岸移南岸，敌军对于瑞昌的攻击，猛烈而且坚韧（现在判明那是敌军的副主力）。一般颇挂心敌军由武宁攻咸宁的企图，尤其当瑞昌右边溃败之际，只怕牵动了南浔线全局。九月间，敌军的正主力，由合肥向潢川、光山出动，平汉线才受到重大胁迫，北岸田家镇、蕲春也终于不守。南岸敌军以同样姿态向阳新、大冶方面推进，恰和北岸同一步伐。最近这一个月（十月），信阳失守以后，敌军居然钻入大别山脉，叩武胜关的正门，因此武汉的北面，比东岸更为吃重了。到了这几天，敌军由平靖关向应山，由沙窝向麻城，由黄冈向黄陂，由鄂城向葛店，由金牛向贺胜桥，五路构成大半圆形的包围圈，武汉守卫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了。到了现在，再回看敌人的战略，我们可以明白敌军在长江两岸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中心作用——刺激、吸引我军的主力以待我军的疲惫。择我军比较稀薄处，从正面来攻坚。总括一句话：敌军的基本战略，只要占得据点，即不计战果之生熟了。
>
> 如上所述，敌军安排实力，北线重于南线，其意在取巧；我军应付这局面，则南线重于北线，其意在留有余以相待。国人对于当局的苦心，怎可不曲加原谅？而军人在各线应战之坚苦卓绝，更不

可不赞叹钦佩。[1]

曹聚仁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运的历史家，因为亲身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不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培养了观察、分析、识断军事、政治、外交问题的能力，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编写一部翔实可靠、高屋建瓴的战史，准备了必要条件。

在《中国抗战画史》之《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曹聚仁开宗明义地说："这是一部战争的记录。"既然是战争的记录，叙事必须信而有徵，这是治史的第一要义。早在暨南大学执教时，同事杨人楩翻译的法国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曹聚仁研读过多遍，对马氏"求真"的治史方法推崇备至："非有可靠证据勿下论断，非证以可信的史料，勿轻于相信；对人物与事变之判断，必须依据当时之思想与判断。任何文献必须予以最严厉之批评；对于流行之歪曲与错误的解释，即出于最可靠的史学，亦须无情地予以摈弃。总之，须以求真为主。"他曾经对好友曹礼吾说："马迪厄可以和中国的王船山比美，两人对史学的贡献一样大。"[2]《中国抗战画史》中的史事，多为曹聚仁亲历笔录，可以称得上信实可靠。日本朝日新闻社战后编次《进入太平洋战争之程途》，若干课题采用的就是曹聚仁的记述，说明他的记述合乎事实。

关于史事的信实问题，曹聚仁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所记的《东战场上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断：

> 偶阅曾国藩日记，其中有一天，忽提起史事的可信不可信问题，因为他自己身在戎行，手造历史，眼边过的事，也有许多不可信的，则史籍所载，可不足凭。但曾国藩毕竟是一个文人，尚不知史家治史自有为造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特点。史家治史，观其流变之迹，不着重一环，而重环与环之间的连锁关系，连锁关系，非有史眼不能见了。我现在所往来的，很多是造史的人；他们看了报纸，有时相顾而笑；可是报纸并不减低其真实性，积一个月的报纸，则战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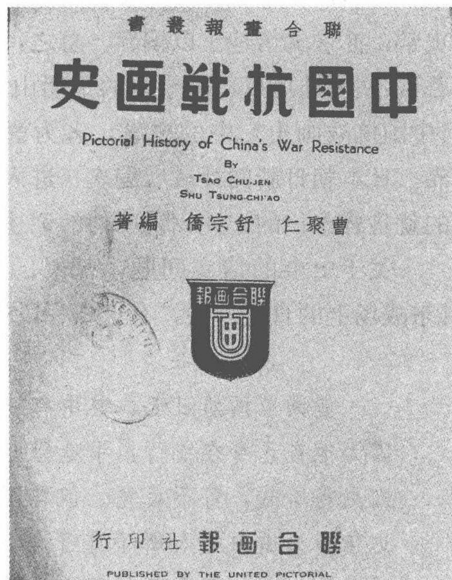
① 曹聚仁著：《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 1946 年版，第 19 页。

② 转引自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4 页。

之轮廓自在，并不因为每天夸张了一点就走了样儿。历史亦当作如是观，惜不能起曾国藩于地下，与之一谈耳。[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曹聚仁在力求史事信实可靠外，特别重视中日之战“环与环之间的连锁关系”。《中国抗战画史》从日本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性入手，剖析了日军侵华的复杂因素，呈现了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全过程。因果流变，环环相扣，脉络清晰，要言不烦。披览此书，不得不佩服曹聚仁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

当然，《中国抗战画史》决不只是一部“战争的记录”。它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作者通过记录战争，探究了敌我双方胜负兴衰的内在因素。曹聚仁说，日本溃败，一个世界第一等的强国陨星似地从天空坠落，这都是日本军阀种的因造的孽，自食其果，怨不得别人。那么，日本何以来势汹汹而终归败亡？曹聚仁指出，现代战争是一个“总体性战争”。首先，现代战争是工业效能的战争，以一国的经济力与人力的总和来作战：“全国生产，供战争之用，虽则战争行动本身并不拿出原料来进行，也不把工厂拿出来作战，而是拿出高度完备的特殊构造的战争机器，以特殊有训练的战斗员来操纵。工业与人力的军事化程度，便是战斗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现代战争又是一种政治战，“若不得民众诚心拥护，



联合画报社 1947 年版《中国抗战画史》扉页。

① 无暇编：《战地日记》，之初书店 1938 年版，第 36～37 页。

则不能为民众所忍受；现代的战争，必须是属于人民的战争”。这次战争，因原子弹的出现缩短了行程。但是，日军的溃败不在于原子弹的威力，而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日军是在“科学的战争”、“脑力的战争”中吃了败仗。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地广人多与大平原环境，使生长于“山岳丛错弹丸黑子的岛国”日本人产生错觉，制定的“速战速决”战略不能实现，从而陷入战争泥沼。但是，日本人忘记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潜力”，也忽视了中国的抗战乃是“属于人民的战争”，“少年中国之广大领土与中国人民之出于意料之外的团结与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的侵略计划全部搁浅了”。曹聚仁总结道：“对于这次战争性质的任何错误估计，以及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的任何一点的认识不够，都会演成致命创痕；致命的创痕，是无法补救的。法国的溃败，日本的终于败北，以及希特勒的覆灭，别无他因，便是对于战争性质估计错误，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认识不够之故。”[①]

更为可贵的是，《中国抗战画史》虽是一部战史，却闪耀着祈望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光辉。在《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曹聚仁提到，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东京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一位知心朋友说：“热心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在民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我是恨极了战争。”曹聚仁说，《中国抗战画史》正是东乡平八郎所作的沉痛遗言的注释：

> 我们所写的虽是关于战争的记录，但希望由此而闪出增进人类幸福，促成世界和平的光辉。我们承认和平乃是一个“绵延的创造”，“和平并非破坏和平的人失败以后所得到的一种静止状态。相反的，和平是一种动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以完成必须的调整变革，以减轻而非加重过去因武力侵略曾经予世界的各种弊害。”“和平必须是一种动态的赓续的程序，进而实现世界规模的自由、正义、进步和安全。”我们希望我们的战士，以往为了抗拒强权争取民族之自

①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扉语：我们的献词》，联合画报社 1947 年版，第 2 页。

由而奋斗，今后为着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①]

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这就是《中国抗战画史》这部煌煌巨著的史学价值。曹聚仁曾说，他有份小小的心愿，要让百年后的史家承认他是一位有眼光的史家，而不仅是一个新闻记者。《中国抗战画史》的行世，足以使他跻身“有眼光的史家”之列。

---

①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扉语：我们的献词》，联合画报社 1947 年版，第 3 页。

桃花扇底送南朝

国共联手驱除外侮之后，固有的矛盾便浮出水面，打打谈谈，纠缠不清。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曹聚仁采访了不少军政要人，问他们国共谈不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那些“大佬”都说他问得天真，言外之意，蒋介石同意和谈，仅仅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戏法，迁就一下美国人希望中国和平、确保不彻底倒向苏联的旨意。蒋内心是坚信凭借武力可以消灭中共的，所以并不把来华调解国共争端的马歇尔元帅看得十分重要，有时还玩弄这位老人。等到蒋氏了解到马歇尔地位的重要，这位美国总统特使已经回国当国务卿了。曹聚仁曾反问一位国民党的总司令：“究竟是你天真，还是我天真?”[①] 还有一次，他与一位总司令去参加文化界举行的座谈会。这位总司令在会上与文化界人士争得面红耳赤，事后对曹说：“现在你们不懂，一仗打赢了，你们就懂了!”通过这些事情，曹聚仁明白，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真实想法，是想用武力来说话的。

在国共之间“吃夹档”，采访国共和谈新闻，曹聚仁觉得这是像他这样的新闻记者最困难的工作，因为双方的成见以及报馆的处境，不容他们做客观性的报道。1946 年 10 月，由福建调任台湾省主席的陈仪，电邀京、沪新闻界人士前往台湾考察省政。感到大陆空气沉闷、压抑的曹聚仁，就代表《前线日报》参加了这个新闻考察团，到海外去换换新鲜空气。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329 页。

新闻考察团由许孝炎任团长，人员除曹聚仁外，还有《申报》总编辑陈训悆、《新闻报》总经理詹文浒、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东南日报》总编辑杜绍文、《正言报》的朱雯和《大公报》的高集，多为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官”。接待方为他们安排了密集的考察行程，宝岛的主要地方几乎都走到了。考察快结束时，陈仪在草山与大家进行了座谈，第二天又在长官公署正式招待了考察团一行。陈仪主闽时曹聚仁已与他相熟，这次见面，他劈头就问陈：依你自己的观感，治闽和治台相比，哪一个更满意些？陈仪愉快地回答：“台湾的省政进程，不仅是顺手，而且可以拔步走向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去！”殊不知，“二·二八”大起义的风暴正在酝酿积聚之中，只是踌躇满志的省主席没有察觉而已。

在台期间，凡是集体应酬之事，曹聚仁概不参加，自己去走访想访问的人，搜寻想看到的资料。这么一圈走下来，他对台湾的政况民心，也有一番自己的了解了。抗战时期，曹聚仁根据对军事地理的研究，曾经产生过一个想法：如果把南洋群岛、菲律宾群岛、海南岛、台湾、琉球群岛和舟山群岛，看成一个海上王国，其战略意义和世界意义将不可估量。经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坚信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陈仪说：“中国毕竟是大陆的国家，所以不懂得海洋的伟大；三宝太监虽说七次下西洋，结果东南亚的世界，还要等哥伦布、麦哲伦来发见，东印度公司来开发的。”“台湾的地位，应该放到岛链上去看的，不要把它当作大陆的一部分多余的东西，中国先民有海外开拓的效力，却缺乏建立海外扶余的政治组织能力，这便是中国人比不上荷兰人之处。”[①] 陈仪听了大为赞赏，把日军司令投降时献给他的一把军刀转送给了曹聚仁。

这次访台，前后 10 天，曹聚仁搜访到了 80 多本有关台湾的史料。同时，新闻考察团中，也只有他和《东南日报》的杜绍文写了稿子，一棒打落了那一群趾高气扬的新闻官。

1946 年 11 月 15 日，蒋政权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曹聚仁从台湾返回上海后，就被《前线日报》派往南京采访“制宪”大会。他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朝野上下，各党各派之人士，我都接触过，只见明枪暗箭，彼此斗争着，没有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360～361 页。

和衷共济的祥和空气。衮衮诸公，都是以国事为儿戏，这就使人感到'秦淮河之冬'的真实气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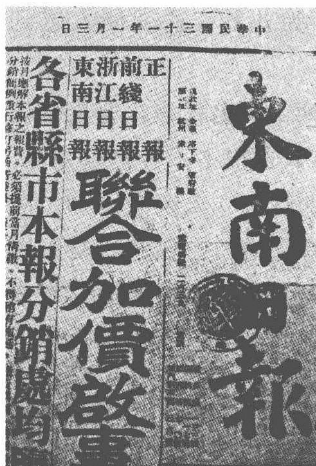
这次大会，名为"制宪"，但是出席会议的两千多名代表，曹聚仁认为最多只有三五十人知道什么叫宪法，蒋介石本人也根本不会尊重宪法。他曾与300多名国大代表谈宪法问题，发现至少有290人漠然无知，对宪法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挂过红条子，有了地位、权势，便可以回家乡为所欲为了。有一次，曹聚仁到中山陵去，碰巧那些挂了红条子的国大代表也在游园，他们趾高气扬，游来荡去。这时，一位教师带了一队小学生过来，大概是走累了，孩子们坐在草地上休息，警察便马上过来驱赶。他隐隐听到那位教师气愤地说："好！看你们横行到几时!"这些代表，坐在会场上，痴头痴脑，只会打盹，但一到晚上，在秦淮河的莺歌燕舞中，一个个都变得生龙活虎，精神饱满。那些头脑清楚的代表则明哲保身。某天，曹聚仁和一帮记者去北极阁中央研究院采访胡适，胡博士一开头就和他们大谈他的《水经注考证》，听得那些文史功底差的记者一头雾水。

因为经济拮据，《前线日报》只派了曹聚仁一个人采访这次"制宪"大会。但是，单枪匹马的他，凭着自己的交游能力和勤奋，采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在这些通讯中，他敏锐地指出社会潜伏的重重危机，最主要的还在于：蒋氏不会尊重宪法的民主精神，一般百姓无视宪法的存在，朝野人士没有守法的精神。[②] 他自豪地说，就"制宪国大"的南京通讯来说，几乎没有一家报纸能比得上《前线日报》的。

在南京期间，曹聚仁时常到《东南日报》办事处聊天。《东南日报》的三巨头胡健中、许绍棣、刘湘女，都是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有一天晚上，恰巧三人都到了办事处，大家自然就聊了起来。说到时局，曹聚仁第一次听到胡健中发牢骚。他笑着对胡健中说："你发什么牢骚！今日之事，还不是都在你们的手中吗？不过，《桃花扇底送南朝》的长篇历史小说，不是正在你们的报纸连载着吗？可惜，你们也不是复社中人呢!"[③]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72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73页。
③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76页。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三日

東南日報

正前綫日報 浙江日報 東南日報

聯合加價啓事

各省縣市本報分銷處均

1942年1月3日金华《东南日报》。报头下注明：现社址：金华塔下寺望府墩；原社址：杭州众安桥；本报今日一大张，售国币贰角。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三日

東南日報

李代總統約集大員 研商和談進行步驟

黃紹竑離京飛港堅辭政府代表

和談開始日期 傳在下半月內

1949年3月3日上海《东南日报》。报头下注明：经理部：南京路377号、长春路410号；编辑部：溧阳路1380号；今日本报一大张，售价每份金圆一百元。

清人孔尚任谱写南明兴亡的《桃花扇》，曹聚仁早就读过。1921年秋，他从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昌应考，三天的落寞旅程，就是靠看《桃花扇》打发的。由《东南日报》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桃花扇底送南朝》，他想到而今的国民党政府，与当年的弘光小朝廷何其相似："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这经纶满腹，也无非报怨施恩；人都说养马成群，滚尘不定，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即使有史可法那样的忠烈之士，也挽不过大局来了。

还有一晚，三更已尽，相别经年的湖南《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突然叩门来访曹聚仁。原来，他第二天一早要回长沙，特地来找老朋友谈谈。话题不由自主地又落到了时局上，段梦晖说："局势越来越坏，而满朝文武，昏天黑地，简直不知死活呢!"曹聚仁问他："为什么这样忧虑之深?"段说："各地的情形更糟!"那一晚，两人几乎谈到天明。新闻记者比较敏感，当众人还在混沌不觉的时候，他们早有大祸临头的预感了![1]

国民大会于1946年12月25日制定并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宣布闭幕。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在遍地烽烟中开始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来年的"行宪国大"做准备。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76页。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一片贿选和绝食请愿、陈棺请愿的闹剧中开锣，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国民党“训政”20年后，要“还政于民”了，忙坏了来自四方的新闻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他往来于京沪的卧车上，为《前线日报》、《星岛日报》采写着一篇篇别具只眼的选举通讯。

不过，在这次大选中，曹聚仁不仅仅是一位客观的记录者。据他自己说，在副总统选举中，他受桂系的白崇禧之托，助选李宗仁成功胜出。这次大选，总统选举没有什么悬念，非蒋介石莫属；副总统的竞选异常热闹、激烈，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都参加了竞选，最后在孙科和李宗仁之间展开竞争，蒋介石和国民党CC派都力挺孙科，排斥李宗仁。至于曹聚仁在幕后如何帮助李宗仁，他没有细说，不好臆测；但助选之事，根据他与桂系几位巨头的交谊，应该不是子虚乌有。另外，曹聚仁听说吴稚晖不赞成蒋介石竞选总统，建议老蒋退让，就写信代《星岛日报》征文，请这位疏淡了多年的忘年交谈谈对时局的意见。吴稚晖回信说：

> 曹先生，阔别数年，无日不驰系。数年前于先生在赣州时，得到小小尊论以外，均无所见，想见著作必等身矣。《星岛报》征言及我，荣幸之至。然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加以最近衰疲日甚，不堪构思。先生必已有所答，高见万倍于我，可若亲献附议也。[①]

吴稚晖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由，婉言谢绝。曹聚仁又写了一封信，坚持要吴谈一些看法。吴稚晖干脆把回复他人的信照抄给曹聚仁，当作答覆。这位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肯定有不少难言之苦呢。

1948年春间，陈布雷从南京来到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京沪之间交通便捷，旦夕往返并非难事，但陈布雷这次来沪好像特别郑重似的，首先由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公宴报界巨头，介绍陈与各报负责人碰头，然后又由各报公宴陈，对其莅临表示欢迎。另外，党团会议及其

---

① 转引自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他不公开的会议，又举行了十次以上。原来，蒋介石把党政军重心集中于官邸，由陈布雷掌宣传之职，所以他专门来报馆聚集的上海调度一番。在沪期间，陈布雷特意找曹聚仁去谈了一次话。陈在叹息了一番之后，谈了曹聚仁的《星岛日报》通讯问题。曹聚仁就老老实实告诉他："港报有港报的观点、立场，我们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就不能和政府一鼻孔出气的。我指出政府并无固定的宣传方针；在香港的宣传战，政府是一败涂地的。连受政府支持的报纸，都不支持政府的政策，何能责怪我们这样的民营报纸呢！"后来又谈到当前政局的危机，陈也十分同意曹聚仁的看法。曹聚仁认为，陈布雷这次来上海，上海新闻界没有什么改进，还是天天争白报纸的外汇分配，天天谈女人，讲反共八股。暮气沉沉的望平街，显然已经到末日了。半年之后，自感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寓所吞安眠药自杀。曹聚仁为陈的"一死谢君王"怜惜哀叹良久，他认为陈能够看得清是非，识得破利害，"但逢君之恶，从来没有勇气和蒋氏去争论，改变过蒋氏的意向的"。从陈布雷的遭遇，他又联想到国民党的其他政要："从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以上那些文人，都是望平街上好汉，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一进入官场，立即和旧官僚同流合污，替军人贴标语去了。当他做新闻记者时期，都是笔锋甚健，把天下事看得很轻易的；一做了官场，又是因循苟且，阿附权势以取容了。"[1]

到了1948年，物价如脱缰野马，狂飙不止，直接撼动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8月19日，蒋介石依照宪法临时条款，以紧急处分命令颁行一种新币值金圆券，限期兑换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上海为东南财富麇集之地，蒋介石委派儿子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管理协助督导员，责令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企图筑起一道可以倚重的经济防线。

蒋经国果然不辱父命，到上海后雷厉风行，逮捕、枪毙了一批违规商人，黄牛投机销声匿迹，市场很快稳定下来。"蒋督导员"顿时成为上海市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曹聚仁的大女儿曹雷正在读小学，放学回家，向父亲讲述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关于蒋督导员的故事，绘声绘色，蒋经国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422页、425～426页。

简直成了现代包公。曹聚仁一生最讨厌道听途说的所谓“传奇”，他就以“丁舟”为笔名，在《前线日报》上发表了“谈蒋经国”的系列文章，把自己身历目睹的“一代传奇人物”蒋经国公之于众。这组文章连载了20多天，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成为当时望平街的一件大事。

曹聚仁1938年8月初识蒋经国于南昌。蒋经国是这年春天从苏联归国的，蒋介石先让他住在老家奉化溪口养性。对于在异国他乡羁留了14年的长子，身为“一国之主”的父亲还不知道如何来“雕琢这块璞玉，使之成器”。江西省主席、政学系的熊式辉揣摩到了老蒋的心意，就把这位“太子”接到江西，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同时筹划牯岭的游击工作。而当时主浙的黄绍竑，虽然比较有政治头脑，却缺少政治敏感，近水楼台而不“捞月”，白白让熊式辉抢去了这政治资本。蒋经国能吃苦耐劳，没有公子哥习气，也确实想干一番事业，所以到江西后口碑不错。曹聚仁是在自武汉乘船到长沙的途中，从一位乘客口中第一次听到蒋经国“传奇”的，遂决定东归途经南昌时见见这位“政治新人”。这次晤谈仅一小时，两人素昧平生，但蒋经国坦诚、务实的态度和作风，给曹聚仁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他对人说：“名实相符，这正是我想象中的留俄人物。”

第二年5月，蒋经国被派到赣州，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领少将衔保安司令。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赣州整肃治安，推行新政，提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施政纲领。在他的治理之下，赣州声誉鹊起，《大公报》记者孟秋江首先发表通讯为新赣南喝彩，《大公报》桂林版总编徐铸成、特派员杨刚接着也写了几篇称赞新赣南的文章。一时间，赣州成为战时青年向往的地区之一。

由于妻子邓珂云怀孕待产，需要安全稳定之所，1939年农历年关，曹聚仁和妻子来到赣州，在城里灶儿巷租了一间民房，把家安在了这里，成为蒋经国治下的“子民”。

曹聚仁是名满大江南北的新闻记者，安家赣州，蒋经国岂有不知之理。除夕那天，蒋经国邀请他们夫妇出席贫儿家属聚餐会，蒋谈笑自若，与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儿童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让曹聚仁颇为感动。半个月后，他又邀请曹同去曾经的“赤都”瑞金，参加中央军校分校的集

体入党典礼。在路上，蒋经国凄然地告诉曹，12 月 25 日，日军飞机向家乡溪口疯狂投弹，母亲毛氏不幸蒙难。他还拿出溪口被炸的照片，让曹观看。曹聚仁感到，蒋经国还是一位重感情、人伦的年轻人。通过这一段接触，曹聚仁对蒋经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虽然蒋经国在广揽人才，但此时的曹聚仁还没有成为蒋的入幕之宾。他依然保持着记者的身份，在粤、桂、湘、赣、闽、浙之间巡游，为了全家生计，还一度随朋友到距沦陷的杭州仅几十华里的小山村南涧走私做生意。不过，作为记者，他写过一些蒋经国“义释假经国”之类的传奇，通过新闻媒体向外传播，对树立蒋的正面形象、宣传赣南新政肯定是有助益的。他认为，蒋经国的青年冒险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是构成传奇的基本因素。蒋本人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短装革履，千里跋涉，本是平常之事，但在民众心目中，旧官僚是养尊处优的，见到这刻苦耐劳的地方行政长官，就不免传为奇谈。这番话传到蒋经国那里，他笑笑说：“知我者，曹公也。”

1942 年 7 月，蒋经国“三顾茅庐”，请曹聚仁担任专员公署高级参议兼《正气日报》总经理、总编辑、总主笔，曹聚仁才正式成为蒋经国的幕僚。1927 年大革命失败，曹聚仁曾发誓从此远离政治，永保自己的自由之身，现在为何自毁誓言，授人以“待价而沽”的口实？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蒋经国当时确实奋发有为，带来了新的政治气象，曹聚仁一时也起了追随他一展才学的念头，这是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历史上，幕主对幕僚言听计从、宾主协力建立不朽功业的事例很多，曹聚仁熟读史书，肯定了然于心。其二，幕主与幕僚的关系近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比较自由。曹聚仁成为蒋经国的入幕之宾后，不少人认为他要做陈布雷第二，他只回应了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不置可否。

《正气日报》的前身为《新赣南日报》，是蒋经国主政赣州后创办的机关报，由他的留苏同学高理文主持，魏晋负责编务。由于《新赣南日报》对皖南事变消息的处理不合上峰“规定”，江西省党部就说蒋经国袒共，魏晋有共产嫌疑。高理文、魏晋因此去职，蒋经国把《新赣南日报》改头换面为《正气日报》，继续出版。但是，创刊后的《正气日报》消息平淡，版面沉闷，而且报社人事复杂，留苏派、CC 派和练兵派你争我

夺，蒋经国甚为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理文就向小蒋推荐了曹聚仁。蒋经国认为无论声望、才具、经验还是党派关系的平衡，曹聚仁都是主持《正气日报》的最佳人选，于是力请他出山相助。

曹聚仁主持《正气日报》后，报纸的面目焕然一新：新闻、言论有了全国乃至国际视野；战事之综述、分析，材料翔实，观点允当；报纸与读者的交流得到加强；版面编排简洁美观，有大报风范。同时，曹聚仁也十分重视经营，一年之内报纸发行量增加到12 000份，竟然实现了赢利。在他和同人们的努力下，《正气日报》一跃与《东南日报》、《前线日报》鼎足而立，成为战时东南地区有影响的报纸了。

《正气日报》的成功，在曹聚仁本为“牛刀”小试，对蒋经国来说却意义非凡：他终于拥有了有影响力的舆论工具。1943 年 3 月，蒋经国带曹聚仁去重庆“面圣”。两人一到陪都，备受瞩目。曹聚仁应该受到过蒋介石的召见，老蒋讽喻曹“辅佐”小蒋，即坊间所说的做“陈布雷第二”，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重庆，曹聚仁见到了邵力子、陈布雷、孙科、吴稚晖等政要，他觉得大家看他的眼光都颇为微妙。其间，他还去看了夏衍，并见到了周恩来。1938 年 12 月，他曾经在金华采访过周恩来。这次会见，曹向周恩来介绍了蒋经国这个人很有一点事业心，想在东南大干一番。周恩来对他的工作进行了鼓励。[①]

蒋经国重庆之行，本来颇有打算。他想把三青团这一新的干部力量掌握到自己手里，结果被陈诚抓走了。当时新疆的盛世才输诚中央，老蒋有意让儿子去新疆磨练，蒋经国也说要带曹聚仁同去新疆办报，不料张治中也有意经营西北，出来扯腿，蒋经国的新疆之行化为泡影。政学系的人，看到自己提拔的这条“龙”越出藩篱，破壁而走，心里老大不舒服；陪蒋经国来重庆的高清岳，就向小蒋剀切进言，说是羽毛未丰，不可遽就大任。[②] 蒋经国在重庆盘桓了一阵子，无功而返。

从重庆返回赣州后，曹聚仁便辞谢《正气日报》的一切职务，到上饶与《前线日报》那帮朋友共事去了。到了 1944 年冬，日军攻占赣州，他就放弃了居住 5 年的家，重新安家于赣东北的乐平。关于他离开蒋经

---

① 夏衍著：《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 年版，第 243 页。

② 卢敦基、周静著：《自由报人——曹聚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2 页。

国的原因，众说纷纭。最主要的原因，想必是重庆之行，“肉食者”的作为让他失望，后来又看到这位太子“依然落在庸俗的窠臼”里不能自拔，他便“挂印”而去了。

不过，曹聚仁认为，赣南时期的蒋经国瑕不掩瑜，是一位真心“为国为民的地方官”。他说蒋经国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

> 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疑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①]

“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曹聚仁对蒋经国的这句断语，成为公认的允当之评。

曹聚仁虽然离开了蒋经国，但是由于赣州入幕的这层渊源，两人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1946 年冬曹在南京采访“制宪国大”期间，蒋经国还曾经到南京《前线日报》分社来看他。曹聚仁不客气地对蒋经国说：“今后六个月，乃是你的最后的考验机会；经不得考验的话，前途是难于预料的！”他认为蒋家政权是经不得考验的，劝蒋经国能够离开南京到边疆去打开天下。[②] 如果两人关系一般，他是决不会这样造次的。正是与蒋经国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决定了曹聚仁在大陆解放后的行止。

1948 年 8 月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曹聚仁就在《前线日报》上发表“谈蒋经国”的系列文字，“来发挥一点‘中有所感’的繁念”。10 月，他又把这些文字加上赣南时期所写的相关通讯，编为《蒋经国论》一书，交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这是所有蒋经国传记中最早问世之作，在当时，对提升蒋经国的声望，让民众了解蒋之为人，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曹聚仁对国民党当局的沉疴知之深切，知道蒋经国在上海的最后一搏也无济于事：

> 蒋氏这一套主张，行之于赣南，已经蜚语纷起。那一时期，重

① 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1 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91 页。


大刀濶斧的蔣經國

1948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日刊对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行动的报道。

庆方面若干政团，自己的天地大，河水不犯井水，大家都肯听其自然，有时也夸奖一番，反正不碍自己的利益。现在，他要把这一套主张，行之于上海；而目前这一阶段，又正当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蒋总统的威望受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的每一种设施，都要和各政团以及衮衮诸公的既得利益短兵相接。南京与上海，京沪路一线相通，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连得那么密切，上海经济市场每一角落都有着豪门巨绅的经济蜘蛛，他的计划又如何能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呢？①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上海真正的“大老虎”是和蒋政权关系最密切的四大家族，尤其是孔宋两家；蒋经国无法和自己一家人为敌，只能打几只“老鼠”，将囤积大户王春哲等处死或投入监狱。据说，王春哲临刑前大声叫道：“我死了，物价如能稳定了，金融投机如能遏止了，我也死得值得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知道蒋经国定会铩羽而归，都站在旁边看他一个人要把戏。蒋经国的打虎精神与个人神话，使金圆券初期在上海的发行还比较成功，但是在内外交攻之下，蒋经国不久即感到力不从心。9月30日晚，他请曹聚仁到自己的私寓闲谈。曹聚仁向昔日的主人一连提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不发行银圆券，而要发行金圆券？为什么不准备大量的银圆来兑现，先坚定人民的信念？为什么不等军事上赢得一场胜利，再来改革币值？

① 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蒋经国只是很沉重似地摸着下巴，无言以对。这时，警察局一位副局长进来报告说，金圆券开始崩溃了。[①] 蒋经国自己觉得对不起老百姓，纵酒狂饮，大哭了几场，一周后悄然离开上海。

曹聚仁的政治观点，本来和民盟相一致，但是，民盟后来发生分裂，失去了中立地位，使他失望。他只希望自己所报道的政治动态，有着历史的价值。但是，望平街自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就成为国民党清一色的天下，除了党报、团报、军报以及半党报，几乎没有不是和政府一鼻孔出气的。《文汇报》不愿和政府同调，结果被封。曹聚仁庆幸自己还有香港《星岛日报》这个地盘，供其自由发挥。在他看来，上海新闻界勉强可以说是出于党报之外的，只有王芸生的《大公报》和陈铭德夫妇的《新民报》，而最敢正面批评国民党政权的，要算《大美晚报》，其次为储安平的《观察》周刊，再次才是《大公报》。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采取独立的自由主义办报方向。所以，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就把储安平、王芸生和曹聚仁三人，一并攻击。而《观察》的南京军事通讯，国民党政府当局有一段时期还疑心出于曹聚仁之手呢。



1948 年 3 月，上海电话公司的职员在领工资。

风雨激荡的 1948 年，曹聚仁的京沪通讯，几乎成为时代的预言者，他的推断很少不被应验的。上海很多工商、金融界团体都在仔细研究他的通讯，航运到上海的《星岛日报》，销数增加到两千份左右。“这一来，我原先以为可以比较自由动笔的文字，为了适应环境，有时不能不出之于曲笔了。”[②]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417～419 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391 页。

紧接着金圆券崩溃的是徐蚌会战惨败，京沪人心立刻浮动起来，大局显然是不行的了，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语："应变"。翁文灏内阁随着"八·一九"经济防线的坍塌而倒下，孙科内阁就是在"应变"的口号中产生的。所谓"应变"，其实就是准备逃亡的意思。

南北各大城市的报馆，多是官办或半官办的，政府拨有"疏散"、"迁移"的款项，应变的行动最为迅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首先迁移到了台北。CC派的《东南日报》有着杭州和上海两副家当，他们先把杭州的轮转机拆掉运往台湾，不料搭乘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倾覆，机器和报社当局的大批财富，连同几位随行的家属一起沉入海底。这样一来，上海《东南日报》的机件，就在员工们的反对之下不能移动了。上海《中央日报》的机件、白报纸和其他财富，与南京《中央日报》不相上下，冯有真、彭学沛去香港打前站，想在那里找个新的据点，谁知他们搭乘的那架飞机在香港上空失事，两人一同遇难，迁移报馆的计划便受到了阻碍，除了一大批白报纸和印刷原料给几位高级人员瓜分了去，其他粗重器材都被职工保留了下来，等待共产党方面的接收。《申报》和《新闻报》也曾有过南迁香港出版联合版的打算，但是遭到中下级职工的反对，两报的几位大头目，也就各捞到一大笔现款，远走高飞了。《前线日报》的邢颂文在台南高雄找到了房子，把印刷机件运去，想在那里打开新的天地。可是，全社职工中，只有四五个人愿意随社迁台，《前线日报》也就一直不曾在台湾复刊。

"大变动的局面，有如海潮，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粼粼相衔，如环无端。"身处其中的曹聚仁感受到，当时大家所希望的，就是这个大动荡的局面赶快终结，至于谁坐朝执政，不管红面黑面，都是无所谓的。教育文化界人士都知道局势要变，但并不怕变，只要变得快，经过一场阵痛，让革命的孩子，早日降生，就大吉大利了。当时人们的应变心理，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迫切。曹聚仁在《新希望》周刊第一期发表了《今日知识分子所以自处之道》的文章，坦陈了知识分子面对大变动局面的意向：我们觉得逃到台湾去，是一种耻辱，我们要迎接这个大时代的到来。[1]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431、437页。

“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国民党主力兵团在徐蚌会战中损失殆尽。1948年12月24日，“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华中“剿总”白崇禧“不避斧钺，披肝沥胆”，在汉口向蒋介石发出主和电报，提出三条谋和建议：（一）先将真正谋和之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面调处，或者由美国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活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祈望蒋介石能够审时度势，采纳自己的建议，“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①] 白崇禧还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桂系倒蒋之意甚为明显。1949年元旦，蒋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下野谋取和平，但是各方反应都很冷淡。军事财政诸端仍束手无策，社会人心不安已达极点。“我既不能贯彻勘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②]，蒋介石已无法恋栈，于1月21日发布“引退”文告，回到溪口，李宗仁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针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力量和理由，

---

①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2月26日条。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9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82页。

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①

李宗仁一上台，和谈空气即刻浓厚起来。1 月 22 日，李代总统即发表文告，表示政府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商谈；孙科内阁也决定派遣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政府和谈代表，并通过广播告知中共，请中共约定和谈地点及日期，以便进行谈判。中共对此的回应是等北平完全解放后再行决定。

在国共为重开和谈相互试探之际，“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于 2 月初到了北平②。因为这一代表团不伦不类，京沪各日报很少派记者随行。晚报的新闻竞争正处于白热化，所以都派了记者。《前线日报》从 1949 年 1 月 8 日起改出晚刊，为了不败给其他晚报，自然也要派记者前去采访。报社本来让曹聚仁随行，但他不愿前往，就改派了王浩。实际上，中共只让 10 名代表和职员进了北平城，王浩等 6 名随团记者被挡在了西苑机场。王浩在机场住了 6 天，所有信息都来自中共的接待人员。2 月 11 日，代表团从北平回到南京。王浩一下飞机，就给曹聚仁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告诉他北平之行的见闻感受，主旨为：“诚意为目前时局之转捩点，和平如不成功，就是失败，并无妥协余地。”曹聚仁据此写了一篇 2500 多字的电讯，刊在《前线日报》晚报上。这一天的晚报，销数破了纪录，报社门口张贴的那一份，一直吸引读者达 36 小时之久。

3 月 12 日，国民政府宣布何应钦接替已经辞职的孙科为行政院长。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和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89 页。

②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为促成与中共的和平谈判而组织的一个民间代表团，由南京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与“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後、宋国枢、夏元芝、刘达逵等。

3 月 23 日，何应钦宣布内阁改组名单，次日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决议并发表和谈代表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3 月 28 日又增补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吁请中共早日决定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以便开始商谈。



戴季陶昨突逝世

心病服安眠藥逾量卒致不救

預立遺書四度修改暫禁發表

官方否認係自殺

治喪委員已推定

1949 年 2 月 13 日香港《星岛日报》对戴季陶突然去世的报道。

3 月 26 日，中共正式宣布周恩来（首席）、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 月 1 日增补聂荣臻），齐燕铭为秘书长，特别声明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请南京政府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自 4 月 1 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



星島日報

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發給登記證文字第三號

香港政府特許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今日每份三大張

（各埠郵運費另加）

4 月 1 日上午，张治中一行 20 余人乘中央航空公司特意准备的“空中行宫”号飞往北平。

经过 10 多天反复折冲，4 月 15 日晚，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限南京政府本月 20 日前答复。这等于是最后通牒，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南京和谈代表团决定接受，派黄绍竑和屈武南返，建议政府同意签字。

由于国共双方对谈判内容都绝对保密，沪港各报几乎除了谣言，很少有北平和谈的真实消息，曹


入台軍公人員及旅客注意！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台灣省政府
公告

台灣省入境旅客申請書

本申請書由申請日起最遲不得逾五日送警備總部核辦

中華民國卅八年二月十二日

主席兼總司令 陳誠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陈诚）在1949年2月25日上海《大公报》上刊登的《公告》。该部府为“确保本省治安”，特制定了《台湾省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本《公告》是对《暂行办法》所规定的有关军公人员及旅客入台应行注意事项及办理手续事项的说明。

聚仁也无法向海外读者报道和谈的曲折经过。4月16日，黄绍竑和屈武从北平飞回南京，被隔在和谈“帘幕”之外的新闻记者们群情激动，总以为有大新闻要发布——这一大新闻，即使不能让人十分乐观，至少也不会是和谈破裂吧。谁知，与新闻记者含笑周旋的黄绍竑，内心非常沉痛：他知道，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的，和谈就此破裂了。果然，南京4月18日举行的最高会议，拒绝了中共提出的最后通牒。

4月20日，和谈破裂。第二天，中共便下达大进军命令，发动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5月11日，上海市民也已经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了。中共军队推进之快，国民党军队溃败之速，让曹聚仁感到诧异。和谈破裂之前，曹应邀到一座谈会作时事分析。他指出：因为双方都在备战，淞沪战事不可避免，近郊将有一场决战；国军“一·二八”、“八·一三”对日作战的光荣记录，对于蒋氏是一种有力的暗示，况且日军当年准备防御美军登陆战的坚固阵地，完整如新，上海可以据守六个月或一年以上以待国际变化；国军这一仗打得好的话，可以争取到美援。不过，曹聚仁强调，理论上讲淞沪防线可以坚守这么长时期，但今日之事，并非是理论上的

事情。[1]

战争的进程确非理论之事。4 月 25 日，蒋介石从宁波乘炮艇到上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亲自指挥淞沪防卫战。蒋氏父子宣称上海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要与共产党军队展开逐街逐屋之战。然而，国民党军队从头到尾还守不到一个月，便于 5 月 25 日晚间土崩瓦解，解放军于夜半攻入上海市中心地区，一举占领了市政府。

那天晚上，望平街上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准备出版第二天的报纸，却估摸不准天亮后的上海市，究竟是属于国民党的，还是已经换了主人。《新闻报》方面的负责人比较活络，先编好了国民党口吻的报纸，浇好了版等待着。等到中共军队到了市中心区，便又改编成共产党口吻的报纸，以新鲜刺目的字眼做了上海解放的头条新闻，一天之间，蒋介石变成了罪该万死的独裁魔鬼了。因此，上海解放后，《新闻报》经改版得以继续出版。《申报》慢了半拍，没有了改版的机会，新华社随军人员 5 月 25 日晚便进入申报馆，将其接收，做刊行《解放日报》的准备了。

曹聚仁家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区。5 月 26 日上午，他和苏州河南岸的亲友接通了电话，他们把《新闻报》上的新闻念给他听，知道市区的秩序当晚便恢复了。27 日上午，解放军进入虹口区，曹聚仁全家吃完午饭，便上街看“解放”去了。“这一场‘大决战’，雷声大，雨点小，好似湿了的炮仗，一直不曾点响过。街口还有些机枪作战的掩体，在我的眼中，这简直是小孩子的演习战，不像什么巷战。北四川路上，东一辆，西一辆，就是前一些日子，游行祝捷的装甲车，一只只死甲鱼似的躺在那儿。走到了苏州河边，才有点打仗的气象。河南那几座高楼的墙壁上，还留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斑点，就像脸上的麻子一般，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洞缺就是了。我们是绕了道，才转到苏州河南去的，一到了南京路，一切如常，满街都是人，热闹得很。亲戚故旧，大家见了面，彼此就是这么一句话：‘好了！解放了’！”[2]

中共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设在四川中路、福州路路口的原上海市政府大楼之中，曹聚仁看着墙上贴出的布告上的军管会委员名单，都非常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493 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530 页。

熟悉——他们都是新四军的老人，曹与他们在皖南分的手，现在都打回上海来了。新闻界的朋友，本来都在望平街工作过，现在也依旧回到望平街了。在《中央日报》大楼挂起新闻组招牌的范长江、黄源等人，正是曹聚仁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旧友，有的彼此分开还不过三两年的时间。

曹聚仁发现，“共产党军队到了上海，刻字的共产党人与不刻字的共产党人都来了”。虽然中共接管上海的党政军及文化人士，多为曹的熟识旧交，但是他立定了主意，“既不想做刻了字的革命党，也不想做盘了辫子的革命党，我只是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① 他认为，1927 年以后自己就下了决心，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也不卷入任何政治斗争的旋涡；抗战胜利以后，依然靠出卖劳力为活，不曾做过任何属于资方地位的工作——这便是自己能够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勉强可以旁观下去的本钱。

大约在 20 年前，曹聚仁就预想到这样一场社会大变动的到来。然而，等到这一大场面真的到来了，他又觉得十分陌生，就像在那么多的熟识旧交面前，他已经变得十分生疏了一样。“解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面前几乎都是一张白纸，谁都知道得不多，连章士钊还慨叹“革命让人成绝学”，说自己要参加革命战线，“还得捐班成为小资产阶级从头来起”，一般人就更不懂“社会革命”为何物了。朋友们都以为曹聚仁对“解放”知道得最多，懂得最彻底。曹承认自己所懂、所了解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马恩列斯主义，更不是大家都急于想知道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初以为懂得马克思主义，便可了解中共的政策了，看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才知道他的思想并不这么简单。中共提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依我的说法，就有克劳塞维支的军事哲学的成分在其中。说到马列主义，也还不是这么简单，也得加上斯大林主义，这其间就有大彼得的雄图在其间。因此，马列斯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至于毛泽东思想，也还有王船山学说的成分，并非纯粹是西方的，更不是纯粹的马克思的。”② 当然，这些都是曹聚仁藏之于心的独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9 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44 页。

得之秘。他清楚，如果把这些看法讲出来，肯定会被视为“异端”。所以，上海解放后曹聚仁闭口不言，而是用他敏锐的“新闻眼”、“新闻鼻”，去观察、触感和思考这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

曹聚仁明了，中共明明白白挂出“阶级斗争”的口号，敌友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所谓“阶级斗争”，照中国的老话，就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阶段。国共斗争了几十年，国民党欠共产党的血债太多了，而血债是要清还的。因此，解放军进上海，这是“手执钢鞭向你打”的时候了，凡是挂名国民党党籍，说得具体一点，凡是替蒋介石工作过的，都在清算之列。有过“军统”、“中统”以及“中训团”组织关系的，一概成为解放军注意的目标，处境就更有些困难了。他对家人说：“安贫乐道，也有安贫乐道的好处；我们生活虽清苦些，总不会碰上这样被清算的场面的！”①

不过，曹聚仁也发现，共产党军队虽然带有策马入城的征服者心理，但是，从共产党军队进上海的情形来看，他们并不是高视阔步、昂然踏进的，而是战战兢兢小小心心地进来的。共产党接管上海以后，除了新闻界、出版界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其他方面表面上几乎都是率由旧章。

望平街上，应变极快的《新闻报》，很快就被停刊改组为《新闻日报》，国民党官股由中共接去，社长程沧波已经远走香港，总编辑赵敏恒也卸下编务，去做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了；总经理詹文浒，这位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办接收的新闻大员，后来退出报馆做了广告公司的老板，最终被判徒刑。《大公报》中的旧人，都退居闲职，范长江已经总绾了望平街的新闻枢纽，大政由杨刚女士主持，王芸生从北平回到上海，依然主持编务，但处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被国民党封闭的《文汇报》，随着上海的解放而复活，言论仍由徐铸成主持。《大晚报》、《时事新报》晚刊、《自由晚报》等几家晚报，开始也颇想适应新环境生存下去，结果都停刊了，只有赵超构负责的《新民报》晚刊存活了下来。望平街上的新干事，一部分是战前《立报》旧人，一部分是《东南日报》的中级干部，再加上《大公报》的记者群，大部分基干工作人员，全是新进的新闻干部，曹聚仁都很生疏。“易手之后，第一个记者节，那一张名单，十有九都是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13～16页。

新人，该算是望平街上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变动。”还有一项大的变化，就是“在上海望平街生了根，几乎成为子孙帝皇万世之业”的报贩集团，仅仅经过一年的逐步清除便完全消灭了，派报工作，完全移到邮局手中去。曹聚仁认为，这种邮局全包的报纸派送方法，对于报社和读者合理而两利；共产党一年之间，便清除了望平街上根深蒂固的报贩集团对报纸派送的垄断，真使人有“事在人为”之叹![1]

对于出版业务，军管会予以严格管理，出版界一度惶惑不适，业务简直停顿下来，商务、中华这两家最好的书店，只有靠大廉价卖旧书维持生计。商务一部新版的张元济重编《康熙字典》，只要2000元人民币，相当于10根油条的价钱。旧书折价从来没有如此低过，但是读者并不因为便宜就抢购，书业生意依然十分清淡。新华书局代替了商务、中华、开明、世界这“四大书局”的地位，出了版本最多的《新民主主义论》，又出了一大批整风文献、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等干部必读书，销行很大。冷落了十多年的神州国光社，因缘际会，突然走红，一大批沉睡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重新出版，销得很不错。有几家旧出版社，也想走神州国光社的路子，出了一些杂凑的中共文献，但是很快就被禁止，而且还登报坦白了一番。邵绚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准备大量编印社会科学丛书，一出版就碰了几个大钉子，只好偃旗息鼓，另作计划了。

报馆盛衰，报人浮沉，报贩兴亡，书业冷热，这些都是望平街上看得见的变化。除此之外，曹聚仁更感觉到了新闻出版业背后的深层变动。

曹聚仁的一位文化界朋友黄萍荪，本来办着一份文献掌故类半月刊《子曰》，上海解放后还想继续办下去。黄几次找曹商谈，想拉他一起经办这份刊物，曹都予以回绝：“凡是白纸写黑字的东西，我都不想积极，因为我们毕竟还不了解中共的文化政策。”[2] 黄萍荪颇有些能耐，凭一己之力拉到稿子，居然出了两本专号，销量也不错。两本专号的题签，分别出自“民革”领袖李济深、“民进”领袖马叙伦之手。黄萍荪本意是借李、马之名为自己撑腰，不料却招致麻烦。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公安局等部门纷纷派人找到黄萍荪，了解他与李济深、马叙伦两人有什么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18、78～79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16页。



周副主席倡新風氣

不做生日 不送禮 不以人名代地名 爲人民服務 最怕的是逢迎

【本報北平特訊】中共周副主席恩來八月十四日對社會科學工作者小組會談話，中間有幾節是很值得記出的，特摘記如次：

周副主席談到準備追悼馮煥章先生，說：「中國共產黨廿八年了，我們沒有幾次很大的追悼會。我們能不歌頌今天的人民解放軍的鬥士嗎？小規模的，自然可以做。但我們對於一個人，如果以爲一切都好，即是沒有歷史的觀點。一個人，有好有壞，都可以提出。自然不能把大家的觀點一致，但進步的朋友們卻不能含混；無原則，無重點，則是不對的。」

「人難得『爐火純青』的，連毛主席今天也並未『爐火純青』。他對『毛澤東選集』的文章，也是一段一段的拋掉，我們難道不應該對自己嚴一點，知道自己是不夠的嗎？」

周副主席堅決的說：「我們共產黨，自今年二月以後，已決定不再作喜事。徐老（徐特立）七十歲，吳老（吳玉章）七十歲，值得慶祝；但我們五十歲以上的人很多，要做壽，那還有個完嗎？還有，我們反對用人名代地名。湖南有個資羅縣，我實不知道這個資羅是什麼人？」

周副主席說：「爲人民服務，最怕的是逢迎。不做生日，不送禮，不以人名代地名，我們今後可能成爲一種風氣吧。」（八月十四日寄）

1949 年 8 月 22 日上海《大公报》特讯《周副主席倡新风》。



王芸生 徐盈 緊要啓事

八月廿二日，本報第一版所刊本報北平特訊周副主席倡新風氣一稿，是本報北平辦事處徐盈所寄供參考用的資料，經王芸生根據本報北平特訊[illegible]刪節而成。該稿原文記錄周恩來先生談話，未經校閱，與已發明[illegible]多失實，有些地方甚至記得完全相反，解釋節錄更與原談話面目迥異。例如周先生指出：完全的成熟不是容易的，即在中共黨內，也只有毛主席、劉少奇同志等幾位領袖才算得上是在政治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毛主席因爲謙虛，對於毛澤東選集的文章一篇一篇親自校訂。我們應該學習這種謙虛的態度，不要自滿。中間一段話，在記錄中竟記錯「連毛主席今天也並未爐火純青」，「毛澤東選集的文章也是一段一段的拋掉」，與原意恰好相反。其他與原意出入者，不一而足。總之，徐盈未經[illegible]而寄出這個談話的記錄，是不負責任的；王芸生未經徐盈同意而發表並刪改這個記錄，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我們現在除自己檢討這個錯誤，力求於今後改進工作外，特聲明完全撤消這個新聞，並向周恩來先生和讀者道歉。

王芸生 徐盈 同啓 九月九日

1949 年 9 月 10 日上海《大公报》登出的《王芸生徐盈紧要启事》。

关系，他们为什么给《子曰》题签？民革方面还有什么文化工作？这件小麻烦，黄萍荪经过 40 多天才说清楚。

上海《大公报》遭遇的一件事情，也让曹聚仁感到新闻出版业“气候”的变化。1949 年 8 月 22 日，上海《大公报》登出了一条《周副主席倡新风气》的特讯：

【本报北平特讯】中共周副主席恩来八月十四日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小组会谈话，中间有几节是很值得记出的，特摘记如次：

周副主席谈到准备追悼冯焕章先生，说：“中国共产党廿八年了，我们没有几次很大的追悼会。我们能不歌颂今天的人民解放军的斗士吗？小规模的，自然可以做。但我们对于一个人，如果以为一切都好，即是没有历史的观点。一个人，有好有坏，都可以提出。自然不能把大家的观点一致，但进步的朋友们却不能含混；无原则，无重点，则是不对的。”

“人难得‘炉火纯青’的，连毛主席今天也并未‘炉火纯青’。他对《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也是一段一段的抛掉，我们难道不应该对自己严一点，知道自己是不够的吗？”

周副主席坚决的说：“我们共产党，自今年二月以后，已决定不再作喜事。徐老（徐特立）七十岁，吴老（吴玉章）七十岁，值得庆祝；但我们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要做寿，那还有个完吗？还有，

我最反对用人名代地名。渤海区有个黄华县，我就不知道这个黄华是什么人?”

因此，周副主席说：“为人民服务，最怕的是逢迎。不做生日，不送礼，不以人名代地名，我们今后可能成为一种风气吧。”

（八月十四日寄）

9月10日，上海《大公报》突然登出王芸生和徐盈两人的紧要启事，对本报所刊发的《周副主席倡新风》这条特讯，表示更正、认错、道歉：

王芸生 徐　盈 紧要启事

八月廿二日，本报第一版所刊本报北平特讯周副主席提倡新风气一稿，是本报总编辑王芸生根据本报北平办事处徐盈所寄供参考用的资料删节面成。该稿原文记录周恩来先生谈话，未经校阅，现已查明颇多失实，有些地方甚至记得完全相反，经删节后更与原谈话面目迥异。例如周先生指出：完全的成熟不是容易的，即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等几位领袖才算得上是在政治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主席因为认真，对于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一篇一篇亲自校订。我们应该怎样学习这种严肃的态度，不要自满。中间一段话，在记录中竟记为“连毛主席今天也并未炉火纯青。他对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也是一段一段的抛掉。”与原意恰好相反。其他与原意出入者，不一而足。总之，徐盈未经谈话人同意和校阅而寄出这个谈话的记录，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芸生未经徐盈同意而发表并删改这个记录，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现在除自己检讨这个错误，力求于今后改进工作外，特声明完全撤消这个新闻，并向周恩来先生和读者道歉。

王芸生
徐　盈 同启

九月九日

像徐盈这样有经验的《大公报》记者，怎么会把周恩来的谈话记得完全相反？曹聚仁认为，王芸生、徐盈登报认错道歉，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别有隐情。

当年国民党不顾共产党、民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强行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曹聚仁就意识到一场革命即将到来，他遍读法国大革命、苏俄大革命的历史，来理解革命的来龙去脉。俄国一位思想家关于“革命”一语的解释，对他颇有启发：“革命是将几百年来树立的似乎不能动摇的，连那些最热心的改革家都不敢以文字攻击的，根深蒂固的制度，在几年之间很快的推翻了。就是一向构成一个民族的社会生命、宗教生命、政治生命、经济生命的精华的一切在最短的时间中消灭了，崩溃了。”[①] 曹聚仁推崇法国史学家马迪厄，在采访“行宪国大”期间，他就在往来京沪的卧车上，又专心致志地研究杨人楩翻译的马氏著作《法国革命史》，了解革命的动机及演变的进程。马迪厄曾说：

> 真正的革命，并不限于改变政治形式及执政人物而已。且须改变制度及转移财产；这样的革命，须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遇着偶然情况的凑合，才爆发出来。法国革命之突变而不可遏，使那些制造革命和受革命之惠的人，以及为革命所牺牲的人，同样地惊讶；这个革命，便是经百余年之逐渐准备而成的。实际与法律，制度与风尚，表面与精神等，彼此脱节，互相矛盾起来；由于这种脱节，才产生这次革命。[②]

由彼及此，曹聚仁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决不会停留在“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阶段，也不可能“率由旧章”。他要“以一百年的史家观点”，来观察发生在思想信仰、经济民生、法律制度等社会深层的这场世变。

关于中共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曹聚仁认为这是中共争取知识分子来做建设干部的一种手段，并非排除异己。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是以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95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91页。

追求光明的热情态度，去主动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的，海外多以为大陆知识分子都是被迫而去接受思想改造，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就拿自己熟悉的新闻界来说，曹聚仁指出，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的《我到解放区来》，应该是一篇“自发”的反省文字，其中“抛弃旧习惯，去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这四句反省的话，正代表着望平街上一般工作人员的心境。例如，中共在前线日报社设立了新闻记者培训班，对各报记者及一般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曹的上海新闻界朋友，几乎人人都是以自发的情绪进入这个训练班，来接受培训的。他自己也接受了思想改造，但参加的不是这个培训班。通过和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不时晤谈，他发现，这些人的思想进境确实很快。

曹聚仁注意到，思想改造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而且“中共似乎对于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折磨得重一点，使你抛弃了那股自尊的心理”。[①]他一直关注冯友兰、梁漱溟、费孝通、罗常培这几位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又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分子们关于思想转变的文字，曹聚仁看了很多，他认为冯友兰在《一年学习的总结》、《参加土改的收获》等文中的感受，正代表了一般文化界朋友的心曲，而费孝通的说法最为彻底：“我愿意低头了，但是究竟还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己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这种想法不但不现实、不唯物，反而又把自己推入苦恼的境地。后来终于明白：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必然是深入骨髓，要一下子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造不是重生，而是发展生的，催促死的。读着他们坦白心曲的文字，曹聚仁觉得这些知识分子还是把内心的改造看得太重，而把环境的改造、生活的改变，看得太容易了。生活方式不改变的思想改造，还是一张白纸。[②]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效如何？曹聚仁认为依然是一个大疑问。他说，即使是从延安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未必很深入。至于那些经过六个月短期训练的青年干部，满口新名词，其精神实质，就更难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2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9～40页。

说了。

曹聚仁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来研究、分析中共的总路线，从而了解中共的政策。他知道，一个政党的主义、学说与其所执行的政策之间，自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原以为中共夺取政权后会首先重视农业，等到解放军一进入上海，他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往所预料的革命进程，几乎和实际情形相反：中共首先重视的却是金融、工商业。

政权更替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发行新的货币，强制在市场上流通。中共新政权发行人民币，来取代几乎已经没有货币功能的金圆券。但是，由于人民币不是金本位、银本位或虚金本位，而是跟金圆券一样是信用本位，所以上海解放之初，人民币在心有余悸的市民心目中还是金圆券，币值一天天低落，黄金美钞的比价却天天高涨，银圆的铿锵声，照样在街角巷尾响着。新政府用种种力量来打击黄金美钞的黑市市场，但是黑市交易依旧活跃。私人拆放的利率，虽然比解放前稍低，但是高利贷还是通行得很，许多私人银行及变相的拆放公司，就是靠拆放来维持业务的，这成为 1949 年上海滩最活跃的买卖。中共就提高人民银行和其他国家银行的存款利息，使之与私人拆放的利息一样高，运用人民银行的力量来与私家银行、私人拆放的高利贷争胜。这样一来，私家银行及变相拆放公司都垮台了，上海的金融投机业就到了末日。到了 1950 年春天，拆放的利息直线下落，利息市场第一次回复到抗战以前的正轨；大量集中在上海的游资经过这一回战斗，终于风平浪静。黄金美钞的比值，也由稳定而低落；人民银行继而实行折实单位存款，人民币的稳定性反而比黄金、美钞高了。①

上海的商业贸易，在政权易手前半年就已经停顿了下来，除了投机，已经没有买卖可做。这座城市本来是商业市场，商业一停顿，经济大动脉也就萎缩了。上海解放之后，商业停顿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中共领导人士明确表示，上海过去的繁荣是畸形的，解放后将有一段萎缩期，新的繁荣期要等待城乡交流时期的到来。这一年，上海的雨水特别多，“一般市民的情绪，已经带了忧郁性，对着阴沉沉的天和相逢只说愁苦的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6 页。

生活状况，就产生另一种寂寞空虚之感。”[①] 曹聚仁认为，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是上海人的意识形态并不曾解放。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货币不断贬值，一般人就养成了重物资轻货币的观念。上海的家庭主妇，在金圆券恶性贬值之时，就像水獭一样疯狂地购备日用必须品，筑起“堤坝”来抵挡金融“洪水”。然而，人民银行击败拆放公司及高利贷买卖之后，利率直线下落，日用品价格也随之直线下跌。当初市民用囤积日用品的方法来保持币值，不料想现在都跌到成本的关限内去了。大小城市的“水獭群”都打了败仗，他们的财富因轻币重货而倒了下去，以致一败涂地。中共在经济战上的手段，让曹聚仁慨叹不已：“中共在经济作战上的手段，不下于对蒋介石的军事作战，我们就没见过一个有还手之力的人，除了香港的汇丰银行。”他感觉到，当时上海人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心态：“共产党也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们上了台，抓到了政权，也会和国民党人一样腐化下去的，等着瞧好了！”但是共产党没有腐化下去，可以说这是奇迹。曹聚仁的看法，这一奇迹归因于共产党的监督制度和共产党人“公私分明”的行事作风。不过，“中共的政权，若干方面，都显得是属于法家的路向，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是头痛的，连我也在内。”[②]

对于中共有一时期普遍攻击国民党金圆券政策、过分指责“通货膨胀”严重后果的做法，曹聚仁并不苟同。他认为，中共射向国民党的这一箭，也损伤了人民币的本身信用。因为人民币也和金圆券一样，采取的是“信用本位”，而解放军事尚未终了，人民对新政权的威望也没有稳固下来，所以，当一万元票面的人民币要流通之日，在宣传上就难于自圆其说了。当时，曹聚仁的女儿曹雷正读小学五年级，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为什么发大钞”的作文。10岁的孩子当然不知所以然，就回家问父亲。曹聚仁就给女儿讲货币的本来作用，“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以及与“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同。曹雷据此写了一篇文章，竟然得了全校冠军，连国文老师都佩服不已。

关于革命运动，曹聚仁有过这样的看法：改变政治风气是一件事，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7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1页、34～35页。

替政治生命"生根"又是一件事；改变了政治风气，并不等于就替政治生命扎下牢固之"根"。他指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包括蒋经国的新赣南政治在内，开头都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一片新气象，但是到后来却冷落下来，都不曾生根。共产党获取政权之后，即在广大乡村推行土地改革，这是准备生根的表现。"国民政府的三十年岁月，所推行的，乃是以全民政治为口号的军国政治，以农工政策为幌子的统制经济；实际政权，就落在以蒋氏为中心的血缘集团的上层与地主乡绅为中心的下层的手中了。中共的社会革命，就在打碎这两个集团上下工夫；这是孙中山所梦想的革命程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口号中兑现了。"①

不过，曹聚仁对中共"土改"的经济效能持有疑义。他说，中国的土地问题，经济意义重于政治意义。国民党一向忘了政治的意义，也忘了经济的意义；中共的土地改革，则着重了政治的意义，忽略了经济的意义。"土改"的成果，从经济角度看，成问题的基点是依然存在的。同时，他对中共的"土改"政策及干部在"土改"中的具体做法也颇有微词。其一，中共的土地法过于笼统，对于复杂的中国农村，并不十分适合。其二，按比例判定阶级成分，滋生流弊："由于下级干部政治认识不够，胡乱划阶级成分等事，也到处都有。流弊所及，上一代勤劳创业的农户，受了重大打击；而这一代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坐享其利，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本来目标，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了。"②

相比而言，曹聚仁对新政权法律制度的思考更为深刻。他说："共产党军队一进入北平，中共当局便通令废止了六法全书。这对于中国旧社会，可说是晴天霹雳；因为下意识地觉得失去了社会生活的尺度，在新政权之下，有手足无措之感。"他曾访问鄂吕弓、李文杰、褚凤仪等法律界权威，请他们写一本新法意，这些先生都敬谢不敏，说不知道如何下笔才是。

曹聚仁认为，六法全书是一个农业社会所累积的文化遗产，大部分内容还是继承了隋唐以来的律令，民国以后借鉴部分日本法律，逐渐修正增补而成——因为若干司法界的先驱，都是在日本接受法律知识的；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07、44～45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47页。

那些添加的法律，富有大陆法的精神。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所添改修正的法令，已经采用了苏联的法律精神。关于妇女继承权，女子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地位，都比西欧进步得多。法律的条文，立法的人的头脑，都比推行律令的人进步得多。“中共在废止六法以后，所继承的律令条文，与封建社会的法律精神，也比废止部分多得多。”因此，中共废止六法全书，只是表示法律尺度的改变，并非表示废弃了法律。实际上，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共“因袭”的部分，要多于“革除”的部分。“文化传统的‘因’与‘革’，就有这么微妙的关系；即算是一场最重大的社会革命，其结果，还是‘因袭’的部分，比革除的部分多，否则那个社会便无法安定下去。”曹聚仁更尖锐地指出，中共提出“清算”、“斗争”的口号，不合司法界“不溯既往”的成例；而提倡“亲属相互告密”，也不合中国法律传统的“容忍”精神。[①]

曹聚仁并非与这大变动的局面毫无关涉。1948 年是《前线日报》创刊 10 周年，社长马树礼准备编一本 10 周年纪念册，来纪念这份抗战中辛苦培育起来的事业。等到动手编写之时，局面已经不行了，这本纪念册的成本，可能要花掉社里一个月白报纸的外汇额，而经济社会的严重情势，报社又非裁员加薪不可。为了裁去员工的生计，马树礼费尽心机，最后决定腾出报社大楼的部分楼层，用准备出纪念册的这笔钱，开办前进中学，安排被裁员工，同时也算做了一件永久性的文化事业。马树礼请曹聚仁出任前进中学校长，颇有先见之明的曹聚仁，答应只负责处理全校事务，不管人事与经济。想不到马树礼无意之中造成的这一“应变”之局，使《前线日报》停刊后部分员工有了临时落脚之处。上海一解放，鉴于这所学校与《前线日报》的关系，军管会认为学校一定隐藏有报社的财产，派员调查过多次。作为校长，曹聚仁当然不免于被军管会叫去谈话。某负责同志问了他三个问题：（一）前进中学有没有基金？（二）对于前进中学，应该怎样处理？（三）前进中学和《前进日报》的关系如何？曹聚仁都如实做了回答。军管会后来也明白，学校教职员虽然多是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50～54 页。

报社职工，但与报社没有什么财产上的关连，就让前进中学依旧开办下去。[①] 曹聚仁认为，自己不用私人，不问公款，是学校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因。

让曹聚仁有切肤之痛是，长兄曹聚德被新政权作为“恶霸”枪决。1942年日军侵入兰溪，蒋畈被烧成一片瓦砾，曹聚德就去了西南大后方做生意。抗战胜利后返回故里，发了小财的曹聚德“大兴土木”，在旧址上建了三幢大房子，还造了大礼堂，育才小学又“浴火”重生。大礼堂落成之日，他请来戏班，热热闹闹地唱了几天戏，轰动了四乡八邻。这样一来，民选乡长时，他以绝对优势当选。曹聚仁在上海已看清国共斗争的结局，写信劝兄长绝对不可出任乡长这类有祸无福的官职，并以断绝兄弟关系相威胁。曹聚德不听弟弟的劝告，头脑发热地当了乡长。到了1948年，他醒悟过来，找县长辞职，但是没有获准。他觉得自己已经辞了职的，虽未辞成，应该没有什么事情。1949年5月解放军开进浦江，年底，曹聚德被作为“恶霸”逮捕入狱。母亲为此担惊受怕了一个冬天，翌年春被曹聚仁接到上海。不久，曹聚德在家乡被处决，开办了50年的“育才”也就此结束。曹聚仁虽然理解这是社会大变动中难免之事，但是同胞兄弟的悲剧还是让他难以忘情。

因此，自称“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的曹聚仁，并非“袖手”的旁观者。“对于这个大动荡的局面，尽可能保持冷静的态度；当我的情绪，无法安宁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埋藏到古书里去。”[②]

---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435～436页；《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10～11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72页。

乌鹊南飞，何枝可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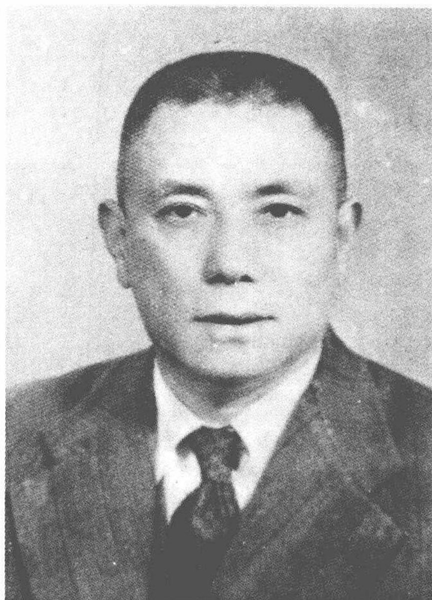
1950年7月16日下午，在大陆“旁观”革命一年有余的曹聚仁，在弟弟曹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忽然”要到香港去走一走了。第二天早晨车过金华，那是最靠近他家乡蒋畈的一站，微明中遥望北山，心中生出无限的怅惘。行囊里装着王安石的诗集，王荆公“飘然羁旅尚无涯，一望西南百叹嗟。江拥涕泗流入海，风吹魂梦去还家”的诗句，正是他当时的心绪。几天后，当曹聚仁踏上深圳罗湖桥，就像去国怀乡的屈原一样，眷恋反顾，心头泪涌。过了桥，他驻足桥头，又一次凝望大陆，久久不忍离去。

1949年4月《前线日报》晚刊结束时，社长马树礼派人给曹聚仁送来船票，请他们全家前往台湾；他婉言谢绝，说要留下来迎接解放。现在，整个大陆已经解放，“中共之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已经成为定局”[①]，他却抛妻别子，把自己“放逐”到香港，这一抉择，确实让朋友们感到太“忽然”了。

既然如此依依不舍，曹聚仁为什么还要决然离去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庭生活所迫，使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上海解放时，其他报社的职工，还有机会领取六个月的俘虏生活费，而曹聚仁所在的前线日报社，除了一所大房子和一批遣散的职工，印刷器材都被马树礼搬到了台南，职工们连做俘虏的机会都失去了。曹聚仁失业在家，又没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03页。



1950 年曹聚仁去香港首次穿西装时所摄。

能领到“俘虏生活费”，但是一家八口——母亲、岳父母、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米下锅。实在没办法，他就组织一家人用剪刀糨糊剪贴拼凑，编辑一本新词典，准备卖点儿版税糊口。然而，当时出版业正在接受整顿，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种词典。

其次，曹聚仁认为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对像他这样中年以上的人打击最大，自己在中共当局心目中已成为“留了也作不得什么用，去了也不算少了什么宝”之人。经过静观默察，曹聚仁发现，中共政权的一切教育设计、生活安排，都是为 30 岁以下的人着想的，对于中年以上的人可说是新的冰河期，气候变得太快，生存技能的适应，太不容易了。“记者曾检讨过自己的生活条件，由于幼年的农村生活以及抗战时期的战地奔波，要我吃苦耐劳，减低生活水准，是可能的。但，我的劳役能力，只能做到每天挑四十市斤的担，走五十华里路的限度，要我再加重挑担分量，走更多的路，已经不可能了。假使我今年只有二三十岁的话，只要训练一个月，挑百斤担走八十华里的要求，很快会做到的。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那就无法可想了；而中共当局所要求于中年以上的人的，还不仅是加重了负担，同时还减低了营养的分量呢。在生存环境突然改变的当儿，而且没有逐渐的改变的机会；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很短的时间中倒下去了。”①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因素。曹聚仁说，大陆解放，就像朱熹所说的，这是一个“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48～49 页。

的时代中，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史学家的他，最早最深刻地感受到了“精神的干扰”。那么，曹聚仁感受到的“精神的干扰”是什么呢？

曹聚仁在上海“旁观”革命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共“征服”整个大陆的时期，他自己却在“征服着内向的精神世界”。这段时期，从唯物辩证法到周易，从毛泽东思想到康德、叔本华，从马克思到老庄，失业在家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通过阅读与思考，他自称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史，一直是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钟摆中前进。西方的国家，永远为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的交替之迹。在中国，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也一直在升沉起伏着。他认为，中共建立新政权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法家天下，毛泽东也正在砌起了思想上的万里长城。“从斯巴达精神说，毛泽东是成功的；不过，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却恋恋于雅典精神而不忍舍。”[①] 曹聚仁信仰的是雅典精神即自由主义精神或者说是道家思想，而占统治地位的是斯巴达精神或者说是法家思想，个人信仰与国家信仰之间发生了张力。个人的自由主义信仰能否兼容于新政权？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一番话，让曹聚仁翻然醒悟：

> 那年（1950 年）六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讲演说：“一块砖头，砌到墙头里去，那就谁也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一脚被踢开了！”这是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提示；在中共政权之下，不独“中共”政团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每一党员只是一个齿轮。“中共”起了带头作用，把民主政团组成一个整体，每一民主人士，也是一个齿轮。于是，全国的学校、报馆、通讯社、书店，都组成了一个整体，每一单位都只是一个齿轮；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而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②]

曹聚仁承认自己“骨头里的钙质太多”，自己这块“砖”可能无法砌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209 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第 48～49 页。

进“新墙”里去，与其日后被人一脚踢开，还不如主动地早点离开，到香港去寻找新的精神天地。自己虽然未曾到过香港，但那是先前所熟悉的世界，不必改变生活方式也可以生存下去，“过了罗湖，我们所进的，乃是希腊精神的天地，从自由主义说，那当然愉快得多了”。

同时，曹聚仁决心南来香港，也是想看清楚整个世界的动态。他在上海，只能看到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求教往来港沪经商的朋友，让他们谈谈香港舆论界的情况，朋友们所讲的他又认为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他疑心自己身在上海，或许坐井观天，并不曾看到整个世界的动态。关于是否离开上海南下香港，曹聚仁本来还在踌躇不决，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谣传四起，而中共当局非常谨慎，几乎不发议论。他认为从民族的永久命运说，“这决不是闹政党意气的时候了，我们似乎应该听一听世界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议论了”。自信自己这个新闻记者，还不至于落伍到连大局的演变都看不明白的田地，于是决心到香港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星岛日报》又汇了一笔稿费给他，他不知道自己所写的通讯是否还适合现在的报纸，因此更觉得有亲到香港来看看的必要。

到香港的第二天，曹聚仁在一家小饭馆偶然碰到一位上海的老朋友，他问曹的第一句话是：“你靠拢了没有？”让曹茫然无以为答。后来接触的人多了，才明白这是港九人士对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所要知道的一件大事。他说，在上海，见过“积极分子”或“前进分子”这样的名称，大家既有种种机会去参加学习，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点，有的从劳动改造过程中接受了新观点，这都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而不是“靠拢不靠拢”的问题。仅仅“靠拢”，事实上是不够“积极”的条件的。世变之际“逃难”到香港的不少人，早就想象着曹聚仁在大陆一定倒尽了霉，吃尽了亏，不料曹突然来到香港，反而使他们有些失望了。曹聚仁觉得，“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都是带点心病的，他们都有着不可告人的一篇交待不了的帐目，眼见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完蛋了，下意识中也希望人人都和他们一样同归于尽。他们把一部分觉悟了的文化人称之为‘靠拢分子’，这也是河水鬼的心理”。[①]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08页。

初到香港，曹聚仁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大陆看革命时，只听得对旧政权攻击与诅咒的话，几乎凡是国民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到了香港，却听到相反的攻击与诅咒的语调，几乎凡是人民政府所做的，都是不对的。他认为，相互之间的这种隔膜即所谓的“竹幕”，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形成种种错觉，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曹聚仁决定把自己在上海的见闻感受客观、真实地写出来，让港九人士对中共统治的大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星岛日报》社长林蔼民支持曹聚仁“忠于事实”的史家态度，请他出任《星岛日报》主笔。到港后第四天，曹聚仁的文章便出现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中，首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说：“我从光明中来!”接着，对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进行赞扬。尔后，他在《隔帘花影》中，报道了留在大陆的冰心、张恨水、梁漱溟、老舍、曹禺等一批文坛巨匠的生活、创作情况，用详尽的事实挑开了遮住港人之眼的“竹幕”，使某些港报散布的有关这些人的谣言不攻自破。他还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向香港读者介绍了被某些港报骂为“匪首”的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贺龙的事迹，并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中共领袖的敬仰之情。[1] 当然，基于“忠于事实”的史家态度，在这些文章中，曹聚仁对中共的有些政策和做法，例如“土改”和“肃反”，也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总之，是有赞有弹，赞多于弹。

一石激起千层浪。曹聚仁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反应非常热烈，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安。《星岛日报》连载《南来篇》的第四天，台湾国民党“中宣部”便下令在港的宣传机构，发起对曹聚仁的总攻击。这种攻击，连续进行了五个多月。

除了来自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攻击外，曹聚仁更多地还受到在港“忠贞之士”的围攻与谩骂。大陆政权易手之际，一批反对新政权的人“逃难”到香港，而国民党当局又拒绝其入台。曹聚仁称这批人为“忠贞之士”：“他们把香港的调景岭比作首阳山，而他们这一群伯夷、叔齐是准备咬首阳山之蕨薇以尽其忠贞的残年的。”

在香港报刊上一片“骂曹”声中，化名“马儿”的文章尤其引人瞩

[1] 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6 页。

目。“马儿”本名李焰生，在上海时与曹聚仁就相识。李本是国民党员，后来认为蒋介石、汪精卫抛弃了孙中山的主张而脱党，但反共立场并没有改变。他在报纸上连续发表《给曹聚仁》、《再给曹聚仁——兼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公开信，批评曹不该“投共”，还诬蔑曹之所以要做“靠拢的民主人士”、“轻于国而重于共，贱于台湾而重于北京”，是因为曹氏出于私利，怕留在大陆的家人受共产党清算。他希望曹反思自己的言行，和他一起做“中华民国的亡国之民”。面对老友的误解、责难和劝告，曹聚仁在《星岛日报》上也发表《我的观点、态度——与李焰生先生书》的公开信，予以回应。他在这封公开信中说，香港朋友看不惯自己的文章，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几乎都背负着创痛，心中有无名的愤火”。由于李焰生主要是指责曹聚仁不该“投共”，所以，曹在公开信中主要讨论了两人政治观点的不同：“在政治观点上，我和你有一绝大的分歧点：你是‘反共’的，而我是不主张‘反共’的。……共产主义决不是自天而降的魔法，我想你决不至于相信天下事是给共产党搅糟的，认为共产主义一去，天下就会太平的……我觉得‘反共’的朋友，思想上有一绝大错误，就是想一拳推倒马克思主义，结果马列主义并没有推倒，他自己却倒下去了。……我赞成仲长统的说法，一个政权已经安定下来了，就让它安定下去为是，因为‘革命’对于社会，是一场突变，不仅消耗人力物力，而且耽误了建设时间。正如一所旧房子，已经拆掉了，就让新工程师来试试看他们建筑的工程究竟怎样，好的，也是国家民族之福；坏了，那时再革命也未迟。”接着，曹聚仁又发表了《读徐道邻〈我们不可缘木求鱼!〉》、《复何永先生的信》两封公开信，表明自己之所以赞成人民政府新政权，是因为自己反对“无为而治”而主张“有为而治”，“我认为批评大陆中国人民政府的措施，应该用他们的观点来下批评的。如果依旧用我们的旧观点来批评他们的措施，那就如司马光之批评王安石的新法，永远合不上来的。”

曹聚仁这一“回手”，立刻又招来一片反驳和辱骂。一位自负华南第一人才的“忠贞之士”，用“左通马克思，右通诸子百家，上通毛主席，下通秧歌舞”来讥嘲曹聚仁。有一位化名“博斋”的作者，因曹聚仁在《我的观点、态度》一文中引用了曹雪芹的《好了歌》，便依调写了一首来挖苦、辱骂他：

人人都道投机好，富贵功名忘不了。卖身投靠无多时，斗争清算便来了。

人人都道投机好，只有生涯忘不了。卑污狗贱甘折腰，担米无多跑不了。

人人都道投机好，解放声声忘不了。事到头来不自由，地网天罗逃不了。

人人都道投机好，服务人民服不了。吹拍文章廉耻无，讨好何曾讨得了。

还有更恶毒者，骂曹聚仁是“妖孽”，鼓动大家起来“合力扫荡”。眼看这场论争就要演变成人身攻击，主编《星岛日报》副刊的易君左，便出来做“和事佬”。他写了篇《息争论》，主张大家“稍安勿躁”，不要因“环境不安，生活不安”弄得心情也不安，不妨“等到秋凉时，再计较不迟”。

与此同时，曹聚仁这座“箭靶”还迎受着来自香港左派文人的利箭。因为曹介绍中共新政权的文章，并非全是赞颂之声，而述及国民党黑暗时又常用曲笔隐藏起来，生怕“剥伤若干人士的疮疤，也不愿意激起他们心头的隐痛”，这便引起了香港左派人士的反感。曹把人民政府与蒋经国的赣南新政相提并论，尤其让左派人士感到悖谬。在左派人士看来，曹自称“从光明中来”，既然身在“光明”之中，又为何离她而去？这便不能自圆其说了。聂绀弩、冯英子、胡希明等纷纷在开设的专栏中撰文，对曹聚仁进行挞伐。其中，聂绀弩利用自己担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之便，在《周末报》的《今日随笔》专栏中，不时写诗文贬斥曹聚仁。[①]

在左派文人所写的“骂曹”诗文中，《周末报》1950 年 11 月 14 日发表的一首题为《赠乌鸦》的七律，颇有意思。诗步鲁迅《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之韵：

---

① 参阅古远清：《在左右夹攻中的曹聚仁——香港 50 年代发生的一场论战》，《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

惯投显贵过春时，颂主心劳鬓有丝。
梦里模糊奴相泪，文坛高插×龙旗。
笑看志士成新鬼，跪向刀丛献颂诗。
吟罢请封多赏赐，骨头有血染绸衣。

诗题中的“乌鸦”，文化圈内的人都知道是指曹聚仁的。1931 年秋天，曹聚仁和四弟曹艺及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冈、周木斋等几位朋友，办了一份《涛声》周刊。他们之间，只有共同的兴趣，起初并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也不替什么主义作宣传，对一切问题均采取批判的态度。后来，大家慢慢形成了共识，提出了“乌鸦主义”作口号。曹聚仁妻子王春翠的一位亲戚王琳，为《涛声》设计了以乌鸦形象为主体的木刻图案：“下面是海涛汹涌，上面是群鸦乱飞；一面象征时代大变动，一面表明我们为时代而叫喊。旁上题了几句话：‘老年人看了叹息，中年人看了短气，青年人看了摇头！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①] 从此，“乌鸦”的帽子便落在曹聚仁的头上，成为“长衫”之外曹的另一著名“商标”。关于“乌鸦主义”，曹聚仁有时称其为“纯理性批判主义”，有时又代之以“怀疑主义”。总之，乌鸦主义的含义有两重：其一，批判精神。“乌鸦”绝对不同于报喜不报忧的“喜鹊”，它“只有对于恶势力下批判，既无什么主义要宣传，也没想替什么主子开留音机”。[②] 其二，怀疑精神。就是要喊醒人们的理性，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问题。

曹聚仁重新检视自己南来后在《星岛日报》上发表的文字，感觉没有什么宣传意味，也没有歪曲事实，还是跟原来的京沪通讯一样，只是忠实报道而已。那么，这些文字为什么会招致左右两派的无情攻击呢？后来他才知道，那一时期正是一般“上海人”（香港对内地去的人的统称）苦闷彷徨的低潮时期，广州解放以后的大骚动情绪，已经平静下去，期待大陆因韩战而总崩溃的幻影，也逐渐破灭。这些“上海人”，本以为曹聚仁的报道会满足他们的幻想，不料曹的报道如此忠实，一点也没有

①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9～470 页。《涛声》周刊封面的原文是：“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疼，中年人看了断气。”

② 曹聚仁：《涛声的宗旨和态度》，《涛声》第二卷第 4 期，1933 年 1 月 21 日出版。

夸大的成分。“我的报道，足以证明他们笔下所虚构的大陆新闻，都是幼稚可笑的。”因此，这些“忠贞之士”便群起而攻之了。一位《前线日报》的朋友对曹聚仁说：“你所说的都是对的，但这个时机是不适于说实话的。”他听后恍然大悟，自己对大陆的忠实报道，对当时香港的左右两派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受到左右夹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过“解放”的大教训，曹聚仁觉得知识分子的命运已定，遂抱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香港”的态度南来，孰料一到香港便受到左右夹击，成为 1950 年港九的“新闻人物”。某港报资料室一位小姐，把报刊上批曹的文章剪存起来，竟有 800 篇之多。不过，曹聚仁并没有被“乱箭”射倒，他承认自己是该死的“异端”，但“甘于成为绝物”，要像“世故老人”鲁迅那样，努力加餐饭，“活给那希望我倒霉的忠贞之士多头痛一些日子”。除了担任《星岛日报》主笔外，他和徐訏、朱省斋、李微尘等创办了创垦出版社，还出了个《热风》刊物。更重要的是，从 1950 年到 1956 年，寄身香港的曹聚仁勉力笔耕，出版了“采访”系列、《新事十论》、《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等 20 余种著作，成就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其中，《新事十论》是曹聚仁发奋续接冯友兰《新事论》之作，该书中下面的这段话，尤其能够反映他当时的学术思想与信念：

> 儒家是我的嘉陵江，道家是汉水，佛家是湘沅诸水，宋明理学、浙东学派是赣江，马克思学说乃是苏州河与吴淞江，这样形成我的思想上的扬子江；我的每一勺水中，都有着这些支流的成分。世界上，只有这样的水，才是真正的水；那不掺杂任何成分的蒸馏水，除了医药，并无其他用处的。我曾说笑话：有一天，我要讲“马曹主义”，大家一定嗤之以鼻，说我的神经有些不健全了。可是，我一说起马列主义，他们却又并不惊讶了。可惜马克思已死，无法使之复生；否则“马曹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优劣论，老师眼底，自有权衡，不一定如世俗人的说法的。……“马曹主义”固是一个笑话，但既有了“马列主义”，便不能限制“马曹主义”的成熟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为学者，不可不存此抱负；一个人在思想上，不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我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我的自发

行为；你要强迫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就要考虑一下子了。为了生活，孔子可以连打更的工作都去做，但颜回虽居陋巷，并不改变他的思想的。明末清初，也是时代的转角，从"大同"说，顾亭林、黄梨洲、颜元、李塨，连那独学无友的王船山，也在山谷间有同样的转变；但，颜、王、顾、黄四家，各有所见，各自完成其思想系统，既未舍己从人，也没强人从己的。[①]

① 曹聚仁著：《新事十论》，香港创垦出版社1952年版，第39～40页。

“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1956年7月1日，南来香港整整6年的曹聚仁，终于踏上了返回大陆的旅途。他的公开身份是访问北京的新加坡工商考察团《南洋商报》随团记者。两年前《星岛日报》右转，社长林蔼民离任，曹聚仁也离开了前后服务十余年的《星岛日报》，应聘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笔。但是，新加坡当局宣布曹为“不受欢迎”之人，他无法前往履任，只好在香港遥领主笔之职。

临行前两天，曹聚仁写了封公开信交《南洋商报》发表，表白自己这次回大陆“绝无政治上的作用”，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为急待知道大陆社会动态、政治进度的千万海外华侨，做真实报道的：

××我兄：

这封信付邮时，我已束装就道，到北京去了。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去作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由前马绍尔部长作顾问），社方派我兼任该团随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寄语香港朋友们，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几天前，《天文台》二日刊所载关于我的北行消息，显系向壁虚构，可以说是属于“客里空”型的新闻，道听途说，以耳为目，捕风捉影，缺乏新闻的真实性。在新闻技术上，他越描写得若有其事，

越显得他采访技术的贫乏。连我到北京去做什么都不知，还算得是新闻吗？

至于我兄笔下，每逢提及弟的行动，总说是“谜样的人物”。弟的居处，五年来不曾移动过；日常生活状况，我兄知之甚悉，终日埋头作稿，从手到口，日不暇给，还有什么神秘可言呢？弟所战战兢兢的，就是不想牵入政治旋涡中去，因为我所工作的新加坡《南洋商报》，乃是一家民营的不带政治色彩，也和任何政治集团绝缘的报纸。在工作上，我的态度，必须与之完全一致。我这回访问北京，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的一本正经工作。我们的背后，有着千多万海外华侨，亟待知道大陆中国的社会动态，急欲明了大陆中国的政治进度，我们自该为他们作真实的报道，使他们有进一步的了解的。我乃面对华侨担当起这一切要的工作，难道会是一个谜吗？

我所以要向你来作一番讨论者，我们的观点或有不同，但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论，是非得失，那是一致的。记得在《真报》创刊初期，弟也曾做扫边工作二年多，其中接连不断，写了二年的《观变日记》。当时对于中国问题的前途，我曾指出几个要点：(1)中共政权，已经逐渐稳定，面对现实，不必作其他幻想；今后五十年中，大陆的局势已定，不会有多大的变动，要梦想改朝换代，已经不可能了。(2)台湾的反攻大陆的希望，韩战结束以后，越来越渺茫了。依我的说法，简直是绝望了。（当时，还有人和我来打赌；我抛出了十对一的比例，他们也输定了。）(3)因此，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不过我要申明：我只是主张国共重开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什么不可以对于国事表示如此的意见呢？这都是三年前的看法；目前的事实，不是替我的看法作证明吗？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告诉我：“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苦痛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

疾呼呢？

这一回，政府当局，允许我这样一个没有党派关系的新闻记者到大陆去采访，而且尺度这么宽大，这就表明人民政府的政权，已经十分稳固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自不怕风吹雨打的。我希望这次北行能够真实地报导，这样才合乎侨胞的期待。政治是最现实的，我们应该认识这一现实。“客里空”的新闻，应该让它到字纸篓中去的，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二十年老老实实做新闻工作的人，加以种种推测，未免太对不起自己了。

我的站在新闻记者地位的态度，大体就是这样的。

谢谢你！专候你的指教。

弟曹聚仁上

六月二十八日①

曹聚仁7月1日早晨从九龙车站动身，正午12点就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深圳海关的办事效率和市面的安全，让曹聚仁感到中共的治理确有成效。从深圳乘车直达广州，受到贵宾般的礼遇与招待。7月4日，从广州乘飞机经武汉前往北京。傍晚，飞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恩师邵力子亲自到机场迎接，让曹聚仁十分感动。北平和谈破裂后，邵力子留下来参加了中共新政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这次北行，曹聚仁受到了周恩来总理7月13日、16日、19日三次接见。其中，7月16日晚在颐和园的宴请最为隆重，陈毅、张治中及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均出席作陪。曹聚仁到后，迎候于此的周恩来、陈毅把他带到玉澜堂，周恩来建议泛舟湖上，于是主客三人乘游艇私谈，至清遥亭弃舟登岸，进听鹂馆，晚宴就设在这里。这天，邓珂云带着幼子曹景行也在颐和园，但是没有参加宴会，被安排在了别处，邵力子夫妇怕母子感到冷落，还不时地过去招呼她们。

晚宴结束后，主客六人又在昆明湖上泛舟畅谈，归城时已是深夜。车过一丛墓冢，周恩来以手遥指着说：“这是元代耶律楚材之墓，他是创建北京的宰相，是位大政治家。”

---

①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169～171页。

曹聚仁把这次宴会的经过，写成《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一文，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文中说：

>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演说之后。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氏郑重说到中共的政策，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①

1956年6月28日，也就是曹聚仁给朋友写公开信表白自己回大陆的动机、目的的那天，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报告，曹便在这次晚宴上探询“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与“票面”价值是否相符。周恩来就通过这位海外民营华文报纸记者之笔，向台湾的国民党传递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意愿。曹聚仁的《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这篇文章一见报，迅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弟弟曹艺时任北京公路学院教务长，家住西直门附近的马相胡同，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这时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但是，曹聚仁没有寄居在弟弟家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侍母亲，而是被安排到了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居处宽敞，他喜欢孩子，就把曹艺的孩子接来同住。据曹艺的女儿曹景滇等回忆，每天来饭店看望伯父的人络绎不绝，夏衍、老舍、曾经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容龄公主……各界人士都有。陈毅经常来叙谈，邵力子则差不多每天都来，周总理还亲自来过一次。除了迎来送往之外，曹聚仁也出去拜访了章士钊、梁漱溟、梅兰芳等人。他本来一心一意要去

---

①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111～112页。

拜访冯友兰的，但看了冯氏最近发表的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大为失望，也就作罢。

曹聚仁在北京见面最多、谈得最痛快的还是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问曹，对新中国的报纸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这本来是两回事，我们所办的报纸，等于香烟，而你们所办的报纸，等于面包；拿香烟来比面包，是无从比价的；但有人非抽香烟不可，饭后一枝烟，快乐比神仙，他们的想法，那是我所不能体会的。不过，我离开祖国五年，这回回来，觉得祖国的人民，竟是这么关心国事，那是大出乎我的意料的。相反的，他们虽这么关心国事，却又只这么和世情隔绝，他们几乎不知道国际间的重大新闻呢；这情形的成果如何，我还不敢说。”曹聚仁曾和王芸生谈到天津《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的优劣比较问题。他认为，《大公报》津港两馆的人手不相上下，瑜亮一时，“但在香港能够发挥才能的，在天津，就不免在圈子中翻斤斗，有所拘束了”。结果，“社中公论香港版比天津版高明得多”。①

7月底，曹聚仁离京南下，回到了阔别六年的上海家中。南走香港时女儿曹雷才10岁，现在已亭亭玉立，马上要升大学了，他既欣慰又愧疚。看到妻子靠做些针凿活勉力撑持着这个老少之家，他更是百感交集，无语哽咽。一家人只团聚了几天，他就乘车返回香港。

一个月后，曹聚仁再次北行。其间，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日，他和妻子邓珂云被邀请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了他。这是曹聚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想不到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对自己的著作差不多都看过，还要曹回去后寄几本《蒋经国论》给他。关于这次晤谈，曹聚仁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不过，他在10月12日的《我看中共的“八大”》中写到，他在和毛主席的谈话中，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中共的政权，在这一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乃在他们的第二代。”他还以建都北京的元、明为例，来说明“第二代”的“瓶颈危机”问题。“毛氏首肯记者的看法，不过记者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这些话，都可以

---

①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28～29页。

使我们明白这回中共‘八大’以后的政治路向了。”[①] 在另一篇文章《从一角看世界》中，曹聚仁谈了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也是来自这次晤谈的观察：

> 毛主席接见记者时，是在中南海居仁堂，记者对他说到成吉思汗的往事，毛主席谦虚地说：“那只是做诗而已。”事实上，他是走向超过成吉思汗的道路了，因为毛氏是懂得辩证法的，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而最弱者却是最强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他今年对他们的部属讲谦虚之道，也就是走向超成吉思汗之路。
>
> 从这一角度看，毛氏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蒋介石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的存在，而且也承认蒋氏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重大转变。[②]

10月7日，曹聚仁再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宴请。作陪的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等人，谈宴的话题，依然是台湾问题。10月13日，他离开北京到上海。曹聚仁这次在北京停留了40余日，日程安排主要以自由访问为主，他寻访了天桥、琉璃厂、八大胡同等地，还专门到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

10月14日，曹聚仁在上海参加了虹口公园鲁迅墓落成仪式暨鲁迅纪念馆开馆典礼。19日是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他在上海国际戏院观看了夏衍编剧、白杨主演的电影《祝福》。10月底，曹聚仁返回香港，结束了第二次大陆之行。

回到香港不久，曹聚仁给台湾的胡适写了封信，告诉胡适，他的著作在大陆并没有像外间传言的被焚烧、禁止，建议信奉实验主义的胡适，组织一班学者到北京去实地考察中共的政治措施：

---

①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72页。

②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141页。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者，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①

信中提到的胡适给张慰慈的旧信，是胡适当年在其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自称"实验主义者"的胡适，一反流俗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对苏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规模政治试验，表示佩服。胡适认为，"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本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胡适当时并不一定赞同苏俄所试验的"主义"，而是同意它有试验的权利，因

①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5页。

为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曹聚仁拿胡适的这封旧信做文章，劝说胡适再行“实验主义”，组织一帮海外学者到北京考察，亲自看一看中共治下的大陆到底如何。[1] 不知为何，胡适 1957 年 3 月 16 日才收到这封信，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只记了一句——“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后来当然也就没有回过大陆。

1957 年 5 月 5 日，曹聚仁第三次北回大陆。5 月 10 日，他携妻子邓珂云入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再次接见。5 月 28 日，他到北京郊区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访问了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康泽、宋希濂、黄维等人。6 月 11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陪同他们夫妇乘火车南下汉口，然后换乘轮船到九江，上庐山，看了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和当年蒋经国的练兵之地海会寺，再返回九江，乘长江轮船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整，一行人便到杭州、绍兴、宁波、溪口游览。7 月 14 日，徐淡庐陪曹聚仁南下到广州，然后曹回香港，徐返北京。

1958 年 2 月，曹聚仁又一次来到北京，弟弟曹艺已调至南京任交通学校校长。时值寒假，已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曹雷，来北京和父亲团聚，父女二人在新侨饭店过了春节。3 月 15 日，曹聚仁随陈叔通、邵力子一行，到安东（今丹东）迎接入朝志愿军归国。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在丹东的一天一夜，红旗蔽日，歌声如潮，他相信“中国的军队确乎打了胜仗”，激动地写下了“五星飘荡处，横槊止新戈”的诗句。这次北行，曹聚仁关心的另一件大事是大陆“反右”斗争的情况。到京后第二天，他便发出了《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报道。4 月 7 日下午，他还去遒兹府 20 号罗隆基家——前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已定居台湾的蒋梦麟旧宅，访问了被毛泽东称为“右派的老祖宗”的罗隆基。

1958 年夏，台海局势突然紧张。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数日后，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曹聚仁，向他透露了这一消息。8 月 23 日，曹聚仁化名“郭宗羲”，以《台峡战火重开配合杜里斯访台，华沙谈判可能无限期休会，北京停火令

---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0～381 页；散木著：《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5 页。

与中止停火令实出毛泽东手笔》为题，在《南洋商报》上予以披露：

> 【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 21 日专讯】据此间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 21 日中止停火，是针对杜里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前此之宣布停火命令，及 20 日的中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于僵持。

中共炮击金门是 8 月 23 日中午开始的，而《南洋商报》是早报，先于炮战面市。因此，曹聚仁的这则报道，成为全球独家新闻。10 月 5 日，曹聚仁再次用"郭宗羲"的化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传北京同意短期局部停火，避免两败俱伤，国共双方酝酿直接谈判》的独家报道。

曹聚仁最后一次进京是在 1959 年 8 月。当时中共正在召开庐山会议，主要领导都不在北京，只有陈毅留守负责。陈毅担心曹聚仁对党内斗争有所觉察，就指示徐淡庐陪同他们夫妇到东北考察采访，越远越好。8 月 15 日，一行三人乘火车出关，先后参观了沈阳、抚顺、鞍山、哈尔滨、长春、吉林等重工业基地，历时 20 余天。10 月 1 日，他应邀参加了国庆 10 周年庆典。10 月 24 日，曹聚仁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11 月，他乘火车离京赴沪，随即返回香港。"可能有些新闻工作以外的事要赶着回去办"①，曹聚仁途经南京时，不能下车去弟弟曹艺家看望老母亲。母亲思儿心切，让曹艺陪同到下关车站，盼望火车停靠时能够见上一面。老母亲在寒夜中望眼欲穿，终于盼到了风尘仆仆的曹聚仁。可是，母子在车站只相聚了 8 分钟，便洒泪而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后来曹赋诗一首，记下与母亲在车站聚散的悲欣一幕："迷茫夜色出长栏，白发慈母相对看。话绪开端环如茧，泪澜初溢急于汍。抚肩小语问肥瘦，捻袖轻呼计暖寒。长笛一声车去也，四百

---

① 夏衍：《怀曹聚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96 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6 年版，第 6 页。



1959年深秋曹聚仁与家人在上海。

八秒历辛酸!”

从1959年11月离开上海，到1972年7月在澳门病逝，曹聚仁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据他自己回忆，1956年至1959年近四年间，他一共回大陆11次。

曹聚仁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当年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这块自由主义之“砖”，可能无法砌进社会主义大陆的“新墙”里去，才决意来到香港这块“希腊精神的天地”的。在香港，针对大陆中共新政权的政治宣传，曹聚仁说：“记者是一个不十分会被任何宣传所欺蒙的，宣传者尽管言之谆谆，我这个听者，简直一笑置之。我是不大相信，三年五年，就可以把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变成了仙境的。”他认为，孔子的“三月而鲁大治”是一句谎话，“必世而后仁”，一个政权，总得有三五十年的建设，才谈得一点成绩的。[①] 首次大陆之行前，他给朋友写公开信，表明自己要站在新闻记者的地位，为海外华侨做客观真实的报道。1956年10月他第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时，还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在几度北行、“看了许多使人兴奋的建设大业”之后，“而今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并不是别人要我收起，而是我自觉的，衷心明白自己的浅薄无知，觉得应该收起的）。对于邦国大计，还是听从先觉者的领导不错。政治上的事，就是要切切实实去做，而且按部就班做通了才对，弹高调也没有用的。”[②]

像曹聚仁这样的记者，一旦失去了自我观察，对事实的认知与报道就可能“走样”。例如，他报道说，“所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处分都是极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69页。

②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178页。

轻的"，吴祖光、丁玲、黄苗子等右派分子"欣然就道"，到"即算不是天堂，也可以说接近天堂"的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进步得很快"。当"海外论客"问及"劳动改造"有什么好处时，曹聚仁笑答："至少可以把若干都市病，如失眠、神经衰弱之类医好。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说的：'他领略到饥时吃，渴时喝，困时睡，他在这个时期所体验到的精神的恬静。'"[①] 如果曹聚仁活到"文革"之后，读到吴祖光、戴煌、舒芜等"右派分子"的回忆文章，不知做何感想？

曹聚仁眼中的"人民公社"也颇有意思。1958 年 4 月，他从北京南返香港时，还只看到人民公社的影子，半年后再回来，已经看到人民公社"遍地开花"了。1959 年初夏，他到天津市郊的一个人民公社考察，"一到农村，鱼、肉、鸡就充分供应了，一席午餐，六大盘菜，一大碗汤，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曹聚仁相信，人民公社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中国可能比苏联还早一步进入共产社会"。"人民公社的远景，比中共当局所想望的更美丽，怕连马克思再生，也不敢这么想。"[②]

应该相信，曹聚仁不会故意去歪曲事实，一些地方和问题之所以看走了眼，可能与"雾中看花"、"走马观花"或者"隔岸观花"有关。更深一层分析，恐怕这是他自觉收起自由主义旗帜的必然结果。一个放弃了怀疑、批判精神的记者，一个流落异乡、而今"仿佛回到了母亲怀抱中"的游子，又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当然是"触目皆春"了。

自愿放弃自由主义的立场，曹聚仁为自己立场的转变找到了崇高理由：孙中山先生在遗教中明明白白要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所以大陆和台湾都提出了"有集团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的口号，而且要求我们为集团牺牲个人的自由。[③] 所以，他为了"集团"即国家民族的自由，就自觉地将个人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收拾起来了。

---

①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第 384、388～389、295 页。

②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第 306、362、366 页。

③ 曹聚仁著：《北行三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第 407 页。

秘密信使，爱国书生

曹聚仁南来香港之初，就有人对他的真实身份表示过怀疑。自称与曹聚仁相识多年、早他一年来香港的“易金”说：“不论他在香港有无任务，起何作用，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还很少有人清楚他。”① 曹在香港新闻界的一位朋友，则称他是“谜样的人物”。1955 年，曹聚仁就有回大陆采访的打算，但迟迟没有成行，美国《时代》周刊为此还发过一则消息，称曹正担任“国共和谈的桥梁”。1956 年 1 月 15 日，曹聚仁通过香港《真报》发表书面谈话，力辩《时代》周刊所言纯属谣传。然而，周恩来总理同年 6 月 28 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讲，曹聚仁便于 7 月 1 日束装北返，这就难免使人有“神经过敏”的推测。况且，他临行之前所写的公开信，在表白自己回大陆是作广泛深人的采访工作、“绝无政治上的作用”之后，却大谈国共“重新回到圆桌边”的问题，更使人有“此地无银”之想了。

那么，1950 年代后半期曹聚仁频频北行，之后孤守海外直至客死异乡，是否真的与国共和谈有关？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长期以来云遮雾罩，因为缺少真凭实据，大家只是猜测而已。直到 1990 年代后，曹聚仁的部分遗札被亲友陆续公布，一些当事人也出来澄清事实，一个“真实的曹聚仁”才逐渐从历史的“后台”走了出来。

---

① 易金：《曹聚仁说他要回大陆》，《新闻天地》（香港）第 342 期，1954 年 9 月 24 日出版。

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

> 曹聚仁1956年初来北京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主管统战工作的徐冰部长都对他很重视，认为他是台湾当局派来刺探、了解我们对台政策底细的，而且我们在香港指定联系人为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与他联系。我们对曹聚仁这位老朋友，以及他的老朋友马树礼、宦乡都很熟悉。我与曹聚仁也常见面。台湾当局一方面想摸清共产党的底，另一方面又怕被别人知道。当时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蒋氏父子不可能让曹聚仁，也不可能让任何人插手，不留文字，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肯定的，蒋氏父子心胸很狭窄。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①

1950年曹聚仁打算离开上海去香港前，曾经写信给北京的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回信说到海外一样可以爱国，还给他指点了一些大纲要目。但邵指点的"大纲要目"的具体内容，曹聚仁从未告诉他人。他同时给上海主管文教工作的夏衍及有关部门发了信，表达了去香港的想法，也没有受到阻拦。1956年春天，他让妻子邓珂云转寄邵力子一信，表示自己愿意到北京为祖国统一做桥梁。不久，邓珂云转来邵力子简函，对曹的北行表示欢迎。可见，曹聚仁当初南来香港是个人行为，虽然中共方面知情，但并非派遣。1956年他首次回大陆，是在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之后，由中共在香港的联络人、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的安排才成行的。实际上，费彝民是陪着曹聚仁一起北返的。根据罗青长回忆，当时周恩来、陈毅等虽然重视曹聚仁此行，但是并不完全信任他，怀疑他是台湾方面的"探子"。既然怀疑曹是"探子"，为何又允许他回来呢？徐淡庐回忆说："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②

于是，周恩来在旬日之内三次接见曹聚仁，并于颐和园夜宴那一次，

---

① 柳哲：《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碑文》，1999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

②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7页。

将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向告诉了他，让他在海外广为传布。

曹艺的女儿曹景滇撰文说，父亲为了不辜负哥哥的重托，一直守口如瓶，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伯父曹聚仁的文稿；“文革”期间，文稿被红卫兵抄去，父亲冒“死罪”据理力争，才索要回来，为此而忍受着精神上的凌辱、肉体上的鞭挞和非人的折磨。当年，伯父要求弟弟为其保密 20 年：“20 年内无历史，20 年之后再大的机密也可以公开。”但是父亲审时度势，谨慎地把保密期限又延长了 20 年。

在曹艺保存的这批材料中，有部分近似书面报告的文稿，曹景滇曾看过，“其笔迹是曹聚仁和邓坷云两人的，估计是伯母帮伯父誊写的”：

> 7 月 19 日报告：聚仁此次以 5 月 5 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 14 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来就是了。
>
> 目前，国际情势如此复杂，聚仁殊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具，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从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这一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依聚仁这两个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冬间所见的更有进步，秩序也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 月 13 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没有混乱过，海外误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实情如何，千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
> 周氏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再不必弄机谋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北京方面的朋友，嘱聚仁奉候

起居！

7月23日下午，曹聚仁接到W兄电话："G公嘱兄耐性，我即来港面谈。"然后是曹聚仁7月27日的"综合"报告。该报告分甲、乙、丙三个部分。甲为"前词"，曹聚仁在综合报告前先讲了三个要点：（一）中共在短期内就把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搞好，我们应该自惭不如。我们对大陆的态度应该是：既不应再有阻碍、扰乱视听的言行，也不应旁观冷笑，"一切只能就中共当局已有的建国基础上去做，不必另起炉灶。聚仁反对再革命的一切打算，时不我与，我们应该共同去建设"。（二）《苏俄与中国》一书分量虽多，并无新义，对孙总理外交政策的继承与批判，颇难自圆其说，在美国的反响也并不如预期。（三）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台座"才有政治新机，中共也可加强建设力量。此乃两利之"自求多福"途径，关系"台座"一生成败，不可交臂失之。

乙部分为"庐山及溪口近况"：

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尊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疗养地区，平日约有住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是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一体系。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南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的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优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驻马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从由台归省，仍可住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内外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

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修葺，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 1946 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至尊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难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区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处之也。惟国际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1957 年 6 月 18 日，曹聚仁、邓珂云夫妇与徐淡庐在庐山。

丙部分是曹聚仁旅行大陆各地后，对“大陆情势之推断”：（一）中共政权建立后最可赞许者，为国家财政之充裕与民生经济之稳定，这是政治与经济相为表里的大成就。（二）中共政权获得支持的程度，虽然无法提出民意测验的统计数据，但毛主席、周总理的威望，还在抗战胜利之初“老人”所得万民拥戴之上，这一份威望足以弥补中共本身存在的问题；全国人民对政府不无怨言，但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周总理关心他们的生活，一时的困难与错误，毛主席一定会有办法解决；中共政权在城市中获得了小市民与工人前所未有的普遍支持，“中共政权实际乃是小市民所支持的政权，工农两阶级乃是中共请出来的陪客”。（三）中共政

治以政党代替中国传统的“宰相—绅士”政治，从无为政治转为有为政治。“今日中共当局，持法不免过严，生活却十分清苦，做到了大夫无私财的标准”。（四）农村生活的改进，只能从衣食等小事上去看，不能希望短短七年就变成现代化的生活；中共勤俭定国，不会失去民心。（五）“右派分子”大都是政治认识不十分清楚、利禄之念甚切之人，投机成分居多。中共由于革命历程中痛苦受得太多，也就十分敏感，所以对于形成政府组织的可能活动都在打击之列。“反右派运动”并不在“反右派”，而在扫清整风的障碍。受打击的右派分子不会投向美国路线。

在这份综合报告的最后，曹聚仁告诫“台从”，“在今日而谈反攻，诚如螳臂当车”。同时，他表白自己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决不考虑个人出处，也不惜献身；事成之后，“严光还是严光”，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老其身。

除了7月27日的这份综合报告外，还有7月27日、28日曹聚仁与W兄的“谈话记录”。这位W兄郑重声明，此番谈话只能算是他个人供给曹聚仁参考的资料，不作为正式记录，也不负任何责任。“谈话记录”中以下几条颇耐人寻味：（一）G氏谓：不论大陆今日局势实际如何，海外人士总以为爆发了新的危机，应该坐待变化。此时，派遣专人访问大陆，必定增加困难。他嘱聚仁耐心等待，老人并无切断联络线。老人嘱聚仁多向大陆巡游，增加彼此之了解。（老人看了照片，非常感动。）（二）G氏谓：目前情形复杂，他本人就难于来港，尤其在这一段特殊时期。以后一切由W兄负责联络，决无疏远之意。（三）G氏安慰聚仁，谓和谈虽未成熟，希望依然很大。华盛顿方面对此事颇感头痛，这就是代价。老人谓华盛顿最怕国军反攻大陆，我就喊得更响。

9月23日，W兄再次来港，告诉曹聚仁台北朝野不独对战争没有信心，对和平也没有信心。在野的党派，无形之中，有一种相互联络呼应的倾向，即是反蒋家独占政权的倾向，这是华盛顿方面从中分化的成果。G氏近来把意志更隐晦了，即是避免这一种逆风。G氏似乎有意要造成一个控制政党的力量。曹聚仁问及G氏与陈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W兄认为要彼此相服是很难的，一山难藏两虎，到了老人身后，这问题就很难了。所以和谈要成功，最好在老人身前。曹聚仁还问及G氏能否派人到北京去试探，W兄说人是一定要派的，不过老人还迟疑着，认为不要

太露痕迹。

W兄这次来港，向曹聚仁转述了“老人”的奖惜之意及垂询诸事，让他一一奉答。曹聚仁在“奉答”“老人”之前，先向G公谈了一番“利害”与“义理”：

> 聚仁私意，吾人今日所考虑所推寻的，不管义理居首，利害居次，或是专研究利害关系，不问义理，总得有一共同目标。今日解决台湾海峡问题，除了和平谈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寻？看来是不会有的了。美国方面明明表示无所爱于国民党政权，一切只是为着美国利益而考虑，那就谈不上什么道义的了。中共方面，当然也无所爱于国民党的政权，但在考虑中国的利益就连带考虑到国民党的利益，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和谈的基础。聚仁这一年半来，也看明白许多枝枝节节问题是难于一一安排好的，只要台湾海峡问题一解决，其他就迎刃而解了。恕聚仁直言，G公的精神准备不够，因此多所牵虑。固然中共当局把政治尺度放宽来，让台方人士安了心，才可以减轻许多阻碍。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台湾海峡问题明朗化了，中共可以安心去建设，就可以把政治尺度放得更宽的了。
>
> 接着聚仁也想说点义理。聚仁认为革命乃是一时性的变态，社会政治的常态，乃是建设，不是革命。孙总理说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一点，中共所建立的政权可说十足做到了。在这基础上，谈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才不致于受外来势力的牵制。伦敦华盛顿方面的外交政策，就是不希望东方有强大的中国，这一点我们必须争气一点，不要做西方国家的工具。“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与“求个人之自由平等”本来是两件事，国民革命的目标，并不是要求个人之自由平等的。我们可以批评中共的人民政府，乃是斯巴达式的政府，而不是雅典式的政府，却不能因为他们并不保障个人的自由就抹杀他们所实现的“中国之自由与平等”的。
>
> 聚仁要重提G氏的一句旧话。G氏在赣州曾对我们说：“中国旧社会中，恶势力有组织，可以横行霸道，而善良势力，却没有组织，他们大都是独善其身的，所以被恶势力所宰割。我们要帮着善

良势力，让他们也组织起来，和恶势力相对抗。”（大意如此。）这话是不错的。中共主政以后，所有恶势力的组织都摧毁了，他们组织了善良势力。聚仁的说法是：无论什么势力，一组织起来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流弊的。所谓“童子操刀而割，所伤实多”也。组织善良势力的基本观点还是不错的。

以下乃是曹聚仁对“老人”的“奉答”之辞：

甲、聚仁三次访问北京，从没听到任何人谈到军事，我也故意避免谈及军事，除了国庆日的阅兵，也没看见过解放军。因此海防情况如何，聚仁无从作答。当年指挥东南战区的陈毅将军，目前在北京负责文化艺术工作，也绝口不谈军事。只有一回谈到朝鲜战争的经验，今日解放军的假想敌乃是美军，以国军的军事装备与解放军相较或许太差了一格。中共当局也曾问及国军的军力问题，聚仁作较高估计，说是有四十五万战斗兵。依现代作战常例，一个战斗兵在前线作战，后方得有七个人来供应，因此在运输供应上，依存于第七舰队的成分更深。聚仁从旁冷观，中共虽未疏于海防，但也不一定把国军的反攻当做严重的因素来考虑的。中共不一定把第七舰队的力量估计得很高，当然也不会估计得很低。聚仁当然是不知兵的，但有这么一个印象：国军有可以战的下级官佐，却没有可以作战的士兵；解放军的士兵教育是成功的，又有一个辅助官佐作战的政治组织。至于统帅指挥作战的技术，聚仁不想作什么批评。作战是综合的艺术，三分是天才，七分是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了解与运用。解放军随时可以解放台湾，而不轻易用兵，这便是一种政治技术。（解放军的将领都懂得政治，这也是一种进步。）

乙、关于中共的内部矛盾的解释或许和老人所得的情报大有出入。聚仁肯定地说，在大陆，有组织的叛变是不存在的。中共本身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同时所有恶势力的组织都已摧毁了，事实上，中共已扶植了若干善良势力的组织，所谓积极分子是也。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从同盟会到北伐军，都是与恶势力为缘的，而今，恶势力不存在了，有组织的叛变不可能了。中共今日已无内顾之忧，所

考虑的只是世界性的流行性感冒，那是“外感”，不是“叛变”。所谓内部矛盾，我看台北比北京更多些。例如：中美乃是比肩作战的战友，事实上是同床异梦的。台湾的朝野间的矛盾，与国际间矛盾，也时常表面化的。中共当局，希望内部团结起来，与香港人士，希望中共内部分裂，这也是明显的对比。聚仁希望老人不要把东欧的纠纷和中共内部矛盾混为一谈，在共产集团中，中共乃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并不是促成纠纷的因素。老人总以为中共听命于莫斯科，这是一种错觉，今日的中共，乃是远东的盟主。美国有如战国时代的齐国，苏联则如当年的秦穆公，中共则是当年的晋文公。我们希望太平洋上的盟主转到中国手中来，中共的成功也就是老人的成功，我们对历史该有新的交代。



1957年7月3日曹聚仁拍摄的奉化溪口远景。

丙、老人或然关心大陆人民的意向，这也是中了香港政客们的宣传之毒害。民意测验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我并未在大陆各地做过测验。我所见闻的，当然是各色人等的随感录，但比海外人士的幻想实际一点。不过，大陆人民不希望再有战争，也不希望再改变目前的政治秩序，则是普遍的共同的心理。老百姓所看见的只是从手到口目前的事，说他们会有远见，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听到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放，的确是高兴的。就在私下谈话中，没有人相信国军会反攻大陆的。这几年的社会教育，解放军的抗日英勇故事，以及朝鲜作战的传奇，代替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说，

试问国军再利害能比得上日军和美国吗？聚仁在这儿应该说实话，请老人听了勿失望。我们今日所要努力争取的乃是和平。

12 月 11 日，W 又来香港与曹聚仁会面。“这两个多月中，经过了国内外许多大事件的激荡”，曹聚仁想知道 G 氏的新意向及“老人”的决意。W 兄说 G 氏的情绪近来还不错，不过他的心境这些年都是这么沉郁，没像先前那么开朗的。至于“老人”，其用心一向是多角形的，W 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动。曹聚仁认为 W 兄的政治感受，本来就不十分敏感，于是“再答老人问”：

聚仁三次访问北京，所见所闻，大都已写在通讯中，先后由 W 君陈览，此外也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说。今日最大的秘密，还是和谈的真正进度，真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也。辱承垂询，敬一一答复如此：

一、聚仁个人看法，许多议论，还是由于不同的观点而来。尊处所得若干情报，搜集的人和判断的人，都缺少全面的与社会的观察力，不免人云亦云，所以落空了。例如，某方面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是事实，聚仁的推断，中共一定会有办法来应付，而且会安排得很停当的，台方的判断说中共的政权，出了纰漏，就此会垮下来了，其结果，尊处的预断常落空，聚仁的推论常正确。（请看我所写的整风十题，我所报导的并不一定合乎中共的意向，但我所下的断语，大都接近事实。）并非我的见解特别高明，而是我的见解不依违于传统的观点，正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同于胡三省的《史论》。

二、政治情势的演变，和社会组织的迁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大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孙总理在民元时期力主美国式的两党制，到了国民革命时代，他就改主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了。在一党专政的观点，台湾与北京的政治路向是一致的。至于说，在野的政党将来是否会有起而执政的机会？在目前已经不是十分重要的论点了，因为主政的政党，在社会建设时期，便等于总工程师，其他政党便等于各部门

的工程师，新中国的建设方面实在太多，工程也实在太大了。和谈成功之后，并不等于国民党势力的消灭，而是由国民党来担任台湾方面的建设工程。至于五十、一百年后的事，浪淘沙去，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也不必考虑得太多的了。

三、今年六月间聚仁在北京和黄绍竑先生见过几次面，他的兴致很好。有一天，他参加了整风的座谈会回来，还写了一首词，那时，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发生。到了七月间，我已经离开北京了，在反右高潮中，北京的情况，只能得之于传闻了。尊处的议论，也和香港的论客说的一样，大部分接受了报纸刊物上的材料。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司马光说："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文，不只是敷衍其词，还有自圆其说之意。）纸片上的材料，自该审慎加以鉴别的。聚仁对于右派思想的看法，和中共当局的观点不尽相同。聚仁认为，四十以上的人，他们接受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要蜕变过来是不容易的，碰到了任何问题，本着下意识中的存储反应，用旧观点来应付新环境也是常事。这种旧观点不一定属于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还是士大夫的"老生常谈"。若说，民主政团人士怀有推翻目前政权，起而代之的打算，他们有了过去七八年的经验，决不会这么愚笨的。我看，除了头脑太简单的旧军人，说是把政治前途寄望于海外的势力，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四、聚仁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承认中共担当建国的总工程师，我们不仅要断了"再革命"的念头，而且要帮着消弭海外那些存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我们不要期待国际间大变动的局面，即算世界大战不能避免，我们也要争取一个与民休息的建设机会。聚仁以为我们的心理上，似乎不妨这么说：中共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可以帮助中共来求进步的。

1月14日，W君又来香港，向曹聚仁传达了G氏的几项重要建议，嘱托他入京取得谅解。W君据此推断："台湾海峡问题，在今后一年中，将有决定性演变。"以下是W君告诉曹聚仁台湾方面的一些近况：

一、严家淦在华盛顿接洽增加经济援助款项，并无结果。美方

口头允诺在国军贷款项下保留优先权，也只算是空洞的允诺。严氏在美时期，美国朝野情绪紧张，也不及照顾台湾问题。依严氏所得暗示，美国势必听从西方国家共同意向，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华盛顿方面本来想把中共参加联合国与美国承认中共分成两件事。目前，美国当局受朝野舆论的压迫，非承认中共不可，这就对台湾当局有了事实上的困难。因为美国承认了中共，便非触及第七舰队的撤退问题不可。

二、兰钦大使临别前夜，曾与老人密谈了三次。据称兰氏以友谊地位作表示：台湾对美国的依赖心不可过深，因为美国不能不考虑西方友邻的远东政策，同时，本身困难重重，在万一情势下，只能改变这几年来勉强支撑的远东政策。（美国民主党所不同意的外交政策。）兰氏认为两个中国如不能实现，美国只能放弃台湾了。兰氏在台湾日久，他也知道两个中国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共太强大了，台湾又太弱小了，对称不起来的。兰氏暗示：杜勒斯到台北，将传达华盛顿方面的最近决定，也要和台湾当局研讨这一问题的。

三、G 氏表示：大方向，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是不会变的，嘱聚仁转陈京中友人，尽可放心。①

曹景滇女士公布的这几则史料，均有明确日期而无年份。根据材料内容、曹聚仁大陆行程及相关史实，可以断定：上述 1 月 14 日 W 君来港是在 1958 年，其他均为 1957 年。在这些材料中，曹聚仁用代号指称几个重要人物。其中，与曹联络的 W 最为关键，他的身份明确了，其他代号所指便迎刃而解。据罗青长、徐淡庐和曹聚仁在澳门的妹妹曹守三等回忆，W 为蒋经国赣南新政时的亲信王济慈，与曹聚仁本来就十分相熟。因此，材料中提到的“台从”、“台座”、“G 公”、“G 氏”为蒋经国，“老人”为蒋介石，则是无疑的了。实际上，曹聚仁所设的谜局并不隐晦，只要知悉相关史实，就能对其所言会然于心。

把各种线索贯穿起来，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

---

① 曹景滇：《拂去历史的烟尘——让真实的曹聚仁从后台走出来》，《新文学史料》2000 年第 4 期。

1950年7月，在上海“观变”的曹聚仁因生计所迫和“精神恐惧”，经中共默许，南下香港另谋出路。1956年，他申请回大陆采访，中共起初怀疑他是台湾方面的“探子”，但是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周恩来遂将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向告诉他，借助他的健笔在海外传播中共的政策。估计曹聚仁曾向周恩来等表态，愿做两岸沟通的桥梁，所以周恩来、陈毅、邵力子等频频会见他，所谋应该多与国共和谈有关，其中筹划的方案之一是让蒋经国和陈毅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①]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在大陆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写信转告台湾的蒋经国。当时香港的《真报》报道：“几个月来，传说中国国民党和红色中国将会和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远东。在香港，谣言集中于记者曹聚仁的头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对国民党。在国民党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前，他认识国共双方的许多显要人士，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书。他相信一个道理：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后的事情是国民党和中共谈判而得到一个解决。他从北京方面得到讯号，就写信去给台北的蒋经国，信内说：‘在这一紧急时间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他要求蒋经国派出一个彼此熟悉的人士来香港，他呼吁说：‘不要让这时机溜了过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写一封信，催促说：‘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沉寂，他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相信这则消息的源头正是曹聚仁本人，否则外人绝无可能知悉他先后三次给蒋经国去信的内容。[②]

蒋氏父子终为所动，派王济慈来到香港，托请曹聚仁再回大陆游历，写出综合报告以资定夺，并特别托付曹去庐山、溪口看看，拍成照片呈览。于是曹聚仁1957年5月再度北行，把蒋氏父子托请之事告诉了周恩来。北京方面遂派徐淡庐陪曹氏夫妇做东南之游。徐淡庐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秘密身份是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曹聚仁对徐淡庐的秘密身份可能并不知情。

---

① 曹聚仁1972年1月12日致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信中，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之事。但后来不知何故，陈、蒋川石岛密晤之计划并没有实现。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②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9页。

其间大陆爆发了“反右”运动，曹聚仁7月14日回香港后不知道蒋氏父子的意向有没有变动，综合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只写了一封简函，连同几幅照片寄给了台湾。7月23日，王济慈从台湾电告曹聚仁：蒋经国嘱其耐性，他即来港面谈。7月27日，王济慈果然来到香港，告诉曹聚仁：蒋介石看了他拍摄的照片，知道“庐山风景依旧，溪口花草无恙”，非常高兴，嘱托他以后多向大陆巡游，了解情况。蒋经国认为，鉴于大陆现在的局势，应该坐待变化，和谈虽未成熟，希望依然很大。至于详细的报告，台湾方面还是需要的。曹聚仁遂于当日给蒋氏父子写了大陆之行的综合报告。

估计蒋介石看了曹聚仁7月27日的综合报告后，颇为赞许，亦有疑问，遂派王济慈于9月23日再次来港，转达奖惜之意和问讯之事。王济慈告诉曹聚仁，陈诚在台湾与蒋经国争权，彼此很难折服，所以和谈最好在老蒋生前进行，否则就很难了。曹问及蒋经国能否派人到北京去试探，王说人是一定要派的，不过老蒋还在迟疑，以为不要太露痕迹。

台湾方面迟迟不见动静，曹聚仁担心夜长梦多，询问蒋氏父子是否有新的意向。王济慈于12月11日来香港与曹聚仁会面，告诉他小蒋的情绪近来不错，也看不出老蒋有什么大的变动。曹聚仁认为王济慈的政治嗅觉不够敏感，于是“再答老人问”。1958年1月14日，王济慈又来香港，向曹聚仁传达了蒋经国的几项重要建议，嘱托他入京取得谅解，并托他转陈京中友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台湾方面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尽可放心。王济慈还不无乐观地对曹聚仁说：“台湾海峡问题，在今后一年中，将有决定性演变。”

不料，台海局势于1958年夏突然紧张。7月17日，台湾当局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发布特别戒严令，并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美国也下令驻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处于战备状态。毛泽东遂决定炮击金门、马祖，以试探美国对台海的政策底线。据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回忆：“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金门炮击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①] 曹聚

①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仁遂于炮战开始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轰动世界的独家新闻。罗青长回忆说："金门炮击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①

看来，毛泽东事先向曹聚仁透露炮击金门的"天机"，是让他转告台湾，并非是让他提前见报。不过，多年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却说："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要做防备工作也来不及了。让我们的大记者更出名也好。"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旨在提升曹聚仁"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层保有联络"的知名度，增加其做对台工作的权威性，也向台湾示意：中共的重大举措光明磊落，炮击金门之事已先行通报，勿怪言之不预；同时期冀曹氏日后向台湾解释中共之真正意图，勿使台湾方面的理解产生歧义，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之诚意未变，炮击实出于被迫无奈，是为了"以战促和"，并非重回"武力解放"方针。②

中共8月23日中午开始炮击金门，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译作杜里斯）发表声明，暗示愿同北京重开谈判。杜勒斯的声明证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预判完全正确，即美国不一定敢在金、马与共产党中国进行军事较量。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海地区的严正声明，等于是对杜勒斯声明的回应。9月15日，中美在华沙恢复去年12月中断的大使级谈判。迫于中共"边打边谈"的方针，加上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美国没有保卫台湾沿海岛屿的任何

---

①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7页。

②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6～107页。

法律义务，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杜勒斯之意，美国想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换取长期霸占台湾，即造成“两个中国”。美国此举，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美蒋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为了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6日1时起，停止炮击金门七天，允许蒋军自由地运输补给品，但要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开宗明义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之间的战火”应当停止，并予熄灭。但是，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前一天，曹聚仁又用“郭宗羲”的化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传北京同意短期局部停火，避免两败俱伤，国共双方酝酿直接谈判》的独家报道。对曹聚仁此举，毛泽东、周恩来都很生气。10月11日，毛写信给周：“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斟。”周恩来让费彝民转告曹聚仁：“三年之内，我不会见他了。”不过不久都还是见了他，批评自然是在所难免。一年后的10月24日，周恩来接见曹聚仁，还当面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①] 原来，停止炮轰金、马的消息是陈毅透露给曹聚仁的，据徐淡庐回忆：“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的金门炮战消息，是陈毅跟曹聚仁说的。陈毅对他透漏了一点中美谈判的消息，他马上出去发电报到《南洋商报》。……陈老总不应该这样的，但我们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告诉他金门炮战的消息。”[②]

在1958年8月至10月台海关系紧张期间，曹聚仁频繁往返于京港之间，为北京和台北传话。据童小鹏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和《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曾于1958年8月、10月13日两次会见曹聚仁；周恩来会见他则有四次之多，日期分别为9月8日、10日，10月15日、17日。他给前妻王春翠的信中也说：“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1958年7月初，北京叫我不要回去，可是到了18日，又叫我40分钟内动身，我什么都方便走了。”[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②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8页。

③ 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百年潮》2000年第5期。“我什么都方便走了”这句话有语病，原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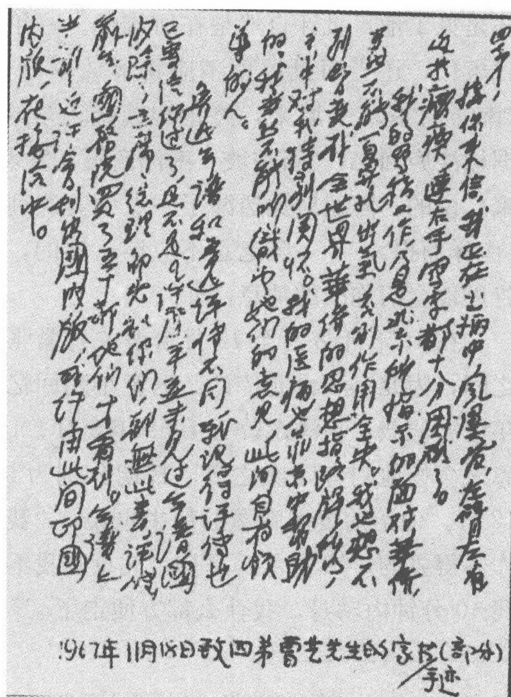
1959年11月以后，曹聚仁没有再回过大陆，但在海外依然为两岸和平统一做着工作，这可以从他写的家信中看出端倪：

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国家了。（11月1日致曹艺，缺年份）

我的出书，也是配合京中的意思，向海外宣传的；我的报导，比较客观一点，在海外影响较大。……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0月20日致曹艺）

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京中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这5年来，自从中苏有了破裂痕，那边的主



1967年11月18日曹聚仁致四弟曹艺家书手迹（部分）。

意也改变了，真的以为鸿鹄将至了呢。我的惟一贡献，就是要那边莫乱动。目前情形，当然不同了，我们有了原子弹，中苏也恢复和好了，那边不会动了。要回国也可安心了。你想，我若回国，那边动了，我怎么说？（11月12日致曹艺，缺年份）

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是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1971年7月28日致曹雷）①

一位号称“王方”的人，在曹聚仁去世后撰文，说曹生前曾向自己透露：1965年7月18日，蒋经国秘密乘船从台湾来港，将他接到左营，然后乘飞机抵达日月潭。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官邸接见了曹聚仁。整个商谈过程只有蒋氏父子和曹聚仁三人。开始先由曹介绍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蒋氏父子逐条研讨，最后达成了六项条件：（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① 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百年潮》2000年第5期。

曹聚仁满心欢喜回到香港，将台湾之行及六项条件报告北京，只待北京同意后台湾方面再派代表作进一步谈判，祖国统一大业即可实现。不料次年大陆爆发“文革”，蒋介石也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就此搁浅。[①]

曹聚仁是否秘密去过台湾？说法不一。罗青长回忆，曹聚仁曾连篇累牍地将去台湾和蒋经国见面的经过、谈话的内容，用复写纸写成报告向北京汇报。[②] 曹雷在《父亲原来是密使》（连载于1998年3月8～10日台湾《联合报》）一文中，也说曹聚仁曾到台湾与蒋经国密谈。夏衍则说，曹聚仁是否去过台湾，他不知道，但周恩来总理曾经对自己说过，曹聚仁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周总理为此还评价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自视过高，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这是好的，但是他还是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他将来是会碰壁的。[③]

台湾方面却声称绝无此事。1998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马树礼写信说：

> 有一件事，我愿在此澄清一下：聚仁兄女公子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曾在此间《联合报》连载三天，内容详述聚仁兄曾以密使身份，为两岸和谈问题出过很多的力，并且还到台湾与蒋经国先生密谈，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第一，据我了解，外间所传两岸透过什么人谈和的事都不是事实。第二，经国先生到台湾后，对大陆上他的所有朋友、部属的来信，他一概拒收，从来不看。来台后经国先生的机要秘书萧昌乐先生告诉过我（昌乐兄后来和我多年同事），聚仁兄确有几封信给经国先生，但是经国先生并没有看到，因他已奉命把所有的信都毁了。尤其那一篇文章里说聚仁兄怎样和经国先生在台湾的日月潭见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文中说坐渔船到左营，从左营飞日月潭，也绝非事实，因左营、日月潭两地均无机场可供起落。记不得是那一年，好像那时他已到澳门住了，我

---

① 王方：《记一次中国统一的秘密谈判——纪念曹聚仁》，《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第4期。

② 柳哲：《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碑文》，1999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

③ 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页。

忽然接到聚仁兄一信，信里隐约的含蓄的谈到个人前途问题，但并无一字提到经国先生，我把原信送给经国先生看，后来经国先生在见面时口头告诉我，信是看到了，他要我不必回信，他也没有把信退还给我，可能是毁了，不然倒是今日最好的纪念品。①

曹聚仁是否去过台湾，并与蒋氏父子达成所谓的六项条件，尚需有力佐证，但马树礼所说的蒋经国到台后一概拒绝收看大陆朋友、部属的来信，就有点掩耳盗铃了。试想，一直高喊“反攻大陆”的蒋氏父子，能无视来自大陆的所有信件吗？蒋氏父子与曹聚仁1957年后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只是马树礼不知情罢了。

无论如何，曹聚仁曾经为两岸和平统一而奔走，则是无疑的了。那么，他充任的又是什么样的政治身份？

女儿曹雷在看过父亲的部分遗稿和家信后，恍然大悟：父亲原来是北京的“密使”。② 司马璐则认为，曹聚仁不过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和用来作统战宣传的工具，中共利用他在《南洋商报》的影响力，对台湾释放政治气球，根本谈不上什么“密使”，而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类典型：“他是文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他既不安分，又害怕政治；他介入政治，又不负责任；他充当别人的政治气球，又自以为得意。”③ 还有人说曹聚仁是台北的“特使”。

对于加给胞兄的这些“头衔”，弟弟曹艺都不认同。曹艺认为，曹聚仁以一个海外孤臣“灯台守”的心情，奔走海峡两岸，呼吁祖国统一，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心甘情愿，为民族利益尽一个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并非台北的特使，也非北京的密使。④

香港资深传媒人魏承思曾对“密使”、“特使”做过这样的界定：“密使者，秘密使节之谓也，既非游侠，亦非间谍。他们通常获得国家政府的授意与授权，携带秘密使命，前往无正式沟通渠道之阵营，进行特定

①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9～100页。

② 曹雷：《父亲原来是密使》，1998年3月8～10日台湾《联合报》。

③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4页。

④ 曹艺：《现代东方一但丁——追忆先兄曹聚仁南行往事》。转引自魏承思著《两岸密使50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4页。

的接触、对话、协商。密使之使命，与特使略同，是一种完成特定任务的临时角色；其区别只在密使的任务与行踪是秘密的，特使也可授予秘密谈判之权力，但其任命与行踪公开。……密使之使命，与特使也有所不同，密使往往只是一种试探、传话的管道，有时更可能是玩弄权谋的欺敌策略。”[①] 若以此论，目前公布的材料，还不足以称曹聚仁为“密使”或“特使”。如果非要给曹聚仁冠以“×使”名号的话，秘密“信使”可能更符合他当时充当的角色：在国共两党之间传话送信，牵线搭桥。不过，他这个“信使”或者俗称的“媒婆”，偏向中共一方则是无疑的。这种偏向，当然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以及对共产党的了解：“我是南来以后，明明白白表示绝不‘反共’的。我认为了解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政策，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知共’的。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们自该‘亲共’，所以，我在情绪上也不‘反共’。”[②]

曹聚仁所从事的这种工作，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1958 年 8 月金门炮战发生后，证实了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提前发表的独家新闻的准确，各国驻香港的情报机关，纷纷找他进一步了解情况，害得他数次搬家。为安全起见，周恩来指示在港澳为曹聚仁安排了多个住处，他不得不过着“狡兔三窟”的生活。同时，他还受着左右两边的误解而不能辩白：香港报纸说他是大陆派驻香港的统战分子，国内文化界却骂他是“反动文人”，直到 1980 年代初，秦似还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的诗句，将他与汪精卫相提并论。再者，他必须忍受无边的孤寂。老病之人，有家难回，在孤岛上过着“灯台守”的生活，思乡一念，百感丛生，自称绝不爱流泪的曹聚仁，有时也禁不住怆然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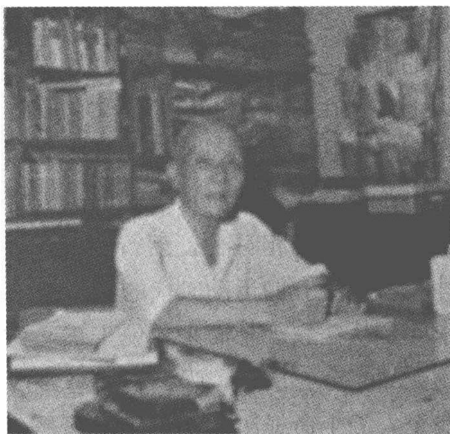
是什么动机和目的，驱使曹聚仁请缨担任国共之间的秘密信使，为此长期忍受着危险、误解与孤寂？有人认为，想当然地充当统战“媒婆”的曹聚仁，最为根本的愿望，就是从中共当局那里捞取足以养老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资本。[③] 这种纯粹功利性的解释，显然带着很深的政治偏见。说曹聚仁没有一点名利心，也不符合事实，他给女儿曹雷写信，还说自

---

①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 50 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3 页。

②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第 402 页。

③ 张耀杰：《曹聚仁的“南来”与“北行”》，《传记文学》（台湾）第 91 卷第 1 期，2007 年 7 月出版。



1960年代末曹聚仁摄于香港宅中（时大病后）。

己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呢。[①] 人生出处方面，曹聚仁说自己跟陈望道师一样，“是一个不敢和现实政治太接近的人，但又是不甘于寂寞的人。”[②] 所谓“不甘于寂寞”，就是不甘心湮没无闻、声名不彰吧。“好名”乃读书人通病，报人张季鸾曾说：不求权不求财，是士人常行，容易办；不求名，却不甚容易。[③] 在香港大坑道与曹聚仁结邻而居的李雨生回忆：曹日常谈话中最喜欢谈起的人，依次为马树礼、蒋经国、夏衍、周总理；最得意的话题有两个，一是当年在赣南“经国”称他为“曹先生”，一是他和周总理在昆明湖上三小时的话旧。可见，曹聚仁也有“好名”的通病。顺便提及一下，曹聚仁对外声称的香港“大坑道二十五号四楼”住址，李雨生说这幢房子实际上只有三楼，曹住的乃是在天台上草草盖成的两个很小的房间。里间放床，算是睡房，外间放书桌，聊作书房。两个房间除了床和书桌之外，到处都是用炼奶箱搭成的书架，上头塞满了书。这幢房子的天台颇大，除了“四楼”之外，还有不小的地方，曹就买了两个大皮蛋缸回来，自己做咸酸菜。[④] 由此看来，曹聚仁在香港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曹聚仁在给蒋氏父子的报告中曾说：自己是从“道义”上，“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惜献身；自己也决不考虑个人出处问

①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264页。
②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③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社评。
④ 李雨生：《哀曹聚仁》，《新闻天地》（香港）第1279期，1972年8月19日出版。

题，事成之后，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老其身。[①] 我们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国家民族至上，天下兴亡在肩，这是我们的文化血脉，“线装书读得很多”的曹聚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他曾经与父亲梦岐先生进行对比，来剖析自己的文化性格：梦岐先生是浙东学派的后起之人，一生走的是程朱的路子，和北方的颜李学派相符合，躬行实践，敢于担当；自己反孔孟，反程朱，反礼教，属于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但“优柔寡断，赋性懦弱”；梦岐先生的学问，从儒家观念而来，偏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自己的学问，偏于格物致知，穷究事理，强调公民修养，以争取平等自由为目标。因此，“从我个人的生命根源来说，我永远是我父亲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永远是先父的叛徒。”曹聚仁说，父亲在个人修养上，总脱不了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国士大夫，凝集在宋明理学所提倡的修齐治平的大道；却是要知道稼穑之艰难，懂得民间的疾苦；修齐只是工夫，而治平才是目的。穷而独善其身，乃是不得已而处之；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善天下，这才是行其道的大抱负。”[②] 一个人总是土地与时代的儿子，曹聚仁虽然说自己是父亲的“叛徒”，但也承认永远是梦岐先生的儿子——不仅是生命血缘上的，也是文化血缘的儿子。

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类似于意大利诗人但丁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那一方看得重要些。”但是，但丁后来为谋求国家统一而努力了。曹聚仁常以但丁自况，要走他的路子。“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那份乐观了的念头，又渐渐地褪了色；到了后来，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中，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歧途的心境，何去何从？简直无法肯定。”[③] 在 1949 年

---

① 曹景滇：《拂去历史的烟尘——让真实的曹聚仁从后台走出来》，《新文学史料》2000 年第 4 期。

②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33、47、61、68 页。

③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上），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 页。

的大变局中，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出路抉择，恐怕是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曹聚仁既没有选择国民党，也无所谓选择共产党，而是利用自己“国共两党中，只要榜上有名的人，几乎都认识”的人际优势，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奔走，竭尽心力。老朋友夏衍说，曹聚仁的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他的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而“知兄莫若弟”，曹艺说哥哥曹聚仁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心甘情愿，为民族利益尽一个书生之责。

“书生”一词大约有三种含义：“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虚浮的“文人”。曹艺说哥哥是书生报国，显然是指第一种含义。周恩来曾经对夏衍说，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自视过高，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将来是会碰壁的，似乎是指曹有些天真、虚浮。不过，周恩来当时在夏衍面前这样评价曹聚仁有这种可能：搪塞话题，不让夏衍与闻曹聚仁的真实身份和从事的工作。

曹聚仁一生著述4000余万言，有六七十种著作行世，是不折不扣的读书人。但是他从不自期为文人，认为文人容易成为“依附统治阶级为生的废物”，非卖身投靠无以安身立命。曹聚仁也绝对不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从以下几则对并世风云人物的月旦，可见他的知人之深切，论世之精辟：

> 在草山老人（蒋介石）左右，当年黄膺白（郛）、吴稚晖、陈景韩在世时，总还在师友之间，在老人面前，可以说一个“不”字。到了张季鸾、杨永泰时期，总还是老人的朋友，可以有所献替。至于陈布雷、邵力子，总还像个幕僚，可以知无不言。陈布雷自杀，邵力子离去，老人左右，只留下陶希圣、张道藩这几个奴才，那才胁肩谄笑，只以迎合老人心理为自满自足。于是老人的江山也就断送在他们手下，穷居草山，日暮途穷了。替他（张道藩）祝寿的人，居然说：“谋国老成寿至计，心关忧乐系苍生”，难怪当年满朝文武替魏忠贤称圣了！不禁为之三叹！[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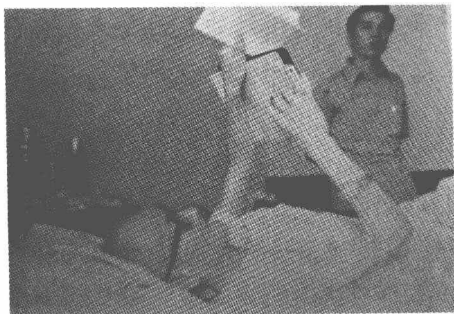
① 曹聚仁著：《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144页。

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很注重一个人的阶级成分。若就经济成分来说，毛（泽东）氏之出于贫农家世，与蒋（介石）氏之出于贫农家世，可说是一样的。毛氏自幼便受了理学空气的熏陶，他是理学大师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是受了曾国藩思想的影响，组织了船山学社。后来，从理学圈子中跳出去，才成为笃实的激进分子的。这和蒋介石到了当权以后，才钻入名教圈子，捧出曾国藩的招牌，刚好是倒走了一段路。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陈英士的革命倾向，颇有关系；他是从上海交易所接受了现实主义，一切理论，一切行动，一切价值，都是此时此地主义；因此，他的政治活动，就在这一尺度上表现出来；若干方面，和共产党的言行颇相符合；所不同者，蒋氏偏于个人英雄主义，共产党则是集团主义。……依我的看法，歌颂曾国藩的政治道德的蒋介石，他的言行，最不合于曾门的作风；而表面最反对曾国藩的毛泽东，他的言行，却是最合于曾国藩的规范的！此知人论世之所以最难于着笔的。……毛泽东更多一点书生的气味，蒋介石便多一点商贾的成分；毛氏的作风，比胡汉民还更接近孙中山，蒋氏倒是离得远；而毛氏却自承马克思的道统，蒋氏乃自负为孙中山的信徒，这都是政治圈子中最有趣的闹剧。①

我们知道国民党的三个领袖，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他们各有各的作风。和汪精卫谈话，只有他说的话，没有我插嘴的机会；和蒋介石相对，只让我们说话，他只是摸着下巴用“嗯嗯”、“好好”来作休止符。只有和胡汉民相对，才是你说一半，他说一半。评论当代人物，即以此为短长的尺度。毛泽东呢？既不是汪精卫型的，也不是蒋介石型的，也不是胡汉民型的；他就是和你谈正经大事以外，还有和朋友谈闲天的风度与兴趣。你可以和他去抬杠，正如胡汉民可以和孙中山去抬杠一样。此所以汪精卫、蒋介石永远没有真

---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61～62页。



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躺在病床上，利用手写板悬腕撰写回忆录。

正的朋友，而毛泽东倒是可以成为许多人的朋友的。[①]

照目前情势看去，中共那个仙境，是会有一座神龛的。那神龛中，坐着两位尊神：一位是已经逝世了的鲁迅，一位是还活着的毛泽东。正如列宁与高尔基一般，政治是毛泽东的时代，文艺则是鲁迅的时代。[②]

曹聚仁极力拉拢、撮合，但遗憾的是，“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直至他去世也不曾重开和谈。这不是书生太天真，而是政治太诡谲。

1972年1月12日，缠绵病榻的曹聚仁致信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还为自己没有能完成国共和谈这件“不大不小”的事而感到歉然：

弟长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了，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可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返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完成这不大不小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的已经是行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这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以下有三字不清）

①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66页。

②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第376页。

> 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经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近于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系，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1]

5月，曹聚仁从香港移居澳门的妹妹曹守三处，住进澳门镜湖医院治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左手高举垫板和稿纸，右手悬腕儿书写他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然而，多年自认为的“风湿”被确诊为骨癌，病入膏肓，良医束手。6月20日，夫人邓珂云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匆匆赶来澳门，陪他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离开了他的“世界”，享年72岁。临终时，陪伴在侧的邓珂云不断听到他喃喃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向周总理说。”[2] 7月26日中午，港澳亲友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费彝民主持并致了悼词。遵遗愿“化骨成灰”，由家人带回上海，暂厝于龙华殡仪馆。后葬于南京雨花台，与母亲长眠一处。不久墓地被征用而移至望江矶。1998年春，子女将其骨灰迁回上海，与1991年去世的夫人邓珂云一起葬于上海福寿园，“灵魂”终于有了安居之所。墓碑之上，镌刻着一首他生前最喜爱的自作诗：

> 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
> 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

① 转引自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2页。

② 曹雷：《常常的怀念》，1980年7月22日香港《新晚报》。

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

——成舍我与《世界日报》

「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斯人为报纸而生

成功的所以然

报界硬汉，新闻斗士

报人问政

岂傍他人论短长

「最是仓皇辞庙日」

主持香港《自由人》

八十到头终强项

“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1945年9月5日，成舍我将重庆《世界日报》交给老朋友陈云阁负责，自己以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陪都记者团”，乘一架军用专机飞南京，准备采访次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典礼。陪都记者团一行十余人，除成舍我外，还有《大公报》的徐铸成、金诚夫，《新民报》的张友鸾，《中央日报》的卜少夫，以及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陈训悆等，都是新闻界响当当的人物。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突然结束，使敌我双方都显得手足无措，战后事宜的处理杂乱无章，很难一下子理出头绪。当陪都记者团一行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时，场内除有盟军和我军的飞机外，竟然还有日本飞机不时来去，运送着日本人和他们的行李。南京市区各街口，仍然站有持枪警卫的日本宪兵。这一切使胜利归来的成舍我颇感怪异。

到南京后第一餐饭在夫子庙六华春，是朋友为他们接风洗尘的。成舍我不愧是记者出身，特意记下了这顿晚饭的菜单和价格，与重庆的物价进行比较。主客一共有六位，烟酒俱全：黄酒二斤，炒虾仁，红烧头尾，清炖鱿鱼，炒蟹粉，香妃鸭，神仙鸡，白饭六客，大前门香烟两包，黑白瓜子各一碟。主人特别说明了点菜用意：客人在重庆八年营养太差，所以鱼肉特多。酒醉饭饱后主人埋单，共消费伪币32万6千元。“我等初看帐单，吓了一跳，及主人以法币折付，每法币一元合伪币二百元。拿出五十元关金票两张，除正帐合法币一千六百卅元外，余数悉赏茶房，茶房千恩万谢，视我等为阔客”。成舍我离开重庆前，和两个朋友吃小馆



1945年9月5日，从重庆同机飞抵南京参加受降典礼的成舍我（前左）、陈训悆（前右）、李荆荪（后左）、卜少夫（后右）。

子，每人要了一碗面和四个汤圆，两张关金票，几乎不能出门。两相对比，南京的物价比重庆低落得多，真使人“乐不思蜀”。“惟如此享受，预计决难持久，因长江航运一通，人口增加，物价即必将突飞猛涨也。”

晚饭后，成舍我、陈训悆、李荆荪、卜少夫四人，在夫子庙庐山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照，作为重回故都的纪念。

南京的各大旅馆，都已经由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统制、管理，而指挥所门禁森严，匆促之间无法接洽，当晚是无望入住了。幸亏经陈训悆多方设法，陪都记者团成员才在国民大会堂摊地铺过了一夜，否则只好睡马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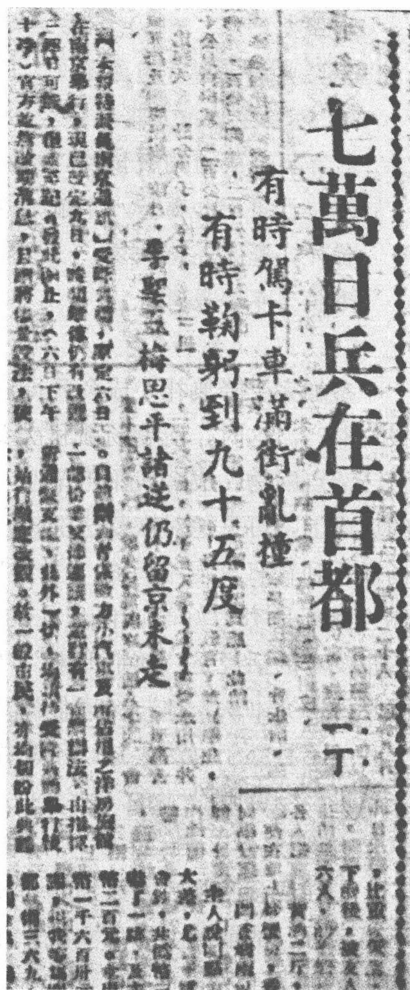
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受降典礼推迟到9日。6日晚上10点，成舍我用“一丁”笔名，向报社发回了来宁后第一篇“本报特派员南京通讯”——《七万日兵在首都 有时驾卡车满街乱撞 有时鞠躬到九十五度》，详细记述了自己初到南京的观感。除了上述的吃、住情况外，他还在这篇通讯中向大后方读者讲述了一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 日兵虽仍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但对我国官民，已不敢再如过去之凌辱侮慢，遇有交涉，常较九十度之鞠躬，更加五度。数日前，抗日专家龚德柏氏，与顾毓琇同至鸡鸣寺附近我战前所设之博物馆巡视，行时面告侵扰该馆之日人，妥为保管，不得妄有遗损。讵龚等甫行，该馆日人竟迁怒华籍阍者，谓不应引人入内，掌阍者颊。阍者奔告龚等，龚乃返觅此掌颊之日人，责其凶悖，并即以同样方

法，掌此日人之颊，此日人不特未敢抵抗，且作九十五度之鞠躬，自认无理。龚谓吾人本不愿如此，但曲先在彼，若仍予容忍，则在此受降典礼未举行前，彼或以我为可欺，对我同胞，肆其侮辱，此则不得不先予惩戒，亦略施薄惩之意也。[1]

9月9日上午九时正，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总司令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第一号，面交日军冈村宁次大将，冈村宁次签字接受。作为记者，成舍我见证了中国人浴血八年迎来的这一历史时刻。受降典礼一结束，他即向重庆《世界日报》发回了一条专电，标题是《签字完毕时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历史上可称“四九”纪念》：

【本报南京九日上午十时专电】受降典礼除中央社所报告外，可注意补充者：（一）签字系于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九分完毕，在历史上可


七萬日兵在首都

有時駕卡車滿街亂撞

有時鞠躬到九十五度

一丁

岑聚五梅思平諸逆仍留京未走

1945年9月9日重庆《世界日报》刊登的“一丁”通讯《七万日兵在首都》。

[1] 一丁：《七万日兵在首都　有时驾卡车满街乱撞　有时鞠躬到九十五度》，1945年9月9日重庆《世界日报》。

> 称四九纪念。(二)双方签字均用毛笔签名盖章,冈村签字所用之笔,典礼完毕后遍寻不见,盟邦记者有欲得此笔作纪念均感失望。(三)签字均用正楷每一名字签毕均约费三分钟至四分钟。(四)冈村等面部表情均极悽冷,有一人泫然欲涕。(五)何总司令精力充沛,严肃而和蔼,八年前记者曾与其同乘长兴轮离京,今除额发稍稀外,毫无苍老之象。某外记者语余,何在盟邦最高将领中望之,恐将为年龄最青者。[1]

参加完受降典礼,成舍我即赶赴上海,收回被日伪占据的上海《立报》财产。这时,前妻杨璠和次女幼殊也在上海,他就让女儿过来帮助自己清点财物。成舍我用毛笔竖写了"立报"两个大字,贴在报馆大门的玻璃上,可见他对恢复这份曾经名扬上海滩的"小型报"充满着期待。杨璠看到昔日夫君手写的"立报"这两个字,还感慨地对女儿幼殊说:你爸爸真是努力好学,他现在的字写得这么好了。[2] 成舍我文思敏捷,用张友鸾的话说是"摇笔即来","落纸如风"。不过,书写速度快了,就顾不得讲究书法,他与杨璠仳离之前,不少文书都由杨璠抄正。但是成舍我总不甘心于书法欠佳,不断揣摩改进。数年不见,成舍我的书法突飞猛进,令劳燕分飞的太太慨叹不已,正应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古训。

正在成舍我紧锣密鼓地筹备复刊上海《立报》之时,股东们却决议不再续办。战前的上海《立报》集股而成,不是成舍我独资创办,股东们不愿再办下去,他也无可奈何。办完上海《立报》的转让手续,[3] 成舍我随即飞往北平,着手恢复真正属于自己的北平《世界日报》。

北平《世界日报》自1937年被日本人劫收之后,已经两易其名。第一次劫收的是日本浪人武田南阳。武田做了社长后,第一年用的还是《世界日报》名义。后来,汉奸王克敏帮着日本人搞"新民会",就把

---

① 1945年9月10日重庆《世界日报》。

②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③ 上海《立报》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发行人严服周,社长陆京士,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CC系潘公展的报纸。

《世界日报》与《华北日报》合并，改名《新民报》，作为伪"新民会"的机关报，社长仍是武田。直到1944年，武田因受另一派排挤，被迫辞职，《新民报》又改名为《华北新报》。抗战胜利后，《华北新报》被国民政府派人接收。实际上，《华北新报》的大部分资产就是原来北平《世界日报》的资产，也就是成舍我的私人财产。

成舍我在上海时，就听说各地接收情形相当混乱，曾写信给主管接收北平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说：对外抗战，民间报纸，为国家而牺牲，这是理所当然，无足顾惜。而今最后胜利既已到来，我们办民间报的，自然仍回到民间去，以自己的血汗，恢复自己的事业，不要国家一文津贴或变相津贴，不要别人一草一木，只要收回日本人夺去的资产。如果报馆被日本人抢去以后，现在又被我们的政府抢去，则自己一息尚存，是必然抗争到底的。到北平后，成舍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当初抢自己报馆的武田南阳是否仍在这座城市。还好，武田尚留在北平。在查明武田的详细住址后，成舍我立即派人向他查问没收《世界日报》及将报馆交给《华北新报》的前后确切情形。武田提供了一本没收《世界日报》时的财产清册和一本移交《华北新报》时的财产清册，并另外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现有《华北新报》的资产来源。得到这些财产清册和证明信，成舍我喜出望外。政府原来借口无法分辨《世界日报》的资产，实际上是不想发还。现在有了这些证据，成舍我向北平接收文化机关的主管人多次交涉，终于收回了一部分资产。[①]

1945年11月20日，在遭受了八年零三个月的厄运后，《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终于在北平西长安大街32号原地复刊。战前报社办公楼是租用他人的私产，现在成舍我干脆花了五万大洋把它买为己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成舍我亲自为报纸撰写了长篇复刊词，以自己30年来的办报遭遇为例，向读者倾诉"这一时代报人"的"幸"与"不幸"：

>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但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它创刊于民

① 成舍我著：《报学杂著》，中国文物供应社（台湾）1956年版，第158页。

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据，《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惨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我们虽曾遭受各种军阀的压迫，现在这些军阀，谁能再压迫我们？许多恶魔叱咤风云，这一个起来，那个倒去，结果同归于尽。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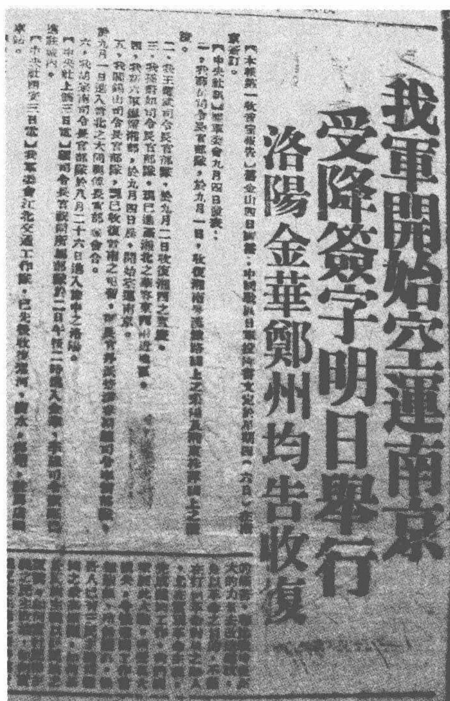
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民国二十三年（即一九三四年），因为反对汪精卫的媚日外交和包庇贪污，被他封闭了我的南京《民生报》，并将我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四十天；一面又电令他的北平同志，将《世界日报》也停刊三天。他无法定我罪名，也无法消除由此而起全国沸腾的清议，我终于恢复了我的自由。他的党徒唐有壬劝我：“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我很坚决地答复：“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我们的谈判，因此决裂，《民生报》被强制“永久停刊”。然而几个月后，我又在上海创刊了《立报》。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

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我举以上二例，并非故作快语，更无自我宣传之意。而且张汪两贼，势倾全国的时代，几稍有正义感的，哪一个报人，不恨张宗昌；哪一家报馆，不反汪精卫？我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

现在我以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不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原主。我为收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报纸器材，曾因小小波折，写过一封信给中央某部当局，我很率直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做报人的，没有饿死、炸死，已算托上帝保佑，心满意足。我不希望向政府要一官半职，也不向任何机关要一文半钞，更不想藉此机会混水摸鱼，抢他人一草一木；但凭自己血汗，辛苦经营得来的一草一木，可以掉头不顾被人没收，却决不能在自己政府之下，自动放弃，无故牺牲。”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中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报人！

经过八年抗战洗礼的中国，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正在向正义之路迈进。如何迈向正义之路？这是摆在每一位报人面前的重大课题。成舍我从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一时代的报人”今后应当担负的任务：

第一，中国现在虽已是全面胜利，列为四强之一，但无可讳言的，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在今日并没有整个消除，甚且



我軍開始空運南京

受降簽字明日舉行

洛陽金華鄭州均告收復

1945年9月5日重庆《世界日报》二版头条新闻《我军开始空运南京　受降签字明日举行》。

还更比以前严重。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对此危机，决不能有丝毫忽视，且正赖这种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始可使这种危机，归于消灭。不过，所谓超然也者，既不是一般人所悬想的，像两个车夫打架，警察出来，一人一巴掌；也不是不分皂白的和事佬，东边作一揖，西边作一揖。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息争排难，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以目前震动中外的国共纠纷来说，决非空洞敷衍写几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所能奏效。我们必须发动全国舆论，造成一种最大的力量。就当前形势，我敢放心大胆代替最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说，老百姓的一致要求，是“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假若现政府不能实现民主，肃清贪污，安定人民生活，而欲一手把持，天下为私，我们就要向政府革命；假若共产党不能从民主政治的正轨，争取政权，而仍私拥重兵，四出窜扰，尤其破坏铁路，奴役民众，使国家无法复员，人民无法还乡，自毁国家的地位，将八年抗战，牺牲无数千万生命财产换来的成果，化为乌有，我们就要请政府剿匪。革命不是做汉奸，剿匪不是打内仗，这是我们全国真正“超然”报纸，所应该一致确认的，也就是全国老百姓心坎上真正要说的话。我们如不将这一个最大前提决定，不明辨是非曲直，而只

想两面求饶，甚或因为怕现在被国民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革命”；怕将来被共产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剿匪”，这乃万分卑怯的可怜乡愿，决不配称报人，更不配称“超然”。我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去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有力量，任何党派，应该听主人的话，国共纠纷，自可得到解决，而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也就有从此消除之望。这是我们这一代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尽的责任。

第二，我们这一代报人，还另有一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前一个口号，我自始就没有怀疑过。至“建国必成”，则确实大有问题。不说政治纠纷，专从社会方面来看，假使我们一大部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像从前那样偷惰泄沓，贪污苟且，那么我们要建国，试问将从何建起？几十年前，李鸿章、张之洞那一班人，也未尝不想将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化国家，他们办过造船厂、枪炮厂、纺织厂等等，然而结果如何？哪一个厂不是弄得一塌糊涂？长官贪污，职工偷惰，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虚有其名。现在抗战胜利，中国要大规模建设，纵然英美盟邦，能供给我们几千万万的资本，最新最好的机器，然而国民心理不改进，社会风气不转变，我敢预下断语，他的结果，一定不会比几十年前李鸿章等的时代，胜过几何！旧官僚贪污，多少有点顾忌，目前大多数青年，一经做官，只要权势在手，开宗明义，就是怎样买汽车、盖洋房、换老婆。我们看看，抗战以来所谓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官营事业，有几件真有成绩？所以我们不谈建国则已，要建国，心理建设，其重要实远过于物质。我们必须将全国贪污苟且，偷惰泄沓的心理与风气，彻底扫除，然后才有物质建设可言。否则所谓建设，不过替若干新官僚，增加揩油发财的机会。至心理如何改造，风气任何转变，这一重大任务，除了教育以外，就完全落在我们这一代报人的肩上。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建国必先建设”，也正是这个意思。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应走的正义之路。归根结底，我们真不能否认这一时代的报人，确太幸运。国内军阀，摧残不了我们；国外帝国主义者，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现在还能挺起腰干，替四万万

> 五千万国民说话。我们要发挥舆论权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改造封建腐恶的社会。我们的任务是何等伟大，我们的前途是何等光明。眼前若干错综复杂的危机，只是黎明前暂时的昏晦。大家努力！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留下灿烂丰厚的资产。我们何幸而为这一时代的报人！在万千报人奋斗的行列中，我及每一世界日报同人，都愿发愤淬励，将永远追从先进，成为这行列中的一员！[①]

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人，饱受内外恶魔强盗的高压摧残，命悬一线，报历万劫，这是何等不幸之事！然而，在这篇复刊词中，成舍我并没有停留在仇恨怨艾之中，而是阐发了生为这一时代的报人“不幸中的万幸”：见证了正义战胜邪恶、公理战胜强权的过程；报人们通过对舆论“忠诚笃实”的反映，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在复刊词中，成舍我提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报人所应担负起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使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以真正超然的立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充分发挥舆论权威，要“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消除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转变社会风气，改造国民心理。“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留下灿烂丰厚的资产”。这样的立场、见识、襟怀、抱负，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唯有成舍我那一时代的报人，才会拥有！

---

① 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1945年11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复刊号。

斯人为报纸而生

成舍我原名希箕，又名汉勋、平，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8月28日生于南京下关。祖父成策达在湘军曾国荃麾下担任幕僚，携家眷宦居南京，成舍我遂出生在这个六朝故都。不过，在他出生前两年，祖父就过世了。成家家境本来清寒，没有田地房产，全赖祖父的薪俸维持生计。祖父去世后，家庭重担就压在成舍我的父亲成璧肩上。成璧性情耿介，虽然有一份差事，但是收入微薄，几乎“无日不为衣食所役，穷厄颠沛，殆非文字语言所能形似”。[1] 后因参加地方平匪有功，被保举获得九品候补，分发到安徽候缺。1900年，全家迁往安庆。成璧一直等了6年，才被派为舒城县监狱典史（典狱长），全家又迁往舒城。不料生活刚刚安定，舒城监狱在1908年秋天发生了一次囚徒暴动事件，数十名重犯冲破牢房，集体逃跑。成璧拼命与囚犯搏斗，被殴成重伤。按照清朝法律，囚犯逃狱分“越狱”与“反狱”两种情况：越狱就是囚犯穴墙而逃，多因看守人员疏于防范造成，由监狱典史承担主要责任；反狱是指囚犯结伙破狱而逃，有造反的意图，这是狱政上的问题，主要责任归于知县。舒城监狱发生的这次囚徒暴动事件，显然是“反狱”而非“越狱”。陆姓知县为减轻自己的责任，以重金行贿成璧，想把“反狱”改为“越狱”呈报上级，遭到成璧严词拒绝。但是后来陆知县仍按“越狱”呈报，并贿赂上海某报社驻安庆访员，徇私发布新闻，内容当然与呈文一致。成

[1] 成舍我：《先考行状》，1931年9月4日、5日北平《世界日报》。

璧在拒绝知县的贿赂之后即携眷回安庆，希望通过向上司面陈实情，洗刷冤屈。但是报纸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对自己非常不利。成璧正在申冤无门之际，恰好由朋友介绍结识了上海《神州日报》正式派驻安庆的访员方石荪。颇有正义感的方石荪，让儿子方竞舟撰写了一篇长文，寄到上海《神州日报》，详细报道了此事的真相。成璧的冤屈，也因此得到平反。

成舍我时年 10 岁，因为家庭困难还没有进过正规学堂读书，不过已经跟着父亲自学五年了。新闻记者能够颠倒黑白，也能够澄清事实、为人申冤，父亲的遭遇在成舍我幼小而早慧的心灵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这比任何教谕都有说服力。成舍我感念方竞舟为父亲仗义执言，又钦佩他能写文章，因此时相交往，两人结为了好朋友。那时方竞舟也才 20 岁左右，发现"成小弟"对作文很感兴趣，就常常向他讲解报纸言论影响社会人心、转移社会风气的巨大功用，并指导他就日常见闻撰写成新闻稿，经自己修改后代向报馆投稿。"从那时起，成先生就与报纸发生密切关系了。以成的心灵感受，深觉新闻事业，确为对人辩诬、白谤、改革进步，最具功效之事业，所以暗自惕励，愿以新闻工作，以终其生。"[①]对于成家的恩人又是自己的"新闻"启蒙老师，成舍我一直念念不忘。1990 年，他还对来台湾探亲的儿子成思危，提及 80 年前曾为成家申冤的方石荪父子，并说要请方石荪在台湾的后人到自己办的学校里做事。

1909 年，成舍我进入正规学堂——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就读。因为他刻苦好学，成绩优异，一年间从初小跳到高小，又直升初中。进入中学后，费用骤升，家庭无力承担学费、制服费等花销，成舍我不得已就辍学了。同时，父亲被派到凤台县任警察局长，全家不得不一块儿前往。

辛亥革命爆发，凤台很快被革命军光复，成璧失去官职，全家又返回安庆。当时安徽革命党成立青年军，成舍我报名投考，被招募入伍。后来，安徽都督白烈武解散青年军，把部分队员送往南京，编入黄兴的入伍生队，成舍我就自愿参加了。但就在船将要开走时，被父亲知道，及时赶到码头，把他从船上抓了下来。不然的话，他就成为职业军人了。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142 页。

成舍我南京没有去成，就在安庆待了下来，闲散无事就写稿子，投给报社。1913 年秋，他被安庆《民碞报》正式聘为外勤记者，新闻生涯由此开始。这一年，成舍我虚龄才 16 岁。从 1913 年开始到 1991 年病逝台湾，成舍我一直从事着新闻工作，生死以之，无怨无悔。即使在世界新闻史上，他也称得上是入道最早、“工龄”最长的报人，新闻战线名副其实的“老兵”。

在《民碞报》工作了一年多后，成舍我觉得报馆的政策不太符合自己的意愿，就主动请辞，与同事王理堂商议另办一份报纸。虽然已经呈请立案，但终因集资困难，这份名叫《长江日报》的报纸“胎死腹中”。成舍我在少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办报的尝试。

当时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革命党人。成舍我参加青年军时已加入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前后又参加过讨袁秘密活动，是当局注意的对象。为避祸，他远走沈阳，经朋友介绍进入《健报》任校对，不久升为副刊编辑。《健报》总编辑王新命颇欣赏成的工作能力，两人遂结为忘年之交。

1916 年元月，成舍我应革命同志之约返回安庆，计划创办一份报纸，以激扬国内逐渐高涨起来的反袁气氛。然而，报纸还没有办起来即被倪嗣冲下令逮捕。这是成舍我平生第一次坐牢。倪嗣冲嗜杀成性，有“倪屠户”之称，尤其对国民党员，抓住就杀，绝不手软。因此，成舍我这次被抓，实有生命危险。幸亏他与倪嗣冲的秘书长裴景福是诗友，经裴说项、担保，他仅被关押三天就放了出来。

安庆已非久留之地。成舍我获释后即前往上海，暂住在安徽革命党人设在上海的讨袁总部。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工作，他就以向各报投稿为生。“舍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笔名。因投稿关系，成舍我结识了《民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叶楚伧。叶聘他担任《民国日报》编辑，主编要闻版和副刊。可是《民国日报》只供伙食不付薪水，成舍我在编报之余，还得卖文来维持生计。这时，王新命也从沈阳亡命上海，卖文为生。王新命受到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的赏识，专门为该馆所出的《小说月报》编文章、写小说。成舍我就与王新命租房同住，一同过起了“煮字”生活。后来，长沙的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也加入了这个“卖文公司”。


1923年时的成舍我先生。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引起了成舍我进入大学读书的念头。成舍我是在上海认识的李大钊。李大钊对刻苦好学的成舍我颇为赏识，多次鼓励他，以后如有机会，应该再进入正规大学深造，前途将不可限量。1918年春，成舍我毅然结束上海的文人生活，束装北上。

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要到暑假才举行，李大钊就介绍他先到北京《益世报》做事。因为成舍我没有中学文凭，他只能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旁听生。1918年8月，他如愿以偿，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旁听生。不过，为了生存，他还得继续在报馆工作；为了能够转为正式生，他又必须勤奋读书，不能缺课。后来回忆起这段半工半读的日子，他说：

我是民国七年一月去北京的，目的是入北京大学读书，但是要等到暑假才能考学，所以就请李大钊介绍到《益世报》工作。我一进《益世报》，就做总编辑，写社论、编副刊、看大样，都是我一个人；暑假到了，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取北大做旁听生，按照规定旁听生的成绩如在第一学年，平均到八十分以上时，就改为正式生。但如果这一年都不缺课的话，可以加三分。我为了争取“全勤”加分，每天都不敢缺课。但报馆的工作等看过大样之后，一定要到凌晨四点钟。而报馆离学校很远，每天早晨都是打个盹，就去学校上课，太累了身体实在吃不消。一学期过去了，成绩考的还不错，看情形升“正式生”是没问题了，所以向杜社长说明工作太累，请准辞掉总编辑的职务，改为主笔名义，除写社论外，还跑新闻，薪水照旧。一切先得杜的谅解，就这样决定了。之后，他请了潘云超

做总编辑。①

生活的窘迫艰辛并不影响“大学生成平”成为校园里的活跃分子。1918年至1921年，成舍我就读北大的这几年，“正是这所大学迅速崛起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时期”②。由于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与鼓励，北大的学生社团极其活跃。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数年、重新回到学校的成舍我当然不会默默无闻，除了在校外编《益世报》外，他还参加了著名的学生社团“新潮社”，是“新潮社”的第一批成员。③ 1919年10月，他干脆自张旗帜，邀集一批同学成立了“新知编译社”，自任社长，通过翻译外国名著以实现“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于文化运动”的宗旨。书翻译出来却无力出版，出版商又百般刁难，成舍我遂决定成立书社自行印刷发行。1921年初，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新知书社”，采取有限股份公司的办法，在北大教职员和学生中公开招股。结果，就连校长蔡元培都被拉入股，总共募到了5000余元。经过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成舍我被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年轻的成总经理虽有满腔豪情，奈何资金少，生产力弱，营业又无计划，书社开办不几月就无法支持，到了年底便宣告停业了。接着，他利用新知书社的残余资金创办了一份四开小报《真报》，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还是无法支持下去。成舍我办书社、办报纸虽然都失败了，但是这为他以后经营新闻业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北京大学毕业后，成舍我除继续任职于《益世报》外，还先后兼任过北京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北京联合通讯社编辑。他因采访新闻的机会，结识了不少政要，如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由于这些政要的引荐，成舍我担任了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华威银行监理官。当然，这些都是挂名差事，白拿薪水而无需上班点卯的。

当时北京报馆见风使舵、变相成为军阀个人工具的状况，使年轻气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150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③ 1918年12月3日的《北大学报》，登出“新潮社”第一批成员名单共21人，成平（舍我）名列其中。

盛的成舍我极为不满。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嫁衣裳也非其所愿。1924 年 4 月 16 日，成舍我辞去《益世报》职务，用积累下来的 200 元大洋，独立创办了《世界晚报》，“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①]。次年 2 月 10 日，他一鼓作气，创办《世界日报》。10 月 1 日，又将日报第五版的“画报”独立出来，出版单张《世界画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成舍我，几乎是白手起家，连续独立创办了三份报纸，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多家报纸的报人。成舍我的“三个世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被称为‘世界’报系，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他独特的个性和持续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②]

1926 年奉系及直鲁联军占据北京期间，为了震慑舆论界，树立威望，相继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成舍我也几遭杀身之祸。虎口余生，成舍我离京南下，寻找新的办报空间。1927 年 4 月 18 日，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那一天，他在南京创办《民生报》，自任社长，开始异地办报生涯。《民生报》以内容“精、简、全”的“小型报”特色，很快赢得了读者喜爱，出版不到一年，发行量从 3000 份增加到一万五千份，最高攀升至三万份，为南京报纸之冠。

1934 年 9 月，《民生报》因得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而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也不许成舍我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1935 年 9 月 20 日，成舍我与新闻界朋友严谔声、萧同兹、管际安、程沧波、胡朴安、朱虚白、田丹佛、张友鸾等集资成立股份公司，在上海创办《立报》。第二年，《立报》发行量即达 10 万份，在淞沪抗战期间，发行量每日都在 20 万份以上，超过了上海老牌大报《新闻报》和《申报》，创造了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与《世界日报》、《民生报》的独办不同，《立报》是成舍我和友人合办的。在 10 万元发起股中，成舍我任股份二分之一，是最大的股东。董事会公推萧同兹为董事长，成舍我任社长。《立报》的组织采用的是社长制，编辑方针、经营管理均由社长负责。这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151 页。

② 傅国涌著：《追寻逝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2～233 页。

时的成舍我，“已从各种不同的历练和经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正的新闻事业专家了。从报纸的言论方面看，他是一个新闻理论家；从报纸的管理方面看，他是一个新闻事业企业家；从报纸的版面看，他是一个新闻艺术家。”[①]《立报》能够在报馆林立的上海滩迅速崛起，再次证明了成舍我确实是出手必胜的办报天才。

成舍我是我国最早开始异地办报并且能够成功的报人。在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相继大放异彩的同时，他在北方的事业也渐入佳境，走向鼎盛。1928年5月，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逃出北京，在皇姑屯被炸身亡。阎锡山随即率众进驻北京，改北京为“北平”，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津，北伐成功。政局的翻覆促使这座城市新闻界重新“洗牌”。当北洋军阀崩溃之时，那些依附北洋军阀、政客的报纸纷纷停刊，民营报纸也因国都南迁、经济萧条而风光不再。在同业凋零之时，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却应时兴起，占据北平新闻界“鳌头”。一方面，《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一直主打教育界新闻，北洋军阀垮台后，政治中心虽然南移，北平仍是文化、教育中心。另一方面，成舍我充分利用异地办报优势，让南京《民生报》人员为北平《世界日报》采访新闻，拍发专电，使《世界日报》在同城报纸中成为专电既多又快的报纸。《世界晚报》也能登载上当天南京、上海的重大新闻，使读者感到该报消息灵通，内容丰富。同时，世界日报还以《民生报》社为南京分馆，推销报纸。

从1928年到1931年夏的三年中，《世界日报》的营业状况逐渐好转，终于获得赢利。1930年底，日报销量突破一万大关，成为当时北平销量最多的报纸。不过晚报销售数目却不稳定，最多不超过5000份，画报则只是日报附送品，几乎没有销数。因为先有晚报后办日报，所以初期对外的总名称是《世界日晚报》。后来有人建议这样的名称不大方，日报也后来居上，日益成为业务中心，因此从1935年起，成舍我干脆以《世界日报》作为日、晚、画三个报的总称。

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时，社址就设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自己的私寓内，设备简陋，根本无钱购置印刷机，报纸由外面的私营印刷所代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34页。

印。第二年再办《世界日报》，改租石驸马大街 90 号作社址，又得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贺得霖之助，购置了对开平版印刷机和铸字、排版等设备。1928 年成舍我从南方回来，在李石曾的资助下，又陆续添置了印刷机、新字模等设备。进入 1930 年代，日、晚、画三个报已具有相当规模，原有房舍、设备无法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1935 年，成舍我把位于西长安大街 32 号的华北饭店整栋大楼租借下来，作为报社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之用。又花了 8000 元，从天津《大公报》胡政之手里买了一部二手轮转印报机。新社址的气魄令同行侧目，轮转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印报速度，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在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施的同时，成舍我锐意改进经营管理，充实报纸内容，使报纸销路日增，营业蒸蒸日上。1924 年他 200 元起家办《世界晚报》，到 1935 年报社改用新式管理办法，全社固定资产已达 10 万元左右。成舍我为会计处的存款规定了一定的限额，超过限额既划入“社长提存”账，由社长自由使用。从 1935 年到 1937 年三年时间内，每月划入社长提存账内的款额，平均在 5000 元以上，总共约为 20 万元。[①] 总之，在成舍我的苦心经营下，无论是营业状况还是舆论影响力，《世界日报》在华北都堪称首屈一指。

然而，日寇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成舍我正在走向鼎盛的事业急转直下。1937 年 8 月 9 日，就在日军进入北平的第二天，“世界”日、晚、画三报同时宣布停刊，资产被日寇劫夺。11 月 25 日，《立报》也在上海弃守后停刊。永不言弃的成舍我南下香港，于 1938 年 4 月 1 日在香港复刊《立报》。虽然香港《立报》始终未能打开局面，没有能够像北平《世界日报》、南京《民生报》和上海《立报》那样成为畅销报纸，但是成舍我依然使这份报纸在香港撑持了三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停刊。

1945 年春，成舍我与范争波、陈训悆、程沧波、刘百闵、潘公展、钱新之等集股 1000 万法币，成立“中国新闻公司”，于 5 月 1 日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报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经常务董事会公推，成舍我任社长兼总编辑，刚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转任监察院秘书长的程沧波任总主笔。从路透社远东分社经理退职的赵敏恒被邀参加编辑部，任副总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 页。

编辑兼采访主任。当时重庆有《大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民营报纸及《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党报、军报刊行，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再出版新报纸，要打开局面绝非易事。由于有成舍我及其《世界日报》的“金字招牌”，创刊前又在《大公报》上连续刊登巨幅广告，大肆渲染成舍我在北平办《世界日报》、南京办《民生报》时数度被捕之事，所以报纸尚未露面就已经在陪都引起了轰动。在重庆《世界日报》创刊之日，读者们一大早就在报社门前排起了长龙，抢购报纸。这其中当然有读者的“好奇心”在驱使，不过也足以说明成舍我在新闻界的感召力。

成功的所以然

成舍我纵横新闻界数十年，几乎无往不胜，办报必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大而言之，有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办报宗旨。1924 年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他为自己独立经办的第一份报纸制定了四条宗旨：（一）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10 个月后再办《世界日报》，政治性质、社会形态和民众需要与创办晚报时大体相同，因此日报沿用了晚报的宗旨。当时军阀暴虐，摧残言论，北京新闻界或慑于淫威三缄其口，或接受津贴丧失报格。北京城虽然报馆、通讯社林立，总数大约在两百家以上，但是有的通讯社专事敲诈勒索，并不发稿，有的报纸竟然和其他报纸合用铅版，只是各用各的报头印刷，印上 20 多份赠送给出资的军阀政客，根本不在市面上出售，无法满足读者及时准确地了解波诡云谲的时局的欲望。成舍我适时地以上述四条宗旨相号召，自然能够赢得读者的支持。1927 年在南京创办的《民生报》的宗旨，因时势推移，稍有修订，即“立场坚定、态度公正、消息灵确、不受津贴、肃清贪污”。1935 年上海《立报》的宗旨，仍为四条：（一）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二）消息灵确；（三）不接受任何津贴；（四）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对外争取国家主权独立，驱除敌寇。1938 年《立报》在香港复刊，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内政谋求革新之时，成舍我为香港《立报》确定了这样的宗旨：（一）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二）消息灵确，报道翔实；（三）打倒汉奸，抗战到底；

（四）革新政治，肃清贪污。1945 年在重庆复刊的《世界日报》，其宗旨与香港《立报》大致相同。

由此可见，成舍我办报一向都有自己的宗旨，而且有几条宗旨是永久不变的，有的条文则随着办报时空的改变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变，是对基本信念的坚守不移；改变，是与时俱进、满足读者需求的策略选择。

在不同时空，成舍我一以贯之的办报宗旨基本上有三条：（一）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二）不受津贴；（三）消息灵确。

近世以来，私营报人不管是否出于本意或能否做到，口头上都以客观公正相标榜，成舍我也是如此，“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就是他手订的办报宗旨之一。办报要做到“立场坚定、态度公正”，首先必须要做到经济上独立自存不可。受人之惠，遇事必然逡巡顾忌，评判问题就很难做到是是非非，不偏不倚。不能说成舍我一生办报从没有接受过任何津贴。1925 年 8 月，曾任“世界”晚、日报总编辑，后来与成舍我分道扬镳的龚德柏，在自办的《大同晚报》上攻击成，说他接受各方津贴，并且将其一一列出。龚德柏的话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当年年底，北京《晨报》又披露说，北洋政府参政院等六个机关，分四个级别向新闻界赠送“宣传费”，其中《世界日报》、《世界晚报》被列为“最要者”，每家 200 元。[①] 这一阶段是成舍我的艰苦创业期，他确实需要资金来开创事业，只要大节不亏，接受津贴也情有可原。但是这种做法毕竟与自己所揭示的办报宗旨相违背，他当然都矢口否认。不过，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成舍我从一文不名变成了报业资本家，接受他人津贴的事情几乎就不再发生了。成舍我一辈子从事新闻业，没有做过行政官吏，没有担任过官报职务，始终以无党派民间报人自居。他少年时代曾经在安庆加入过国民党，1927 年在南京办《民生报》时，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党员必须重新登记，他认为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不往登记，自动放弃了国民党党籍。[②] 1944 年 9 月桂林沦陷后，成舍我携家眷从桂林退到重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49 页。

② 关国煊：《锲而不舍的新闻界老兵成舍我》，《传记文学》（台北）第 58 卷第 5 期，1991 年 5 月出版。

庆，以国民参政员身份暂作寓公，但毕竟闲不住，总想继续办报纸。那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办得不好，两报后台都先后拉成舍我去接办，希望借他的才干搞出一点名堂，为官报增光，减少赔累。但是他始终没有下水，而是与朋友集资恢复了私营的《世界日报》。[①] 毋庸讳言，成舍我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特别是与国民党新闻宣传方面的程沧波、萧同兹、陈训悆等要人的私交都不错。在他的办报生涯中，有的曾经给予过援助，有的干脆就是出资合伙人。但是不管如何，成舍我毕竟没有办过官报，也没有担任过政府官职，始终没有突破民间报人的底线。总之，成舍我基本上做到了不受津贴和无党无派，从而大致保证了“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办报宗旨的贯彻。

“消息灵确”办报宗旨的一贯强调，则反映出成舍我对媒体功能的正确体认。新闻媒体的首要功能，就是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读者购买报纸，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获知最新、最准确的消息。如果一份报纸刊载的消息总是“旧闻”，或者错谬百出，迟早要被读者抛弃。成舍我深知“消息灵确”对于一份报纸竞争力的重要性，虽然办报时空不断在变，但“消息灵确”这条宗旨却始终未改，并尽力贯彻于办报实践。从《世界晚报》开始，成舍我就经常亲自出马采写新闻，甚至参与“抢”新闻。报社还自设短波无线电收报机，雇佣收报员“偷听”空中电波，每天都可以得到不少消息，改写后以特讯或专电的名义刊载，为报纸赢得消息灵通的声誉。上海《立报》之所以受读者欢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消息灵通。当时“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放、“七君子”被捕等重要消息，上海报纸首先发表的就是《立报》。该报备有收报机，负责收报的人很勤勉，经常昼夜不停地寻找各地所发电讯，没有电讯可收或睡觉时也不摘下耳机，一听到呼号就立即收听，因此得到的电讯特别多。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来自端纳所发的英文报告，为《立报》收报员首先收到，《立报》发表后，南京方面才知道此事。[②]

在中观层面，成舍我的成功得益于坚持走“大众化”办报之路。1935 年 9 月，成舍我为上海《立报》撰写的发刊词《我们的宣言》，集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0 页。
② 郑逸梅著：《书报话旧》，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83 页。

中阐述了他对“报纸大众化”的看法：

在今日以前我们曾向社会宣布过我们发刊《立报》的要旨，我们揭举了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这两个口号，或许有人会批评我们，第一个很新奇，第二个太夸大。但我们的认定，却正在这种批评的反面。

第一，“报纸大众化”。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近百年间，世界新闻事业，最共同普遍的一个原则。从一八三三年美国彭佳命创办纽约《太阳报》，到一八九六年英国北岩爵士发刊《每日邮报》，报纸大众化的潮流，实已弥漫了全世界新闻王国的任何角落。只有我们孤立自诩的贵国，到现今，所谓“精神食粮”也者，还只在极少数的高等华人中打圈子，也只有这极少的高等华人，才可以有福享受这种高贵的食粮。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不但不能了解报纸的使命，甚至见着新闻记者，还要莫名其妙地问：“恭喜贵行，究竟做的是什么买卖。”我们从整个世界新闻事业的潮流说来，“大众化”不但不新奇，而且腐之又腐。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正和民国初年，拿剪辫子、放小脚，当做新政，是同一的叫人惭愧。尚何新奇之有？

第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人口土地来比例计算，那只能说，这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起码数字。我们试看，不满五千万人口的英伦三岛，只伦敦一处，日销两百万份的大众报，就有四家；即人口不及百万的比利时京城，仅一个“晚报”，就销四十万。那么，我们纵不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做对象，而只就所谓将近四百万人口的大上海说，这个“日销百万”的数字，还能算是夸大么？

不过我们虽然不承认“大众化”是新奇，“百万销路”是夸大，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确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

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我们所揭举的报纸大众化，不仅是对于中国报业的一种新运动，并且也是对于现在世界上所谓大众化报纸的一种新革命。不过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那就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何者为应享的权利，何者为应尽的责任，都印象模糊，莫名其妙。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以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诚如韦尔斯氏所说："中国报纸，内容艰涩，国民能完全了解报纸中所记载者，为数极少。"且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此种报纸，固然自另有其宝贵价值，但欲达到普及民众之目的，则显然十分困难。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困难。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①

成舍我不但有丰富的国内办报经验，对中国报业现状了如指掌，而且也熟悉世界新闻业发展状况。1930 年 4 月至次年 2 月，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支持下，他和上海《时事新报》主笔程沧波一起，曾经赴欧美考察过多国的文化学术和新闻事业。他为上海《立报》撰写的这篇发刊词，可以视为此次欧美之行的心得体会。成舍我发现，"报纸大众化"早

① 《我们的宣言》，1935 年 9 月 20 日上海《立报》。

已是世界新闻业的发展潮流，但是在中国，报纸仍被称作“精神食粮”，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福“消受”，而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无力购买来阅读，根本不知道新闻业所为何事。也就是说，中国报业的发展路径，背离于世界新闻业“大众化”的发展潮流之外。因此，成舍我在我国开创性地打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作为上海《立报》的办报要旨，以期跟上世界新闻业“大众化”的发展潮流。

当时中国报纸的特点，成舍我将其概括为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内容无关民众痛痒。这些特点都违背“大众化”精神，成舍我力求变革，开创新的报纸风格。实际上，从“世界”报系开始，成舍我走的就是“大众化”之路，北京《世界日报》的风格与同城的《顺天日报》、《晨报》、《益世报》明显不同。比如报价低廉，就像广告所说的“一块钱可看三份报”，“世界”日、晚、画报每月订费总共只收大洋一元；重视副刊，《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连载的张恨水小说《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脍炙人口，风靡京华。两部小说均连载数年，为报纸赢得了非常可观的忠诚读者。

在成舍我所办的报纸中，上海《立报》最能体现他的“大众化”办报理念。上海《立报》是一种“小型报”，这种小型报与上海滩颇为风行的“小报”，比如号称“四金刚”的《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和《罗宾汉》，表面看来相同，都是四开报纸，但是版面内容、编辑方式尤其是办报主旨绝不相同。成舍我曾经比较过两者的区别：

> “小型报”和“小报”，意义绝不相同。小型报是 Tabloid，他主要原则是要将一切材料，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换一句话说，即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最好都不超过五百字。举凡一般大报所刊载冗长而又沉闷，特别像我们中国若干要人又长又臭不知所云的演说，是绝对不容许在小型报内全文照登。小型报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总之，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他的工作重心，在“改写”与“精编”。至于人才的储备，新闻网的布置，决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较最进步、最完善的“大报”减色。至于“小报”，通常了解的意义，正即西方所指的“蚊子报”

Mosquito Paper，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它只是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这种报，当然不能与“小型报”相提并论。[①]

成舍我在北京开始办报时，这座城市已经有小型报《群强报》刊行。这份报纸的新闻都是剪自两天前其他的大报，也没有像上海、香港等地“小报”上通常具有的色情小说，一张四开纸除广告外，内容总共不到8000字，版面编排也很低劣。但是就凭这样一张毫无特色的小型报，北京“引车卖浆”之流几乎人手一纸，发行竟达五六万份，连素称四大报的《顺天时报》、《益世报》、《晨报》和《北京日报》也望尘莫及。这令成舍我很惊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群强报》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新闻虽然剪自大报，但是都经过缩编，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二）文字用《三国演义》式白话体，其中的白话栏目“说聊斋”尤其受劳动阶级欢迎；（三）报价便宜，劳动者易于承担。后来他在南京办《民生报》，就借鉴了《群强报》的一些做法，以“精、简、全”的小型报风格，开南京报业风气之先，使南京市民耳目为之一新。所谓“精”，就是要精打细算版面，因为四开报纸版面有限，内容、编排一定要精短细致；“简”即文字简单明了；“全”，就是内容要丰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

南京《民生报》的初步成功和考察欧美新闻业的感受，坚定了成舍我办“小型报”、走“大众化”办报之路的理念。1935年上海《立报》创办，遂成为他贯彻这一理念的基地。针对中国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内容无关民众痛痒等反“大众化”潮流的弊端，《立报》逐一地予以变革。价格方面，《立报》的口号是“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五分钱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并在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向读者承诺：除国家币制和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立报》将永远保持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成舍我深知内容对一份报纸的重要性：“一个报纸办好的程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

---

① 成舍我著：《报学杂著》，中国文物供应社（台湾）1956年版，第119～120页。

因果颠倒，必将劳而无功。”《立报》初创时只有四开一张，后来又增加了半张，版面很少，但是他要求新闻的数量和时效要超过大报。曾经担任过总编辑的储保衡回忆说：“立报因为是一张‘小型报’，篇幅少，但在原则上，它的新闻不但不比大报少，还要比大报多，不但不比大报慢，还要比大报快。国际各大通讯社的稿子全部订购，不准遗漏任何新闻。因为篇幅少，必须采精简主义，对这一点成社长要求很严格，做编辑的必须把通讯社发的稿子，重新缩写，成社长下令，排字房可拒排油印稿，任何编辑发排的稿子，必须是用手写过的，所以在《立报》做一个编辑，是相当辛苦的。”[①] 同时，所刊载的内容，都必须经过严格选择，“其与最大多数人民无切身关系，或不感兴趣者，虽一字亦不浪费，否则搜本求源，不厌求详。”[②] 文字方面，《立报》以“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相期，来杜绝艰深难懂的流弊。

《立报》继承了“世界”日、晚报注重副刊的传统，开设了《言林》、《花果山》和《小茶馆》三个副刊。其中《言林》是给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看的，严肃中带些趣味性，主编为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花果山》面向一般市民、自由职业者和商人，张友鸾、张恨水、包天笑等先后主编。《小茶馆》由萨空了、严谔声先后主编，读者对象主要是劳动者。三个副刊各有千秋，具有大众化、平民化的风格特点。

上海《立报》虽然没有达到“日销百万”的目标，但是发行量达到过20万份，创造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成舍我一生引以为豪。上海《立报》的意义还不在于它曾经创造过发行纪录，而在于证明了成舍我“报纸大众化”的办报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卜少夫建议，在中国报业史上，应该对上海《立报》大书特书，“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它的内容并不少于大型报。这是舍我先生一大创作，他要求同仁，要用简明的笔法，尽量把文字浓缩，以最小的篇幅，刊载更多的新闻。因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尤其都市生活每个人都很忙碌，可以说没有什么时间看报，有很多东西，经过浓缩之后，使读者很快就把报看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29页。

② 《立报三大特色》，1935年9月20日《新闻报》。

完了，所以《立报》在上海销路很大。”[1]

倡导“报纸大众化”的成舍我还有高人一筹之处：他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大众化背后追逐个人私利、报馆成为私人牟利机关的弊病，宣称中国报纸的大众化不但不步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而且还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其流弊，使中国报馆变成“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为公众而非个人谋取福利。不仅如此，成舍我更能够从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树立近代国家根基的高度，来谈论中国报纸大众化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他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内忧外患不断，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但是最大多数国民依然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因此，要把报纸办得使全体国民都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他认为办报是“对于国家最紧要的一件工作”，立己立人立国均在其中：“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2] 成舍我的这一识见，远非一般业新闻者所能企及。不能否认，成舍我是报业老板，追逐利润是他办报的目的之一，但是在他身上，依然不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济世的情怀。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关乎成败。成舍我从一文不名的流浪青年成长为一代报业资本家，驰骋旧中国新闻界数十年，除了宏观层面的办报宗旨正大、中观层面的办报路径准确外，恐怕更与微观层面的治事风格有关。多次辅助他办报的张友鸾就说过，就报纸而言，无论编辑采访，还是经营管理，成舍我都有一套办法，甚至可以说那已经成为了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43页。

② 《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

"成舍我体系"。[1]

张友鸾没有阐发"成舍我体系"的构成要素。详推细究，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恩怨分明，不以私谊害公理，堪称"报界狠人"。

成舍我出身寒微，无依无靠，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为了开创事业，有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过，在新闻事件涉及施惠者利益的时候，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能做到"言论公正"，并不因为曾经受人之惠而有所偏袒。一方面"照单全收"，一方面铁面无私，这样的处事风格，确非一般人所及。1924 年，成舍我在办起《世界晚报》后，还想再办一份日报，但是苦于资金短绌而不能如愿。后来，他在采访新闻的时候，在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家里认识了贺得霖。贺得霖时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正想操纵一家报纸为己所用，听说成舍我办报急需资金，就给了他 3000 元大洋。成舍我正是利用这笔钱置办了印刷设备，于 1925 年 2 月创办了《世界日报》。后来，贺得霖又陆续接济过成舍我，总数约达 4000 元。由于这层关系，贺得霖自以为是《世界日报》的后台老板，《世界日报》对段祺瑞政府也有所帮忙。但是 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激起公愤，成舍我及其《世界日报》就不再假以辞色了：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发表署名"舍我"、题为《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的社评，提出段祺瑞政府应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后来，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五人以图卸责，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政府卫队犯有杀人之罪，"世界"日、晚报都适时发表社评，严加谴责。如此一来，报纸的声誉和销路大增，却惹恼了贺得霖，就向成舍我索取"借款"。成舍我并不示弱，说贺得霖索款是"笑话"，并警告他，如果逼款，就揭穿内幕。[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纳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建议，学习法国"大学院制"，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个大学区管辖范围很广，如"北平大学区"就包括北平、天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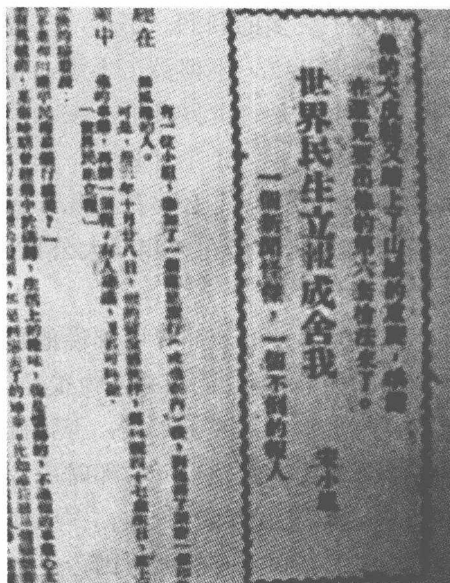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 页。

②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8 页。

河北、热河四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大专院校以至中小学校。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为北平大学区负责人，李石曾又聘请成舍我担任北平大学区秘书长。对于政府“霸王硬上弓”式的改革，教育界群起反对，引发学潮，大学集中的京津地区反应尤其强烈。论私谊，李石曾对成舍我时有帮衬，南京《民生报》的创办获助良多；论公事，此时李石曾又是成舍我的上司。“世界”晚报、日报自创刊起都非常注重教育新闻，可以说，教育新闻是它们的生命线，是报纸赢得读者、赢得竞争的法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日报》该如何自处？成舍我斟酌再三，为其确定了一个原则：有关反对教育“改制”的新闻和理论性文章照登不误，“就事论事”以维护《世界日报》“言论公正”的宗旨，但绝不作私人攻讦和谩骂。社会大众对《世界日报》的“言论公正”，不但信而无疑，对成舍我的敬业精神，也更加赞佩。时人皆谓“成舍我就是成舍我”，并非徒具虚名。[1]

1945 年 5 月成舍我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国民政府早已不许新报纸在重庆出版。曾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的胡汉君回忆，据说是有人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说项，重庆有华东地区撤退而来的上海《时事新报》、南京《新民报》等报纸出版，似乎华北地区也应该在后方有一张报纸。这个建议被蒋介石采纳，《世界日报》才得以在重庆出版。[2] 但是报纸刊行还不到两个月，一场暴雨造成报馆所在地七星岗一带严重积水，报社损失惨重，不但整个排印工场被污水淹没，十多天无法印报，还有很多纸因为来不及搬走而泡成浆汤。成舍我报告给重庆市政府工务局，促请加快疏浚、整修下水道。多次申请后仍不见动静，他盛怒之下，一方面在报上刊登新闻，说下水道迟迟不能修复显然是市政府无能，贺耀祖市长该下台谢罪，另一方面聘请律师公开登报警告市政府主管当局，以赔偿全部损失相威胁。市长终于被惊动，两次亲临现场，视察报馆下水道堵塞情况，责令工务局长日夜督工抢修。在对付玩忽职守官员的同时，成舍我还在报上刊登启事，正式向读者致歉，并宣布停刊期间补偿订户的办法。“这些手法都对报纸声誉与发行增添了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179 页。
② 陈汉君：《关于重庆世界日报》，1984 年 1 月 21 日香港《星岛晚报》。



《新闻天地》(1945 年 1 月 12 日创刊于重庆)创刊号刊登的宋小岚(卜少夫)文章《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

许多有利影响。所以当时就有不少同行说他在利害、是非问题上既能破除情面，毫不忍手，又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争取读者同情，说得上是一个报界狠人。”①

第二，管理严格，待下刻薄。

1930 年成舍我游历欧美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西方报馆的经营管理制度。回国之后，他开始仿效西方报馆的管理方法，设立监核处监管广告等营业业务，采用新式簿记实行成本会计，制订新的人事管理制度，开始尝试对《世界日报》进行所谓的“科学管理”。1935 年 7 月，报社从石驸马大街迁到西长安街，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成舍我成立总管理处，权力凌驾于编辑、营业、印刷、会计四处之上，对报社实施全面、严格的科学管理。在实施的诸多管理方法中，“工作日记制”可谓别出心裁，属于成舍我的独创。全社人员，不管是总编辑还是一般职员，人手一本日记，记录下当天的工作情况，下班时汇总到总管理处。一般职员的日记由经理审阅，各处负责人及编辑、记者的日记须转成舍我亲自审阅。他边看边批，成绩予以肯定，错误给予提醒。如有重大错误即严词申斥，甚至批注某人应予罚薪，某人应予处分。工作人员每日上班时多惴惴不安，等到看见发回的日记本上没有不好的批注才能安心。有人说，世界日报社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在成舍我手下工作五年未被“炒鱿鱼”，此人可受任何报社欢迎，可见他律人之严。科学管理降低了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4 页。

生产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成舍我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不过，成舍我所采用的“科学管理”方法，由于过分紧缩开支，不但员工不满，有时还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质量。例如，范长江本来是《世界日报》在北京大学的特约记者，1935年夏他打算到西北去采访，写了个计划书，每月只需几十元费用。当计划书交给成舍我时，他认为没有必要花这几十元钱。后来范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所写的西北通信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轰动全国，成舍我后悔不迭。

成舍我不但对属下要求严格，而且十分悭吝，旧新闻界中都说他是刻薄起家。创办《世界晚报》时，由于经济拮据，员工的报酬定得很低，并且是按日开支。编辑上班时，拿到当日的薪金，才开始编报，否则拂袖而去，往往临时找人编报。后来改为半月开支，便发铜元。那时成舍我家庭和报社不分，夫人杨璠掌握着度支大权，因为银贵铜贱，铜元换银元的行情每日不同，杨璠便玩弄花样，从中克扣，有的编辑因为收入不能维持生活而离开报社。当时，北洋政府“欠薪”的风气，也“传染”到报社，每月发薪水，要搭上一张欠条，由杨璠署名出具。据说张恨水有一叠欠条弄丢了，找杨璠要钱，杨说没有存底，也不知是多少钱，不肯兑付。员工没有福利待遇，也几乎没有节假日。编辑因病请假须自行托人代编，否则报社找人代替，由请假人付工资。晚报某编辑结婚时，只好编完报才去做新郎，一时传为笑柄。职工按工作性质分别规定上班时间，迟到三次折合为请假一天，旷职一天作为请假三天，月底结算，照扣工资。营业部人员主要靠招考练习生。练习生入社时必须有铺保，每月薪金只有10元到20元，而且三年之内，报社得随时辞退不用，本人不能辞职不干。校对如有错字未校出，也要罚钱，这也是成舍我的独创。校对人少工作量大，时间又紧迫，难免出错，因此到月底发薪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扣款，扣得最多的仅剩下几元钱，还不够饭费。

事业开创阶段锱铢必较还情有可原，到了重庆《世界日报》时期，成舍我依然如故，那只能说是本性使然了。重庆《世界日报》集股1000万法币而创办，财力相当雄厚，但是成舍我对社内的一切措施，一如他在北京《世界日报》的办法，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要求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为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他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消息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①

成舍我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连他的女公子成嘉玲女士都说，他的俭省简直到了"严苛"的地步。为了减少电力消耗，他在排字架下面设计装上脚踏的电灯开关，工人排字时，用脚踏上开关才能开灯，离架时灯即关闭。这样的设计，可谓挖空心思，也只有成舍我才能想得出。他在台北恢复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有几项出人意外的规定，连被邀担任副校长的叶明勋都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教室电灯每日下午六时才能开明；信封纸最好反面也用；铅笔等文具必须以旧换新……真是鸡毛蒜皮都管到了。他的朋友卜少夫认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建校长达35年，直到最后一年才获准改制为世界新闻学院，与成舍我的"节俭成家"作风关系很大。

也难怪成舍我悭吝、节俭。幼时家贫无助，甚至发生不能举炊、靠典当衣被救急的情况。他十四五岁就出外谋生，在上海时常靠啃烧饼度日，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还有人说他是"东斋吃饭，西斋洗脸"，意思是指他一无所有，"逐水草而居"。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然看重分文，出手一般不会大方，也不会有挥霍浪费的行为。再者，成舍我是老板，要挣钱给雇员发工资、维持报馆运作、不断追加投入以壮大报馆规模，当然要锱铢必较，讲究经济核算。在这方面，成舍我和王芸生、徐铸成等报人是不一样的。

难能可贵的是，成舍我不只是对人刻薄、吝啬，他也严以律己，自奉甚俭。他没有什么嗜好。少时贫穷，没有享受的资本，及至成了报业资本家，完全有条件享受了，他依然如故，生活上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因此，和他往来的人，也不一定都苛责他的刻薄、吝啬。他的朋友卜少夫说，自己常常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认为他的节省已习惯成自然，你以为清茶淡饭是刻苦，鲜鱼肥肉是享受，而他正好相反。他乘破旧的吉普车；他绝不签账，而带现款付账；他居室无豪华设备；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9、20、60、61、117页。

他衣着朴素简单；这一切他都甘之如饴，并不觉得是刻苦。所以，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富豪生活作标准，而怜悯他不知享受、没有享受。所谓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他安于如此之生活习惯，不以为苦，更不认为受罪也。"[1]

据说，1931年成舍我从欧美考察归来，在海轮上一位外国人问他：可抽烟？可喝酒？他一一做了否定的回答。那个外国人就说："那你为什么活着?"[2] 这位外国人当然无法明白成舍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挚爱的办报、兴学事业。1956年他在台北恢复"世界新闻职业学校"，经费涓滴归公，绝不移作私人之用。学校草创之初，经费捉襟见肘，成舍我有时还把自己在其他大学兼课所得的钟点费、稿费，甚至"立法院"的薪俸，都带到学校，抵补开支。到了1968年，学校已拥有土地八万余坪、建筑物一万余坪，基金和不动产合计共有20余亿元。成舍我一举将它们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根据台湾"民法"规定，钱物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归其所有，不得再移转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他的这项豪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深切敬佩。[3] 他对于公私财物分得很清楚，没有把学校当作学店，作私人敛财之用。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李蜚鸿在《追记成舍我一生志业》一文中说："在世新改制为学院的过程中，'教育部'官员发现世新的师资、图书、设备虽不尽理想，但是成舍我确实很有良心地把每一笔钱都留在世新的财团法人基金里，在各私立学校财务会计普遍暗藏玄机时，世新的财务最令'教育部'放心。"[4]

第三，负责敬业，事必躬亲。

成舍我的北京《世界晚报》刊行不久，发生了一桩"因祸得福"的奇事。1924年秋，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特派吴佩孚为统领，率直系大军防堵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吴佩孚手下有员大将叫张福来，驻守河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②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④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南开封。相信“逢凶化吉”之说的吴大帅，特意把他调来任前敌总指挥，希望靠“福来了”旗开得胜。《世界晚报》得到消息，把它列为当天头条新闻，标题是《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成舍我做事一向胆大心细，为防疏失，并且也为了表示负责，报纸大样都由他亲自审阅。碰巧当天中午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成舍我在受邀之列。中午正是晚报看大样的时间，外勤记者龚德柏就主动提出替老板看一次大样，让他放心准时赴会，以免错过重要新闻。参加完外交部记者招待会及午宴后，成舍我乘车返回报馆。这时《世界晚报》已经上市，他停车买了一份自家报纸，一看顿时傻了：头条新闻的标题就出了大错，“张福来”变成了“张禍来”（“禍”是“祸”的繁体字，与“福”形近，极易混淆）！他加速赶回报馆，告诉还在洋洋自得的龚德柏，龚被吓得呆若木鸡，久久不能自语。两人赶快收拾东西，溜之大吉，住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去了。不出所料，宪兵、警察很快就上门捉人，人没捉到，一纸封条就贴住了报馆大门。

就在成舍我、龚德柏在六国饭店度日如年之时，北京的政局突然发生逆转：《世界晚报》被封的第三天，冯玉祥突然临阵倒戈，不但不出兵山海关攻打张作霖，反而切断吴佩孚的后路，包围北京城，软禁了曹锟。吴佩孚大败，逃回洛阳，冯玉祥当上了北京城的新主人。如此一来，查封《世界晚报》的封条自然失效。成舍我回到报馆，得到冯玉祥集团的同意，立即复刊了《世界晚报》。经此一劫，成舍我和《世界晚报》名声大噪，报纸的销量也随之大增，从原来的两三千份一下子增加到万份以上。

有人戏称成舍我因“祸”得“福”。成舍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好事”不会总被自己碰上。这件事情使他愈加惕厉，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常说：“一张报纸犹如一把手枪，如果社长或总编辑自己不看大样，就好像把自己手枪交给他人，万一他乱扫乱射，责任都是自己的。”① 重庆《世界日报》时期，因为使用廉价的学徒多，排字技术和校正水平都很差，版面上常常错字连篇，让成舍我很伤脑筋。为了消灭错字，他每天都要用不少时间把版面上的错字勾出来，查问是校对的责任或是排字房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163页。

的责任。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遇参政会开会，他总是坐在会场捧着《世界日报》勾错字。

成舍我的“认真”还闹过笑话。1946年南京玄武湖展出一只活的大玳瑁，吸引很多市民去观看。北平《世界日报》驻南京记者毕群根本没有到现场采访，而是照抄南京一家小报登载的一则新闻，说玄武湖展出一只大乌龟，观者甚众云云，敷衍了事地发给北平报社。谁知第二天其他报纸同样新闻中，写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舍我便去电质询说：“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这样的“六朝小品”式电文，让人哭笑不得。

成舍我的新闻观念很强，用他的话说是“新闻第一”。他认为报纸的成功只有一天：昨天，你的报纸言论正确，内容充实，版面美观，尤其拥有许多他报所无、本报专有的特讯，昨天的报纸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今天，你言论荒谬，内容芜杂，版面恶劣，许多重要消息他报登出而本报独无，那么昨天被评为成功的报纸今天就会突然变成失败的了。[①] 因为报纸每天都要竞争，特别是新闻的竞争，所以一定要比别的报多一条新闻或一个特讯，以培养读者对本报的信心。《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他办报的“座右铭”。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脱离这家党报，成舍我请他担任北平《世界日报》南京特派员。陆铿说南京太大，向成舍我要一辆车代步，用来跑新闻。成舍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座车——一辆紫红色的美国产 Hudson 新轿车交陆铿使用。有一天早上，陆铿坐车经过一个公交车站时，突然发现成舍我挤在等车的人群中。他立刻叫司机停车，请成舍我上来，问：“何必自苦乃尔?”成舍我的回答很自然：“既然你采访需要车，当然归你用，新闻第一嘛!”[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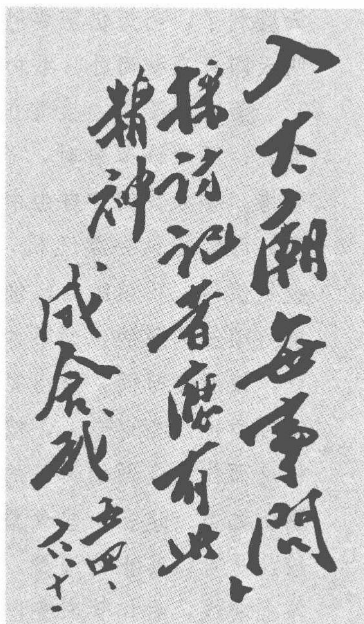
对于自己天性喜好的新闻工作，成舍我可谓专心致志，异常敬业。清晨，员工们常看到他手持当天的《世界日报》，计算着新闻的条数；夜晚，他踏着一双大皮鞋，在编辑部来回踱步，闷声不响地思考着版面上的问题。因为他经常穿一双大皮鞋，报社中人私下都习惯称老板叫“大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36页。

② 傅国涌著：《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皮鞋”。“大皮鞋”踏遍大江南北，对新闻的挚爱终生不改。1988 年，成思危带着夫人和女儿到香港与父亲团聚，已经 91 岁高龄的成舍我，每天早晨还让儿子去买回当地出版的各种报纸，拿着高倍放大镜一行一行地认真辨读。



成舍我翰墨。

在成舍我手下做过事的人都知道，成老板的治事风格犹如三国时的诸葛亮，事必躬亲，无所不管，“夙兴夜寐，罚五十以上皆亲览焉”。1953 年 5 月 23 日，成舍我应台北编辑人协会的邀请，以《如何办好一张报》为题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他讲了三点管理报业的体会，实际上回答了自己事必躬亲、无所不管的原因：

第一、要把办报看作开机器，马达固然重要，小螺丝钉也不能忽视。编辑人纵然绝顶天下，如果配上一些缺乏能力、不大负责的校对，时常将“中央”错成“中共”，“大使”错成“大便”，“伦敦”错成“敦伦”，那么，这张报仍将难于博取读者良好的印象。由编辑方面推而至于其他部门，报差不按时送报，信差不按时取稿，工人不按时出版，其对于报纸的能否办好，当然都影响很大。

第二、要把办报看作指挥一支作战的军队。新闻工作，虽被称为自由职业，但为增强工作的效率计，一个报馆的组织和纪律，却绝对不能松懈。指定的发稿时间，一定不许迟误，指定的采访任务，一定需要达成。印刷部门延时出版，一定要追究责任，校对房错字连篇，一定要依章处罚。尤其重要的，即对于参加这支报馆军的每一分子，必须随时随地充分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一个标题不如人，编辑先生，应该感觉羞愧；一条新闻不如人，外勤先生，应该吃不下饭。人人要争取胜利，但这胜利的有效期限，永远只是一天。今

天胜利了，明天仍需要胜利，并不能因为今天努力奋斗，有声有色，明天即可高枕而卧，敷衍了事。

第三、要把办报看作主妇管家，应该节省时，粒米寸布，不许浪费；不应该节省时，子女教育，或急病开刀，几千几万，也毫无吝惜。譬如我们“自由中国”，一旦反攻登陆，假使为军事当局所许可，即使特包一架飞机，去猎取最早最确最详的消息，花多少钱，也是值得。不然的话，像我过去管理报馆的一些小事，曾被朋友们笑为琐细刻薄的，如不许全馆有一盏不应开而开的电灯，将全部电灯，按所需时间，分组安设总门，全部总门，集中于总管理处我的座位旁边，指定专人，按时启闭；又如每天利用一部分通信社废稿，将反面作为夜间编辑部的稿纸，及严禁印刷部职工撕取卷筒报纸上厕所之类。这在一些大报馆大报人眼中，虽都卑不足道，但我总相信凡是可以防止的浪费，就必须加以防止。将办报看作开机器，看作上前线，看作管家务，如果这对于解答“如何办好一张报”，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当然那将是我十分欣愿的！[①]

事无巨细，老板都要去过问，如此做事，不但辛苦，也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成舍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经对马之骕说过，自己也并非什么事都想管，只是用人太难，自己不管就做不好：“有的人老实忠厚，但他头脑简单，不会做事，你不干涉他，他也要向你请示，什么事都不敢做主，所以要管；有的人智慧高、主意多，但他什么事都想自作主张，遇事横冲直闯，一不小心，他就会给你惹乱子，所以更要管。既肯做事，又肯负责的人，往往找不到，所以说‘用人太难’。”[②] 另外，他深知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私营事业与公营机构不同，尤其需要谨慎勤勉，在理财或用人方面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惨重的损失。所以，成舍我事必躬亲的治事风格，虽然不够旷达，但是也是为了来之不易的事业能够延续发展下去。

第四，剑走偏锋，出奇制胜。

---

① 成舍我：《如何办好一张报》，1953 年 5 月 29 日台湾《新生报》。

②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350 页。

新闻业是注意力经济，报纸创刊后能否吸引大家的“眼球”，进而掏钱去订阅、购买，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成舍我天生聪慧，从少年起就在新闻界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心领神会，等到自己独立创办报纸做老板，他总是能够想出出人意表的招数，吸引读者，打开局面。

在办《世界晚报》初期，成舍我每天下午领人带着刚刚出版的报纸，雇汽车到北京城南游艺园一带去卖，自己则杂在人丛中争着买自己的报纸，造成“抢购”的场面。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还想出打笔墨官司的办法。《世界晚报》最初的竞争对手是《北京晚报》，成舍我就指使《世界晚报》刊文指责对方新闻如何失实，甚至诋毁对方同某某派系有瓜葛。《北京晚报》当然不示弱，照样回敬，于是造成对骂的热闹场面。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下子吸引住了不少读者的“眼球”。成舍我尝到甜头后，又和龚德柏的《大同晚报》故技重演了一回。龚德柏本来是成舍我办《世界晚报》的伙伴，后来另起炉灶办起了《大同晚报》。由于彼此知根知底，在这场笔墨官司中，双方互揭隐私，热闹非凡。另外，成舍我还有意识地找一些权贵，如段祺瑞儿子段宏业、教育总长章士钊等加以攻击，一方面博取敢言的名声，一方面引起权贵的干涉，借以提高报纸的声价，扩大报纸的销路。

广告收入是报社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被称作报社的“血液”、“生命线”。“世界”日、晚报创办时，北京的工商业并不发达，广告来源不多。即使有的商家登广告，一般也不会照顾新出版的报纸。官厅广告又讲究派系，不会在毫无瓜葛的报上登广告。所以，“世界”日、晚报初期的广告都很少。为了增加广告收入，成舍我采用了三个办法：一是从其他报纸的广告里，选择几家商业广告，如百龄机大补丸之类的医药广告，事先不征求商家同意，刊登出来后再派人登门收取广告费，不拘多少，给钱就行；第二是派人出外兜揽，不一定照报上登的定价收费；第三是自编广告刊登，以广招徕。①

到了创办上海《立报》，成舍我一反常态，主动将广告客户拒之门外，令人大跌眼镜，不知其所以然。上海《立报》刊行前，就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刊登预告，其中特别声明：“在本报发行数字，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7～68 页。

不能证明已达到十万份前，任何广告，都一概拒绝刊登。”当时上海的广告，都控制在一些广告贩子手里，新创刊的报纸要想拉到广告，就必须先过广告贩子这一关。《立报》不但不买广告贩子的账，而且先发制人，声明拒绝刊登广告，大大出乎那些广告贩子的意料。同时，《立报》的这一声明，也让一般读者非常好奇，他们迫切想知道这份报纸何以如此牛气冲天。事后证明，《立报》的这一声明，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曾任上海《立报》总编辑的储保衡回忆说：“《立报》发行的第二年，销路已超过十万大关，开始接受广告了。本来在报纸发行到四五万份时，就有许多工厂商店要求开放广告，但成社长为了维护报馆的信用，而不答应，一定要等发行量满十万份时，才接受广告的。刚开始的前几天，一群广告客户在营业部门前，大排长龙，真是‘盛况空前’，而且广告地位很少，广告费很贵，只是在报头两边，一个小广告就是三十元。”[①] 仅此一事就可看出，成舍我确实深谙出奇制胜之道。

第五，知人善任，兴学育才。

说成舍我对下属刻薄，主要是指钱财方面而言。对于那些有办报才华、个性特出的人成舍我却有容才之量、用才之方。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使用张友鸾就是典型一例。1925 年秋，张友鸾被成舍我聘入《世界日报》做编辑，几个月后，就被提升做总编辑。当时张友鸾才二十出头，还没有读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在《世界日报》干了两年后，张友鸾离京南下，到安庆办报。1927 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就把张友鸾约请到南京，做《民生报》创刊的总编辑。总编辑才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因和成舍我闹小别扭，年轻气盛的张友鸾一怒之下离开了《民生报》，先后到汉口《中山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南京办事处做事。1929 年底，陈铭德约请他到南京《新民报》做总编辑。

伙计做久了，总想自己办一张报纸。1933 年，张友鸾又离开《新民报》，创办了《南京早报》。本以为办报不是什么难事，用小小积蓄做开办费，报纸一出，靠卖报和广告费的收入，就可以周转开来。谁知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南京早报》出版后，赔累不堪，积蓄很快用完，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332 页。

依靠太太变卖首饰来支撑。成舍我并没有因为张友鸾的反复无常而袖手旁观，看其笑话，而是对张极表同情，主动说愿意投资，和张合办。不过，成舍我后来又变了卦，说《民生报》缺总编辑，希望张友鸾回去，他也不向《南京早报》投资了。碰壁之后的张友鸾认为自己不是做老板的料，就把《南京早报》无偿送给了朋友，自己又乖乖地回到《民生报》做成舍我的伙计了。

不料成舍我这次接回的是给《民生报》"送终"的"丧门神"。张友鸾二进《民生报》不久，就编发了一篇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腐败的新闻，得罪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最后导致《民生报》被迫关门。成舍我也没有因此而心存芥蒂，后来他到上海和一帮朋友创办《立报》，在斟酌请谁做《立报》的创刊总编辑时，又一次想到了张友鸾。张友鸾不喜欢上海闹哄哄的样子，就推辞说："《世界日报》人材济济，你随便调一个人来就行，何必要我去。"成舍我说："我要你给《立报》打响第一炮哩！"①

成舍我当然清楚张友鸾的办报才华。上海《立报》是1935年9月20日创刊的，按照当时的准备情况，特别是印刷方面，还不具备正式出版的条件。因此，《立报》等于是提前出版。提前出版的主要原因，是总编辑张友鸾认为当日的一则新闻准能一炮打响，就选中9月20日这一天出版。

张友鸾"押宝"的这则新闻，是帮会头子、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雇凶杀人案，法院定在9月20日开庭审讯。顾竹轩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亨"，地位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不相上下。他雇凶暗杀了一个叫唐嘉鹏的仇人，被在押犯人供出。顾竹轩向租界巡捕房行贿，而巡捕房分赃不均，心中怀恨，对他实施突然袭击，逮捕后移交法院。那时老百姓对帮会势力的横行霸道极为痛恨，无奈帮会头子都和租界巡捕房有勾结，对他们没有办法，就连《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的本埠记者、编辑，也得拜"老头子"为"师父"，否则就不能安于其位。《立报》试版期间，恰逢顾案发生，张友鸾就组织记者，分别到法院、看守所、巡捕房及顾家采访，并且打听顾竹轩的徒弟如何活动、律师如何辩护、街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谈巷议如何等等，为正式出版做准备。谁知创刊那天，报纸印刷得很糟，出版又晚，尽管登了顾案的新闻，却没有引起读者注意。并且顾案开庭时，法院说还要继续侦查，宣布延期审理。报纸没有迎来预期的“开门红”。不过，一周后法院终于开庭审讯，9 月 28 日，《立报》用耸人听闻的题目《顾竹轩案昨开庭 庭外大叫嚣旁听奔逃秩序乱 看守所闹监》，作为头版头条刊出。除新闻报道外，还附有顾竹轩受审的照片，又在第三版用半版的篇幅，刊载审讯详记。这成为《立报》详细的独家新闻，一下子轰动了上海滩，报纸增印到七万份。为了巩固销数，此后一个多月，又对顾案进行了近 10 次的后续报道，直到发表了顾竹轩被判徒刑 15 年的判决书为止。

成舍我的用人方式，报馆的部门主管一般是礼聘而来，普通的编辑、记者，营业部门、排版印刷部门的员工，常常采用公开招考的办法。经过实践，成舍我深悟公开招考这种办法的妙用：首先，当时很多大专毕业生失业，报纸上的一个招聘广告立刻会引来许多青年学生应考，大家口耳相传，无形中等于给报社做了宣传。其次，通过公开招考进入报馆的人，月薪不多，又能埋头苦干，易于驾驭。由于他对人苛刻，薪金待遇又差，“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少吃草”，所以很难长期留住人，编辑部的人员变动频繁。不过，在成舍我的严苛要求之下，《世界日报》的确为旧新闻界造就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把“玳瑁”写成“乌龟”的毕群曾说：

> 《世界日报》开的是流水席，一批人进去了，一批人出来了；又一批人进去了，又一批人出来了。可能由于人事流动性大，成舍我提拔干部是较为放手的。只要你肯卖劲，不争钱的多少，而又稍具才干，往往能受到重用。因之，在新陈代谢之中，锻炼了人的工作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那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的，其它的报社都乐于接纳。我曾经听到一位新闻界前辈说：“世界日报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这话含蓄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又是真实的写照。[①]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1 页。

成舍我不但有容才之量、用才之方，而且有育才之术。1932 年，他干脆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为自己的报馆和社会培养专门的新闻人才。[①] 经过一番筹备，学校于翌年 2 月开始招生，先开办初级职业班。1935 年 9 月，又办了高级职业班。成舍我本来决定 1937 年开办本科，并且已经在报纸上登了招生广告，不料日寇侵华，北平沦陷，学校也就停办了。

从第一届初级职业班的招生简章，可以看出成舍我的办学目的和旨趣："本校最大目的，欲使凡在本校受过完全训练者，为出校服务报馆，则比每一报馆之高级职员——经理、编辑，皆能排字印刷，而每一个排字印刷之工人，全能充任经理、编辑，藉以废除新闻事业内长衫与短衫之区别，而收手脑并用、通用合作之效。"招生简章最后所附的特别提醒报考学生及家长的一段话，尤有深意：

> 本校目的，既在改进中国之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则凡投考本校者，其本身及其家长，务必对于本校之宗旨，有详切之认识。如本人及其家长，怀抱一般投考洋八股式学校者之同样心理，冀图本身或其子弟，将来毕业后，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则请千万勿误入此途。因新闻事业，最需要忠实勤奋，吃苦耐劳，而本校管理训练，亦将取极端严格主义。故凡有纨绔习气，或渴望将来升官发财者，即侥幸录取，亦必难保全始终，不仅贻害本校，亦实适以自误。投考之先，务希注意。[②]

后来，成舍我把这些意思凝练为"德智兼修，手脑并用"，作为学校的校训。

学校以不收学费和毕业后可以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民生报》等报馆工作相号召，这对高小及初中毕业生来说很有吸引力。第一届初

---

① 校址初在成方街，后迁到西四丰盛胡同。1935 年成舍我租借下西长安大街 32 号华北饭店整栋大楼，作为《世界日报》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之用，"北平新专"于该年 7 月从丰盛胡同迁到报社旧址石驸马大街 90 号。

②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3～144 页。

级职业班原定只取 40 名，竟有 600 多人报名。“其招考年龄限制极严，最高不得超过十八，竟有两鬓花白，仍称只十八岁而来投考者。至于程度，原只希望初中资格，但竟有高中、大学生亦来投考。……足证其号召力之大矣。”①

为培养“手脑并用”的新闻专门人才，教学安排理论与实践并重，上午上国文、英语、数学、报业常识等学科课，下午学排字、编辑等实习课。授课教师，多由《世界日报》高级编采人员兼任。身兼校长的成舍我也亲自给学生上国文、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当时已有徐宝璜、邵飘萍等人写的几本新闻学著作出版，成舍我都瞧不上。他宁愿讲授自己的一套东西，不过没有讲义，自己口授，让学生笔记下来，回家后再把笔记用毛笔誊写在正式笔记本上，藉此训练学生的听写及整理能力。在国文课上，严肃的成校长用湘潭口音摇头晃脑地吟诵、逐字逐句讲解桐城派古文的样子，让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林海音一回想起来就忍俊不止。

这种“手脑并用”的培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功效。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排版、印刷工人几乎都是“北平新专”的毕业生。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不但能够熟练地检字排版、开印刷机印报，还可以胜任采访、编辑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他们每人都扮演着两个角色：每天上午扮演新闻记者角色，衣着整齐地出去采访新闻。下午再换上排字房的工作装，做排字工人，到夜晚就去机器房，开机器印报。上海《立报》的战地新闻，主要靠这群年轻人冒着枪林弹雨去采访。他们的战地报道快而详细，深受读者欢迎，所以这一时期《立报》的销路特别好。总编辑储宝衡回忆说：“这时上海中日战争爆发，我们北平‘新专’同学，都成了前线记者，报道的又快又确实，全上海的人，对打仗的消息，都有一种不看《立报》不放心的感觉，足见《立报》深得读者的信任。”②

香港沦陷后，成舍我挈眷居于桂林。1942 年春，他借用原广西省政府干训班的校舍，创办了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简称“桂林世新”）。该校学制沿用“北平新专”旧制，主要招收流亡学生，不但免收学费，

---

① 《成舍我新闻专科学校》，1933 年 3 月 4 日《北洋画报》。

②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235 页。

还提供膳宿，为失学学生创造学习的机会。1944 年 6 月，日军进攻衡阳，桂林吃紧，学校在大撤退中停办。部分学生辗转到重庆，进入成舍我创办的重庆《世界日报》工作。

依托报馆兴办新闻学校，学校培养的人才又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报馆。在旧中国民营报人中，能够做到办报、兴学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成舍我一人而已。就成舍我自己来说，这恐怕也是他多彩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自己培养的这些“子弟兵”，不但能干，而且也忠诚于报社。郑逸梅在分析上海《立报》的成功因素时，就注意到了它在人事方面的优势：“《立报》不但是编辑上招了练习生，它的排字房里一般青年职工，也都是训练过的。这些人都是北方人，是成舍我在北方办报训练成功，带到南方来的。这些青年职工很可爱，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受过相当教育，他们而且会写稿子。我在编副刊时，他们常投稿，思想意识而且颇前进咧！因此《立报》的职工，和上海别家报馆的职工不通气，别家报馆往往闹罢工，而《立报》却不受他们的影响，现在办小型报的，都想追踪《立报》，但谈何容易呢！”[①]

在旧中国，成舍我有“新闻怪杰”之称。揆诸成舍我的一生，“上天”安排他降生人世，好像就是让他来办报纸、做新闻的。所以，他种种出人意表的办报招数，恐怕也是“非学而成、殆由天授”吧。

① 郑逸梅著：《书报话旧》，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82 页。

报界硬汉，新闻斗士

成舍我笔名“舍我”，显然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他取名“舍我”，无非是表明自己要踵武前贤，像孟夫子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这符合年轻人睥睨一世、当仁不让的英雄主义气概。以“舍我”为笔名，恐怕还有另一重意思，即它的字面含义——“舍弃自我”：义之所在，勇往直前；牺牲自我，在所不惜。实际上，在成舍我前半生新闻生涯中，呈现更多的是“舍弃自我”的悲情，而非“舍我其谁”的豪情。为了社会正义和新闻自由，他揭发不义，抨击特权，宁折不屈，几遭不测，赢得了“报界硬汉”、“新闻斗士”的称誉。

青年时代的成舍我就敢于主持公道，挑战权势。1916 年，18 岁的成舍我流浪到上海，靠卖文为生。他的文章受到《民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叶楚伧的赏识，被聘入《民国日报》任编辑。此时，成舍我也加入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第二年，南社内部关于诗歌宗唐尊宋问题发生激烈笔战。南社主任柳亚子论诗“尊唐抑宋”，贬抑尊奉宋代江西诗派的陈三立、郑孝胥等“同光体”诗人，遭到南社社员朱鸳雏的反对。柳亚子未经社友讨论，独断专行，贸然发出《南社紧急布告》，将朱鸳雏驱逐出社。

成舍我认为柳朱之争纯属私人问题，非南社团体之问题；朱鸳雏如果侮辱了柳亚子，柳与之绝交可也，诉诸法庭可也，而竟以私怨驱逐朱鸳雏，实属违规。他写信给柳亚子，表示反对，并以典当衣物之钱，在《中华新报》上刊出《南社社员公鉴》，斥责柳亚子的狂妄欺人，为朱鸳

雏抱不平。柳亚子又将成舍我驱逐出社。

经过南社的这次纷争，成舍我决意离开上海，北上求学。1918 年 8 月，他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旁听生，同时兼任北京《益世报》总编辑，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艰辛生活。为了不影响学业，能够从旁听生转为正式生，他征得社长顾竹轩的同意，一个学期后由总编辑改为主笔。1919 年 5 月 23 日，正是"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安福与强盗》社论，称安福俱乐部是"强盗的魔窟"，安福系的所作所为，"那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呼吁国民起来"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的魔窟"。这篇社论，自然受到安福系的嫉恨，《益世报》因此而被停刊三天，总编辑潘蕴超遭到逮捕。"五四运动"前，北京《益世报》无声无息，销路很少。"五四运动"爆发后，凭借天主教的势力（《益世报》为美国天主教神甫雷鸣远主办），在言论和报道方面敢于放胆说话，销数日升。特别是经过报馆被封这件事后，报纸的发行量激增。成舍我撰写的这篇《安福与强盗》社论，招致报纸被停刊三天，杜竹轩不但没有解雇他，反而让他代行总编辑之职。

1924 年，26 岁的成舍我开始自己做老板，在北京相继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1926 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政府卫队枪杀请愿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成舍我即在《世界日报》发表署名"舍我"、题为《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的社评，提出段政府应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关于"三·一八"惨案，《世界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还出版了专刊。随后，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五人以图卸责，京师地方检查厅又确认段祺瑞卫队犯有杀人之罪，"世界"日、晚报都适时发表社评，严加谴责。

当了老板后的成舍我常对编辑和记者们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① 到 1945 年 11 月"世界"日、晚报在北平复刊，成舍我已走过 30 多年的办报历程；在这 30 多年中，他本人坐牢不下 20 次，报馆被封不下 10 次。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成舍我不下20次的坐牢经历，其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他在南京办《民生报》时，因得罪行政院长汪精卫而遭受的40天牢狱之灾。

1934年5月，有记者采访到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彭学沛是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的亲信，又是成舍我的第二任太太萧宗让的姑父。这样的新闻，《民生报》敢不敢登？要不要登？总编辑张友鸾回忆：

> 1934年5月，我再次任《民生报》总编辑时，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住宅小洋房；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来计划一倍以上。我曾听说彭和成是亲戚，有些踌躇，拿着稿子去问他，他却说："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刊登！"新闻一经发表，彭就向法院控告成"妨害名誉"。当时有程沧波、端木恺、萧同兹、俞新武等人，从中调停，要他登一个更正启事，彭愿撤回诉讼。他因事实俱在，为了报社信誉，坚决拒绝。后来法院提起公诉，他出庭答辩，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那天我去旁听的，原告彭学沛倒没有到。这是行政院交办的案件，法院不能不买账，于是把他判处短期徒刑，但予缓期执行。这本是扯淡的事，他还是不服，把写的万言答辩书登在报上，请求社会公评。彭无法还手，就请行政院长汪精卫，施用政治压力。因为刊登了德国海通社一条新闻，硬说《民生报》"泄露军情"，下令封门抓人。宪兵司令部人马来时，他适外出，我说："我是总编辑，责任应该我负，我去。"经理周邦式（长宪）说："成先生长期不在南京，我是负责人，我去。"他们一个不要，定要成舍我"正身"。就是这样，他被捉走。于是周在南京，我去上海，活动营救。他一直被关了40天，由于李石曾出面，才准予保释。9月1日，我坐汽车到宪兵司令部，从"优待室"里把他接出来。当时《民生报》原可以复刊的，他在汽车上和我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①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成舍我后来告诉马之骕说，事情是由一篇有趣的特写报道引起的。这篇特写报道的大意为：某日行政院汪精卫院长亲自主持一项重要会议，当与会人员到齐时，院长却不知去向，遍找无着，把秘书人员急得团团转。正在焦急慌乱之际，有人发现院长被关在厕所里，无法出来。原来，行政院办公楼刚刚落成，所有门锁按照规定均为外国进口的高级弹簧锁，而实际使用的都是赝品，质量甚差。汪在会前如厕小解，厕所门自动上锁，事后怎么也打不开，虽敲门呼救，也未被人发现，只好忍耐一时了。汪精卫如厕被困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家喻户晓。汪精卫大为光火，严斥负责工程的政务处长彭学沛，彭学沛顾及面子问题，曾提出辞呈。《民生报》以《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为标题，发头条对此进行详细报道，使汪精卫更为不快，遂以《民生报》公然污蔑行政院为由，下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那天，几乎全张报纸，都是在质问“汪院长”，查封报馆根据的是哪条法律？并对贪污案大肆渲染，报纸销路因此大增。汪精卫心中愤恨却无可奈何，后来授意彭学沛向首都地方法院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

开庭之日，旁听的民众有两千人之多，把首都地方法院挤得水泄不通。成舍我早期办报，常被人控告，为了准备答辩，他总是自己写答辩书。后来报社聘请了法律顾问，他还是肯于钻研法律，把一部《六法全书》差不多都翻烂了。这次成舍我依然是亲自出庭答辩，用事实和法理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博得如雷掌声和阵阵喝彩，出尽了风头。成舍我后来忆及自己当年在法庭上的表现，还洋洋自得，说这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①]“成舍我”的大名，在平津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在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11～213页。吴范寰的记述是：《民生报》揭露彭学沛贪污的新闻已被南京新闻检查机构删扣，但成舍我认为此类新闻与删扣规定不合，结果仍予以刊布。汪精卫大为震怒，以不服检查的罪名，通知南京警察厅罚令《民生报》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又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江宁地方法院控成舍我妨害名誉，经法院侦察后提起公诉。成认为打官司有助于报纸业务发展，遂亲撰答辩书万余言，全力应付讼案。后来南京新闻界程沧波等以国难严重为由，要求息讼。结果关于妨害名誉部分，由彭学沛自行撤回，法院中止宣判了事。吴范寰：《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37～238页。

沪宁还不够响亮。经过“彭案”之后，“成舍我”已名震江南了。

关于后来汪精卫公报私怨、下令查封《民生报》和逮捕成舍我的借口，以及被保释出狱的经过，张友鸾的说法是《民生报》刊登了德国海通社的一条新闻，被指控“泄露军情”而身陷囹圄，后经李石曾出面保释才获得自由。吴范寰发表的回忆文章《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也持同样的说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事人之一，和成舍我同时被捕、一同度过40天铁窗生活的陈云阁，为了史料存真，特意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 成舍我为《民生报》和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打官司，留在南京。我那时在民族通讯社（简称民族社）任采访外交消息的记者，还没有进入德国海通社。南京成立海通分社，是在同年民族社已经关门以后的事。成和我被捕绝对不是因为《民生报》刊登了海通社的军事消息，而是它刊登了一条由我采访并由民族社通过送检手续才发表的重要政治新闻。当晚被捕的《民生报》方面只有成舍我一个，代他经常负责照料报馆的周邦式和负责编稿的张友鸾都未被抓去。民族社方面初先只抓我一个，还是因我得到社里通知，自己到宪兵部去联系时被扣留下来的；但随后又把社长赵冰谷（又名雪岩）和总编辑钟贡勋抓来了。当晚成舍我和我们三个不在一起，第二天才关在一间房里。直到放出为止，一同经历了40天的铁窗生活。我和成舍我虽早已认识，但结成好友是从这里开始的。
>
> 我们出事的这条消息的内容，和南京当局为什么要抓成舍我的真正原因说来话长。大汉奸行政院长汪精卫身边的彭学沛主管修建该院办公大楼有贪污行为，被《民生报》尽情揭露，因而涉讼；成舍我在地方法庭公审时，又把彭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彭因此恼羞成怒。虽经朋友从中调停，由彭自动撤回控诉了事，但总想另找机会打击报复。一次，我从接近监察院长于右任的该院参事商文立那里得到一条消息，内容是汪、于两院长为铁道部向国外购买建筑材料发生贪污舞弊问题，在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中政会内发生争执，引出蒋的干预。消息说：蒋那时正在江西忙于“剿共”军事；汪坐镇南京，正在搞华北通车通邮卖国勾当，汪、于争执中，于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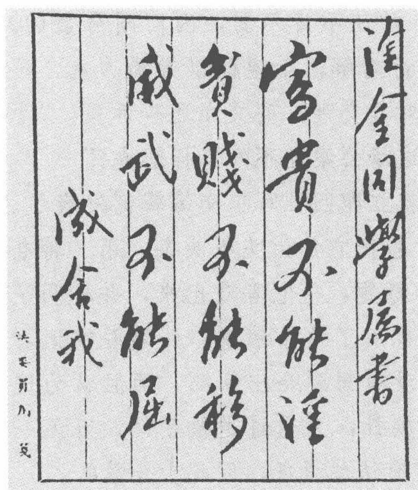
任虽非实权派，但站在有理一边，对汪不肯示弱，因而闹得很凶。蒋为平息内哄，只得分电于、汪进行劝解，希望能以大局为重，不再争吵，以免影响江西军事与华北对日交涉。商文立还告诉我："于先生见到蒋的来电后，没说什么，这场公案还不知怎样解决。"

我当时只认为这是一条要闻，就立即回社写稿交编辑部发表了。《民生报》以为这条消息很合需要，就把它作为头版头条，用《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八个木刻大字作标题，把它登载出来，并标明了民族社是消息来源。南京别的大报也用了这条消息，外地驻京记者也有据以发出电讯的。成舍我不但没有想到会出问题，而且认为这条消息来自国民党组织部控制的民族社，又通过送检手续，万无一失。即使出了岔子，《民生报》也没有法律责任，因此十分放心。

不料彭学沛一见《民生报》登出这条消息就认为整成舍我的机会到了；于是向汪汇报说，南京报界有人想借此兴风作浪、扩大事态，激起汪的恼怒，并促劝汪电蒋采取制服措施，以防暗潮。和汪有密切联系的杨永泰，是蒋的行营秘书长，得到汪的密电就用"捏造文电，鼓动政潮"的大帽子，请蒋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谷奉电令当然雷厉风行，就把《民生报》和民族社当晚封闭，又把我们四个分开诱捕起来了。在诱捕成舍我时，是派的非武装特务，借口请他去谈话的方式进行的。但他很敏感，把常用衣物和盥洗用具都带在一道。特务假装说何必那样，他还是坚持带去。他第二天早上穿上外衣，在天井刷牙，我们都很惊异。他见到我们三人毫无准备的样子，也暗暗发笑。随后我们关在一起时问他，他说，他在北平多次坐监，对于此道不但有敏感，也很内行了。

……

尽管几方面都有人暗中为我们进行活动，但最后还是得力于汪身边另一亲信唐有壬的说情。唐那时在外交部当常务次长（汪兼外交部长)、正在为汪主办华北通车通邮对日交涉；他和彭学沛有私人隔阂。成舍我通过家属暗中托人取得唐的同情，在唐随汪上庐山开会途中把汪说通了。当蒋、汪会面谈及此事时，汪当面表示可以从宽发落，蒋也乐得了此公案。他的电令一到，未经任何麻烦手续，



成舍我为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生的题词。

> 只叫我们各写一张悔过书，就同时释放出来了。这一天正是旧社会搞的第一个记者节的日子，对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这并不像前述那篇史料文章所说，得力于李石曾的营救。其实C.C.系头子为了保全民族社，也曾暗中通过陈布雷，向蒋有所进言。但蒋为要敷衍汪的面子，还得等汪松口；所以如无唐有壬的背后疏通，也不会这样容易了结。这个内情是成舍我后来在我们当中津津乐道，而为我从C.C.头面人物方面得到印证的实情。我们出来不久，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道藩还以民族社后台身份，约请我们四人到部里去谈过一次话。言外之意，很责怪我们对这类新闻的处理太不审慎，使我和成舍我大感不快。因为我们确知自己并非他们的派系分子，怎能这样对待？所以谈话一完，我们就不欢而散。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记述这桩秘史，不只为要说明《民生报》的查封真相，和我与成舍我关系的来历，也是对国民党当局控制新闻手法的一次揭露。[①]

成舍我于1934年7月22日夜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拘捕，9月1日获释，这次被囚禁了整整40天，是他一生坐牢经历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释放前，汪精卫很不放心，为防后患，特别嘱托宪兵司令部向成舍我开具了五项条件，作为获释的前提：（一）《民生报》永远停刊；（二）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三）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四）不得在任何集会，作批评政府的演说；（五）以后如离开南京，无论到达任何城市，应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成舍我为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231页。

了早日获得自由，顾不了许多，先应承下来再说。

成舍我获释的第三天，唐有壬前来拜访，向他暗示“汪院长”可以取消上述五项条件，《民生报》也可以立告恢复，但前提是成舍我要给汪写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以前种种全出误会；信由唐有壬代交，再由唐有壬安排一次成汪见面，成舍我向汪精卫说几句请他原谅、保证今后竭诚拥护汪精卫的话，则一场风波自可从此终结。成舍我一听，毫不考虑地当即予以拒绝。唐有壬警告成舍我：“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长碰，结果，无疑是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回答道：“我的看法，全不如此，惟其不怕头破血流才配做新闻记者。而且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的正义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绝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①]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绝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成舍我这句自由正义的新闻记者笑傲贪墨骄横的官僚政客的话，掷地有声，光芒四射，值得永载中国新闻传播史册！

成舍我这次被捕，只是被关押的时间长，并无性命之虞。在他一生20余次的被拘经历中，最为惊险的要属1926年秋被“混世魔王”张宗昌捕获。

1926年4月，张学良统率的奉军、张宗昌统率的直鲁联军进入北京，成为这座城市的新主人。为了震慑异己，树立威望，二张首先从新闻界开刀，于4月26日捕杀《京报》社长邵飘萍，8月6日又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制造了“萍水相逢百日间”的言论恐怖。8月7日晚，也就是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一队宪兵拥入成宅，二话不说，将成舍我推上了卡车。成舍我在当天的《世界晚报》上，刚发表过一篇根据外勤报告而写的《林白水先生遇害经过》。现在的情况与林白水被捕如出一辙，他料想自己跟林白水一样必死无疑，因为林白水被捕后，押解他的卡车直驶天桥刑场，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个小时。

然而，押解成舍我的卡车没有直接驶向天桥，而是开到了宪兵司令部。原来，捕杀林白水，张宗昌事先已将枪毙的命令交给宪兵司令王琦，所以只要捕获就可以立即执行。据说，成舍我被捕前，张宗昌曾说过，这家伙，抓到就毙了完事，但是这话并没有当面吩咐过王琦，而枪毙像

---

① 成舍我著：《报学杂著》，中央文物供应社（台湾）1956年版，第131～132页。

成舍我这样的人，王琦照例总要得着张宗昌的一句话。也是成舍我命不该绝，那晚张宗昌新讨了一房姨太太，当王琦赶来请示时，被副官拦住了："王司令，你怎么这样不凑趣，今晚大帅好日子，只要人抓住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杀，何必抢在此刻，来惹大帅恶心呢?"[①]

张大帅的"好日子"为成舍我的家人和朋友换来了宝贵的营救时间。在成舍我被宪兵押上大卡车后，家人和报馆立即向各方求援，成夫人杨璠夤夜赶往前国务总理孙宝琦家，长跪不起，泣求孙宝琦救成舍我一命。

孙宝琦字慕韩，与赵尔巽、王士珍被尊为"北洋三老"，在北方军政界颇孚声望。当年，曹锟贿选上总统后，就拉孙宝琦出任国务总理以撑持场面。孙与曹素无关系，而曹的周围想做国务总理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孙上任不久即遭到保定派反对，尤以王克敏反对最烈。王是财政总长，北京多数报馆都仰仗他发津贴。王克敏给报馆发放津贴的条件是要公开反对孙宝琦，于是那些拿津贴的报纸群起围攻"孙总理"，这个骂他老迈无能，尸位素餐，那个骂他头脑昏庸，难当大任，把孙宝琦整得头昏脑涨，不知如何是好。王克敏还控制"国务总理用钱"，甚至连孙的薪俸都不按时发给，孙宝琦自然也无钱敷衍报馆，只好硬着头皮任其围攻了。

北京城的老百姓认为孙宝琦是"大好人"，都为他叫屈，而王克敏本来就是"金佛郎案"的罪魁祸首[②]，久为社会所不齿。此时成舍我刚创办《世界晚报》，他顺应民意，站出来为孙宝琦打抱不平。他让张恨水每天都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里，做几首打油诗，来讽刺、挖苦王克敏。

---

①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124 页。

② 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战败，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39 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其中法国占 15.75%，每年约合法币 1400 多万佛郎。原以海关银两折合，但是自欧战爆发以后，佛郎骤跌，法国政府竟于 1922 年 6 月 22 日，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将历来电汇还款办法，改为照金元计算。对法国的无理要求，国人反响激烈，咸表反对。自徐世昌去职至黎元洪复位，北洋政府均不接受法国的还款要求；法国政府遂不择手段，请北京外交团于中国海关税盐税两项内，将法国应得之罚款，依照金元计算之标准，悉数由总税务司先行扣留，不准中国政府提用。及段祺瑞出任临时总执政，以财政困难，乃于 1925 年 4 月 12 日，由外交总长沈端麟与法国公使订立条约，同意用金元偿还对法之庚子赔款，作为退还被总税务司扣留的 1600 万元海关税盐税的条件。按照当时佛郎汇兑率平均价格计算，中国將增加 8000 多万元的国库负担。这一事件，史称"金佛郎案"。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王克敏时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为"金佛郎案"之罪魁祸首，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世界晚报》能够如此主持公道，使四面受敌的孙宝琦大为感动，他对成舍我也暗生赏识之意。适逢端午节来临，孙宝琦特意嘱托长子景阳往访“成社长”，送上两百块大洋的支票，以示感谢。成舍我一口回绝，他说：“我支持孙总理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要收你这两百块钱，不是就失掉我的原意了吗？何况我一向不要人家的钱，假如我向王克敏要钱，一定会比你这两百块多十倍、百倍。”[①] 从此，孙景阳与成舍我成了朋友，成也开始和孙府来往。

成舍我没有想到，孙宝琦会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

孙宝琦听了成太太杨璠的诉说后，不敢怠慢，天不明既赶往张宗昌府邸。张督办还在温柔乡里酣睡，孙告诉副官：“我在客厅等督办，你现在不必惊动他，他什么时候起床，请你尽先报告，只说我天亮就来了！”

一觉醒来的张宗昌听副官报告说孙宝琦早在客厅坐候，连呼“失礼”，迅起迎晤。张宗昌对孙宝琦如此客气，是因为有求于他。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奉系准备请孙宝琦组阁，张宗昌主张尤力，正多方向孙宝琦劝驾，促其出山。张以为孙宝琦此行是为了商讨组阁大计，不料却为成舍我而来。

张宗昌先客套一番，说区区小事何劳慕老枉驾亲临，然后历数成舍我三大罪状，骂成舍我咎由自取，死有余辜：一、恶毒反奉；二、和冯玉祥有密切勾结；三、替国民党扩大宣传，最近还接受了广州10万元宣传费。孙宝琦逐一为成舍我开脱：

> 第一点，如果报纸反奉，是在你们进城以前，则那时冯军统治北京，谁敢明目张胆，不登冯军所发反奉消息，而甘冒危险帮你们讲话？这是北京报纸最普遍现象，也是他们办报者共有的苦痛，我相信《世界日报》绝对没有比其他报纸反奉特别恶毒。至于第二点，他根本和冯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谈不到有任何密切勾结。目前最重要的，在第三点，假使他真是接受了广东这么大的一笔宣传费，在北京故意和你们捣乱，那么军事时期，我也不敢替他说情。否则子虚乌有，我就不能不请你从宽处置，立予释放。好在十万元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185～187页。

> 数目不算小，由那家银行汇的，来龙去脉，极易调查。但据我所知，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都是由他个人辛苦经营，白手起家，从没有任何背景，他本身生活，十分刻苦，恐怕十万元之说，未必可靠。①

经此一说，张宗昌终于松口，表示无论如何看在慕老分上，决不重办。孙宝琦辞谢张宗昌，即把前后情形告知成舍我的家属和报馆，要报馆赶快开出成舍我的债主姓名、债款数目，并检出最近一些当票，自己据此再写一封信送给张宗昌，证明成舍我负债累累，决非腰缠万贯之人，所谓接受广州 10 万元宣传费纯属子虚乌有。张宗昌当晚覆函孙宝琦："本应立予枪决，兹承尊嘱，已改为无期徒刑。"

孙宝琦心中暗骂，这个张宗昌不愧称"混世魔王"。第二天，他再去张府，问改处成舍我无期徒刑，是否系查出成舍我确已收受广东来款。张谓尚未查出。孙说，如果成某罪有应得，处死亦不足惜，否则无期徒刑甚至坐一天牢，也未免冤枉好人。张宗昌见孙宝琦如此为成舍我奔走求情，知道两人的交谊非同寻常，乃允再行考虑，但口头仍说还要派人切实调查。两天后，张宗昌派副官手持一张大卡片，上写"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将成舍我作为"礼物"送至孙府。孙宝琦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交张的副官带回。

在成舍我被张宗昌手下捕获的最初十几小时内，北京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成将步邵飘萍、林白水后尘，必死无疑。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已经等在天桥刑场附近，准备为他送别。路透社发出的第一次电报，说成舍我已被处决，国外朋友还打唁电慰问他的家属。当时的情势已严重到这样的地步。成舍我后来说自己这次离"鬼门关""只差一根头发的距离"，决非虚言。若不是当晚大帅"好日子"，孙宝琦又全力相救，成舍我恐怕真的要"以身殉报"了。军阀时代的横暴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圣先贤孟子的这句话，成舍我终生服膺，身体力行，成就了他"报界硬汉"、"新闻斗士"的威名。

---

①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125 页。

报人问政

办报、兴学、问政，是成舍我一生志业的三个方面。他的“问政”经历，始于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关于国民参政会，应该先从它的“胚胎”——国防参议会说起。

1937年8月11日，感到“和平既然无望，只有抗战到底”的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议设立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再设国防参议会，“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是”[①]。于是，国防最高会议综合考虑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专业特长等因素，在全国选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第一批被遴选的参议员，有张耀增、张君劢、曾琦、胡适、蒋百里、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马君武、毛泽东、晏阳初，一共16人。后来又增聘罗文干、颜惠庆、施肇基、徐谦、左舜生、甘介侯、杨赓陶，加上当然参议员即国防最高会议正、副主席蒋介石、汪精卫，共有25人。[②]

---

①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会上对成立“国防参议会”的说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速纪录》，转引自闻黎明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 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名单从未正式公布，除了最初遴选的16人外，增聘之人各种记载出入颇大。一些著作中提到梅贻琦、陈启天、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张东荪、陈布雷等，大概都是临时约来参加讨论的，似乎除第一批参议员外，国民党只要认为有必要，都可以随时请来开会，参加会议者也无人计较是否具有参议员这一名衔。闻黎明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国民党长期把持政权，从不允许在野党派在体制内参与国家政治。国防参议会的设立，终于开启了在野力量参政问政之门。“国民党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吸纳国民党外的在野党派和团体的领袖为抗战献计献策，并为最高当局制定战时政策提供咨询，但其另一个用意，则在于展示国民党决心团结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共同抗战的姿态。”[①] 从 1937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到次年 6 月 17 日宣布结束，国防参议会 10 个月中，共集会 64 次。“九国公约”在布鲁塞尔开会期间[②]，国防参议会每周都集会三至四次，及时了解国际动态，商讨应对措施。因抗战军兴而设立的国防参议会，确实发挥了“集中意见，团结御侮”的作用。

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国防参议会组织要纲》的规定[③]，国防参议会只是一个战时政策咨议机构，参议员只有咨询权和建议权，权能有限；参议会提案不具有法律效力，须提交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再转交政府实施，国防最高会议是否采纳及政府执行情况如何，均无需向其报告；参议员人数少且遴选范围狭窄，不足以代表民意。因此，从国防参议会的形式、规模，特别是职能来看，它不能适应群策群力、团结御侮的迫切需要。

寇患愈深，有识之士愈认识到谋求抗战胜利必须倚重民意。上海沦陷前，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等九人，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呈递调整政府机构、发动民众、成立民意机关、肃清贪污等四项建议。中国共产党也建议国民党健全民意机关，其组织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地，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

---

① 闻黎明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② “九国公约”成立于 1922 年，为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

③ 这份当时油印的文件，从未正式公布过，1980 年代周天度先生进行沈钧儒研究时，才从沈老遗物中发现。《要纲》共八条，其中前四条最为重要：“第一条，国防最高会议为集中意见，团结御侮，设立国防参议会。第二条，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听取政府关于军事外交财政政策之报告，得制成意见书于国防最高会议。第三条，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负责扩大全国国民团结之宣传，以期一德一心，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第四条，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由国防最高会议指派或聘任之，开会时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或副主席任主席。”周天度：《1937 年的国防参议会》，1989 年 10 月 17 日《团结报》。

胞公意的人才；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①]

1938年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卢沟桥事变以来军事、外交频频失利的国民党，切实感到靠一己之力难克强敌，发动全国政治力量，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势所必需。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将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大会宣言对设立国民参政会有一段解释：“至于政治机构，更有当郑重声明者：战事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权。惟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惟值此非常时期，政府不能不有紧急处分之权，俾临危处变，有所应付。要而言之，民众之基础，亦于此建立，则抗战胜利之日，结束军事，推行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建设，为势固至顺也。”[②] 这次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也有“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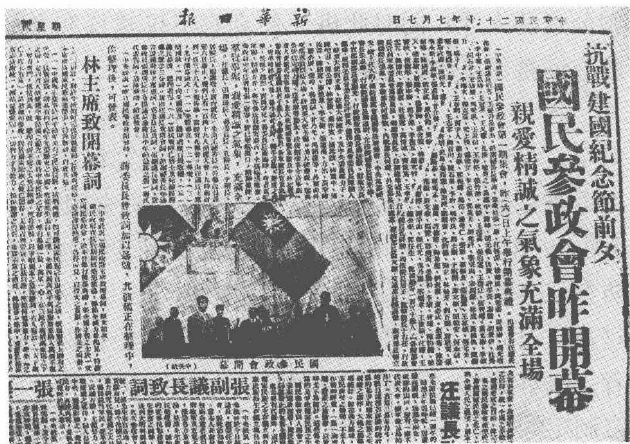
1938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200名参政员名单，成舍我名列其中。同日，国防参议会举行第64次会议，宣告结束。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除蒋梦麟外，其余皆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于该日选任汪精卫、张伯苓为国民参政会正、副议长。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200名参政员由下列四类人员组成：（甲）由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遴选88名；（乙）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6名；（丙）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

---

①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487页。

②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新華日報

抗戰建國紀念節前夕
國民參政會昨開幕
親愛精誠之氣象充滿全場

林主席致開幕詞

國民參政會開幕

張副議長致詞

汪議長

1938 年 7 月 7 日汉口《新华日报》对国民参政会开幕的报道。

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 6 名；（丁）由曾在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 100 名。①

成舍我属于“丁”项膺选。该项包括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村治派等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可以说是国防参议会的扩大。成舍我因为在新闻界“著有信望”，被国民党政府当作“社会贤达”，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 年 7 月 6 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两仪路上海大戏院开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都亲自到会致辞。林森指出：“国民参政会为抗战时期之人民参政机关，其最大使命，为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其最大目的，在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与欧美政党政治之议会实不相同。”蒋介石在致辞中说，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

① 国民党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及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订法规。1938 年 4 月 12 日，《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公布，规定参政员总额为 150 名，其中“丁”项即在野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只有 50 名。名额过少，群情不满。经过争论，国民政府于同年 6 月 16 日公布修正条例，将“丁”项扩至 100 名，总名额增至 200 名。《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后经数次修正，到 1947 年 5 月四届三次大会亦即最后一次大会时，参政员总额增至 362 名。

切实完成两个基本任务：第一，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助成抗战的胜利，促进建国的成功；第二，“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①]

会议期间，汪精卫以国民参政会议长身份，假汉口某银行大厦宴请全体参政员。[②] 为表示谦恭下士，汪亲自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大家，彭学沛（时任参政会副秘书长）则站在汪的旁边随时应招。当彭学沛看到成舍我走进大厅时，非常不安，立即躲开。汪精卫却丝毫没有改变他那副满面春风的姿态，长时间紧紧握着成的手，并破例把成舍我引到里面一列沙发坐下，用很柔和的声调与成舍我寒暄：“我们大约已好多年不见了，你北平和上海的事业，都已为国家抗战而牺牲。我们很担心你在北平出不来。最近听说，你的《立报》又已在香港出版。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对中国人很不客气，尤其他们处处想博取日本人欢心，在那里办报，大概很苦痛吧？”说到“苦痛”两字，汪精卫笑容顿收，还频频地擦其两掌，似乎很替成舍我着急的样子。看着汪精卫假惺惺的样子，成舍我既好气又好笑，他不失时机地揶揄了汪一下：“承汪先生这样关切，我不胜感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北平上海沦陷，个人事业的毁灭，那是无法避免，也是无足顾惜的。至于香港办报，诚然痛苦很多，所幸香港虽是殖民地，在相当范围内，还能实行法治，她好像还没有过不依法律手续，封报馆捕记者，从这一点说，是比我们过去在国内办报，要有较大的身体安全和言论自由啊！”听出了话外之音的汪精卫，不待成舍我再说下去，竟像触电似地站起来，马上离开了。[③]

国民参政会具有提案权、审议权、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等职权，虽不是真正民选议会，但是具有了代议制议会的雏形。国民政府首脑多有称参政会为“战时国会”，而这一“战时国会”，确实汇集了全国英卓

---

①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1、164～165 页。

②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民参政会置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1938 年 6 月 17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汪精卫、张伯苓为国民参政会正副议长。1938 年 12 月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后，由蒋介石任议长。1940 年 9 月，取消议长，改由参政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负责。

③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129～130 页。

之士，很多参政员也以“民意代表”自任，[①] 所提议案或行使审议权、询问权等职权时，总体上能反映战时民心。在国民参政会全部四届 13 次大会中，参政员共提交提案 2669 件，其中 2630 多件均经大会决议通过。有的提案十分重要，例如四届一次大会，有 13 件提案事关国民大会的组成、职权和召开。与提案权一样，询问权是国民参政会的另一项重要权力，也是参政员问政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为使询问权落到实处，《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国民政府 1938 年 7 月 1 日公布，后有修正）规定：“参政员之询问事项，除因国家利益有不便宣答之重大理由者外，主管机关长官应为书面或口头之答覆。”提出询问案颇能反映参政员问政的能力和胆识。有的询问案非常引人注目，如一届三次大会上参政员钱端升、周览、陈博生、张忠绂、傅斯年等五人对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质询。有的询问极其尖锐，使做施政报告的政府官长难以招架。例如，在三届二次大会上，粮食部长徐堪做完施政报告后，有参政员当面质询他：“平价米内不仅有矿物如灰砂，且有动物如蛀虫甲虫；并且因仓储管理不善，米多潮湿霉腐，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八宝饭。请问徐部长，你是否吃这种饭？你的感想如何？你有没有能力和信心去改善？若没有办法，最好另让贤能。”粮食部随后作出了书面答覆，但措辞失态，会场群情激奋，引起轩然大波。参政员马毅说那是污蔑参政会，高惜水提议退回全部书面答覆。傅斯年说：“请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将徐部长失态情形报告蒋主席！”许德珩说：“此事关系重大，小则粮食部失言，大则关系中国今后民主建设问题。”孔庚则大叫：“在闭会之前，没有结果，我们不闭会！”大会表决，请徐堪出席答覆。最后，徐堪不得不亲自

---

① 参政员邹韬奋著文《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说，国民参政会是中国在非常时期所产生的“非常的民意机关”。和欧美各国议会相比，国民参政会有两大差异：第一，各国议会里的议员是由民选而来，而参政员是由政府选请而来的；第二，各国议院里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各党有各党的目标，往往互相非难，而参政员却是由各党各派、各区域、各民族及无党无派的国民，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因此，以欧美标准来衡量，参政会当然不是民意机关；但作为参政员来说，却应该以民意代表自任，应该把国民参政会视为民意机关，应该努力使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成为民意机关。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4 页。

到参政会致歉，并自行撤回答覆书，重新修改。[①]

国民参政会自 1938 年 7 月在武汉成立至 1948 年 3 月在南京结束，历时 10 年四届，共召开过 13 次大会。成舍我连任了四届参议员。不过，他的“问政”表现却乏善可陈，每遇参政会开会，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坐在会场捧着《世界日报》勾错字，几乎是位“不提案、不发言、不投票”的“三不主义”者。[②]

成舍我的第二个“问政”经历是被选为“国大”代表，参加“制宪”大会，议定《中华民国宪法》。

根据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次第进行的革命方略，1928 年 8 月，底定平津的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华民国军政时期结束，全党应着手准备进入训政时期。10 月 3 日，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五人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次年 3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军政时期已告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追认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训政政治体制由此建立。1931 年 6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

孙中山 1906 年编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约法之治”预设的期限为六年，然后解除约法，制定宪法，全国政事，皆依宪法行之。1929 年 6 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训政时期之规定案》也明确：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 24 年完成。但是，《训政时期约法》没有明文规定训政年限，只是说“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政治”时为止。这样，国民党就可以无限期延长训政时间。然而，《训政时期约法》公布实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众呼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同时，国民党内孙科、胡汉民等亦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主张开放党禁，允许各政党竞争，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宪政政府。1932 年 12 月，国

①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08～609 页。

② 易春秋：《成舍我大声疾呼保障人权》，《新闻天地》（香港）第 370 期，1955 年 3 月 19 日出版。

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议决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决定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1933年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院长孙科任委员长，吴经熊、张知本任副委员长，傅秉常等36人为委员，负责宪法的起草事宜。1936年5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历时三年、稿经七易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予以公布，史称“五五宪草”。

国民党在组织一班人马起草宪法草案的同时，还开始进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为召开“国大”、议定宪法做准备。由于种种原因，原定于1935年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一拖再拖，后又将会期定于1937年11月，不料全面抗战爆发，终未能如期举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改组国民政府、军队国家化、宪法草案、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国民大会案》规定：当年5月5日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宪法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1936年选出的1200名国大代表依然有效，台湾、东北增加区域代表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分配方法另行商定。《宪法草案案》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政协的五方面——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人士及会外专家组成，根据政协拟定的修改原则（核心为放弃“五五宪草”的总统制而实行责任内阁制），参酌各方意见，两个月内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议定。关于国大和宪法草案问题，实际上还有不公开的商定事项：（一）各党派负责使其出席国大之党员在国民大会中维持政协修正之宪法草案；（二）如有其他较好之宪草意见，由党派临时协商定之；（三）增加的700名国大代表分配方法为：国民党220名，中共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另根据国共双方的默契，在原有1200名区域代表中，华北战前未及选出需要补选的250名，由中共解放区选出，无党派代表中可有17名由中共或民盟提名，这样中共和民盟合计共有577名代表，超过了四分之一否决权的票数，以防止国民党将国

民大会作为表决机器。[1]

不料，从 1946 年 3 月开始，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冲突日益扩大，原定于 5 月 5 日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又将成为泡影。4 月 24 日，蒋介石召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征请各方面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中共和民盟代表主张大会再行延期。蒋介石无奈同意，第二天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这已是国民政府第五次宣布国民大会延期。[2]

国民大会已成为国民党的一块心病，欲罢不能，欲开不成。为了从政治上孤立中共甚至是获得剿灭中共的“合法性”，改善政府形象，为自己的统治建立法理依据，1946 年 7 月 4 日，在内战已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和民盟的抵制，悍然宣布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相信“共军主力已被击溃”的蒋介石，当天下午即宣布，国民大会一月后如期举行。

在国共双方就国大问题形成尖锐对抗之时，第三方面的态度顿时显得举足轻重，“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

---

① 参阅汪朝光著：《中华民国史·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57～159 页。

② 国民党政府曾宣布 1935 年 3 月、1937 年 11 月、1940 年 11 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但均未能如期进行，一再拖延。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和机制更加强化，政治日趋腐败，引起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盟国尤其是美国也非常关注国民党的统治危机，罗斯福总统曾建议蒋介石，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决纠纷。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在 1943 年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1944 年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湘桂战场一败涂地，朝野震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国共两党原来的关系模式必须改变，遂授命林伯渠于 1944 年 9 月 15 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第三势力民盟的热烈拥护。习惯于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然不同意中共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声称这种做法有违于孙中山总理的《建国大纲》，国民党只能通过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不是还于其他党派。1945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促进会发表演讲，公开否定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声言将于本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蒋介石的这一建议，被两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大”所接受。1945 年 7 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召开，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具体事宜。中共中央事先即声明本党参政员不参加这次大会，给一意孤行的国民党造成强大的压力。由于与会的民主党派参政员反对在各方意见尚未融通的情况下仓卒召集国民大会，所以国民党“六大”作出的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又等于被否决。

的大失败。"[1] 于是，第三方面成为国共双方争取、拉拢的对象。第三方面希望国大能够顺利召开，使中国走向民主化，也使自身获得参政的机会，但不愿在国共分裂的情况下举行，使国大成为国民党主宰民意的工具。第三方面感到事有可为，也认为有做最后努力的必要，民盟的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无党派人士莫德惠、缪云台等，纷纷出动，奔走于京沪间，再做国共的调人。不料国共都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三方面代表"愈跑愈觉得这个中间派难做，总找不着双方要价的眉目来"。[2] 眼看会期临近，第三方面一厢情愿地搞出一个事实上有利于国民党的和谈方案，招致周恩来的一番怒斥。最后，民盟坚定了不参加国大的决心，而民社党表示要自由活动，参加国大。青年党本来就接近国民党，也准备在国民党的脸上"搽粉"。11月11日，为了表示尊重"民意"，蒋介石宣布国大再延期三天举行，实际意图是再多拉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大会。

1946年11月15日上午10时，制宪国民大会终于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国大代表总名额为2050人，国民政府已公布者为1580人，当日到会代表1381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3] 大会经过四次预备会，于22日选举蒋介石、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等4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从11月28日开始，大会围绕宪法草案共召开了18次全体大会和若干次小组审查会。12月25日，国民大会制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闭幕。国大与宪法问题，扰扰攘攘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却使国内局势严重恶化，不可收拾。就在国民大会开幕次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表明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的立场，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

① 梁漱溟著：《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②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北京）1961年版，第265页。

③ 制宪国民大会闭幕时，国民政府先后公布的国大代表为1745人，报到人数为1701人。中共代表190名和民盟代表80名（民盟代表本为90名，后被民社党分去10名）未提交名单。

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①] 11 月 19 日，周恩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标志着国共关系破裂。国大闭幕后，《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嘲讽蒋介石把"弄假成真的国大再弄真成假"，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败"。[②] 至于大会所制定并通过的宪法，虽然比"五五宪草"进步，基本上确立了议会和责任内阁制，但是，"这部宪法的最大缺点，还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③]

成舍我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圈定为国大代表的。不过，在"制宪"过程中，像他这样的无党派代表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无非是充数表决而已。但是，由于共产党极力反对国民党包办召开"制宪国大"，那么，谁参加这次大会，对共产党来说，就等于为国民党捧了场。

如果说，成舍我担任"制宪国大"代表是出于被动的话，立法委员一职则是他主动参加竞选获得的。"制宪国大"决议，宪法于 1947 年 12 月 25 日生效，在此之前要完成国大代表的选举，为来年"行宪国大"的召开做好准备。第一届立法委员也要紧跟着选出。成舍我本无意于问鼎政治，只想集中全力发展自己的新闻事业。但是，当立法委员选举开始后，他政治圈里的朋友，尤其是有资格参与决策的朋友，多积极劝进，希望他能出马竞选立法委员。据说，北平特别市党部第一次呈报的立委候选人名单，国民党中央并不满意，原因是北平世称文化故都，知识渊薮，人文荟萃，而参加立委竞选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并不多。为"显示执政党对实行民主政治之诚意和决心"，决策方面乃指令北平特别市党部主委吴铸人、书记长金克和，设法促请文教界素孚众望之人士，参加竞选。成舍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立委角逐的。[④]

选举前夕，国民党《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丁履进，以他们把持的北平记者公会、北平日报公会和北平通讯社公会的名义，在全市各报大登广告，"向本市市民推荐，请圈选成舍我先生

---

① 《周恩来将军在京发表声明，揭露蒋记国大分裂性》，1946 年 11 月 19 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弄真成假——评蒋介石"国大"的闭幕》，1946 年 12 月 28 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③ 《国民大会闭幕了》，1946 年 12 月 26 日上海《大公报》社评。

④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327 页。

为立法委员”。广告原文如下：

> 成舍我先生献身新闻事业垂四十年，其在北平，手创《世界日报》，亦已二十年以上。抗战胜利，《世界日报》复刊，所有言论，无一不代表人民，特别代表我北平一百七十万市民，真正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奋斗。同人等对成先生夙极敬佩。过去成先生以社会贤达地位，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制宪）。此次立法委员选举，复被提名为本市区域候选人，深盼我全市新闻界同人，一致支援。并盼我全市市民，凡同情成之言论主张者，务请各行使其神圣之选举权，为成先生投其最纯洁、亦最宝贵之一票！

1948年1月21日，北平市立法委员分区进行投票选举。成舍我的竞选对手是北平市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和师范大学教授张怀。由于他事先不肯多花钱收买选票，从上午选举的情况看，他的票数不如唐、张，很有落选的危险。下午，北平市民政局玩弄花招，拉到两个郊区的选票。一个姓茅的职员通知成舍我，说替他找到一万张选票，叫他送钱去收买。后来开票结果，成舍我当选为立法委员。[①]

查阅《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行宪”第一届立法院于1948年5月开会后，成舍我很少到会；偶尔与会，也总是三缄其口，无所献替。即使如此，由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行宪”把戏，他也就被中共冠以“伪立法委员”的称号。

“立法委员”成舍我“问政”的卓异表现，要等到“立法院”迁台之后。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164页。

岂傍他人论短长

成舍我一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20年起，他就开始逐日记写，从不间断。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拒绝参加汉奸潘毓桂组织的地方维持会，潜往天津，尔后南下，累积了七年的日记全部遗留北平，不知去向。后来的日记，又毁于香港之变，再毁于桂林之变，自此中断。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回到北平，成功复刊《世界日报》的成舍我，又恢复了日记的写作："今为民国三十五年元旦，余年四十有九，虽仍昕夕辛劳，但胜利到临，国运昌隆，自念当不致再遭沦丧，因决自今日起，继续记写。并拟以将每日读书心得，或友朋侈谈，足资追忆者，概为摘录。撰述、讲演，亦以附入，借自体念，亦以供将来之整理也。"①

但是，外患既除，内争又起，成舍我想望的"国运昌隆"并没有如期而至。对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成舍我及其所经营的《世界日报》，持什么样的立场与态度？

社评是报纸的灵魂。担任过《世界日报》总主笔的张友渔曾说："社论（即社评）者，代表报社之意见，对于时事，有所解释、批判及主张，以期指导读者之评论也。"② 成舍我极为重视《世界日报》的社评，始终掌握着报纸的言论大权，"他的主张就是报的主张，他的言论方针就是报

---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② 张友渔著：《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的言论方针。"[1] 初创时期报纸的社评，大多是成舍我亲自操刀，用"舍我"、"百忧"、"大哀"等笔名署名发表。如果请人撰写，他事先也要交代内容、观点，写成后再经他修改审定发排。他离社期间，报纸便很少刊登社评，偶尔有一两篇应景文章，也是经他指定的人审核发表的。《世界日报》复刊后，加重了社评的分量，几乎每天一篇，对军政要闻进行评论。这一时期《世界日报》的社评，均不署名，成舍我也写，但较战前为少，主要由总主笔朱沛人撰稿审稿，社评委员王聿修、楼邦彦、王铁崖、贺子远也参与撰写。不过，只要成舍我人在报社，社评必经他审定发排，则是无疑的。因此，从复刊后《世界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评，可以窥见这份报纸和它的主人成舍我战后的政治倾向，对国家前途、国共内战的立场与态度。

（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成舍我为《世界日报》所写的长篇复刊辞，再次声明《世界日报》是站在国民立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为了表明为人民代言的办报宗旨，他还让报社员工在办公楼内高挂"人民喉舌"的大字条幅。八年抗战，山河破碎，民生困厄，国家需复元气，人民渴望和平。因此，以国家、人民的名义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自然成为复刊后《世界日报》社评的总基调。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举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由于一些问题当时没有达成协议，需要继续会谈。《世界日报》发表社评说："中国内政问题，要让中国全体老百姓来谈判，不能听凭国共两党偷偷摸摸，讨价还价。……其实人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复员；国家只有一条出路——和平统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民要和平，绝对反对暂时的和平。"社评最后写道："事急矣，时迫矣，不要再秘密谈判了，让国民作最后的裁判吧！"[2] 随后又发表社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绝不仅是一部分人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或其他各党各派也好，如果你们能符合我们要求，谁执政也受我们的拥护；否则，谁来也要被我们打倒。现在不是你们欺骗人民，专说漂亮话的时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 页。

② 《反对国共两党秘密谈判》，1945 年 11 月 27 日《世界日报》社评。

候了，我们要集中力量来监视你们的行动。”[①]

1947年元旦，国共两党都发表了新年文告。次日，《世界日报》发表《使人失望的国共文告》社评：

> 我们深切期盼，转入了三十六年的中华民国，应该否极泰来。然而不幸得很，在我们读过造成去年四亿五千万人民灾难的两大主角国民党共产党各当局元旦文告以后，使我们一切希望，又濒幻灭。因为这些文告中，一方面只尽量推扬宪法告成的伟绩，一方面，则更强调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反美阵线，将有迅速进展。至于如何确实停止内战，平抑物价，使水深火热的老百姓，脱离苦海，早登衽席，似都已置之脑后。……
>
> 我们便不能不问转入三十六年的两个大主角——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们或讲尊奉总理遗教，或讲实现民主政治，现在则一个只忙着夸扬制宪告成，一个只忙着反美运动进展，究竟你们那个是为人民？那个是为老百姓？如果都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个想再压榨人民以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个想再制造血肉世界，以遂其恐怖成功主义，你们不想想四亿五千万的善良人民终竟也会有一天起来铤而走险吗？人民在这过去一年所受的赐与已太多了，假使你们还没有完全忘记老百姓，希望从今以后，切切实实，来替老百姓解除痛苦。停止内战，平抑物价，在老百姓看来，他的需要，比制宪反美，实在要超过万倍！

几天后，《世界日报》获知国共正在秘密酝酿恢复谈判，并从来华调停国共争端的马歇尔特使屡传归国而迄未动身，判断美国方面对恢复和谈仍在作最后的努力。同时，因为马氏一年来的调解工作劳而无功，中国的内战和经济危机反而愈演愈烈，把整个国家逼到濒临总崩溃的边缘，美国舆论时有严正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示，要求美国从速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为此，《世界日报》发表社评，呼吁国共均不应坚持己见一意孤行，长期内战陷国家于万劫不复，必将遭受世界谴责国民唾弃：“总而

① 《再不能袖手旁观》，1945年12月25日《世界日报》社评。

言之，内战是中国问题的根本，如果内战一日不结束，美国甚至世界，谴责中国的舆论必将有增无已。国民政府万不可误认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确将永远不变，应善纳友邦人士的批评与诤谏，趁此宪法制订国大闭幕以后，开诚布公，尽最大可能觅取重开和平之门，千万不可固执成见各走极端，造成更严重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和平应由当事者双方努力始可获致，因此，我们并不忽视中共在此国庥民命已临生死存亡关头所当负担的责任，如果中共一意孤行以求一逞，也必将同样遭受人民的谴责与历史裁判。所以当此恢复和谈传说极盛之时，对于国共互让的可能性，我们是不能不寄予深切期望的！”①

陈布雷次女陈琏的结婚启事，刊登于1947年8月9日北平《世界日报》。

1947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恢复和谈的新方案，仍然要中共交出军队，中共当然不能接受。国民党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限3月5日前撤返延安，美国也声明退出三人和谈小组和军调部，调处彻底失败，和谈就此终结。《世界日报》无比愤激、痛惜，以民间寓言故事中摔破“翡翠碗”的故事，比喻今日民族的大悲剧：一富翁死去，两儿子分遗产，一只价值连城的翡翠碗无法分割，敲碎后都弃之不要！“摔破‘翡翠碗’的‘不让’精神，已贯透了整个社会人心，才铸成了今日民族的大悲剧！我们要求国人绝对理智的深思一遍，这种精神充分发挥的结果是什么？是国

① 《国共均不应坚持己见一意孤行》，1947年1月6日《世界日报》社评。

家民族这只‘翡翠碗’碎成片段！是国家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境！大家要从头猛醒！”①

（二）主张走“第三条路”，实行“不流血革命”。

1947年1月13日，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一周年的日子。然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已于一周前黯然离去，国共双方考虑到宣传和责任，都不愿主动提出撤消军调部，实际上调处早已失败，军调部名存实亡。② 当日，《世界日报》发表社评说，我们对调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一年来对于国事的看法，虽然一方面热忱祈望国共合作能够实现，以解除眼前四亿五千万老百姓的苦痛，“但另一方面，历史和理智，使我们也确切了解，国共合作困难太多。所以我们过去，曾一再指出国共不能合作的症结所在。我们对于政治协商，既未敢妄存过高的空想，对于军事调处，也就深抱疑虑，今日调处失败，在我们并无意外之感。我们今日，只能向爱好和平，盼望中国能免于崩溃毁灭的一切善良人民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在此情况之下，我们是否应袖手旁观，听国共两党长期内战，至中国崩溃毁灭为止？抑或我们自己，应挺身而起，挑起这个救亡图存的重担？”回答当然是后者。社评说，中国固然非国共所专有，如果两党不能合作，则我们只有希望，不是国民党本身革新，就是共产党修正他的“暴力革命”，让任何一党，用选举票来争取他们的政权。如果这一希望再失败，我们就不得不为中国的前途，另找一条新生之路。《世界日报》找到的“新生之路”，就是过去曾提出的“第三条路”：

我们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即是认为长期内战及政治腐败的结

---

① 《何必摔破“翡翠碗”！》，1947年3月6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促成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根据停战令的规定，国共美三方于1946年1月13日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调停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确保停战命令有效实施。军调部下设执行小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然而，军调部无法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国共美三方面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军调部工作高峰时曾下设36个执行小组，人员近万人。到1947年1月，东北及关内执行小组相继撤离，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一定的工作和人员，军调部已是名存实亡。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之关系；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

果，人民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这即是第三种力量必会逼出的客观事实。这第三条路实际上即是中国的新革命运动，而这个革命运动，因见于当前国内人民的水深火热实在不堪再经暴乱，又见于温和的同意的社会政治改革之在世界各地抬头，所以我们深愿它能运用政治竞争的方式，以大多数善良人民及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意志及舆论上的团结表现，以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统一的坦途。我们觉得这是中国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进步分子都能参加这一运动。当然我们知道这一运动的成功，并不是短促之间可以速成的，而其前途的发展也必然会遭遇到必不可免的困难的，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却相信中国并无其他得救的途径。

马歇尔在离华声明中指出，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厥为国共双方完全以猜疑相对：“一方面共产党坚决要实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一方面国民党又在形式上坚决要保持一个基于三民主义的国家，所以国共的合作在根本上已难调协。”他遂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自由分子身上：“据余观察所及，此项情势之挽救，惟有使政府中之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内之优秀人物得以集合。惟此辈自由分子现仍缺乏政治权力，以实施控制之影响，余相信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此等团体，如果顺利进行工作，必可经由良好政府而达到团结之目的。”《世界日报》同意马歇尔的看法，不过认为，“现在一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所谓小党，实不足以当此重任”，中国的唯一希望，即在自由分子的集合与团结：“有代表真正自由分子的第三种力量产生，这即是中国的生，反之，即是中国的死。环境的险恶，已经逼得善良人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到了为国家为自己必须团结奋起的时候了。”[①]

第二天即 1 月 14 日，《世界日报》又发表社评，介绍英国工党执政下的“不流血革命”，使人民在和平中得到了社会革命的实效。社评说，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体系、经济制度还是在思想文化上，从大的方面

---

① 《调处失败后将如何——“自由分子”与“第三条路”的救国之道》，1947 年 1 月 13 日《世界日报》社评。

去观察，“显然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两大时代主流在作着生死的斗争”。社评还认为：苏联30年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能够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消除贫富差别等不平等现象，但个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限制，这一点不如资本主义。因此，当世的思想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途径，不能不重新予以考虑：“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能够使人民既能生活，同时又能享受充分的自由？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能避免阶级斗争的惨剧，而又使国家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实惠？即兼有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两者之长，而避免两者之短。”社评认为，现在英国式的温和社会主义，可以说就是纠正了共产主义矫枉过正的毛病，而另辟出了一条新的途径。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所施行的改革运动，说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有最大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这篇社评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英国优良的政治精神，通过立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我们国家正陷入政党武装斗争的泥沼中，你冲我杀，纠缠不清，国家快被打到山穷水尽，人民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如果再继续的打下去，国脉民命，只有被打断了事。我们一向以为共产党到处烧杀，极尽破坏之能事的作风，不是中国所需要，而国民党的颟顸保守，腐败无能，如果不彻底革新，我们也很难寄以任何期望。因此我们曾一再著论指出‘为了国家真正的新生我们不能不把希望寄托在国共两党之外’，即是希望未来的政治能够超越国共两党各走极端的政策而采行中道。这个‘中道’才是今日中国善良的人民和一切具有正义感的自由分子所应走的路线。英国这种经济的改革运动，正是一个走‘中道’的很好榜样。”[①] 2月26日，《世界日报》又发表伍启元撰写的专论《英国的“不流血革命”》，评介英国工党由国有方法达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

在国共之外寻求“第三条路”，使中国通过温和改良而非流血革命，走上平等、民主、自由之途，是当时民间报人、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一种愿望，不仅仅是《世界日报》如此，《大公报》、《观察》等民间报刊都有过同样主张。但是，政治传统中缺乏容忍、协商精神的中国，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大局的底定，非经过武力决出胜负不可。在

① 《工党政府下“英国不流血革命”——人民在和平中得到社会革命的实效！》，1947年1月14日《世界日报》社评。

非此即彼的历史关头，国共双方都不允许自由知识分子走“第三条路”，1947年11月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而无奈解散，便是明证。

（三）对国民党之批评。

《世界日报》认为，缔造民国、抗战建国的国民党，其政治合法性不成问题，“无如国民党自己不争气，内部既派别纷歧，自加戕贼，政治又贪污腐败，寡效无能。因此，胜利以来，遂在国人指摘友邦诟病之下，而信誉全失。……过去年余，不思努力革新政治，提高效率，促进建设，安定民生，而一天天在粉饰掩盖上做工夫，希望拿一面民主招牌边谈边打来杜塞反对者悠悠之口，同时又想藉这一个招牌来换取友邦的谅解，而获取其援助。不料弄巧成拙，协商成为内乱的藉口，民主扰攘了一年多，不但没有解决一个问题，而一切问题反都因而加速地恶化。”[①] 1947年初，为了摆出民主姿态，争取舆论民心，国民党终于决定改组政府，民社、青年两党也跃跃欲试，准备“入阁”。对于这一众目睽睽的政治问题，《世界日报》说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从政府的角度看，它是改组政府，而从民社青年两党的角度看，它是参加政府；但假如政府对于改组政府一事并无真正的扩大政治基础的诚意，同时民社青年两党对于参加政府一事亦不具有光明正大的态度，那么从老百姓的角度看，那无疑是朝野各政党在玩着分赃的把戏！”“归根的说，我们老百姓的期望是很单纯的：改组政府必须政府具有诚意，参加政府必须参加的政党态度光明正大，我们所最不愿意看的却只是一曲分赃的把戏！”[②] 1947年4月16日，蒋介石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曾琦、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共同签署“新政府施政方针”——《共同施政纲领》。4月18日，亦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20周年纪念日，新国府委员发表，国府改组告一段落。当日，《世界日报》的社评说，从今天起，将是自训政到宪政的一座桥梁；我们虽不敢断言今天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但是十二万分地希望今天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不过，社评对《共同施

---

① 《和平非空口呼吁所能实现》，1947年2月7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三种不同的看法——政府看是改组民青两党看是参加老百姓看是分赃》，1947年4月15日《世界日报》社评。

政纲领》感到失望，认为它们大多是旧调重谈。[①] 4 月 23 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组成人员名单，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发表就职广播。第二天，《世界日报》发表《失望乎？绝望乎？——全国人民读新政府名单及张群广播应有的惊疑》社评："今天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他们一起床，睁开眼睛，看看改组后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行政院全部名单，再看看新任行政院长张群的就职广播，他们心理上，将会有何种反应？胜利以来，国民党天天高叫着'还政于民'，尤其最近，什么民社党青年党，也在锣鼓喧天，大凑热闹，仿佛一场好戏，即将登台，不料戏幕掀开庸俗丑恶，依然如故，丝毫不足以使人兴奋。论人选，除了青年民社两党几个升官发财新面孔外，其余多仍是许多年来只知做官不知做事的若干党棍、财阀、政客、官僚，他们既然负了过去许多年的政治责任，没有弄好，一塌糊涂，现在是否换一个名义，搬一搬铺位，就马上会有奇迹出现？至于张群的就职广播空洞浮滑，更是不知所云。如果这样人物，这样作风，就可以将眼前不可终日的天大危机，轻轻度过，那真是梦呓妄想。既然如此，则老百姓今天所感到的痛切失望，自属不言而喻。"

政府如此改组，的确不会带来什么奇迹，物价攀升，战火更旺，全国流行着一种"死不瞑目、活又不成"的普遍感受。《世界日报》呼吁："政府不能再继续无能下去，也不能再继续愚蠢下去！老百姓要生活，政府却不给他们生活的保障，老百姓要安定，政府却不给他们安定的环境，试问：政府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什么试行责任行政院制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我们要求在人民没有自己产生政府以前，政府要对人民负一个起码限度的责任，即予人民以生活的保障和安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活下去。"[②]

根据"制宪国大"的决议，在《中华民国宪法》生效之日即 1947 年 12 月 25 日前，要进行全国普选，完成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国民党为了所谓的"还政于民"，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在 1947 年夏即开始部署

---

① 《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中国政治从此好转抑或更坏国民青年民社三党应以今后政绩听候国民公判》，1947 年 4 月 18 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1947 年 5 月 6 日《世界日报》社评。



世界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立委參政員昨一齊怒吼
要求宋子文引咎下野
宋如不走即全體總辭職

緊急經濟措施方案未定國防會改明舉行

傅斯年要革命!

臨沂

1947年2月15日北平《世界日报》二版头条“立委参政员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新闻。

全国普选。内战正酣而谈普选、行宪,《世界日报》讽刺国民党是在创造“奇迹”:“正好像过去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是一句大话,眼前的‘一面内战,一面行宪’也实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在武装的政治斗争问题没有合理获得解决以前,而谈全国普选与开始行宪,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欲笑不得!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又蹈了民初制宪失败的覆辙,那么历史的巨轮似乎总是在往回转,什么时候才会是我们的明天呢?”[①]《世界日报》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如期进行普选,无非是怕盟邦指责中国不民主,怕共产党骂国民党继续独裁。但是这样“霸王硬上弓”,结果换来的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假民主。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截痛快,立即宣布全国普选暂缓举行,先从起码的“廉能政治”着手,努力实行彻底革新。[②]

召开“制宪国大”,改组国民政府,举行全国普选,是国民党在战后重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举措。政府改组完成之后,蒋介石曾言,这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质上并不情愿放弃一党独裁,推行“民主”政治乃迫于盟邦及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合法”手段孤立共产党,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

① 《普选果能如期举行吗?——“一面内战,一面行宪”的奇迹正在创造中》,1947年6月10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我们不需要空招牌假民主》,1947年8月25日《世界日报》社评。

此，在训政向宪政的过渡中，国民党当局措置乖谬，笑话百出，图虚名而招实祸。《世界日报》对国民党奉为自救灵丹的政府改组、普选行宪，进行了无情嘲讽和尖锐批评，显示了民间报纸无畏敢言的道德勇气。

不过，《世界日报》批评国民党贪污腐败，颟顸庸顽，是希望它能够自我整肃，通过“再革命”而走向新生。1947 年 3 月 16 日至 25 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世界日报》分别在大会开幕日和闭幕日，发表了《要把握此最后机会》、《走向新生抑走向毁灭》社评，规劝国民党彻底觉悟，不拖不骗，立即作出抉择革新政治，不要成为流血革命的对象。其间，胡宗南率大军占领延安，国民党上下一片亢奋。《世界日报》提醒国民党不要头脑发昏，走上迷信武力解决国内政治之路，而忽视内部的改造与新生：“国民党真正永久的胜利，应在政治而不在军事。两周以来，由于延安的收复，引起了国民党主观上的一些兴奋。我们觉得这个兴奋并不过分，因为至少在今天言，国共两党乃是完全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地位，那么由于共产党之遭受打击而高兴，这在国民党自是当然之事。但我们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却希望这个高兴不会引起国民党自身的错觉。如果国民党过于高估了收复延安的重要性，如果国民党因此而走上迷信武力解决之路，如果国民党以军事的向外发展而忽略了内部的改造与新生，则延安的收复不特不能动摇共产党在中国生长的政治基础，而且相反的因军事成绩引起的这种错觉，必会更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溃烂程度。”“而反观国民党的现政权，却仍然迷恋于对‘外在延安’的斗争，而对于党治下的政治腐恶，则大有视为‘次要’之态度，殊不知这‘内在的延安’对于国民党政治前途的破坏力，实更比中共外在的破坏力可怕百倍！何时攻克这‘内在的延安’呢？国民党的智慧如果不能答复这一问题，那就只有让历史给我们记录了！”①

1947 年 7 月 6 日，蒋介石于“七七”抗战 10 周年前夕，向全国广播《戡乱总动员令》。第二天，《世界日报》发表《振奋人心与“再革命”》社评，告诫国民党如不彻底整肃国政，即将无法应付另一“七七”的来临：“我们今后是否仍能把握着抗战期间，全国一致，目标单纯的两大特

① 《必先整肃内部才可消除外敌——国民党战胜中共在政治不在军事》，1947 年 4 月 2 日《世界日报》社评。

点？在蒋主席昨晚广播中，要求全国人民，明辨是非，而我全国人民所要求于政府的，就是政府如何能澄清现局，齐一步伐，整肃国政，安定民生。实行'再革命'给我们一个确确实实，明辨是非的标准。……政府如不趁此时机，大刀阔斧自我革新，使举国一致，公认这样廉洁忠贞的政府，是值得举国一致的拥戴，则无论如何无法振奋人心，也更无法完成统一，争取真正最后之胜利。"同年 9 月 9 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开幕。这是国民党为"戡乱"大业，调整组织，实行党团合并，统一"戡乱"意志的大会。《世界日报》在大会开幕当日，发表了《团结始可制"敌"，分裂等于自杀》的社评。蒋介石在会上痛心地说，国民党内部，权利人人要享，责任无人负担；甚至为私人权利，以致对同志斗争，比对共产党还激烈。他痛切训示国民党员："丧失信息，将来只有束手待毙；长此衰颓，即无共党亦必灭亡。"《世界日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蒋总裁的训示，对时局是如何焦虑，对干部的指责与期望是如何沉痛而殷切，国民党人应该有所感动，知所奋勉。[①] 1948 年 4 月 19 日，蒋介石被"行宪国大"选举为"大总统"。当日，《世界日报》以《为天下得人庆》的大字标题，登出蒋当选的消息，并发表《所祈望于蒋先生者》社评说："国家局势愈艰危，需要领袖愈迫切。目前挽救危局的第一要着，即首在树立纲纪，纠正颓风。"总统、副总统选出之后，行政院长之位竞争激烈，"新内阁"面临难产。《世界日报》发表社评，劝解国民党人应重视对国家的责任，不要再在人事派系上闹别扭，以免消耗力量，浪费光阴。5 月 25 日，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世界日报》发表社评为翁捧场，并劝翁："不可因延揽阁员，困派系斗争的混场，应该以最大努力，来减轻人民生活的痛苦。""国民党并非无人才，但宜团结；时局并非无办法，但要肯干。"但是，"行宪"政府对时局并无良策，军事败退，物价飞腾，总崩溃已成定局。即使到了如此地步，《世界日报》还在盼望着国民党进行改革，取得成功："我们要国民党走入大民主正轨，要中国避免流血革命，就不能不盼望彻底改革，并取得成功。"[②]

（四）对共产党之批评。

---

① 《国民党人应该有所感动》，1947 年 9 月 12 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我们关心国民党的改革》，1948 年 8 月 30 日《世界日报》社评。

对于“争斗”的另一方——共产党，《世界日报》当然也毫不留情地予以谴责、抨击。1946年7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8月22日，《世界日报》发表《大家都有眼睛——必须认清事实，判定谁是内战的罪魁》社评，暗指共产党是发动内战的“罪魁”。同年“双十节”社评，《世界日报》污蔑共产党所号召的民国，是“演尽烧杀劫掠的中华匪国”：“挂了三十五年的‘中华民国’的招牌，到今天还是一塌糊涂，所出现于老百姓眼前的，虽俨然有着两个壁垒，都以民国为号召，但一方面是充满贪污腐败的中华官国；一方面是演尽烧杀劫掠的中华匪国。老百姓宛转呻吟于这两个壁垒的重压之下，救死不遑。至于真正‘民国’在哪里，我们确十分惶愧无从作答。”①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依然采取边谈边打，打打谈谈的手法。1946年11月“制宪国大”开幕后，国共关系实际上已无转圜余地，内战也正在大规模进行。国民党为了显示和平民主姿态，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又向共产党发起新一轮和平攻势。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但是，由于国共双方各自提出的和谈条件相距太远，根本就无法坐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1月29日，美国继召回总统特使马歇尔元帅后，又宣布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国共关系最终破裂，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战场胜负来决定了。次日，《世界日报》刊登头条新闻《中共再拒绝政府新方案　和谈之门终于关闭！》，并发表社评，把美国抽身而退的责任推诿于共产党一方，说什么西洋政治家遇到了中国心口不一的政客和党棍，徒唤奈何：“在政治上则一幕一幕的复演谈判、协议、推翻、吵闹、重谈判等等周而复始的滑稽剧，直演到国大召开代表撤退而后已。故一年以来，马歇尔个人虽已舌敝唇焦，而当事者尤其是中共则在层出不穷地改变花样，千方百计地以玩弄困窘这位焦急万状的和事老人，最后再向他的脸上丢上一把污泥，加以种种的污蔑，使他知难扫

---

① 《“官国”“匪国”与“民国”》，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社评。


中共再拒絕政府新方案

和談之門終于關閉！

政府聲明經過並宣布今後方針

美亦聲明退出三人會及軍調部

軍調部昨會議

決作撤廢準備

共軍猛襲隴海路兩側

1947 年 1 月 30 日北平《世界日报》二版头条关于和谈最终破裂的新闻。

兴而退。”①

《世界日报》还多次发表社评，指责中共军队不管人民死活，以拆路掘堤为唯一战略，讥讽这是中共军队的“一贯作风”，建议国民党政府“与其无把握确保安全，则何苦昼修夜拆，为共军白送物资”。② 更有甚者，《世界日报》还污蔑中共军队在河北通县“纵火焚烧”，“劫取物资”：“死伤的是老百姓生命，焚烧的是老百姓房屋，劫取的是老百姓资财，总而言之，共军的收获，只是老百姓的血和汗。”③

《世界日报》既然反对内战，主张“不流血革命”，对武装斗争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批评和规劝，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两相对比，《世界日报》对国共两党的立场、态度显然是不够公正，有所偏袒的：批评国民党，是希望它能够自我整肃，通过“再革命”而走向新生，属于“建设性”的批评。对共产党的批评，则多是抨击责难，甚至歪曲丑诋。《世界日报》对国共双方态度不同，尤其表现在军事新闻和言论上。下面

① 《和平结束内战扩大——在美国退出调解以后我们应否即坐待中国为党争所毁灭》，1947 年 1 月 30 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平津线何等重要!》，1947 年 2 月 2 日《世界日报》社评；《平津线岂可听令共军一再破坏》，1947 年 4 月 13 日《世界日报》社评。《有感于平保线之一再被毁》，1947 年 9 月 8 日《世界日报》社评。

③ 《要保障一百七十万市民的安全——有感于通县之“事出仓促”》，1947 年 2 月 11 日《世界日报》社评。

是 1947 年 1 月 3 日《世界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两条军事电讯：

国军已进驻大名　元旦晚里应外合一举而下

【中央社郑州二日电】冀南大名，自被共军盘踞以来，对当地民众裹胁虐杀，无所不用其极，民众恨之入骨，一日晚利用共军畅乐之际，经当地民众武力，联合国军某部，里应外合，一举将共军驱出城外，国军比即入城，民众沿街欢呼，共军狼狈西窜，刻在收集残部，冀求反扑。

聊城终告陷落！　城内守军已突围今可抵济

【本报济南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七分专电】共军围困聊城逾年，城内守军王专员金祥部仅余千余人，经国军援救，于二日突围出城，当夜停于茌平，三日可抵济南，聊城遂终陷共军之手。

第一条是中央社关于"国军"胜利的电讯，《世界日报》既然采用，可以视为认同电文的立场。第二条是共产党军队胜利的消息，为本报专电。如此一对比，《世界日报》对国共双方的立场、态度，不言自明。检阅《世界日报》这一时期的军事报道，对"共军"多用"犯"、"袭"、"陷"等词语，而对国军则用"克"、"收复"等词语。显然，《世界日报》是尊国民党政府为"正统"的。

关于军事评论，《世界日报》也明显地偏袒"国军"，甚至为"国军"出谋划策。1947 年 9 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接连失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前往调整军政机构及人事，不久发表陈诚代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世界日报》发表社评，盼望陈诚以全力抢救东北，并建议陈辞去参谋总长之职，这样可以专一责任，收效必速。① 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从鲁西南渡过黄河，向大别山挺进。《世界日报》发表社评指出，"国军"近两个月在山东的作战已收到相当良好的战果，"从目前的形势

① 《盼陈诚以全力抢救东北》，1947 年 9 月 11 日《世界日报》社评。

看，主战场已不在山东，而国军的重要任务乃在如何截击流窜的共军，重点已转移到豫皖鄂边区一带地境”。社评对共产党军队“流毒四处”忧心忡忡，“极迫切的希望政府军事当局能有迅速戢止共军流窜的办法拿出来”，并建议国民党政府，除了对“共军”的军事行动之外，还要注意到行政工作、民众力量与军事的配合。[①] 1947 年 11 月 12 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军事重镇石家庄，“国军”在华北的形势顿时恶化。《世界日报》痛心疾首，发表社评检讨石门之役，建议“国军”今后的军事决策：“原则上必须作主动的打算，兵力上必须作经济的使用，时间上必期其迅速，行动上必求其有效。”[②]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星期一)

劉伯誠部三萬入大別山
嵩縣情況已陷于混亂
李先念部又竄抵武漢外圍
進犯英山被阻六安昨仍在激戰中

伊麗莎白 佳期在邇

沙河昌平間 貨車昨出軌

1947 年 9 月 8 日北平《世界日报》二版头条新闻《刘伯承部三万入大别山 嵩县情况已陷于混乱》。

1947 年 5 月 20 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到会致开幕词。5 月 22 日，《世界日报》发表《参政会最后的努力》社评：“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所反对的是内战和分裂；我们所要求的是和平与统一。从蒋主席的演讲辞，我们看到内战与分裂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又看到和平与统一不能实现的原因。但是我们尚不能完全悲观，因为我们

---

① 《应从速戢止共军流窜——民生凋敝物资缺乏的当今中国不能再遭此普遍化的浩劫》，1947 年 9 月 16 日《世界日报》社评。

② 《从石门之役论今后军事决策》，1947 年 11 月 15 日《世界日报》社评。

还看到政府在过去曾‘以百折不懈的决心，求和平统一的实现。’而在现在‘仍然维持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的基本方针’。我们对于共产党，只是希望其放弃以武力夺取政权的企图，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交通。只要他们以事实表示其诚意，政府无时不企求和平，自可用政治方法谋求解决，解民于倒悬，这是政府方面的态度，也是政府的主张。”《世界日报》如此立论，岂止是有所偏袒，而是完全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来训诫共产党，难怪有人说这篇社评，不像是自称“超然”的《世界日报》的社评，而应该是国民党党报的社评。[①] 事实上，如上所述，《世界日报》复刊后有关国共问题的社评，不少都存在这一问题。

由此看来，北平解放后，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将《世界日报》定性为“恶迹昭彰”的“反革命报纸”予以查封，并非信口雌黄，乱扣“帽子”，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成舍我及其《世界日报》在国共问题上，为什么要放弃民间报人、报纸应该具有的中立立场与公正态度，偏袒国民党，甚至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放言论事？吴范寰指出，成舍我后期已投身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凭借统治势力搞中国新闻公司，一切言论方针都通过陶希圣或陈训悆向陈布雷请示，所以《世界日报》的立场是拥蒋反共，其言论主张已和《中央日报》相差不远；但为了维持民营幌子，表面上仍作出中立姿态，对国民党政府的评论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②]

吴范寰是从经济、政治功利主义来解释成舍我的动机的。成舍我青年创业，阅历极其丰富，当然懂得“朝中有人好办事”之理，借助当权者支持来壮大自己的事业，这种意图应该是有的。不过，根据成舍我的性格，他不大会以丧失自己的立场、态度为代价，换取事业的发达。否则，在内战局势已经极不利于国民党一方时，成舍我及《世界日报》依然拥蒋反共就无法解释。另一方面，说成舍我后期已投身国民党统治集团，恐怕也未必尽然。成舍我与国民党新闻宣传方面的要人程沧波、萧同兹、陈训悆等私交甚笃，也曾膺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等“民意”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出任过国民党政府官职。成舍我在战后与国

---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2 页。

②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31 页。

民党方面的关系愈拉愈紧是事实，说他已投身国民党统治集团，则有点言过其实。《世界日报》在内战中拥蒋反共，丧失中立立场与公正态度，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老板成舍我在政治信仰上不认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47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并责成新闻媒体一律称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共匪"。但是，《世界日报》一般不使用"共匪"一词，而仍称作"共党"、"共军"，至少在形式上守住了民营报纸的底线。

“最是仓皇辞庙日”

1948 年 9 月底，成舍我离开北平，到南京出席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并在京沪间处理一些有关《世界日报》的事务。其间，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全境，挥师入关，大兵团对决的淮海战役，也正在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一方发展。成舍我担心华北局势有变，又值年末岁尾，遂决定尽快返回北平。他本来计划从上海乘飞机北返，12 月 10 日到航空公司询问，只能订到 15 日飞北平的机票。而 12 日上海招商局的元培轮开往天津，14 日午前可抵达。成舍我一盘算，如果乘元培轮，14 日下午换平津快车当天即可抵北平，比乘飞机还早一天到达。他一向喜欢海上旅行，于是就改乘元培轮，转道天津回北平。不料船过烟台时遇到狂风暴雨，延误了行程，14 日傍晚元培轮才开抵天津招商局码头。

华北局势虽然不容乐观，但成舍我和不少人一样，对国民党军队保住平津，还是有相当信心的。然而，特来码头迎接的天津某报社长劈头告诉他：华北局势已急转直下，当日早晨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平津交通被截断，他将困在天津无法回北平了。因军事关系，这一消息，平津报纸到此时还没有发表。在这一刹那间，成舍我所受到的刺激，“正如夜半熟睡，忽被大地震惊醒，屋摇瓦飞，墙裂榱坠，四顾彷徨，几不知人间何世!”

这位社长朋友把成舍我接到饭店，又邀集了几位相熟的天津同业，为他接风洗尘。席上，大家安慰他说：解放军截断平津路已经发生了多次，今天断了，明天即修复；你今天先睡一觉，明早起来，或许就有了

好消息。不过，成舍我推断解放军发动的这次攻势，对平津是志在必得，大家这样说，无非是不让自己过于焦虑而已。“这些朋友，表面虽作欢笑，与马路上电灯通明，熙来攘往，不减平日的外观，若相辉映；实则，我看每人眉峰深锁，一个个都好像有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的确，这晚在此聚会的，思想和文字方面，多曾和‘共匪’有过长期的剧烈斗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大家对自己以及国家未来命运，自然都会要十分感觉沉重。”

这顿饭吃到晚上 10 点多钟才散。几位天津《民国日报》的朋友，把成舍我拉到他们的“社长宿舍”暂住。

事有凑巧，《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前两天去北平，被困在了那里。平津间交通虽断，电话仍然畅通。当晚，成舍我借《民国日报》同人和卜社长通话的机会，也和卜谈了几分钟，知道北平城郊的炮战，时断时续，不过城内秩序，还相当良好。接着他又和《世界日报》同人及眷属通了电话，“大家都恨我没长出一对翅膀，好不要飞机，不要火车，自己飞回北平。”

成舍我判断，短期内平津不可能通车复航，要回北平，只有先返京沪，在京沪间寻找机会。“天津人地生疏，我既断了由天津回北平的念头，自应尽早离开。一些朋友，已在涂改身份证，寻求避难所，我没有天津身份证，更无处可容我避难，万一‘匪军’窜入天津，当比我在北平更加危险。”成舍我通过电话和北平同人商量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赞成他迅速离开天津，越快越好。当然，他们盼望老板能够再从南京或上海飞回来！

12 月 15 日夜，成舍我再次和北平通话，告诉同人及眷属，自己已经作出了尽速离津南返的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他没有麻烦任何朋友，自己从电话簿上，抄了一大堆航空公司、轮船公司和旅行社的名字，按照地址，挨家探询，看有无到上海的船票或机票。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短短一两天内，天津对外的所有交通，都已完全断绝：大沽口附近已发现零星解放军，停泊在紫竹林一带的商船，15 日已全部抢先开走，自己 14 日坐来的元培轮，当天即折回，此时港内已没有半条商轮踪迹；民航方面，中国、中央、民航队三家办事处均已宣布结束，不再派飞机来天津；旅行社是代理性质，无船无机，他们也束手无策。

16日跑了一天，失望而归。成舍我明知希望渺茫，但仍不死心，17日一早又外出，继续探访旅行社，有的昨天遗漏，有的再碰碰运气，或许有奇迹发生。下午5点左右，他走进附设在利顺德饭店内的来福旅行社。这家旅行社昨天已经来过，前台职员似乎已经认识了他。当成舍我试探着问今天有没有好消息时，这位职员一言未发，匆匆走进里面一间小屋，请出了一位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应该是这家旅行社的老板。当他听说成舍我要回上海，放声大笑，连说：“这真是你千年难遇的好机会！你运气太好了！”原来，一星期前，来福旅行社应旅客之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飞机，直飞上海。不料平津间战事突起，飞机未能如期到达。本以为不再来了，17日中午突然接到民航队电报，说包机18日早8点飞来天津。旅行社立即通知原来订票的旅客，其中有一位困在北平无法前来，就空出了一张机票。

成舍我喜出望外，飞奔回寓所取钱，不到一小时，即向来福旅行社办妥了各项手续。他将这一消息告诉天津的几位朋友，大家都替他高兴，认为这简直有点近于神话！他又用长途电话告知北平报馆同人和眷属，鼓励大家努力出好《世界日报》最后一版。“想起来日大难，相见何时，大家声音也就都显得有点哽咽。”

旅行社约定18日早上6点从利顺德饭店出发，用汽车将旅客送往张贵庄机场。成舍我害怕错过时间，不到4点钟就起了床，草草盥洗后准备出发。不料正要动身，突然一阵炮声隆隆而来，门窗玻璃被震得簌簌作响。他立刻意识到，围攻天津的解放军，必然已逼近市郊，否则炮声不会如此沉重。市区已经临时戒严，行人车辆，完全绝迹。成舍我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心急如焚，估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到集合地点了。他更担心的是，飞机可能不会再来，即使来了，没有见到乘客，空机飞走。

幸而不到一小时，炮声停止，交通接着逐渐恢复，成舍我和其他26位旅客从各处陆续赶到旅行社。旅行社点齐人数，全体坐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向张贵庄机场进发。此时已是上午8点左右，离原来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两个小时。

车上寒风刺骨，路面结冰如镜，大家的心情更是沉重异常。卡车开出市区不远，即遇到国民党守军迎头拦阻。旅行社职员拿出昨晚请得通

行的证件，守军说此证件现在已完全无效，并提醒旅客，张贵庄一带战事可能随时爆发，机场已经被破坏，民航队飞机未必肯冒险再在这里起飞降落。旅行社跟大家商量，是否同意就地折回。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非走不可的决心，情愿冒险到机场，看飞机究竟到了没有再做定夺。卡车载着乘客，往返奔驰于被拦阻的地方，先后交涉三次，都无结果。最后，一位旅客说他是从东北退出的一名军官，和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很熟，愿意再去找陈司令试试看。这一试果然奏效，卡车最后被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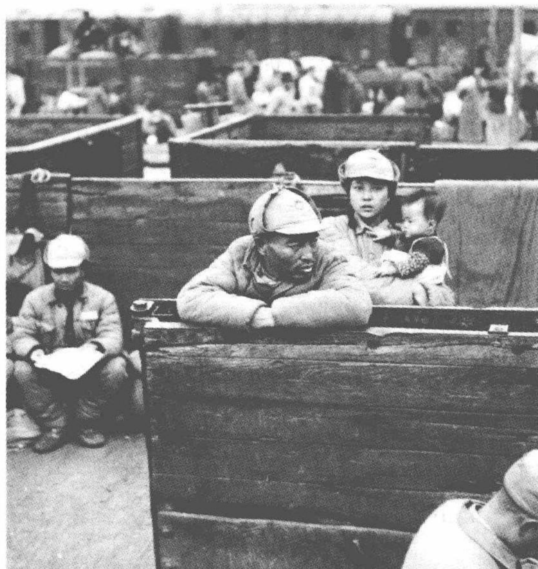
下午 3 点，卡车终于开到张贵庄机场。国民党军队在机场周围数华里外布防，机场设备都已撤走，部分跑道被破坏，场内仅有小工数人。但是让大家惊喜万分的是，机场内竟然停着一架民航队的飞机！这架 C47 型、编号 801 的民航队飞机，上午 8 点就按时抵达了，因久候乘客不至，正发动马达，准备空机飞走。旅行社迅速与机师接洽完妥，大家依次登机。这架飞机容量很小，并且相当破旧，有一扇机窗竟然没装玻璃，暂用木板钉住。好在大家“逃难”心切，“有机可乘”，已是深感万幸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后，正要上升，突然一声轰响，机身震动了一下，向右斜去。原来右边的一只轮胎爆炸了！美籍机师懊丧地告诉大家：这架飞机上没有备用轮胎，机场仓库中的器材早已搬走，除打电报请上海派专机送轮胎来，此外毫无办法。“这真使我们一刹那间，俨如坠入万丈深渊，所有登机时种种希望，已全部化为乌有。惶恐焦急，不可言状。我们从昨夜至现在，每人紧张、疲乏、饥饿、僵冷，多大致相同。到旅行社集合以前，谁也未曾睡好，炮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在敞蓬车上僵坐了六七小时，早饭大半没有吃，午饭更不必说。此刻困站在这空旷孤寂、一望无边的飞机场内，连一滴干净可饮的水都找不着，尤其时正严冬，气候酷冷，而 18 日这一天，西风刮得特别大，两只耳朵和十只手指好像都要被冻得和自己脱离似的。”

机师安慰乘客，上海派来的专机最多四小时内必可到达，劝大家先回飞机内避寒，只要忍耐过这四个小时，轮胎一到，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成舍我觉得这四小时真比四年还长。好不容易挨过一小时，到下午

4点钟，突然传来阵阵巨大的炮声，飞机场外远远看见几堆火光。那位与陈长捷交涉的东北军官，连声叫嚷说“共匪”已向飞机场发动攻势，他警告大家，万一炮声更近，就赶快跑出机场，紧急疏散，无论如何决不可再坐在飞机上。每个人的饥渴孤寒顿时被这几阵炮声打得烟消云散，大家惊慌失措地再爬下飞机，有几位女乘客，吓得号啕大哭。“寒天黑夜，人疏地生，四顾苍茫，有何处可以逃避。眼看这机场，将变成一群旅客的坟场！而天色越暗，炮声越紧，远处的火光，也就照得越红亮。”又过了一小时，上海的专机还是杳无音讯。到这时候，成舍我心里才明白，所谓的专机送轮胎，是不可能的了；只是机师怕大家过于惊惧，不肯宣布而已。



一位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站在货车车厢里，身上穿着别人捐给她的军服（1948年11月，浦口）。

正在间不容发之际，空中突然传来飞机的嗡鸣声。大家以为是送轮胎的专机来了。在没有指挥塔和灯光，更没有任何夜航设备的情况下，这架飞机经过几次低回盘旋，竟然安全降落了。机师赶快跑过去，然后回来向大家宣布：这不是上海派来送轮胎的专机，今天上海已无机可派。这架飞机是从兰州、西安沿途装运器材向上海撤退的C46型机，恰巧经过天津，接到公司通知，特冒险降落，抢救乘客。这架飞机上也没有备用轮胎，只好将所载的公司器材放弃一部分，腾出位置搭人，但乘客行李必须全部牺牲，丝毫不许携带，以免超量过大。机师并警告大家，目前情势紧急，不必犹豫，马上就走。

> 我们依照飞机师所说，空着两手，毫不考虑，向来机停靠的方向，拼命急走。无如机场多半破坏，东边一个坑，西边一条壕，暮色苍茫，难于辨认。一位携带两个小孩的中年女客，偶一疏忽，全体跌入泥坑，经大家合力，逐一扶起，幸坑底不深，尚未受伤，这样大约走了五六百码路，才到达机旁。飞机等客人上完，立即开动马达，不料马达吼叫了很久，还没有离开原地，原来C46型飞机，两个引擎临时突有一个失灵。飞机师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下，竟急得满头大汗，在那里紧急修理。忽一片炮声，比以前特别响亮，这等于告诉大家，“共匪”进攻，更见迫近。我们也不知道这引擎究竟修好没有。只是一刹那间，飞机师却已跳上机头，不顾一切，将飞机滑出了跑道，急向南方腾空飞去。

民航队这架坏了一个引擎又超载的C46型飞机，竟然安全飞行了四个多小时，于晚上11时左右抵达淞沪上空。不料上海浓雾蔽天，飞机又盘旋了许久，方才降落虹桥机场。事后得知，如果再迟10分钟不能降落，油将用完，后果也不堪设想。

正在大家高声欢呼、共庆生还之时，人群中却传出了一阵哭声。成舍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在天津张贵庄机场换机时跌入泥坑的中年妇人在边走边哭。她向大家哭诉说，自己准备回广东老家，将天津全部家产变卖成细软，装在两个行李箱里，转机时不但行李箱没有提出，就连一个留在座位上的手提包也未能上机取走。现在命是保住了，但手无分文，又带着两个孩子，上海举目无亲，今晚到何处安身？想着这些难处，就悲从中来，忍不住放声痛哭了。她这一哭，大家也都跟着焦急起来，因为丢失在张贵庄机场的行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成舍我只遗失了一件小提箱，是从上海带去的，里面装了些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品，丢弃了也没有什么可顾惜的。

这时，一位民航队办事处的职员过来询问这批乘客：大家原来是不是坐801号飞机，因临时轮胎爆炸，才转乘这架C46型飞机的？在听了成舍我他们的诉说后，这位职员立即笑着向大家道贺，说大家丝毫不必着急，801号飞机已先于这架C46型机一小时到达上海，现停在龙华机

场，所有留在机上的行李已全部运来，明早9时即可提取，保证各位绝无损失。原来那架破了轮胎的801号飞机，在乘客换机飞走后，不再有丧失人命的危险，机师遂不顾一切，凭一只轮胎，冒险起飞，不但安全飞出，而且因空机速度较快，竟赶在大家前面抵达上海。

听了这意外喜讯，那位中年妇女破啼为笑，大家也庆幸行李失而复得。

成舍我花了200元金元券，在虹桥机场雇了一部“野鸡汽车”，直驶南京路自己住过的一家旅馆。“安顿甫毕，墙上的钟正敲着12点。我舒服地洗完澡，吃完饭，拉开窗帘，面向窗外，欣赏着上海夜景。大约此时，影院戏院，末场刚散，一股股人流从马路上不断冲过，流线型汽车，排得和长蛇阵似的，向各个不同方向驶去。全市霓虹灯，仍和平常一样灿烂夺目。许多舞场，奏着色情乐调。我睡在席梦思床上，想起民国三十七年12月18日这一天，要算是我记者四十年生活中，最富于戏剧化的一天。更特别想起，仅在几小时前，大家站在紧张混乱、四顾苍茫的荒原上，忍饥受冻，比钢刀还要锋厉的西北风，不断向脸上刮削，炮声不断，机场可随时变为坟场的那种惊险情况，与此时此地，温暖如春，互相对照，真是恍如隔世。”①

成舍我本来打算折返上海后再寻找机会飞回北平，但是平津局势的急遽变化，使他的这一计划彻底落空。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解放军华北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后，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对北平“围而不打”，于1948年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6日攻克天津，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至此，北平已成为一座孤城。曾经对新闻界宣称至少像阎锡山守太原一样坚守北平一年半载、死拼到底的傅作义，最后顺应民意，于1月31日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被围后，市内停电，电动印报机改用人工摇动印刷，速度慢了许多，《世界日报》只好由每日对开一大张四版改出四开一张两版。1949年元旦，报纸创办以来每年都发表新年社评的惯例也取消了。北平解放

---

①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2007年版，第139～152页。

后，南北恢复通邮，成舍我不断用书信指示北平报馆同人，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动的和谈，让报纸多登新华社消息，也登一些中央社消息，希图《世界日报》能够存活下去。正在北平访学的美国人德克·博迪，就注意到了《世界日报》的这种变化。他在1949年2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值得注意的是报纸的变化。例如《世界日报》现在花很大篇幅登载延安电台的内容。同时来自驻外记者的消息减少了，来自中央通讯社的消息被完全取消了。"[①]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制定、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来指导对新解放城市新闻业的清理整顿工作。该文件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用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文件规定：国民党系统的新闻业一律予以接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私营新闻业，根据其具体情况分进步、中间、反动三类，予以不同对待：（一）进步类：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贯保持进步态度，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者，予以保护，但需要向民主政府依法登记。（二）中间类：既不赞成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不拥护人民解放战争者，不予以没收，也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但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三）反动类：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予以没收。该文件还对新解放城市中存在的大量报刊、通讯社进行了基本评估：绝大部分被反动派所掌握，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而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②]

天津解放时，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接管、没收了国民党系统的全部新闻媒体以及天主教会所办的《益世报》，并勒令天津《大公报》在内的全部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引起一些不满。中共中央对天津军管会这种"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指示天津市委，"不

---

① 德克·博迪著、洪青耘、陆天华译：《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99～10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191页。

如采取一面听其续出（不是用法律允许其续出）一面令其登记的办法，我们可居于主动地位，从容审慎处理。”[①] 有鉴于此，北平市军管会下设的文化接管委员会（简称“文管会”）在北平解放当天随军进城，立即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华北分社和国民党中宣部机关报《华北日报》，而对其他报纸通讯社没有采取直接行动，《世界日报》也照旧继续出版。

一直到2月25日，《世界日报》才被北平市军管会下令查封。共产党查封《世界日报》，非常慎重，专门发了个查封的“文告”，通过广播昭告天下：

> 【旧金山广播】据陕北电台廿六日广播，北平廿六日息：国民党CC分子伪立法委员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已经在二十五号被北平市军管会查封。北平世界日报虽然戴着所谓“无党派”的假面具，并在北平解放以后伪装进步，但是事实上这个报纸在北平复刊以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始终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它一贯地拥护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忍心害理地把反对这种反革命内战的人民污蔑为“匪谍”，号召人民拥护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清匪除奸运动”，并且鼓吹组织亚洲反共集团，哀求美国干涉中国内战。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年一月十四日提出八项和平条件时，他还公然反对。北平市军管会为了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把它封闭。对于成舍我主办的另一种报纸《北平世界晚报》，也同时予以封闭。这两种报纸已恶迹昭彰，北平人民舆论界早已一再要求人民政府禁止它继续出版，在听到这两报被查封的消息以后，人心大快。[②]

据曾任《世界日报》储备课长的李鸿铭回忆：1949年2月24日，设在石驸马大街90号新闻专科学校内的报社印刷厂，正在紧张地印刷第二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② 《北平世界日报被封》，1949年2月27日上海《大公报》。

天报纸的副刊版。晚9时许，突然开过来一个排的解放军，大门口马上被几个士兵警卫，禁止人员出入。吴范寰经理跟着三个军代表也来了。学校员工当即被召集到印刷厂，聆听文管会副部长钱俊瑞宣布接收命令。钱部长宣布《世界日报》即日起停刊，员工暂时不得随意走动，等待研究后分别安置。报社立即组建了一个由吴范寰、李鸿铭等人参加的交接委员会，保管机器设备和物资账册，等待接收。军管会留郭代表住在学校办公室，负责具体的接收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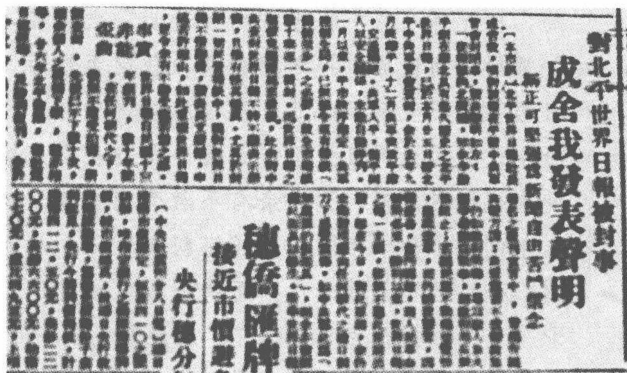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郭代表来到李鸿铭的宿舍，找他了解成舍我的情况。郭代表问李鸿铭自己认为成舍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成校长一贯跟孙中山总理走，他早年在北平办的报，触犯了军阀张宗昌，结果被张派宪兵抓过；在南京办的《民生报》触犯了汪精卫，也被汪精卫逮捕，过了40天的铁窗生活，最后虽然被释放了，但他的《民生报》被宣判为永远不得复刊；他在上海、香港、原在北平办的日报、晚报、新闻专科学校以及在桂林办的新闻学校全被日本鬼子没收查封了。抗日时他又是国民政府遴选的参政员，那时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邓颖超女士等都是国民政府参政员，都是为了抗日，对吗?"他又补充说："我不懂政治，我的认识可能片面，我认为他对社会作了些好事，在桂林和重庆办的新闻学校都是半工半读，所招的学生大多数是穷孩子，是被日本赶走逃难的孩子，他办的学校能给生活费用，不收学杂费，私人能办这些事业，实在不易呀!"①

后来，文管会对《世界日报》员工作出了四种安置办法：（一）《世界日报》将改名为《光明日报》，凡愿留报社工作的，一律留用；（二）凡愿考革命大学和华北大学读书的，一律由文管会开介绍信，前往报名；（三）凡愿回家乡的，由文管会给介绍信和返乡路费；（四）查有罪行记录的人，作开除处理。最后，报社员工中只有总编辑张慎之一人被开除，个别留下来继续工作，多数年轻员工都进入了革命大学和华北大学。

1949年4月离开北平的《益世报》社长马在天则说：《世界日报》在解放军进占北平前后，本来已经表示"向人民靠拢"，但是终不免以

---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對北平世界日報被封事
成舍我發表聲明

成舍我为北平《世界日报》被封而发表的声明，刊登于1949年3月1日《申报》。

“坚持内战戡乱”、“为CC分子”、“违反人民利益”而遭到封闭。因为《世界日报》不是官僚资本，所以在名义上称“封闭”而不是“接收”。当时，工人要求“清算”，职员要求“清算”，工人职员一齐要求“清算”。三次清算之后，《人民日报》又出面要求清算。《人民日报》是接收《华北日报》而出版的，清理账目时发现《华北日报》曾经拨给《世界日报》60多吨白报纸——据说这批纸是1945年国民党中宣部饬令华北特派员、《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划拨给成舍我的。《人民日报》要讨回这笔纸账，按照当时的市价，《世界日报》需偿付五万大洋。报社把一切变卖，也抵不上这笔“巨债”。①

成舍我是在上海听到《世界日报》被查封的消息，他在南京广播了自己的答辩，并立即写了一份声明，送请上海各报刊登。但是大家都不愿登载，经成舍我多方请求，《申报》、《新闻报》于3月1日发表了这份声明：

从报载陕北广播，知余辛勤手创在华北具有悠久历史之北平世界日报，已于本月二十五日被北平中共军管会查封。余于去年九月底离平，十二月共军突攻平津，交通隔绝。共军入平，留平同人以安全关系，未能自动停刊。一月以来，平市秩序渐定，共军控制全

① 马在天：《“解放”后的北平新闻界》，《新闻天地》（香港）第71期，1949年6月25日出版。

局，已无强令原有报纸“伪装进步”之必要，故全市报纸数十家逐一被封，而世界日报之躯壳竟独获延至最后，此余对中共查封世界日报不特不应表示怨愤，且惟有怪其优异。尤其于封闭一切民营报纸中，独对世界日报不惜辞费，发表长文广播，申述若许理由，如此重视世界日报，更令余有不胜受宠若惊之感。世界日报自民国十三年创刊，数十年间，在任何朝代之下，几无不遭受迫害，所谓查封，先后已不下数十次，而余个人之被捕下狱，数亦相等。廿六年北平沦陷，报社为日军掠夺，及胜利复刊，余于署名之复刊宣言中，曾痛告国共双方谓：共产党若不改变政策，仍如政府所传，专以杀人放火斗争暴动为能事，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常，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革命势所必至。胜利以来，世界日报之每一主张，即无不遵此原则出发，即在今日，对此原则，余仍未能发现应向任何朝代之枪口刺刀下感觉忏悔。如中共认此为“无党派的假面具”，则余亦宁愿戴此面具以终生。所幸世界日报过去言论，一字一句，公正良善之广大华北人士，久有定评，初无待余之辩证，亦非任何人所能歪曲。而余于二十余年前，一介书生，以仅有之数百元极少资金，独力创办此报，迄至今日，被中共查封止，能在华北民营报纸中具有广大规模，拥有广大读众，原因何在，众所共见。然世界日报不特从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与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贷款，亦向所谢绝。中共所查封之世界日报资产中，每一机器之齿轮，每一铅版之字粒，胥为余及数百同人绞脑汁流血汗以获得。世界日报今虽暂时不能再向华北广大读众供献超然独立之言论，迅速确实之新闻，但过去数十年来华北广大读众，所给予世界日报滋育成长之鼓励，正可坚强余及无数新闻战士为新闻自由继续苦斗之信念。回忆抗战时期，不特余之北平世界日报为敌摧毁，所有由余主办南京、上海、香港之其他报纸，亦先后胥遭掠夺。汉口、桂林则未及出版即告沦陷。而余终于胜利前夕，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余深信天地之大，中共能封闭余北平之世界日报，然无法封闭余毕生献身新闻事业发挥正义抵抗暴力之意志。至中共广播曾指余为国民党CC分子，此种恶毒的造谣，不特无庸余一词辩正，

即作此广播者，苟不自毁其谍报工作向称卓绝之惊人成绩，则对当前各种派系情形，及余向不参加任何派系之铁的事实，稍加思索，亦必哑然失笑。好在任何朝代，均有其制造专衔，污蔑异己之天赋特权，“国特”“匪谍”，易地皆然。此为古今中外不易之定律，而在今日为尤甚。余亦惟有叹息政治道德之愈益衰落而已。①

中共将《世界日报》定性为“恶迹昭彰”的“反革命报纸”而予以查封，成舍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88 年 7 月 12 日，台湾《立报》创刊，他在发刊辞中，还不忘 40 年前的这桩公案。

北平和平解放后，吴范寰设法将成舍我的太太和孩子送走，又给老板汇去了所需款项。1949 年 4 月，成舍我携眷移居香港。

① 《对北平世界日报被封事 成舍我发表声明》，1949 年 3 月 1 日《申报》。

主持香港《自由人》

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战败求和”，试图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在立法院中，有一部分立法委员是赞同政府诚实地与中共谋取和平的。4月1日，即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等赴北平那天，立法院主和派但懋辛、刘不同、张潜华等数十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和谈的认识与态度》声明，指出：“经过了三年沉重无比的内战，其所显示于我们目前最鲜明的印象，厥为面临着一个自清末以来又一次空前的政治大变动，而且在变动的范畴、规模、原因以及形成上看，其动荡之烈与幅度之广，确乎超越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之役和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从历史进程上看，我们应有自惭自疚的反省：这次政治变动不仅是广泛的社会变迁中之方面表现，乃是来自最根本的人民革命。……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由于国民党领导阶层远离了革命的本旨，所以便遭遇到它难以洗刷的创痛。”声明表示：“我们既然受到了这种惨痛的教训，就应当有勇气承认失败，重新领悟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和中共诚实地谋取和平。这不但是解决政治上空前大变动的对策，也是四亿五千万同胞所衷心向往的盛事。”为造成有利于和谈的政治气氛，他们把这份声明彩印数万份，在南京全市及和谈代表出发的明故宫机场散发，使送行场面相当热烈。

然而，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彻底破裂。人民解放军当即挥师渡江，南京陷于末日恐慌之中。4月22日，即南京被攻克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发出紧急通知，所有立法委员一律于本日撤退至上海。南京明故宫机场集中了10架运输机往返京

沪运送，另在下关车站备有专列，供不及搭乘飞机者撤退。这些立法委员到上海后，又被分批送到广州，在广州还举行了院会。身为立法委员的成舍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举家从上海到香港的。当然，也有立法委员不愿做国民党政府的“殉葬品”，并未随队撤退，而是就地隐蔽，准备迎接解放。

1949 年 5 月中旬，张潜华等一批曾经赞同和谈的立法委员到达香港，与中共负责人邵荃麟取得了联系。张潜华向邵荃麟表示，出于良心上的驱策和政治上的责任感，迫使他们不能不和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彻底决裂，公开站到人民方面来，并请示他们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对人民事业有所贡献。邵荃麟没有当面答复。过了两天，邵荃麟告诉张潜华：立法院既然是国民党的所谓民意机关，那么你们就站在人民立场表示一下政治态度吧！如果能联络一些人发表一个声明，一面抨击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祸国殃民制造内战的罪行，一面申述自己脱离反动政权归附人民的决心与愿望，这对于革命事业还是有意义的。邵基麟还表示，完成这一任务后，欢迎大家到北平去。

这时，曾任南京和谈代表的黄绍竑来到香港。黄绍竑也是立法委员，这批人希望他出面领导。黄绍竑已经从中共方面闻听此事，同意共同推进这一政治运动。黄还认为联系的范围应该更大些，不必只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都可以去争取。大家表示赞同，遂决定分头进行联系，争取在最短期内举行集会。6 月 8 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了第一次集会。这次集会，有 20 多人参加，连成舍我、程沧波、傅汝霖等人都闻讯而至，“这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人的彷徨无主和苦闷情绪”。[①]

成舍我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所以后来也就滞留在香港，没有像黄绍竑、张潜华等那样北上参加共产党新政权。

成舍我属于当时香港另外一个所谓的“自由人”圈子。由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完全失败，王云五、成舍我、阮毅成、程沧波等一批文化人相继“流亡”到香港。他们既坚持反共立场，又对台湾当局持观望态度，

---

① 张潜华：《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70 辑，中华书局（北京）1980 年版，第 133～138 页。

以“自由人”自命。这些人本来就是朋友，为了解彼此生活情况，约定每周餐叙一次，以免互访之劳。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扩大发起每周一次“聚餐会”，王云五被推为召集人。参加餐叙的人，都能各说各话无拘无束地表达意见，但也有一个原则，就是每次所谈，内容都必须是“如何反共，如何争取自由民主”，其他一概免谈。倘若有人觉得不合个人志趣，则参加与否悉听尊便。[①] 由于港英政府禁忌政治性集会，他们也觉得这样散漫的每周座谈会未必能持久，最后决定出版《自由人》三日刊，“既可藉此刊物益巩固反共人士之联络维系”，又可免除港英政府之干涉。由座谈会发展到决定创办《自由人》三日刊的过程，王云五曾有如下回忆：

> 每次参加座谈会者，多至三十余人，少亦一二十人，皆为文化界人士，或为旧日与政治有关系者，各政党及无党派人士皆有之。后来我以香港政府最忌政治性的集会，凡参加人数较多，尤易引起猜疑，动辄干涉，加以如此散漫的座谈，亦未必能持久，因于某次座谈会中提议创办一小型之定期刊物，每周或半周出版一次，既可藉此刊物益巩固反共人士之联络维系，且刊物一经向港政府注册，则在刊物办公处所举行的座谈，皆可诿称编辑会议，可免港政府之干涉。……结果决办三日刊，定名为《自由人》，其资金由参加座谈会人士各自量力提供。我首先代表华国出版社提供港币一千五百元，此外各发起人分别担任，或一千、或五百不等；并决定撰文者一律用真姓名，以明责任。其后，又决定委托《香港时报》代为印刷发行。[②]

“自由人”之一阮毅成则回忆：1951 年 1 月，大家又在高士威道举行餐会，公推王云五先生主持，进一步商谈出版事宜。当即决定出版三日刊，仿小型报格式编辑。阮毅成建议刊物的名称叫《自由人》。他说：“台湾已有《自由中国》与《自由谈》两个刊物，我们反共即争取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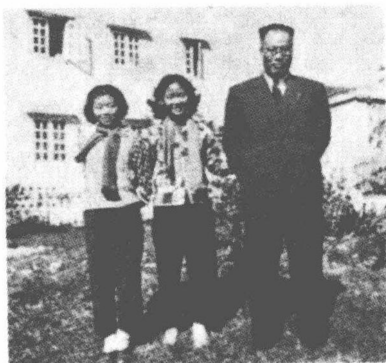
① 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 24 集。

② 郭太风著：《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5 页。

何不名为《自由人》？众皆赞成，议遂定。”[①] 这次餐会决定《自由人》在农历新年后出版，随后推出董事会第一任董事：左舜生、成舍我、阮毅成、端木恺、许孝炎、陈训悆、陶百川、程沧波、楼桐孙，左舜生为董事长；第一任监事为王云五、金侯城、雷震。组织管理实行社长制，公推成舍我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陶百川为副总编辑，编辑委员16人。卜少夫为总经理，并以他的名义在香港政府登记立案。

1951年3月17日，《自由人》三日刊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原始发起人的名字赫然排列，一篇洋洋洒洒的发刊词，诉说着此时此地这批“自由人”的政治立场与态度：

> ……
>
> 我们现在简单明了地指出，今天世界人类只有两个壁垒，一个是“人的社会”之壁垒，一个是“非人社会”之壁垒。这两个社会的摩擦，今天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全世界“方趾圆颅”的芸芸众生，今天必需自己有一选择，我们参加“人的社会”呢？还是加入“非人的社会”？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但具有五官四肢，有机的各种机能，他还有思想、有灵魂。换句话说，“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是有人性，有人格。根据了人性与人格，发挥其个性，以增加社会之幸福与个人之生活水准，从而增进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文明。在另一方面，一个“非人社会”中，虽然“方趾圆颅”的众生，具备了人的形态，但是除了形态以外，他没有思想与灵魂。“非人社会”中只是一群动物，每一个“方趾圆颅”的



成舍我1952年与三女嘉玲（中）、幼女露茜摄于香港九龙钻石山寓所。

① 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24集。

动物，既不许其有人性，亦不能让其有人格。他们是机器，他们是奴隶，他们的动作行为，是不让自己有任何的主宰。他们是一群牛马，一群绵羊，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受牧人的操纵指使，他们没有自己。他们是大编组中一个微小的东西，他们的社会是一部机器，每一个人是机器上的螺钉或零件，它的生存是为着整部机器，没有零件或螺钉的地位。犹如“非人社会”中的个人，其生存为着少数专制的寡头，他们没有生存的价值。

“人的社会”中因为有人性与人格，所以个人有尊严，也有个性的创造。各个人发挥其个性的创造，因而有物质的发明，艺术的成功。那个社会中具体而现实的特质，是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社会福利的设备，以及亲爱与合作的气氛。每个人为着自己而生存，也为着人人而生存。个己与群体，相互调和其需要而消除其矛盾。“非人社会”中不许有人性，而只有所谓纪律，不让各人保持有人格。同时视各人的个性为执行纪律的障碍，所以尽力设法毁污各个人的人格与其个性。惟有各个人的人格与个性毁灭以后，然后整个社会，可以随着少数的寡头们为所欲为。在这种社会中，多数人在欺骗的口号下而被迫害，而尽量降低生活水准，惟被少数的专制寡头得以穷奢极欲。各个人不仅消极的不许有人性，而且极力鼓励各人做反人性的行为。“自白”、“悔过”、“清算”、“斗争”，就是“反人性”积极的表现。制造矛盾冲突，乃至布满仇恨猜疑忧惧。人民在此种气氛中，仅仅以免于冻馁、免于一死为幸事，不敢再望生活之有水准，更不敢再求社会予以福利。每个人为着所谓“国家”而生存，每个人是奴隶，是牛马，奴隶牛马不能再望有人的一切权利与幸福。

……

我们谨以此小小刊物《自由人》，贡献于全世界凡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决心献身于这一运动的开始。全世界和平民主的人士：我们要做人，我们要做自由人。每个人争取了自由，每个人做到自由人，世界才有民主和平，人类才有幸福与光明。

发刊词把世界分为“人的社会”与“非人社会”两大壁垒：“人的社

会”中人有人性、人格与个人尊严、个性创造，每个人为自己而生存，也为人人而生存，因而生活幸福，社会和谐。“非人社会”不让人保有人性与人格，而且鼓励人做反人性的行为，专制寡头通过所谓的纪律约束大多数人而自己为所欲为，全社会生活水准低下，充满仇恨猜疑，每个人是奴隶，是牛马，不敢再奢望有人的权利与幸福。文章说，每个人都想做人，参加“人的社会”，这是天经地义之事。那么，做人的主要条件是什么？“自由是做人的主要条件”，要做人必先得自由，得着自由，方可做人。因此，“我们揹着自由的大纛，叫着‘做人’的口号，开始‘自由人’的运动。争自由，争人性，发动全人类自由人性的力量，去打倒与铲除‘共产帝国主义’反人性的非人社会”。

这篇被阮毅成誉为“掷地作金石声”的发刊词，出自程沧波之手。它实际上揭示出《自由人》的两大宗旨：第一要反共；第二要争自由民主。为了贯彻这两大宗旨，“自由人”们特别宣布三点：第一，凡参加《自由人》的人，必须轮流写稿，而且要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第二，在经济方面，绝不接受美国人的帮助；第三，绝不接受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津贴。[①]

但是，《自由人》刊行不久，即面临停刊危机。首先是经费拮据。刊物的创办经费及经常费，来自发起人的捐助。为了节省开支，《自由人》委托《香港时报》印刷，费用由该报暂时记账。由于经营状况不佳，1951年年底，《自由人》即有“断炊”之虞。到1953年3月，《自由人》已积欠《香港时报》印刷费6000元，稿费11期，难以为继。其次，王云五、程沧波、阮毅成等发起人纷纷赴台，香港“自由人”声势日衰。到1951年年底，已有三分之二的发起人去台湾定居。第三，发起人之间政治思想发生矛盾。这些所谓的“自由人”，虽然几乎都从事文化工作，但是大多与现实政治有瓜葛，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例如，王云五曾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程沧波前后担任过近10年的《中央日报》社长，左舜生是青年党主席，金候城为民社党人，雷震则是国民党后起之秀。这个颇似一小型“联合政府”的“自由人”团体，难免不发生政治思想的分歧。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69～270页。

最大的问题乃在于编辑尺度很难掌握。这些“自由人”一方面要反共，但是香港环境复杂，不能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要向台湾国民党当局争民主、自由，如果争的太多，就会被人猜疑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在这种情境之下，编辑尺度很难做到“恰如其分”。《自由人》号称超越党派，“绝不接受任何津贴”，实际上在变相接受国民党的资助。为《自由人》赊欠代印的《香港时报》，是国民党中央在香港办的机关报，当时的社长许孝炎，也是《自由人》发起人之一。陈诚任“行政院长”期间，某“立法委员”意外发现，“行政院”向“立法院”送审的年度决算中，列有补助“香港自由人社反共宣传费”一项。[①] 后经查证，说这笔钱并没有收在《自由人》的账册上，不过总让人有“此地无银”之想。

这批所谓的“自由人”，几乎都与国民党有关联，只是关系有疏有密而已。因此，他们刊行的《自由人》，一边反共，一边维护台湾国民党的权益，决非所标榜的“超于党派之外”。1952 年 2 月，在台“自由人”王云五、程沧波、黄雪村、王新衡、楼桐孙、吴俊生、陈石孚、陶百川、雷震、阮毅成等举行餐会，会上有人提出，《自由人》的编辑尺度已经出现了偏差。经过讨论，决定请阮毅成起草一函，大家共同署名，致香港的左舜生等，请其注意：

> 弟等今午聚餐，谈及《自由人》编辑态度。回溯创办之初，原属超于党派之外。因此，铸秋兄（端木恺）月前自港返台，所述一节，不拟加以考虑。兄等在港主持，辛劳至佩，自亦必赞同弟等态度也。尔后港方报刊，如对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恶意攻讦，或无理批评，《自由人》似不便自居中立，宜即加以驳斥。如有《中国之声》作者来稿，希勿予以刊登，以严立场。再则，此间对第三方面各事，多持私人消息。语多片段，难窥全貌。斯后尚恳时将各方动态，择要见示。既可为撰稿之参考，亦为知己知彼之一道。《自由人》素以民主反共为宗旨，创行以来，瞬将一载。此皆兄等艰苦奋斗之成绩，不胜佩敬。专此奉候，并请著安![②]

---

①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第 280 页。

② 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 24 集。

信中提到的《中国之声》，是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创办的一份刊物，张国焘、李微尘先后担任主编。战盟是1952年香港地区出现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以第三种力量自居，既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反对台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起人有张发奎、张君劢、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李微尘等。[①] 这封信中提到的“第三方面”，应该就是指“战盟”。在台“自由人”认为香港《自由人》与第三势力即战盟有关联，所以在信中委婉提及，提醒左舜生等在港“自由人”注意。在反共这一点上，战盟与“自由人”立场一致。但是战盟同时又反国民党，“自由人”就不能接受了。可见，“自由人”是一个反共而支持国民党的文化团体。

即便如此，台湾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人》仍时有干涉之心。王云五等在台“自由人”鞭长莫及，《自由人》难免会登载一些“不妥”文字，引起台湾执政当局注意。1955年春，台湾执政当局认为《自由人》的问题已到严重地步，必须给予正面干涉。3月26日下午，阮毅成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宣传政策指导小组会议。阮当时任《中央日报》社长，所以被指定与会。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在会上报告：香港《自由人》三日刊，近日言论记载，愈益离奇，须采取停止进口处分。阮毅成当即起立，说明《自由人》的创办经过，并向与会者解释：台北各位同仁，久未闻港事；王云五也曾专门去函港方，请以后不要再刊载不妥文字。国民党基于安全上的考虑，执意要给予《自由人》“停止进口”的处分。王云五约请在台“自由人”在端木恺家集会，商讨对策。讨论结果，达成如下决议：“本刊如不能销台，势必停刊。为避免使政府蒙受摧残言论之嫌，希望政府妥慎处理，使其能继续出版。在台同仁愿意退出。惟在港同仁意见如何，亦盼政府迳与洽商。”会后，由阮毅成、许孝炎将此决议转达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照。中央党部决定《自由人》以后不准再与《香港时报》发生关联，一场风波暂告平息。4月15日，大家又在成舍我家中聚餐，讨论决定：在台同仁既已必须退出，《自由人》也不能再依靠《香港时报》印刷；外界闻知中央处分，必不愿再认捐，环境困难如

① 参阅杨天石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8～634页。

此，只可宣布停刊。[1] 不过《自由人》并未停刊，一直出到 1959 年 9 月 13 日方才结束，一共刊行了八年半时间。

成舍我 1952 年底离港赴台定居，担任《自由人》社长兼总编辑将近两年。这一时期的成舍我，在《自由人》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言辞激烈的反共文章。他称中共的"镇压反革命"为"大屠杀"，讽刺中共当局读水浒演义读多了，为了证明被杀者死有余辜，替被杀者拼命制造种种惊人罪行，将其刻画成妖魔鬼怪。说大陆几亿善良的羔羊正在俯首待戮，中共尽可痛杀一阵，何必自讨麻烦，制造那些不伦不类的罪状。[2] 1951 年端午节，他在《自由人》上撰文，指责共产党造成了中国"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悲恸局面。[3] 1952 年新年，他应卜少夫之约，在《新闻天地》上谈对新年大局的看法，将共产党与旋胜旋败的李闯王相提并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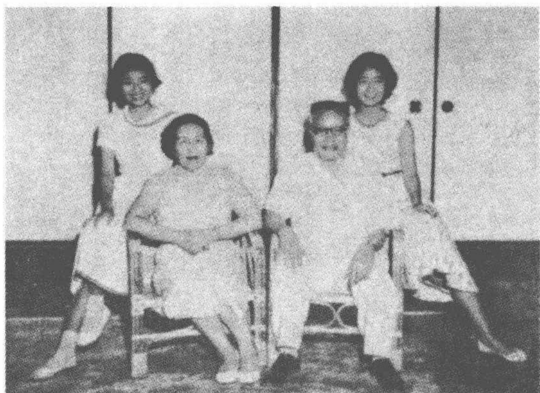
成舍我主持《自由人》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朝鲜血战方酣。评说韩战，自然是成舍我的主要话题。他指责中共夸耀"人力无穷"，将"铁幕中的羔羊"源源不断地赶往朝鲜战场。[4] 联军占领汉城后，是否重越"三八线"，众说纷纭。他撰文分析："中共一天不宣布取消'一边倒'，我就一天有理由相信，只要联军掌握了充分兵力，不但会越过三八线，并会打到鸭绿江。最后，时机到来，并一定会轰炸中共基地，荡灭秧歌王朝。"[5] 艾森豪威尔宣布就任欧洲盟军统帅，与麦克阿瑟分掌世界两大战区——西欧和远东的军权，成舍我兴奋不已，他建议美国内部集中力量，支持分处两大战区的统帅，并切望所有盟国同德同心，"打倒人类恶魔，保障民主自由"。[6] 从成舍我的韩战评论中不难看出，他是寄希望于联军战胜人民志愿军，甚至"荡平"共产党新政权的。

作为一名报人，这一时期的成舍我特别关注共产党治下的新闻宣传

---

① 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 24 集。
② 舍我：《煎人心下酒切人肉出售》，载《自由人》，1951 年 2 月 6 日。
③ 舍我：《谁迫使我们骨肉离散》，载《自由人》，1951 年 6 月 9 日。
④ 舍我：《人力是否真的无穷?》，载《自由人》，1951 年 3 月 10 日。
⑤ 舍我：《联军为什么不越过三八线》，载《自由人》，1951 年 3 月 17 日。
⑥ 舍我：《联军危机在七嘴八舌》，载《自由人》，1951 年 4 月 4 日。

事业，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诋毁中共“铲尽非共报纸，杀光非共报人”，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人权保障”，是不折不扣的“加料张宗昌”、“超级希特勒”，已成为“中华民国自由报人第一号公敌”。[①] 攻击中共的宣传工作完全是说谎，报纸内容千篇一律，编排完全倒退，强派勒销而发行依然下跌，中共“以诈骗得中国”，但是“以诈骗治中国”却遭到了致命的失败。[②] 他自称以“纯报人”的观点，从技术方面对中共报纸三年来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一）新闻干部，无知懒惰；（二）新闻内容，互相冲突；（三）记者粗心大胆，捏造新闻；编辑不假思索，信手发稿；（四）文章互相抄袭，报纸踊跃刊登；（五）编辑工作混乱，“一鱼两做三做，一稿再版三版”；（六）错字严重，大闹笑话。成舍我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匪’连报纸都搞不好，都得不到自己工作干部的衷诚协力，则它有无本领，将整个大陆一手搞好？纵观各种迹象，‘共匪’日趋崩溃，这一问题，任何人都可解答，用不着我丁宁反复，浪费笔墨，再为申说了。”[③]



成舍我与夫人萧宗让、三女嘉玲（右）、幼女露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决非像成舍我所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中共获得胜利，建立政权，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岂是“诈骗”所能得之？历史已经证明，成舍我当时的推断乃一厢情愿，完全错误。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仇恨，观念、主义的森严壁垒，使

① 成舍我：《“共匪”是记者第一号公敌》，1952年9月1日香港《工商时报》。

② 成舍我：《“共匪”将亡于宣传》，1951年9月27日，载《自由中国》第五卷第8期。

③ 成舍我：《替“匪区”报纸做一次总清算》，1952年8月1日，载《报学》第3期。

一个报人失去了应有的客观、冷静与理性。

诚所谓“世事茫茫难自料”。1951 年 7 月，正是成舍我不遗余力地攻击、诋毁共产党新政权之时，他 16 岁的儿子成思危却背起行囊，离开香港，在二姐成幼殊的接应下，走过罗湖桥，回到了新中国。妻子萧宗让舍不得这唯一的儿子，天天以泪洗面，但怎么劝都没用。成舍我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知道儿子去意已决，也没有过多劝阻。成思危回大陆后，成家从香港迁居台湾，起初彼此还能保持联系，但后来就渐渐地断了线。母亲思儿心切，趁送女儿出国留学的机会，来到香港，写了 100 多封信希望能找到儿子，但全都石沉大海，音讯全无。萧宗让 1964 年在台湾去世，临终也没能再见到儿子一面。成舍我与成思危父子相见，已是 28 年后的 1979 年，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女儿成露茜家中。

八十到头终强项

1952年底，在香港对共产党新政权“口诛笔伐”了三年的成舍我，感到中国的政治巨变已成定局，遂举家迁往台湾。他本拟复刊《世界日报》，但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此时已实行“报禁”，不允许在台湾创办新报或复刊原有报纸。如果确要办报，必须购买现有报纸，改头换面后刊行。成舍我不屑像寄居蟹换壳那样偷偷摸摸办报，向国民党文化宣传部门力争复刊《世界日报》。几经争取，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答应《世界日报》在台复刊，但是陶希圣将此案呈报给最高当局时，遭到否决。后来，陶希圣曾找成舍我商谈，告诉他上面有意让一些过去在大陆有声望的报纸在台出版，点拨他最好直接给“蒋公”写信。成舍我谢绝了陶希圣的建议，他说：“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了我办报的手脚。因此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而不是给蒋公写信。”据说陶希圣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①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成舍我就打消了办报的念头，开始在台湾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由“一代报人”成为“新闻教育的巨擘”。人生事业方向的这种转变，成舍我曾有如下记述：

---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 我到台湾以后，即准备在台恢复《世界日报》，惟此时台湾已有了所谓的“报禁”，为节省纸张油墨，不许有新报出版，如果要办，只有购买现有一家营业不佳、计划出顶的报纸，改变登记，更换报名。也有不少热心朋友，为我介绍，但我认为办报，尤其此时办报，主要为反共，而非如我过去为开创自己的新闻事业，这是一件何等光明正大的事，既然“国家”不需要我办报，又何必鬼鬼祟祟去顶替别人的招牌？我婉谢了这些朋友的好意，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这几年中，我就断绝了办报念头，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我在《新生报》写了一篇《需要一万名新闻干部回大陆》的专论，强调新闻教育的重要，许多新闻界、教育界的朋友，看了多劝我，既然你相信办一个新闻学校，训练反共新闻干部，倡导新闻自由，比仅仅办一张反共报纸，功效更大，那么，你何不率性办一所新闻学校？我对于这一建议，再三研考，我最顾虑的，是那时我已快近六十岁，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我无法等待百年，但要看到一所学校，稍具规模，起码得廿年以上的努力，我能否再活廿年？鼓励我的朋友，尤其程沧波先生，他这样说，马相伯先生，在满清末年，创办震旦大学及复旦大学，都是在他六十岁左右，他还能眼见他的学生于右任及其他高足，勋业彪炳，事业成功。那么，安知你不能有他那样的运命。即使万一中途不幸，只要这个学校，有了好的开始，许多朋友，也会帮你继续办下去。世界新闻学校，就是在如此热情鼓励下，开始筹办的。①

当然，办学也需要得到当局的批准。与办报相反，上面对成舍我办学非常热心，主动地促成此事。据女儿成嘉玲回忆，请求复刊《世界日报》被否决后，成舍我没多说话，开始埋头给报纸写评论，并到几所大

---

① 成舍我：《我如何创办世新》，原刊于 1976 年 10 月 15 日台湾《联合报》，为成舍我纪念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建校 20 周年之演讲。《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560～561 页。

学兼课。这种沉默的态度，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于是有人向当局建议："成某人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让他办报，也应该让他做些大一点的事，否则会闷出问题来。"经过一番讨论，当局最后认为让成舍我办学校，应是两全之策。于是，"教育部长"张其昀亲自登门，极力怂恿成舍我办学校。[①]

朋友们的鼓励和当局的支持，使成舍我终于下定决心，再度兴学。1955年，他邀请新闻界、文化界朋友于右任、王云五、萧同兹、黄少谷、端木恺、程沧波、陈训悆、阮毅成、张明炜、辜振甫、叶明勋等19人，发起筹备"世界新闻职业学校"。

成舍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筹措经费。他估算了一下，即使开办的是一所高、初级职业学校，除了地皮，至少仍需要二三百万，方可动手。自己虽然很早就做了报业老板，"薄于资产"，但是经过数次世变，早已丢失殆尽；发起人也多为一介书生，家无余财。经过发起人会议研商，决定分别向熟识而有钱的朋友劝募。成舍我也亲自出马，四处募捐。有一次，他接到一位发起人的朋友的电话，要他去拜访某煤矿老板，说这位老板答应捐5000元。该公司离他家很远，当时还没有计程车，成舍我先打电话约定，然后坐了三轮车前往。不料快到公司附近，三轮车的一个轮子突然飞去，把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幸好没受重伤，成舍我站起来拍拍隐隐作疼的双腿，勉强走到煤矿老板所在的三楼。谁知事先约好的这位老板，竟然说临时有要事，请他明天再来。成舍我没好气地说：我明天不能来，可能要进医院了！这位老板总算没有食言，过了几天，派人把认捐的5000元钱送到了成家。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最后募到30万元。成舍我又向朋友告贷，并且将住宅向银行抵押贷款，购得台北县木栅乡沟子口一片荒山野沟作为校址，盖起了一幢简易校舍和一座实习印刷工厂，购置了一些必需的教学设备，真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956年10月15日，世界新闻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职业学校正式开学，董事会公推成舍我任董事长兼校长。[①] 在开学典礼上，成舍我对仅有的 63 名学生说："我以年将 60 岁的老人，敢向同学保证，我一定将我未来的生命，全部贡献给这个学校。"[②]

"世新"创校的最初几年，学校所在地木栅乡沟子口还不通汽车，也没有电话通市区，成舍我每天早晨从信义路丽水街家里，坐三轮车赶往学校，要在高低不平、满地泥泞的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有时上下午要各跑一次。曾经功成名就的成舍我，在花甲之年，还能够如此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确实让人感佩敬慕。在他全身心的经办下，学校事务很快就上了轨道。四年后，当局以"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办学成绩优良，正式核准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在当初发起人会议上，成舍我曾郑重地指出，办报与办学虽然同是极其重要的文化事业，但两者的基本出发点却正好相反：近代报纸，是自由经济下大规模营利事业之一，赚钱越多，越显得报纸办的成功。学校则不然，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公立学校，全部支出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政府支付的经费越多，办得越好。私立学校，则全靠私人捐助，捐助的目的，只是兴学，不为谋利，捐来的钱越多，学校才能办得越好。换句话说，就是办私立学校，要陪钱越多，才越算办得成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起人会议才决定由大家分头募集办学经费。但是苦口婆心一年多，最后只募得 30 万元。这一结果使成舍我深切认定，要使"世新"不中途夭折，并能够逐年壮大，必须放弃那套等待工商界不断捐助、陪钱越多学校越成功的想法。"我们既不能以办学为营利事业，改募捐为'募股'，劝人投资办学店，我们就只有咬紧牙关，以工商界私人营利精打细算的精神来办此涓滴归公、非营利的私人学校。"[③] 于是，成舍我决定仍采用当年 200 元创办《世界晚报》再办《世界日报》的做法，以学

---

① 1960 年，"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董事会改推萧同兹为董事长，成舍我专任校长。1973 年 11 月，萧同兹去世，成舍我由校长兼代董事长。1975 年 8 月后，成舍我专任董事长，不再担任校长一职。

②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3 页。

③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562～564 页。

校现有的这点儿微薄基础，厉行节约，惨淡经营，特别是 1968 年木栅乡由台北县改隶台北市，学校的地价升涨，“世新”的各项财产合计已达到 20 多亿元。为了使学校由“专科”改制为“学院”，成舍我竟然一举将其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根据台湾的法律规定，财产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属该财团法人所有，不得再转移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世新”草创之初，经费短绌，成舍我常常把自己在其他学校兼课所得的钟点费、稿费甚至“立法院”的薪俸，都带到学校应急。等到财力坚实了，为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他又慨然捐输，这样的豪情壮举，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成舍我在北平、桂林也办过学校，但那只是自己办报的附属事业。到台湾后，报纸不允许办了，办学就成了自己的“主业”。成舍我最初的构想是办一所新闻学院或新闻专科学校，但是当时当局严格限制设立大学或专科学校，他只好先从职业学校办起，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升格。1960 年，“世界新闻职业学校”被核准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事业蒸蒸日上，遂于 1964 年呈请改制为“世界新闻学院”，获准先行筹备。由于种种原因，“世新”改制为学院酝酿了 20 多年，到 1989 年还没有实现。成舍我自觉身体日衰，遂利用假期把在美国工作的幼女成露茜召回，帮助自己谋划筹措。炎炎夏日，父女两人对桌而坐，每天都忙到深夜才收工回家。1991 年 3 月，“教育部”终于批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改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此时成舍我已再度发病，住进了医院。成露茜拿着批文，兴冲冲地到医院去告诉父亲。成舍我拿起惯用的放大镜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还没有看完一行，就迫不及待地对女儿说：“还是你念给我听吧!”他终于在有生之年，听到了自己手创的“世新”，由专科技术学校获准升格为大学的消息。一个月后，他便安然而逝。1997 年，“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在女儿成嘉玲手里，又奉准改制为“世新大学”。50 年来，“世新”培养了数万名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毕业生遍布台湾、香港各大媒体。在台湾的新闻传播界里，“世新”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老校长”成舍我以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培育了巍巍学府，夭夭桃李。有人说，“世新”与成舍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生命交融，不可分离。

成舍我到台湾后走上专业办学之路，是无可奈何之举，并非自己的

初衷。自喻为“新闻界逃兵”的他，岂能忘怀自己所钟爱的办报事业？“世新”创办第二年，他就办了一份校内刊物《小世界》，供学生实习。学校改制为专科后，他又把《小世界》向官署申请登记，正式对外发行。为了让学生直观了解一般报社的运作、管理，成舍我特意使《小世界》的组织设置和一般报社大致相同，也分编辑、经理两部。编辑内容方面，如社论、专栏、副刊、新闻处理原则及版面格式等，都有规则式的教学意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世界》只是一份学生实习的刊物，而且篇幅仅有四开大，但是成舍我依然像当年办《世界日报》和《立报》那样，全力以赴，饶有兴致。他不但指导学生在《小世界》实习，而且还常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撰写评论。1967 年 8 月 18 日，成舍我从日月潭避寿回到台北，列车进站时，已经是上午 10 点 45 分，距下班的时间只有一个多钟头。他先赶往“立法院”开会，然后到“监察院”，向陶百川委员采访有关地方民意代表言责的新闻。第二天，他采写的新闻便刊登在《小世界》周刊一版头条。每一期《小世界》的清样，从第一版的刊头到第四版的广告，他都要亲自校对一遍。某一期的广告栏中，排字工人把“兹遗失牙骨印章一枚”，误排成牙“膏”印章，担任校对的同学都没有发现，竟被他校了出来。他在学生实习检讨会上作为例子，告诫大家：“任何一个字的小错误，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一位“世新”的学生毕业后留在《小世界》工作，某次疏忽大意被成舍我发现，成舍我在他的采访日志上批示：你再不认真努力，恐怕永远和新闻工作绝缘了。①

成舍我最大的心愿是在台湾办一份真正的“好报纸”，但是当局实行“报禁”，他只能在《小世界》这个“螺狮壳”里“做道场”。1988 年 1 月 1 日，台湾“报禁”正式解除，91 岁的成舍我奋其余勇，毅然于当年 7 月 12 日创刊台湾《立报》。如此高龄还创办新报，这在世界新闻史上也绝无仅有。

成舍我 1947 年在北平被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仍然担任，直到 1991 年 2 月才因老病自动办理了退职手续。不过，

---

① 台北世界新专学生集体记述：《师门沐恩记——我们敬记成舍我先生的训诲》，《新闻天地》（香港）第 1021 期，1967 年 9 月 9 日出版。

早年他在“立法院”以缄默闻名，对政府上的事很少发言。他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就是位“不提案、不发言、不投票”的“三不主义”者。其实，成舍我不是不说话，而是不随便说话。1955 年 3 月 4 日，在“立法院”第十五会期第五次公开会议上，他向“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两项严厉质询，让人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感。

关于“人权保障”问题，成舍我主要是针对“国大代表”龚德柏“失踪案”有感而发的。龚德柏曾在南京创办过《救国日报》，是出名的反共抗日死硬派，1950 年初携眷到台湾，被蒋介石委以“国大代表”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当年 3 月 9 日，龚德柏应邀到新竹“国防大学”演讲，话题虽是反共，但不忘捎带痛骂孔祥熙、宋子文等贪污舞弊几句。演讲结束后，突然不知去向。五年来，龚德柏的妻儿没有见过他一面，妻子急得头发脱落成光头，一家大小，啼饥号寒。龚德柏在新闻界人称“龚大炮”，口无遮拦，人缘很差，所以“失踪”后没有朋友为他奔走。龚德柏当年曾跟成舍我在北京一起办《世界晚报》，任总编辑，后离去自办《大同晚报》，成为成舍我的竞争对手，两人为此还打过“口水仗”。在众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一向缄默的成舍我却挺身而出，在“立法院”会议上公开批评当局“不审、不判、不杀、不放”的做法，为龚德柏争人权：

> 这五年中，他究竟犯的什么罪？关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但似乎谁都知道。这五年中，他没有受审，没有判罪，没有枪毙，却也总没有回家。此外又似乎谁都知道，龚德柏这个人，只在此岛中，云深不知处。有人说，因为他一生信口骂人，人缘太坏，没有朋友替他奔走，所以尽管失踪了五年，“不审、不判、不杀、不放”，主办这个案件的人，也就觉得很放心，不会引起何种反响。……诚然，他人缘不好，朋友不多，不过，我相信，龚德柏没有人缘，龚德柏却有人权，龚德柏纵无朋友支援，像这样“不审、不判、不杀、

不放”，却可以激起天下公愤。[①]

成舍我又列举了“立法委员”马乘风被捕[②]、“军法犯”不允许保释、在港部分“立法委员”被拒绝入台等事件与做法，指出这些都是政府无视人权、侵犯人权的行为。然后，他把话题转向了“言论自由”问题。成舍我指出，政府禁止创办新报刊，可以停止报刊发行一年或一年以上，并非依据“立法院”通过的《出版法》，而是依据 1952 年 11 月“内政部”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这一份由行政官署制定的施行细则，许多地方与母法《出版法》的立法原则冲突，“痛快地说，就是违宪”。1951 年，国民党当局以台湾印刷材料紧张、报刊数量过多为由，实行“报禁”。成舍我用台湾白报纸产量、千人阅报率等具体数据，驳斥这些理由的荒谬。自己就是因为“报禁”而不能复刊《世界日报》，有切肤之痛，所以他讲到此处，不无动情地说：由节约纸张及印刷原料，就可以禁止新的报纸杂志出版，“这真是天下奇闻”，台湾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少得可怜”，“少得可耻”！

成舍我关于“民主政治两大支柱”——“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洋洋万言的质询，赢得了全体与会“立法委员”的鼓掌与喝彩。据说，当时他对全场情绪的控制，为“立法院”有史以来所仅有。会后，《立法院公报》予以全文刊载。成又进行整理，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

1960 年 9 月 4 日，《自由中国》发行人兼社长雷震，及同人傅正、刘子英、马之骕，以涉嫌“叛乱”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成舍我认为，“雷案”即使涉嫌触犯普通刑法，但尚不至于触犯《惩治叛乱条例》，因而不该受军法审判。遂联合另一“立法委员”胡秋原在台湾各大报章发表声明，呼吁勿以军法审判“雷案”：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因言论文字涉嫌违法，被台湾省

---

①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176 页。

② 马乘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一届“立法委员”。1952 年因“匪谍案”突遭逮捕，羁押近三年尚未判决，亦不释放。1955 年 10 月，即成舍我在“立法院”提出质询后半年，才审结定谳，马被判无期徒刑。



雷震被捕前一个月摄于自由中国社门口。

警备总司令部依据《惩治叛乱条例》拘捕侦审。……

吾人主张并无“匪谍”或叛徒关系之言论犯或文字狱，得依“中华民国”《刑法》及《出版法》处罚，以期维护“国家”安全，保卫社会利益，但不应以叛乱论罪及军法从事。

雷震自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以来，就其言论而言，其主张“反共救国”，甚为显然。虽若干主张，非吾人所能赞成，惟书生论政，纵涉偏激，若其本旨在“反共救国”，争取民主自由，拥护“国宪”，反对暴力，则此种书生论政之是非，实未可与叛徒之犯罪视为一事。此意固非有爱于雷君之个人，而是爱护“中华民国”法治之前途。

“中华民国”之“反共复国”，现正面临最严重阶段，联合国大会开会在即，苏联、苏联附庸及中立主义者，方竭其全力，欲牵引“匪帮”，篡夺我代表权。“我国”政府与人民，正宜不分朝野，切实团结。有笔在手之书生，对当局之艰苦负责，不宜逞其意气，过分责难，致贬我国际地位，损我政府威信。而有权在手之当局，对书生爱国热忱，评论时政，更应恢宏大度，兼容并包，以民主自由之实据，昭大公大信于中外。否则国步日艰，危机四伏，覆巢之下，宁有完卵？此吾人所以于雷案发生，忧念后果，心所未安，不得不向有关各方垂涕而道，一贡其款款之愚也。①

“雷案”发生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正在美国开学术合作会议。为防止胡适在美国作出不利于台湾当局的言行，蒋介石指使“行

① 转引自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339～341页。引文中部分引号为引用者所加。

政院长”陈诚接连给他发去两通电报，告知“政府”抓捕雷震等人的依据，以及将根据“法律”妥善处理该案。胡适回电说“政府”此举不够明智，影响甚坏；既然已成事实，唯一补救方式是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全部公开。美联社、法新社记者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也陈述了同样意见：“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

雷震等人被抓后，《自由中国》编委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所谓“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实际上，大家都期盼自由民主的精神领袖胡适能够回台湾救雷震。何况，他还是《自由中国》的首任发行人，现任编委。但是，在蒋氏父子的软硬兼施下，胡适以换牙医为由，推迟回台。10 月 23 日，他终于回到了台湾。当晚接见记者，他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感慨，“光荣的下场”——胡适的话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雷震判刑以后，亲朋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大家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盼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可是星期五去了又来，胡适还是没去探监。聂华苓、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南港看胡适，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然而，胡适招待了他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①]

雷震和成舍我都是香港《自由人》的发起人。据聂华苓回忆，雷震在台湾筹组“中国民主党”时，成舍我也曾与闻其事。[②] 不过，成舍我和雷震的交情，远没有胡适深远。但是，“雷案”发生后，胡适顾虑重重，成舍我却在第一时间公开发表长篇声明，为雷震争权利。正如声明中所言，他这样做，不是“有爱于雷君之个人”，而是为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不受戕害。作为报人，成舍我是新闻出版自由的坚决捍卫者。1943 年 2 月 15 日，国民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虽然全文只有 31 条，“而对于记者束缚严酷，实可谓无微不至。其中最重要一点，即撤消记者证书，罪名过于浮泛，程序过于简易。”成舍我于 3 月 28 日发表

---

① 聂华苓著：《三生影像》，三联书店（北京）2008 年版，第 174～175 页。

② 聂华苓著：《三生影像》，三联书店（北京）2008 年版，第 168 页。

《〈新闻记者法〉应速设法补救》一文，建议对此法进行修改。在全国同业的一致反对下，《新闻记者法》最终没有实施。然而，1947 年夏国民党政府进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登记，各地新闻界为竞选关系，滥行登记，因此又有人呼吁施行记者法以确定记者身份。成舍我撰写万言长文《辛苦打消的“记者法”万不可再请施行》，以“专论”形式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告诫大家，“记者法中的每一项，施行以后，将不是白纸黑字的法条，而只是锒铛可怕的铁链。我全国记者，对此无限镣铐枷锁的存在，恐真要如古人所云‘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其为惨怖，何待言喻!”[1]

不过，雷震还是被“军事法庭”科以 10 年有期徒刑的重刑，刘子英处有期徒刑 12 年，马之骕处有期徒刑 5 年，傅正“交付感化”3 年。

1961 年元旦，《新闻天地》要出 16 周年新年特大号。卜少夫在香港又是电话又是快信，敦请老友成舍我为刊物写一篇评说时局的文章。成舍我对《新闻天地》感情很深，戏称其为“世侄”。他说，抛开与卜少夫的私人友谊不讲，单看在这位度过十六寒暑、饱经艰险的“世侄”份上，自己也应该写点东西作为礼物，祝他长命百岁。“但是不幸得很，我最近不知如何，提起笔来，总是兴趣索然，尤其谈到时


專論

辛苦打消的「記者法」萬不可再請施行（一）

——這是一大串鐐銬鎖鏈，我們決不能容許存在，且確定記者身份，亦根本與施行記者法無關！

成舍我

1947 年 8 月 26～30 日北平《世界日报》发表成舍我撰写的专论《辛苦打消的“记者法”万不可再请施行》。

① 成舍我：《辛苦打消的“记者法”万不可再请施行——这是一大串镣铐锁链，我们决不能容许存在，且确定记者身份，亦根本与施行记者法无关》，1947 年 8 月 26～30 日北平《世界日报》。

局，更好像有一块千斤巨石，压在笔上。”截稿在即，成舍我还是无法交卷，只好写信向老朋友道歉。一个在报纸杂志上东涂西抹四十几年，号称“摇笔即来”、“落纸如风”的新闻界“老兵”，何以忽然竟连一篇短文都交白卷？在给卜少夫的信中，成舍我没有直接自我解释，而是转述了另外一位同样没能交卷的朋友的话：

>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也是你所邀请写稿的另一位朋友，据说也不能交卷。间接传来他不能交卷的原因，是他认为所谓“文章报国”、“书生论政”，绞脑汁，呕心血，唯一目的，总不外希望于国家有益。如果“论政”结果，不特不能发生有益的功效，反而使有权阶级，视为寇仇，轻则警告、围剿，重且封门、坐牢。这情形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军阀统治下，无权而有笔的书生，为了贯彻主张，势必铤而走险，以军阀为革命对象，再接再厉，誓死搏斗。然若时移境异，政府不特是我们的政府，而且我们正在竭诚拥护，盼他领导国民，励精图治，中兴大业，早日完成。不幸这有权阶级中若干顽固分子，要贪权固宠，打击忠良，诤言逆耳，爱国有罪，那么，投鼠忌器，除了“封笔大吉”以外，试问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好在反共抗俄的民主体制下，人们尚有不说话的自由。“封笔大吉”，是否就算屈服？扼杀诤言，是否就算胜利？这些问题，在你和我的这位朋友看来，他相信自会从天下公论，未来事实，得到正确解答。[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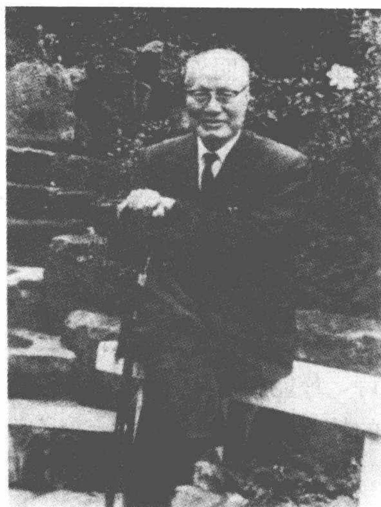
这段话显然是成舍我的“夫子自道”，他是借所谓的朋友之口，表达对国民党当局“打击忠良”、“扼杀诤言”的愤懑，用“封笔”来消极对抗国民党当局大兴“雷震案”。做过多年“世新”副校长的叶明勋说，陆放翁吊张才叔谏议“许国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峥嵘”，实为成舍我之写照。

成舍我到台湾后，冀望国民党打回大陆，自己也能够收回被共产党“抢夺”的《世界日报》，重建“自由报业”。“流亡在这个岛上的军民大众，唯一愿望是‘反攻’”。可是，“每届新年，大家总欢呼就将是‘反攻

---

① 成舍我：《我写不出文章》，《新闻天地》（香港）第673期，1961年1月1日出版。

年’的开始，一到岁末，又不免感到一年容易，再告幻灭。”[1] 他一方面对“王师”“今岁不战，明年不征”表示失望，一方面不忘咒骂“共匪必败”。1972 年 10 月，在美国读书的幼女成露茜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要成露茜代问父亲好，并说彼此之间有些误会，令尊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成露茜回台后将周总理的话转告给父亲，成舍我听后很高兴，并将此事告诉了好朋友黄少谷。[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加入了联合国，国民党“反攻”大陆无疑于痴人说梦。从此，成舍我不再多提“反共复国”之事，而是讲两岸的和平统一。1979 年，成思危在美国与父亲见面，成舍我认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必然趋势。他认为，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心向统一，反对分裂及异族入侵的，而且力图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文化。1985 年父子又在美国见面，成舍我说：“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并预言少则 5 年，多则 10 年，两岸总是要谈的。1988 年成思危携妻女在香港与父亲会面，成舍我特意要他们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并表示将来条件成熟时一定要争取回祖国大陆一行。[3] 他也曾与女儿相约，退休后要她们带他回北京、上海看看。可是，“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4]，直到去世，成舍我也没能再踏上大陆一步



成舍我晚年摄于台北。

成舍我年轻时喜欢吟诗填词，1916 年在上海还参加过革命文学团体

① 成舍我：《东望王师又一年》，1966 年 12 月 31 日，载《小世界》。

②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8 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8～159 页。

④ 宋人晏几道《生查子》词句。

"南社"。到北京后进《益世报》，和同事张恨水唱和，往往通宵达旦。张恨水写《春明外史》，内有一人叫"舒九成"，影射的就是成舍我。小说中描绘杨杏园和舒九成水边联句，实际上就是张恨水和成舍我两人的故事。后来成舍我自己办报纸做老板，也就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了。不过本性难改，诗兴上来，还是禁不住要"抒情言志"一番。1977 年 8 月 26 日，是成舍我的八十寿辰，门生故旧准备为他举行盛大庆祝。他不喜铺张，提前于 8 月 19 日去了美国，作为期一月的考察。在大洋彼岸，他做了一首《八十自寿》诗，以告慰故人。成思危认为，这首《八十自寿》诗，最能反映父亲成舍我"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的精神：

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训报先亲。
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
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
隔洋此日梦垂念，顽健差堪告故人。

征引书目

一、日记、书信、回忆录、年谱、传记

1. 德克·博迪著、洪菁耘、陆天华译：《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东方出版中心 2001 年版。
2. 无暇编：《战地日记》，之初书店 1938 年版。
3.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4.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5. 夏衍著：《白头记者话当年》，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
6. 夏衍著：《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6 年版。
7. 梁漱溟著：《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8. 张友渔著：《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9.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10. 《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11.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2. 黄绍竑著：《五十回忆》，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13. 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4.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15. 宋云彬著：《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6.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 年版。
17.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18. 陈存仁著：《抗战时期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9. 聂华苓著：《三生影像》，三联书店（北京）2008 年版。
20. 全国政协暨北京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22.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3.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24.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纪念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96 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0 年版。
25.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
26. 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 年版。
27. 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28. 卢敦基、周静著：《自由报人——曹聚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29.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 年版。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31. 郭太风著：《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
32. 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3. 白吉庵著：《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
34. 张林岚著：《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
35. 周天度、孙彩霞著：《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论著、主要文章

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张朋园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
3. 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4. 杨天石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 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6. 金冲及著：《转折年代——中国的 1947 年》，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
7. 刘统著：《中国的 1948 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北京）2006 年版。
8. 张仁善著：《1949 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9. 闻黎明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
10. 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11. 约·斯·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12. 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13. 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7 年版。
14.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5. 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6. 汪朝光著：《中华民国史·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北京）2000 年版。
17. 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北京）2000 年版。
18.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9. 曹聚仁著：《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
20. 曹聚仁著：《采访三记　采访新记》，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
21. 曹聚仁著：《采访本记》，三联书店（北京）2008 年版。
22. 曹聚仁著：《北行小语》，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
23. 曹聚仁著：《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 1946 年版。
24. 曹聚仁著：《新事十论》，香港创恳出版社 1952 年版
25. 曹聚仁著：《万里行记》，三联书店（北京）2000 年版。
26. 曹聚仁著：《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版。
27.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 1947 年版。
28. 成舍我著：《报学杂著》，中国文物供应社（台湾）1956 年版。
29. 《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 2007 年版。
30. 《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31. 赵超构著：《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社 1944 年版。
32.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 2008 年版。
33. 郑逸梅著：《书报话旧》，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34. 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35. 台静农著：《龙坡杂文》，三联书店（北京）2002 年版。
36. 牟润孙著：《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北京）2009 年版。
37. 徐宗勉、张亦工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8. 傅国涌著：《追寻逝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39. 傅国涌著：《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40. 散木著：《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1. 魏承思著：《两岸密使 50 年》，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42. 于劲著：《上海：1949 大崩溃》，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43. 刘宋斌著：《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44. 计红芳著：《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45. 张同欣、何仲山主编：《从南京到台北》，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
46. 汪幸福著：《胡适与〈自由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47.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48. 朱正著：《报人浦熙修》，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49. 李谷城著：《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50.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3 辑。
51. 赵遂初：《陈棺竞选国大代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13 辑。
52. 田肖德：《新民报关门前后》，《新闻天地》（上海）第 44 期。
53. 蒋丽萍、林伟平：《一九四六：众声喧哗》，《书城》2007 年 12 月号。
54. 余湛邦：《一九四九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7 辑。
55. 曹景滇：《拂去历史的烟尘——让真实的曹聚仁从后台走出来》，《新文学史料》2000 年第 4 期。
56. 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百年潮》2000 年第 5 期。
57. 张耀杰：《曹聚仁的“南来”与“北行”》，《传记文学》（台湾）第 91 卷第 1 期。
58. 罗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读书》1982 年第 12 期。
59. 古远清：《在左右夹攻中的曹聚仁——香港 50 年代发生的一场论战》，《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
60. 李雨生：《哀曹聚仁》，《新闻天地》（香港）第 1279 期。
61. 曹雷：《父亲原来是密使》，台湾《联合报》1998 年 3 月 8～10 日。
62. 徐訏：《念人忆事，悼曹聚仁先生》，《传记文学》（台湾）第 21 卷第 5 期。
63. 丁言昭：《曹聚仁初到香港的前前后后》，《百科知识》1998 年第 1 期。
64. 张潜华：《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70 辑。

65. 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 24 集。
66. 吴范寰：《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43 辑。
67. 关国煊：《锲而不舍的新闻界老兵成舍我》，《传记文学》（台北）第 58 卷第 5 期。
68.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
69. 马在天：《“解放”后的北平新闻界》，《新闻天地》（香港）第 71 期。
70. 易春秋：《成舍我大声呼吁保障人权》，《新闻天地》（香港）第 370 期。

三、史料与文献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3.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海上春秋》，中华书局（北京）2005 年版。
4. 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史迹文踪》，中华书局（北京）2005 年版。
5.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及续编，重庆出版社 1985、1987 年版。
6. 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7.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8. 《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 年版。
13. 杨秀菁、薛元化、李福钟编注：《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第 7～12 册），“国史馆”2002 年版。
14. 余克礼、朱显龙主编：《中国国民党全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5.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
16. 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图片出处

1. 新民报社“三张”：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　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版，第227页。/4
2. 陈铭德、邓季惺结婚20周年留影（1953）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10
3.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与孙女在一起　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版，第60页。/59
4. 南京受降会场全景（194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68
5. 曹聚仁怀乡诗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文前插页。/74
6. 曹聚仁初任战地记者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文前插页。/84
7. 曹聚仁与邓珂云在上海（1937）　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文前插页。/99
8. 上海望平街　仲富兰主编《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1840～1949）文体·教育·卫生》，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103
9. 上海电话公司的职员在领工资（1948）　杰克·伯恩斯摄影、吴可融译《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126
10. 曹聚仁去香港西装照（1950）　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前插页。/146
11. 曹聚仁与家人在上海（1959）　李伟著《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前插页。/164
12. 曹聚仁、邓珂云夫妇与徐淡庐在庐山（1957）　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百年潮》2005年第5期。/170
13. 奉化溪口远景（1957）　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

旋》，《百年潮》2005年第5期。 /174

14. 曹聚仁致四弟曹艺家书（1967） 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百年潮》2005年第5期。 /182
15. 曹聚仁于香港宅中（1960年代末）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文前插页。 /187
16. 曹聚仁躺在病床上写作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文前插页。 /191
17. 成舍我、陈训悆、李荆荪、卜少夫合影 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经世书局（台湾）1986年版，第266页。 /196
18. 青年时代的成舍我先生（1923）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文前插页。 /208
19. 成舍我翰墨（人太庙每事问）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文前插页。 /231
20. 成舍我为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生的题词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文前插页。 /246
21. 抱着孩子逃难的妇女（1948） 杰克·伯恩斯摄影、吴可融译《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285
22. 成舍我1952年与女儿嘉玲、露茜于香港九龙钻石山寓所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文前插页。 /297
23. 成舍我与夫人萧宗让、女儿嘉玲、露茜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文前插页。 /303
24. 雷震在自由中国社门口（1960） 聂华苓著《三生影像》，三联书店（北京）2008年版，第149页。 /313
25. 成舍我晚年在台北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文前插页。 /317

后　记

本书是去年出版的拙著《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的姊妹篇。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女士，没有她的关心、细心，这两本著作不可能如期高品质地出版。

本书书名采自台湾漫画家幾米的同名书。当我在书店偶然遇到他的手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顿时心领神会：这就是自己思而不得的最佳书名！当然，本书主题与他讲述的浪漫故事绝不相类，特用副题《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以相区别。感谢幾米赐予的灵光与情怀。

《人民日报》社的祝华新兄，当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求学时，我还在豫西山城的一所学校，过着类似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高中生活，所以我们原来并不相识。他看过拙著《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后，和我结为文字之交。他是位古道热肠之人，对拙著多方揄扬，惟恐淹没在汪洋书海之中。对于祝华新兄，我不想言谢，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责任。

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前辈、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他们慷慨为本书写下荐语，对我绝对是道义上的支持。

感谢我的太太蔡晖和儿子嘉树，他们母子第一时间分享了我写作的快乐与忧愁。

陈建云

2009 年 11 月 19 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